

中共高層

恩怨

◎ 辛紅將



領袖出版社

書名: 中共高層恩怨

作者: 辛紅將

發行人: 李大衛

編輯: 張小申

校對: 吳西洋

書籍裝幀: 黑茶客設計所

策劃: 明鏡有限公司

出版: 領袖出版社

網址: www.mirrormediagroup.com

電子郵件: taiwan@mirrormediagroup.com

地址: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 174 號 8 樓之一

通訊地址: 11199 台北郵局第 42-73 號信箱

電話: 0975150134

印刷: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總經銷: 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新北市新莊區五工五路 2 號

電話: (02) 8990-2588

傳真: (02) 2299-7900

全球郵購: 明鏡書城 www.mirrorbooks.com

通訊地址: P.O.Box 795, Deer Park, NY11729-0795, USA

美國紐約電話: (516) 487-0343

電子郵件: usa@mirrormediagroup.com

mirrorpublishing@yahoo.com

ISBN: 978-1-940007-18-2

版次: 2013 年 8 月

定價: NT449

本出版社出版品受國際版權公約保護

版權所有, 禁止翻印, 轉載, 複印, 違者必究

本出版品並不代表本社立場

本出版品缺頁或裝釘錯誤, 請寄回更換

目錄

- 7 千人送別陳希同, 不滿江澤民栽贓
- 23 鄧小平中計: 江澤民曾慶紅聯手搞掉“楊家將”
- 46 萬里“六四”行蹤揭秘
- 55 喬石對老友吳學謙突然變臉
- 61 他最早知道共產黨“六四”要殺人
- 70 我差點成了莫言的頂頭上司
- 89 莫言不是英雄, 只是講故事的人
- 96 阻撓改革開放的鄧小平
- 120 30 年了, 鄧小平帝國還在“崛起”
- 152 吳仁寶虛偽的光環
- 171 胡耀邦說他“又可愛, 又可氣!”
- 206 是黨變了, 我沒有變!
- 243 啼笑皆非進出黨——胡喬木勸吳祖光退黨記
- 254 鄧小平如何戰勝華國鋒
- 289 毛澤東打倒劉少奇的政治武器

目錄

- 327 毛澤東叫他“我的莊爺爺!”——大起大落的莊則棟
- 343 一個洋人的中國革命之路
- 363 守護和弘揚滄海中的珍貴——“粟”
- 379 浴火重生的周揚
- 411 “潘司令”帶走了多少歷史祕辛
- 416 路線分歧與制度質疑——林彪父與子的政治區別
- 424 嚴慰冰匿名信案始末與辨析
- 456 革命無情地吞噬自己的孩子
- 475 人生苦難與政權輝煌結合的完美怪胎
- 496 中宣部長鬧離婚鬧出流血事件
- 506 他見過很多中共最高領導人

- 527 後記

“六四”元凶之一陳希同在“六四”周年祭前夕病逝，讓民衆有機會一抒心中積鬱。以中共官員的現狀來看，陳希同算不上“貪官”，但他絕不是無罪無辜之人，他的罪行，比貪腐幾十萬元要嚴重得不知多少倍

千人送別陳希同， 不滿江澤民栽贓

病亡非病故·火化非當天

2013 年 6 月 5 日傍晚，新華社發布了一則簡短消息：

陳希同因患癌症，於 2013 年 6 月 2 日病亡。陳希同，男，83 歲，於 1998 年 7 月 31 日被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 16 年。2006 年 5 月 31 日保外就醫。

雖然晚了三天，但報喪總比秘不發喪為好。中國網民也頗為理解當局苦心：要在“六四”過去之後再發布。

這條消息雖然簡短，但是在早已精通“春秋筆法”的媒體和國人眼中，也是可圈可點。香港《太陽報》發表尤可夫的文章指出：“通篇不提陳過去擔任過何種職務，也無對其一生的蓋棺論定，是篇相當另類的報導。”



弔唁陳希同的花圈。

尤可夫說，報導不說“病逝”“去世”而用“病亡”這個中性偏貶的詞，避開“享年”和“終年”含有尊敬意思的詞。而且如此之短的報導，還用過半篇幅介紹陳受審及獲刑情況，凸顯他仍在刑期屬戴罪之身。官方如此處理，在尤可夫看來，“還是有著濃重的黨爭人鬥色彩，缺少人文關懷精神”。他指出，當年蔣介石去世，中國官方報導的標題是“人民公敵蔣介石死了”。事過快 40 年，面對陳希同去世，內地官方仍擺脫不了舊有的思維模式。

幾乎緊接著陳希同去世，香港媒體馬上就紛紛傳出讓人不少驚愕的消息：陳希同的遺體“當天”就火化了；一說“次日”即 6 月 3 日“匆匆於昌平殯儀館火化”，還說火化時用假名“陳希”，職業填“詩人、攝影師”。假名和職業是陳希同家人所取，因其年輕時愛好文學及攝影，曾以筆名“施長”在媒體發表過文章和照片。

沒想到，過了一個星期，讀者才知悉：上述消息都是烏龍，其實，他的遺體，一直存放在昌平殯儀館，直到 6 月 11 日，陳希同的喪禮才在該殯儀館舉行，明鏡新聞網記者獲得弔唁和火化過程照片，當天即予刊登。

據參與者現場觀察，送花圈者眾多，絕大多數是親友故交，但全國人大兩名前副委員長田紀雲、王漢斌，以及一些社會團體和知名企業也送了花圈。

香港中通社報導，陳希同的故交以及來自四川老家的族親前往弔唁，人數超過百人；但據《新史記》記者瞭解，人數

遠不止此數，相當熱鬧，估計達千人以上。香港《明報》獲悉，陳家人準備的 3000 枝白菊花很快就派發完了，30 本簽名冊都被簽滿，“弔唁者排隊以五人一組鞠躬，整個喪禮進行了一個多小時”。前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王漢斌、陳希同的副手、前北京市長李其炎、前北京市委副書記李志堅等人到場向其告別。陳希同的遺孀因病未出席喪禮，兩個兒子陳小希和陳小同出席。

這天的儀式結束後，陳希同遺體才被火化。

何以人望如此之高

陳希同以戴罪之身，保釋期間去世，儘管治喪活動受到諸種打壓限制，其喪禮參加者竟有千人以上，這個消息讓當



陳希同靈堂。

權者得知，無疑心驚肉跳——他們能嗅出其中的挑戰意蘊。

何以一個罪臣竟有如此之高的人望，聚攏這麼多人？分析人士告訴《新史記》記者，喪禮參加者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他過去在昌平、北京各個崗位任職時的同事、下屬——陳希同家屬之所以決定在昌平殯儀館舉行喪禮，重要考慮因素之一，也正是要方便許多故舊就近出席；此外，弔唁人士中，有惺惺相惜者，有兔死狐悲者，有鳴冤叫屈者……還有為數不少的一些人，與其說是來弔唁陳希同，不如說是藉此機會向當局發泄滿腹怨氣。

而從靈堂懸掛的輓聯也可以看出陳希同的遺屬的憤懣不平：“志同道合無愧無悔一生；閒居龍園笑看世間百態”。

83 歲的陳希同患絕症的消息，2013 年 2 月就被《明鏡月刊》披露於世。《明鏡月刊》報導：陳希同患下顎腺癌已到晚期，轉移到腦、肺，住進北京軍區總醫院幹部病房的四樓，醫生不表樂觀。

後來明鏡新聞網又多次報導過陳希同病危，人們有了思想準備，到 6 月 2 日傳來陳希同的噩耗，人們已不感到震驚。人們詫異的只是，他的死期竟如此湊巧，緊挨“六四”。

“六四”罪責賴不掉

陳希同這一生大起大落，有兩段引起巨大的爭議。一段是在 1989 年跟隨鄧小平、李鵬等人，在鎮壓學潮中表現



弔唁儀式後陳希同遺體被送去火化。

十分“搶眼”；一段是在 1995 年地位崇隆、聲勢鼎盛之際，突然被江澤民以經濟犯罪的名義拿下，引發北京乃至全國政壇的人事地震。

陳希同，1930 年 6 月出生於四川省安岳縣，1948 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1949 年 12 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中共進城之初，他做過一段時間的基層工作，歷任中共北京市西單地區街道工作組成員，北京市公安局 12 派出所副所長，北京市公安局內城二分局人事股副股長、文書股股長等。

1952 年陳希同調至北京市委辦公室任幹事；1953 年，他被任命為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的秘書，開始踏上權力台階。

1963 年，陳希同被安排為北京市昌平縣農工部副部長，

不久升任縣委副書記。“文革”初期，因為他與“黑市委”劉仁的關係，受到衝擊，一度被下放勞動。1971年，陳希同東山再起，在昌平一路升遷，歷任十三陵公社革委會副主任、馬池口公社黨委書記、昌平縣委副書記、縣革委會副主任、昌平縣委書記、縣革委會主任等職。

1979年12月，陳希同從京郊回到京城，升任北京市副市長。三年後，他當選為十二屆中央委員。1983年4月，被任命為北京市長。

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上，陳希同當選連任中央委員，幾個月後，1988年1月，他連任北京市長，4月，升為國務院國務委員。

他就在這個崗位上，遭遇“六四”。

儘管他與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市委書記李錫銘關係並不和睦，兩人明爭暗鬥，但是在追隨鄧小平、李鵬鎮壓學運上卻是同夥，而他因為更精明強幹，比李錫銘更受鄧小平、李鵬等人的器重，在民間的民憤也更大。

李鵬在《六四日記》中透露，當時任命陳希同為戒嚴總指揮。陳希同對這一說法強烈否定，力辯純屬子虛烏有；他也否認外界流傳他鎮壓學運的許多說法。不過，有兩件事，讓民衆不可能將他從“六四”元凶名單上撤下：第一，他在“六四”屠殺之後的1989年6月30日，以國務委員和北京市長的雙重身分，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做了長篇“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後來印發100萬份；第



陳希同主政北京時視察工作。

二，“六四”之後，陳希同青雲直上，不僅接任北京市委書記，並在 1992 年中共十四大上，當上政治局委員。

挑戰江澤民被整垮

天有不測風雲。陳希同仗恃後台鄧小平，又自忖“六四”有功，對江澤民居然被選中為“第三代領導核心”很不服氣，屢屢不服從、不配合，終於導致江澤民、曾慶紅下了決心，將之拿掉祭旗，以震懾全國各地不聽號令的諸侯。

1995 年 4 月 5 日下午，在北京市懷柔縣一處果園裡，涉嫌貪腐的時任北京市常務副市長的王寶森飲彈自盡，以一

顆子彈將自己的身後事一了百了，陳希同卻沒有那麼“利落”了。

次日，陳希同即向中央書記處呈交“引咎辭職報告”，但未獲通過。隨後 20 天裡，陳希同三次向中央提出辭職，均未得到批准。4 月 27 日，中央書記處同意陳希同引咎辭職，隨後他被拘捕審查。

當年 9 月的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上，通過決定：將陳希同清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保留黨籍以觀後效。“對其經濟問題，繼續進行審查”。

以陳希同為軸心的 22 名涉案人員也被關進大牢，其中包括他的兒子陳小同。

但對陳希同的審查過程並不順利。兩年多後，1997 年 8 月 29 日，才由中紀委出面報中央批准，開除陳希同黨籍。又過了半年，1998 年 2 月 27 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才以涉嫌貪汙和玩忽職守罪，決定將陳希同“依法逮捕”。

當時公布的罪狀是：“任北京市市長、市委書記期間，自 1991 年 7 月至 1994 年 11 月，在對外交往中接受貴重禮物 22 件，總計價值人民幣 55 萬 5956.2 元，不按照國家有關規定交公，由個人非法占有”。“任北京市市長期間，於 1990 年和 1992 年指使、縱容王寶森動用財政資金，在北京市八大處公園和懷柔縣雁棲湖畔修建兩座豪華別墅。違規建造別墅及購置設備款共計人民幣 3521 萬元。陳希同任北京市委書記後，自 1993 年 1 月至 1995 年 2 月，經常帶情婦某

某與王寶森等人，到兩座別墅吃住享樂，兩座別墅成為陳希同、王寶森享樂的場所。”

罪狀公布之後，輿論嘩然。作為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這樣的高官銀鐺入獄，審查數年，而且當局說得那麼煞有介事，坊間更是傳說他貪腐上億，最後竟然只是這麼一點犯罪事實和涉案金額：55 萬元禮品沒按規定交公！而縱容副手動用財政資金修建別墅——所謂“別墅”，也不過就是北京市的招待所，陳希同並未轉移到自己名下，而且據知情人評論，即使就當時的標準來看也夠不上“豪華”。

此案讓民衆看清：與其說是“清查貪腐”，不如說是“整肅異己”，陳希同固然是倒了大楣，但江澤民的形象也嚴重受損。



陳希同受審。

1998年7月31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一審以貪汙罪判處陳希同有期徒刑13年；以玩忽職守罪判處陳希同有期徒刑四年，兩罪並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16年。

雖是祭品，更是幫凶

陳希同並未在秦城監獄住得太久。數年後，他就被保外就醫，住進北京最高級的療養院——小湯山療養院的一棟三層小樓，吃住、醫療均由秦城監獄負擔。他還有專車司機，和他點名要來的一名廚師。日常生活均有服務人員伺候。

陳希同實際上享受了中共高官待遇。知情人士稱，他就是正常退休，退休金也付不起房租。

在中共垮台高官中極為罕見的是：在保外就醫期間，陳希同居然通過北京獨立學者姚監復發出聲音。

姚監復因表姐鍾鴻與陳希同半個世紀前同事交往的關係，得以在陳希同保外就醫期間多次探望，贏得陳希同的信任，前後做了八次訪談，請他回憶了往事並講述了看法。姚監復於2012年“六四”23周年前夕，在香港出版了《陳希同親述：眾口鑠金難鑠真》。書中陳希同對自己在“六四”中的作用自我辯護，反駁當局後來給他定罪的那些罪名。

後來姚監復對《新史記》記者講述了多次採訪陳希同的經過和陳希同保外就醫的生活。姚說，第一次見到陳希同，



《陳希同親述：眾口鑠金難鑠真》。

陳就開門見山地強調，自己不是貪汙犯。說他貪汙、判他的刑，完全是個冤案。“所謂‘貪汙 50 萬元的禮品’，是準備捐獻給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藝術發展基金會的”，“我打的借條也都俱在”，根本不是據為己有。他還澄清，在“六四”時自己也從未擔任所謂“北京戒嚴總指揮”。

陳希同寫下一首七言打油詩：“慣聽汙言心氣平，假話千邊詔高明。幾桿曲筆文革亂，三聲訛傳曾母驚。權欲熏熏滅心智，忠直代代鑄冤魂。謠言世家還謠斃，眾口鑠金難鑠真。”

分析人士指出，陳希同無疑是中共體制這台“政治絞肉機”的犧牲品，但他本人絕非無辜受害，也曾經充當過這座“絞肉機”的重要零件。當他病入膏肓之際，如果能抓緊人生的最後歲月，反思懺悔自己一生扮演的角色，講述出更多

鮮為人知的內情，不失為改惡從善的途徑。因而對他通過姚監復出版自述，更自我標榜為“眾口鑠金難鑠真”，抱有很大的期望。但是一讀之下，許多人大失所望，認為《陳希同親述》一書不僅內容十分單薄，沒有講出多少有價值的真話，而且表明陳希同儘管遭受江澤民的政治打擊，但是並未“覺今是而昨非”，沒有在監獄中和軟禁中認真讀書思考，拓寬視野，對自己在“六四”期間乃至整個從政人生做出深刻反省，實在是辜負了上天賜予臨終前發聲的珍貴機會。

儘管如此，分析人士對照他這本書與李鵬《六四筆記》、趙紫陽《改革歷程》等許多書和眾多當事人的回憶，以及有關人士披露的高層內幕，非常感嘆，“六四”期間中共體系的最高權力層，實際上是多麼混亂不堪！正所謂“各吹各的號，各唱各的調”，而中國的未來就交在這麼一個雜亂混沌的體系手裡，官員也好，民衆也好，實在是都只能自求多福！

分析人士還對《新史記》說，顯而易見，無論是李鵬，還是陳希同，儘管在字面上都強撐著咬緊牙關不鬆口，嚴守當時的口徑，但是心都是虛的，話裡話外，都是儘量推卸責任。

三個老鄉都給他背後一槍

世界著名的英國老牌雜誌《經濟學人》一向以深入報導和俏皮分析而著稱，陳希同去世的消息傳來，讀者期待《經濟學人》拿出與眾不同的深入俏皮的分析報導。《經濟學人》



陳希同的罪行比貪腐幾十萬元更嚴重不知多少倍。

再次不負眾望，標題為：“陳希同死得正當時”，文筆讓讀者一讀就強烈地感覺到皮裡陽秋：

中國失勢的前領導人陳希同死去的消息延遲兩天到了6月4日才傳出來，這也算是很合適。6月4日是1989年天安門抗議活動遭到暴力鎮壓24週年紀念日。當時的抗議示威導致中國首都癱瘓了數月。那個日子依然在困擾著中國政治。

陳希同一度獲得很大的權力，而且也似乎很樂意大力使用權力。他聲稱，他是權勢更大的人的犧牲品。假如他的這種抱怨是真實的，那麼，他在天安門鎮壓之後那些日子裡的經驗本來可以讓他對未來的事情有點預警。

陳希同在達到其權力巔峰的時候，有關他收受賄賂、擁有高檔別墅、玩弄一大群女人的私下議論不脛而走。但這

種私下議論本應表明他只是一個典型的、而不是例外的高級官員。在他倒台之前，他被認為是在北京快速發展期間一個能幹的官員。他後來遭遇困境，更多的是因為權力鬥爭，而不是因為他貪汙腐化。

有人說：也真巧，“六四”元凶中竟很有幾位“四川老鄉”，除了陳希同之外，更有鄧小平（四川廣安）、楊尚昆（四川潼南）、李鵬（四川宜賓）。中國俗語說：“老鄉老鄉，背後一槍”，說的是老鄉絕不可信。陳希同的這三個老鄉，都是給他背後一槍的人！

算不上貪官，卻是罪人

陳希同的兒子陳小同，在他氣焰萬丈之際，一度也是風雲人物；隨著他垮台，兒子立即遭到清算。

1997年2月10日，陳小同接到了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被告人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犯挪用公款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決定執行有期徒刑12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

陳小同原是北京一家中日合資酒店的總裁。首鋼周冠五之子周北方自80年代中期即開始操辦一大型房地產項目，陳小同聞訊積極配合。兩公子聯袂到美國夏威夷等地考察，花天酒地，自不待言。令人詫異的是，這位於北京西

直門立交橋東北角、占用大片黃金地段、耗費巨額資金的龐大工程，幾棟高層建築的結構及外裝修完工已有五、六年，卻一任風吹雨打，龐大的建築悄悄扔那裡，全然無人問津。

80年代末，為承包北京大觀園飯店工程，陳拼湊成立一個工程公司。這是個僅有十多人、沒有任何業績的皮包公司，註冊資本為上級撥給，資質資格係瞞天過海。經一番請客公關，陳衙內的公司不僅拿到了營業執照，而且很快就獲得數億元人民幣投資……

以中共官員的現狀來看，陳希同算不上“貪官”，江澤民整垮他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但陳希同絕不是無罪無辜之人，他的罪行，比貪腐幾十萬元要嚴重得不知多少倍，即使他去世了，這筆帳也掛在史冊上，等待未來清算。（《新史記》特約記者沈志強）■

“六四”之於鄧小平，就像“文革”之於毛澤東。凡是政治強人感到心虛理虧之事，擔心一讓步會危及自己的歷史地位，便都會表現得格外敏感，絕不許旁人“翻案”。“楊家將”的命運就此決定

鄧小平中計：江澤民曾慶紅 聯手搞掉“楊家將”

93 歲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祕書長楊白冰，於 2013 年 1 月 15 日去世。距離他親自參與、直接指揮的“六四”清場鎮壓學運血案已有 24 年；距離他被鄧小平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整下去已有 21 年。21 年來近乎人間蒸發，中國年輕一代幾乎沒有人知道他，哪裡想象得到，他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後期、九十年代初期三、四年間炙手可熱、氣焰衝天？！

隨哥哥青雲直上

沒有什麼比楊白冰的經歷，更能體現中共政治鬥爭的風雲詭譎而又殘酷無情。



楊白冰

楊白冰，1920年9月出生，重慶潼南人，原名楊尚正。1938年參軍並加入中共，曾在陝北公學和抗日軍政大學學習。1939年起，歷任民運工作隊隊長、組織部幹事，八路軍第129師政治部組織部青年幹事、民運部社會調查副主任。1943年秋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次年任第129師延安留守處政治協理員。

解放戰爭時期，任晉冀魯豫軍區政治部組織科科長，經扶縣縣委組織部部長、經東縣工委書記兼縣游擊大隊政治委員。1948年9月起，在中原軍區暨中原野戰軍政治部從事組織工作，當過組織科副科長、組織部副部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西南軍區後勤部政治部組織部長、成都軍區政治部組織部長等。1960年10月，陞任成都軍區政治部副主任。1979年4月起，任北京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副政委、政委。

八十年代中期，楊白冰同父異母的哥哥楊尚昆地位扶搖直上，1987年11月，楊白冰直陞為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次年晉陞為中央軍委委員。1988年中國軍隊實行新的軍銜制，楊白冰在首批被授予上將軍銜的17人中排名第五。

1989年11月，楊白冰接任哥哥楊尚昆的中央軍委秘書長職務，仍兼任總政主任，在十三屆五中全會上更被增補為中央書記處書記，達到其政治生涯的頂峰。

楊白冰是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上突然失去實權的，那一屆黨代會爆出兩大驚人消息，一個是幾乎沒人聽說的50歲的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胡錦濤，被選中當了“王儲”；另一個

就是 72 歲的楊白冰失勢，雖然他當選為政治局委員，但不再掌管兵符。很明顯，給他戴上這一頂空頭烏紗帽，只不過是為避免軍心、黨心和民心發生巨大震蕩而已。

當時的中共高層還沒有“七上八下”這樣的年齡規則，在政治局中 70 來歲繼續掌權的高官有的是，鄧小平請出了比楊白冰還要大 4 歲、當時已 76 歲的劉華清重新出山掌軍，還進入政治局常委。人們如墮五里霧中：楊白冰不是隨著他的哥哥楊尚昆，鞍前馬後緊跟鄧小平嗎？哥哥監國、弟弟監軍的格局，不是鄧小平親自定的嗎？就在鄧南巡之後，楊白冰提出解放軍“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不是音猶在耳嗎？

有分析人士說過，在現實政治中，人治不如法治；但是敘述歷史，法治不如人治：法治社會，大家都按規矩辦，平淡無奇；而人治社會，掌權者靈機一動，忽發奇想，歷史的河流就可能大改道，充滿了意外和偶然。中共高層權鬥的劇情正是這樣峰迴路轉、波瀾疊起：楊白冰在大權在手、勝券在握之際，失手露出一個破綻，江澤民與他的大內高手曾慶紅把握住了絕地反攻的機會，竟然使局勢來了個大翻盤。不僅令“楊家將”滿盤皆輸，更影響到許多高官和民衆的命運。

故事要從楊尚昆與鄧小平的關係講起。

得鄧信任，勢力坐大

比楊白冰大 13 歲，1907 年 8 月 3 日出生的楊尚昆，是中



1961年鄧小平、楊尚昆到廣東視察。

共主要領導人之一。他與鄧小平算四川同鄉，早在三十年代的中央蘇區，兩人就很密切。1956年中共八大，鄧小平出任中共總書記，楊尚昆為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辦主任，兩人愈加密切。

“文革”中，楊、鄧先後被打倒。楊尚昆與彭真、羅瑞卿、陸定一並稱為“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文革”之初即被捕入獄，直到“四人幫”垮台後的1978年底，鄧小平復出重掌大權，楊尚昆才得以重見天日。

楊尚昆復出後，得到鄧小平充分信任。1979年2月，被任命為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兼廣州市委第一書記，與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一起主持廣東工作。1980年9月，楊尚昆從

廣東調回北京，擔任一個又一個要職。在鄧小平竭力堅持下，1988年4月，在七屆人大第一次會議上，楊尚昆以80歲高齡出任國家主席。

鄧小平與楊尚昆的友誼非比尋常，楊尚昆可隨意出入鄧家，楊尚昆更成為鄧小平退出權力核心圈後，向中共中央政治局發號施令的欽差大臣，政治局遇有重大事情向鄧小平請教，多是通過楊尚昆轉達。

楊尚昆的勢力在軍隊中更是盤根錯節。他與廖漢生、蕭克、賀龍有各種親屬淵源：廖漢生是楊尚昆的親妹夫，十大元帥之一賀龍的親外甥，1955年被毛澤東授予中將軍銜，曾任國防部副部長，北京軍區、南京軍區、瀋陽軍區政委，後來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賀龍雖早在1969年“文革”中就被迫害致死，但他是紅二方面軍創始人，建國後曾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體委主任，軍中影響猶存；而開國上將蕭克，曾與賀龍結拜為兄弟，一起出生入死，共同締造了紅二方面軍，他娶了賀龍妻子騫先任的親妹妹騫先佛作妻子，建國後又歷任國防部副部長、農墾部副部長等職務，八十年代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

在楊尚昆陞到政壇頂層期間，蕭克、廖漢生聲勢看漲。在楊親自關照下，賀龍之子賀鵬飛火箭式上升，1984年初39歲時，陞任總參謀部裝備部副部長，兩年後時陞任裝備部部長。



楊尚昆和楊白冰。

“六四”中扮演什麼角色？

楊尚昆往上攀一攀，楊白冰往上躡一躡。

1987年11月，在十三屆一中全會上選出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第一副主席趙紫陽，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楊尚昆。全會一閉幕，立刻宣佈楊白冰出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

高新在《溫家寶傳》中披露這段內情說：當時，黨內曾專門傳達，解釋楊尚昆對安排自己弟弟出任總政主任一事“有顧慮”，鄧小平用“舉賢不避親”一錘定音。自此，“楊家將”的說法開始在黨內、軍內流傳。以至在八九學潮期間，楊尚

昆自己都向元老們感慨：“我們‘楊家將’名聲不好聽啊”。

“楊家將”在1989年“六四”中扮演的角色，一直讓人疑猜。

鎮壓學潮最後靠槍桿子說話，然而李鵬、陳希同、何東昌等人都不是軍人；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不會直接出面，第一副主席趙紫陽反對鎮壓並稱病請假，那麼，就只有常務副主席楊尚昆有權出面調兵遣將了，在1989年5月20日宣布戒嚴的大會上，他出面講話動員。楊白冰當時也頻頻露面，2004年，香港媒體報導，中宣部製作了一張“六四真相”光碟，組織司局級官員觀看，其中透露，楊白冰作為戒嚴部隊總指揮，由他下達了鎮壓令。

“六四”之後，包括趙紫陽、李鵬等各方人士對楊尚昆當時態度的回憶大可玩味。分析人士一般判斷：楊尚昆在學生抗議和絕食之初，是傾向於趙紫陽的解決方案的，為此還做了一些斡旋。但是後來見鄧小平態度強硬，於是就轉而積極按照鄧的指令具體部署，站到了歷史錯誤的一邊。

然而，楊尚昆在九十年代自己也失勢之後，對解放軍軍醫蔣彥永說：“六四”事件是中共歷史上犯下的最嚴重錯誤，將來一定會糾正。這使“楊家將”的角色更加模糊。

“攝政王”離“太上皇”一步之遙

八十年代曾在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室、中央辦公廳工作

過，“六四”後入獄的學者吳稼祥曾評論：八十年代，中國政治舞台上形成三大集團：改革派，保守派，陰謀家派——陰謀家派就以楊尚昆為首。吳稼祥把“六四”定義為趙紫陽為代表的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的決戰，決戰結果，全都是失敗者：保守派利用了學生，楊尚昆利用了保守派和學生、趙紫陽和鄧小平之間的衝突。他處於最有利的地位——既能溝通鄧小平、趙紫陽，又能溝通保守派。他的位置使他可以讓趙、鄧和保守派同歸於盡，自己取而代之做“太上皇”，控制軍權，找一個“兒皇帝”。

楊尚昆幾乎辦到了這一點，在其後兩年半內，他是“太上皇”鄧小平全權委託、代“太上皇”發號施令的“攝政王”，他離完全的“太上皇”只有一步之遙。

吳稼祥認為，楊尚昆想當“太上皇”，也就為自己的最終滅亡種下了禍根。因為他的言行瞞不過鄧小平，只是鄧當時不敢和他動手：鄧不可能既打趙紫陽，又打楊尚昆，楊尚昆倒向哪一邊，哪一邊就加強，所以鄧小平一定要穩住他。何況



十三屆四中全會換班後的政治局六名常委以楊尚昆為中心合影。

楊尚昆軍權在手，對他動手必須小心謹慎。再說，鄧小平迫不得已整垮了趙紫陽，弄上來一個江澤民，還必須用楊尚昆對江澤民進行指導和監督。

常委為何是雙數？

鄧小平表面上對江澤民信任，大大方方地在 1989 年 11 月十三屆五中全會上讓出中央軍委主席職位。但與此同時，鄧卻進一步加重了楊尚昆在政治局和軍委內的份量，不惜詔告天下：楊尚昆就是在扮演輔佐“弱主”的攝政王角色：楊尚昆僅僅是政治局委員，但官方報導，排名都是江澤民第一、楊尚昆第二，接下來才是李鵬、喬石、姚依林等一干政治局常委。

最有代表性的莫過於 1989 年 10 月 1 日，黨內元老與現任領導人登上天安門城樓“舉國歡慶”的新華社通稿，出席者排列順序是：江澤民、鄧小平、楊尚昆、李鵬、陳雲……楊尚昆的大名不但排在李鵬以下所有政治局常委前面，而且還排在時任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陳雲前面。

十三屆四中全會閉幕次日，由新華社統一發稿，刊登在所有官方媒體上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的照片，除了按順序刊出“調整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六個人的單人照，特別配發一張集體合影，共七人，六個新常委分列楊尚昆兩邊，照片說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楊尚昆同志合影”。歷屆政治局常委人數都是單數，唯獨這次在非常事件之後倉促調整

的常委變成了雙數。鄧小平“心中有數”：要的就是雙數，才能加上楊尚昆這個不是常委的超常委，讓他在可能出現的勢均力敵的票決中一言九鼎地體現自己的意旨！

1989年11月的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上，江澤民在接任軍委主席的就職演說中，特別表示：有尚昆同志擔任軍委第一副主席，劉華清擔任軍委副主席，楊白冰同志擔任軍委秘書長，是自己做好工作的“有利條件”。

“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

到“六四”之後，鄧小平把軍委主席職務交給江澤民時，楊尚昆取代趙紫陽的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鄧小平點將讓楊



1992年，楊尚昆陪同鄧小平南巡。

白冰接替其軍委秘書長職務，還同時安排增補楊白冰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這既有籠絡楊尚昆、安撫楊家將之意，也有安放棋子，看住江澤民之意。

趙紫陽在任時，十分明白自己這個“軍委第一副主席”是空有其名，鄧小平提醒他要過問一下軍隊時，總是裝聾作啞；江澤民擔任中央軍委主席之後，楊家兄弟實權更大，連軍委副主席劉華清都感到插不進手，遑論江澤民？

鄧小平痛感江澤民不僅不推動改革開放，而且從理論上批判改革開放，百般無奈，只有親自出馬。1992年1月17日，鄧小平在家人和國家主席楊尚昆陪同下，開始武昌、深圳、珠海、上海之行。在武昌，在深圳，鄧小平多次發表講話，並要當地官員給中央傳話：“改革開放是大勢所趨，得到了全黨全國人民的擁護，誰不改革誰下台。”

同時，鄧小平讓楊尚昆等人負責草擬中共十四大人事新名單，流露出想撤掉江澤民、李鵬的打算。他在南巡途中還一再提起，說趙紫陽主管經濟的那五年“加速發展功勞不小”。南巡回來後，鄧小平又派人和趙紫陽聯繫，說認個錯就可以出來工作，但趙紫陽仍不認錯。

1992年3月下旬，北京召開七屆人大第五次會議，改革是大會的主旋律。楊白冰率先喊出：“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他授意《解放軍報》發表題為“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的社論，旗幟鮮明地支持鄧小平。在總參系統中頭一個響應的，是副總參謀長何其宗。楊白冰的“保駕護航”直接針對

的就是江澤民。

楊白冰代表軍方對南巡講話表態，為鄧小平“保駕護航”，使得形勢急轉直下，震懾了江派人馬。

楊白冰百密一疏，曾慶紅絕地反攻

江澤民最信任的助手曾慶紅非常明白眼前江的處境，如果江在十四大黯然下台，也就意味著曾慶紅政治生命的極大挫折。緊要關頭，曾慶紅讓江澤民放下身段，主動與李鵬合作，他多次隨江一起拜訪李鵬，講清只有同舟共濟，才能穩住



楊尚昆與江澤民。

陣腳。於是江、李一連以中共中央、國務院名義下發了近 20 個文件，大談學習鄧小平南方談話，以主動改革的姿態，化解鄧小平對他們的不滿。

曾慶紅清楚，在鄧小平正在醞釀扶植的楊尚昆、喬石、田紀雲等人中，楊尚昆無疑最關鍵。他把握住了一次千載難逢的機會。

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楊白冰提出了一個晉陞百名將軍的名單，包括：49 歲的副總參謀長何其宗中將、52 歲的總政治部副主任周文元中將、51 歲的總後勤部副部長宗順留少將、48 歲的總參謀部裝備部部長賀鵬飛少將等。

這個方案需層層報請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軍委第一副主席楊尚昆、軍委主席江澤民批准。第一關劉華清，經楊白冰親自當面詢問，表示同意；第二關楊尚昆，也點頭了，並批示請江澤民審閱批准；最後一關江澤民，拿到這個方案不知所措，隨即找曾慶紅商量如何處置。曾慶紅建議他先壓下，找時任總政治部副主任于永波來商量。

于永波是江澤民在軍中關係最親近的人。江澤民任職上海期間，于永波是南京軍區政治部主任，曾兩次與江澤民一起出國訪問，與江很談得來。江澤民於 1989 年 11 月擔任中央軍委主席後一個月，即提拔于永波任總政副主任。

于永波說，楊白冰提出的百人方案從未徵求過他的意見，基本都是楊尚昆、楊白冰的親信，目的是完全剝奪江的知情權，徹底架空江。曾慶紅判斷，這個方案出台，說明楊白冰有

恃無恐，不僅不把江放在眼裡，更不把小平同志放在眼裡，想以“楊家將”人馬來徹底替換鄧小平在軍隊中的班底。

於是，曾慶紅聯繫了他的兩個“太子黨”盟友，時任青島市長俞正聲和時任昆明市長劉京，這兩人都曾是鄧樸方的得力助手，擔任過中國殘疾人理事會副理事長，曾慶紅請他們與鄧樸方聯絡，隨後，曾慶紅與鄧樸方見面深談。

抓住了鄧的“六四”心結

在曾慶紅與鄧樸方會面之時，北京城關於“楊家將”不可一世、“楊尚昆想取代鄧小平”甚至圖謀搶班的流言盛傳。楊白冰所提百名將軍名單在中共高層內越傳越廣。激起更多派系的元老不滿。李先念對比他大一歲而接替他任國家主席的楊尚昆一直耿耿於懷，現在當然藉機反對；陳雲、彭真也認為楊氏兄弟的權力過大；出自第三野戰軍的張愛萍等要求不搞“家天下”，張親自找江澤民，向鄧、江推薦老部下、時任國防大學校長的張震協助江澤民抓軍事。

《新史記》特約記者葉茂之援引“可靠消息來源”披露，曾慶紅對鄧樸方首先介紹了江澤民的處境，大意是：江對鄧小平的部署和思路，都從內心認同，很想貫徹執行好，但是力不從心，因為楊尚昆實際上控制著實權，令江澤民沒法幹工作。特別是軍中事務，江根本插不上手，完全聽命於楊。江澤民是有能力的，只要賦予其全權，定能放開手腳幹得很出色。



江澤民和曾慶紅搞掉“楊家將”。

曾慶紅特別向鄧樸方剖析了“楊家將”在軍中的勢力。主要圍繞二條：一、楊尚昆、楊白冰的勢力在楊、廖、蕭、賀四大親屬關係的基礎上越來越膨脹，已經沒有人能與之抗衡。這次楊白冰推出百名將軍方案，名義上實行軍隊的新老交替，實際上就是以“楊家將”徹底替代“老爺子”（指鄧）人馬，將解放軍演變成變相的“楊家軍”。現在，哥哥是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弟弟是中央軍委秘書長、軍委四號人物，這於黨、於國、於軍都十分危險。

二、楊尚昆有比較明顯的平反“六四”的意圖。“六四”後，楊尚昆始終間接否認是自己下令清場開槍，同情趙的處境，這等於把責任推給“老爺子”，也留下楊尚昆與趙紫陽重

新合作的空間。若“老爺子”讓趙紫陽復出，等於間接承認了自己當初決策錯誤。趙紫陽一旦復出，楊、趙合作，一切局面都會顛倒過來，國家可能再度出現不穩定。

在曾慶紅與鄧樸方會面不久，江澤民帶著于永波親自拜見了鄧小平，鄧小平則召來了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于永波先介紹了楊白冰所提百名將軍方案的來龍去脈，說明了有關背景；江澤民著重談了為什麼他壓下這個方案；劉華清則從旁證實江澤民在軍委大權旁落。

鄧小平當時只聽不說。分析人士說，曾慶紅談到楊尚昆可能重新評價“六四”，抓住了鄧小平的心。“六四”之於鄧，就像“文革”之於毛澤東，凡是毛、鄧感到心虛理虧之事，又擔心一讓步會危及歷史地位，便都會表現得格外敏感，絕不許旁人“翻案”。

“楊家將”的命運就此決定。

楊尚昆再也見不到鄧小平

在一陣緊似一陣的“倒楊”聲中，鄧小平不露聲色做出重大決定，放棄與他共事幾十年的老鄉兼密友楊尚昆，不再要楊主持十四大人事安排，而是再次與陳雲、李先念結盟，指定薄一波、江澤民、李鵬、宋平主導中共十四大人事安排。

鄧小平與楊尚昆的通家之好，就此告終，曾頻繁走動的兩家子女，互不來往。

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上，劉華清、張震進入中央軍委輔佐江澤民。楊白冰被免去軍委秘書長和總政治部主任職務，其總政主任職務由于永波接任，軍委秘書長一職撤銷。

楊白冰100人名單中的絕大部分人的仕途由此走下坡路。

何其宗於1993年1月調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周文元於1992年11月調任瀋陽軍區副政委，宗順留於1993年3月調任瀋陽軍區後勤部長，後來都無聲無息；賀鵬飛未進入中共十四屆中央委員會。

鄧小平於1997年2月19日去世。十年後，楊尚昆之子楊紹明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大談父親與鄧的“革命友誼”，以及兩家互動關係，試圖澄清外界關於鄧楊恩怨的說法。

楊紹明回憶說，鄧小平的生日是8月22日，父親每年都



1997年2月25日，鄧小平追悼大會現場。

會送去花籃，或者送些禮物表示心意，1996 年鄧小平生病，禮物沒送成。

楊尚昆曾希望見鄧小平，但沒見到。他正在海南三亞時，秘書告知中央通報鄧小平去世了。楊尚昆馬上要求飛回北京，空軍說專機有個零件出了點問題，當天不能起飛。楊說：“今天不能飛明天飛，你們今天必須把它修好。”並再次表示，不管怎樣，要見小平最後一面。

楊尚昆飛回北京時，中共中央已向遺體告別過了，他未能見上鄧最後一面。楊尚昆叮囑送花圈到鄧家，並親手寫了挽聯：“小平同志永遠活在我們心中”。落款：“尚昆率子女敬挽”。不過，鄧小平的夫人卓琳沒有同意楊家送過去，派了鄧的警衛員到楊家來取。

鄧小平追悼大會召開時，楊尚昆說要選一套最莊重的衣服，最後穿了一套西裝，站在最前面。致悼詞時全體要起立，直到悼詞念完，時間很長，家人很擔心 91 歲的楊尚昆能不能支持住，但他一直站在那裡，也沒有哭。

鄧小平去世一年多後，楊尚昆 1998 年 9 月 14 日也去世了。一向很少出門的卓琳來到靈堂，坐了許久沒有離開。

楊白冰只能對家鄉父母官發指示

楊白冰的政治局委員的職務，到 1997 年中共十五大時才結束。哥哥死時楊白冰 78 歲，從那時到他自己去世，14 年



1991年春，鄧小平、楊尚昆在北京玉泉山。

來，楊白冰的地位相當尷尬。

不同於銀鐺下獄的高官，但更不同於功成身退的元老，楊白冰失權失勢，卻並沒有挨鬥挨整，不過，軍隊裡他提拔和重用的所有黨羽都被整肅，讓楊白冰沒有任何可施展的空間。

楊白冰一直跟江澤民水火不容。據稱數次在退休高官範圍內猛烈抨擊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知情人說，中共十七大前，2007年7月15日，楊白冰曾與28名退休黨政軍高官，上書總書記胡錦濤及中央政治局，題為《我們的責任和憂患》，列出了政治、制度、經濟、社會、對外路線、對台灣方針等六個方面，稱現行路線、方針政策背離了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主

義理想，實際上要求清算“江澤民路線”。胡錦濤沒表態，最後不了了之。

楊白冰不得不識相，關起門來安度餘年。少有的幾次露面機會，都是沾他的哥哥——烈士楊闇公和前國家主席楊尚昆的光。

2010年初夏，李鵬要出“六四日記”餘波未了，又傳楊白冰也想出回憶錄澄清“六四”真相，被中央阻止。

楊尚昆去世前，要求楊家人不要寫自傳或回憶錄。但楊白冰認為，如果自己不寫，楊家在歷史上的功過將會被當局任意塗抹，於是決定以這種方式來表白。

總部在美國的博訊網透露，楊白冰回憶錄是借一位在廣州中山大學做訪問研究的美國威斯康辛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教授之手進行的。楊以接受採訪的方式一吐積懣。在當年上半年已完成採訪，中英文的寫作材料也就緒。

不料這件事被當局察覺，中央派人找楊白冰和美國教授談話，要求“暫緩”出版，理由是回憶錄涉及敏感話題。據稱美國教授慨嘆：“這本回憶錄的命運，恐怕要看江澤民與楊白冰，誰先去見鄧小平和楊尚昆了！”

2007年7月20日，四川潼南縣委書記向和平、縣長羅建極等人去楊白冰家拜望。沒有任何一家官方媒體報道，只有該縣網站上發出一條消息津津樂道：縣領導“參加完中共中央舉行的紀念楊尚昆同志誕辰一百週年座談會後，到楊白冰家拜望，受到白冰同志親切接見”。



1956年9月，楊尚昆在中共八大上與毛澤東合影。

報道說：“白冰同志專門談起胡錦濤總書記關心尚昆同志家鄉潼南一事。他說，胡總書記親切詢問家鄉情況怎麼樣。他向胡總書記匯報說，家鄉變化很大，摘掉了貧困縣帽子，新農村建設也搞得很好。胡總書記對他說，新農村建設要因地制宜，搞好群眾文化生活，主要要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

想過去楊白冰宣佈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時，何等叱咤風雲，眼下卻只能對幾個七品芝麻官煞有介事地發指示：“語重心長地對向和平、羅建極一行說，潼南近年來發展很不錯，潼南的領導和人民都付出了努力，鼓舞人心，一定要把潼南建設得更好”；“送到大門口，抱拳告別，並深情地說：‘家鄉的事就拜託你們了！’”真是情何以堪！

“六四”屠夫揹黑鍋？

“楊家將”最後一個將星殞落了，但留下的歷史亂麻並未揭開。疑團有二：

一是，“六四”時楊尚昆和楊白冰究竟扮演什麼角色？他們對“六四”持何種態度？

二是，“楊家將”倒台，究竟是江澤民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而把他們拉下台，還是楊家兄弟真的試圖平反“六四”而變相政變未遂？

“六四”之後，中共中央高度肯定動用坦克平息“反革命暴亂”，但實際上絕大多數參與鎮壓的將領和強硬派官員，從李錫銘、陳希同、何東昌到袁木、張工……後來都陸續被冷凍甚至貶抑，楊白冰最終也不例外。

《明鏡》出版集團總編何頻在接受 BBC 電話採訪時說，楊白冰積累了強大的人脈關係，外界公認他是中國政治舞台上最堅不可摧的人物之一，“卻莫名其妙地突然失去了所有實際權力，許多高級將領也受到他的牽連而失去權力”，這可以算是中共內部的另一次“宮廷政變”。“到目前為止，這件事的幕後真相從未得到過清楚的解釋。”（安江河）■

等到槍聲大作、“六四”屠城之後，為了所謂的黨性原則和自己的身家性命，萬里也不得不轉而譴責他們那個黨所稱的“天安門反革命暴亂”了！

萬里“六四”行蹤揭秘

傅高義《鄧小平時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中第21章“天安門悲劇”，提到了“六四”時期，中國名義上的最高權力機構、時任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時有一段，字數不多，引用如下：

5月中旬萬里正在北美訪問。由於擔心他可能支持趙紫陽，中央領導人通知他不要直接回北京，而是先去上海。5月26日凌晨3點萬里到達上海機場，迎接他的是江澤民和丁關根。丁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他向萬里通報了形勢。第二天丁關根根據北京的指示，向萬里作了更全面的彙報。江澤民交給了萬里一些北京準備好的文件，解釋為何要讓趙紫陽下台。雖然萬里在北美時說過一些贊成民主的話，但是回到上海後，這位一貫忠誠的中共黨員表示支持鄧小平的政策。然後他才獲准回到北京。



萬里

不尋常的出訪

其間，萬里在北美的行程如何，究竟說了些什麼贊成民主的話，當時還跟著他一起出訪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主任記者劉振敏在剛剛自費印製的三卷本《小人物記大事》中“萬里的一次不尋常出訪”裡有著詳細記述，作為歷史的補充材料，故作摘要轉錄。如作者所講，“1989年北京發生的六四風波在歷史上濃濃地記下了一筆。若干年後如何評價，那不是我的事。我只從記者的角度真實地記錄下我的難忘經歷。這是當時的認識。”

傅高義書中說，鄧小平認識萬里的時間與趙紫陽一樣，都是在晉冀魯豫邊區的1946年。但經歷過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國人都知道，當年萬里與趙紫陽的聲望都一樣高，“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這兩句民間俚語謠諺，曾風靡中華大地，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鄧小平也說過，“中國改革始於農村，農村的改革始於安徽，萬里同志是有功的。”從1988年到1993年，萬里擔任全國人大委員會委員長，到1993年離任。

劉振敏書中記述，1989年5月4日，外交部發布新聞，萬里將於5月12日到6月1日分別對加拿大和美國進行正式友好訪問。陪同人員有萬里的夫人邊濤、人大副秘書長曹志、外交部副部長朱啟禎、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顧明、中國

駐美國大使韓敘、駐加拿大大使張文樸、人大外事局長石國寶、新聞局長張虎生等。專機上的記者共有九名，劉振敏是其一。

萬里的專機於 12 日下午離開北京時，首都大學生此時正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絕食、靜坐，百萬人的大遊行無日無之，天天都有。劉振敏認為絕大部分人是愛國愛黨的，但也有個別搞政治陰謀的人是打著“自由民主”的旗號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如她說反革命煽動分子金觀濤就於 4 月 21 日揚言：“中國大亂之至，中國危亂在日，諸位拭目待之。”劉說自己是經歷過文革動亂的人，所以反對任何形式的動亂，4 月 22 日，她去參加胡耀邦追悼大會的實況轉播，因為交通阻塞，差點沒進去人民大會堂，又因為天安門廣場聚集著幾十萬學生，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還取消了從長安街到八寶山的全程現場報導計劃。5 月 4 日，趙紫陽說，“中國不會出現大亂……學生絕對不是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5 月 8 日，她到中南海採訪趙紫陽會見土耳其人民黨代表團，並把趙紫陽的思路寫進了稿件的導語中，這符合她的意圖，也是她最後一次見到趙總理。

在這種局勢下出訪，隨訪的每一位記者心情都很沉痛，都十分關注國內的局勢發展，都是在焦慮不安中度過每一天的。在加拿大期間，這裡的電視鋪天蓋地的報導了北京混亂不堪的動亂鏡頭，劉振敏心情極為沉重，認為建國 40 年了，怎麼還會出這樣的大問題？當著別人的面，還難過地掉了眼淚。並為政府遲遲不採取措施而著急。這時候她的發稿數



1989年5月13日，萬里訪問加拿大時，受到溫哥華市民的熱烈歡迎。

量和質量也一減再減，恨不得馬上飛回國內，這段時間萬里的行程很多，國內才給發出很短的稿子，新聞聯播排名都在十幾條之後。這時，萬里的秘書王順生也告訴她，“老頭急得睡不好覺，醫生勸他注意身體，他大發脾氣說，‘我能不急嗎？’”

加快改革開放步伐

5月17日，萬里到渥太華訪問，上午在與加拿大總督索維夫人會見時，萬里特別講到：“現在我國學生、知識分子、工人要求民主、反對腐敗是敦促加快改革進程的愛國行動。我

們召開的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八次會議上，將要討論群眾普遍關心的問題。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步子慢了一些，民主發揚的不夠，群眾監督也不夠。我們總的方針是，要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創造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我們一定要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只有這樣才能加快改革和建設的步伐。我們還要從自己的國情出發，同時也要借鑑外國的一些好經驗。”劉振敏覺得這些話講得很好，都寫進新聞的導語中了。

下午，在與加拿大總理馬爾羅尼談到北京最近發生的遊行時，萬里強調說：“我們的國家領導人對學生提出的合理要求和意見非常重視。全國人大要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以及搞好廉政建設方面，進行更加卓有成效的工作。在群眾遊行、示威、罷課、絕食過程中，政府和學生以及各界都表現出理智和克制的態度。他們提出問題，黨和政府近年來一直在研究如何解決。對學生要進行說服教育，在堅持建設和改革的大政方針和穩定國內局勢的前提下，政府和群眾要坦誠的對話，使學生諒解國家面臨的困難，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保證國民經濟穩定地發展。”

新聞封殺萬里的不同聲音

5月21日，北京已經開始實施戒嚴，朝野矛盾進一步被激化。晚上7點，萬里在多倫多出席有600多華人在假日酒店舉行的招待會。晚7點半，主持人說：“請青年作曲家黃安

倫彈奏一首中國暢想曲。”台下立刻活躍起來，沒想到黃安倫只彈了一小段音樂後，就跳到台上大喊：“我是作曲家，我今天只彈《馬賽曲》。中國在動亂，中華民族在危機。萬里必須中斷這次訪問，趕快回國處理國事！”說到這裡，在場的人才知道他是在演說，有人跳到台上阻止他，也有人在台下高呼口號進行呼應，在推搡中，黃安倫一邊被拖出會場，一邊高呼“打倒李鵬！”場內的人則有人附和鼓掌，跟著呼喊口號。

隨後，萬里在宴會上發表講話，打破沈寂：“中國政府一定能處理好學生動亂，穩定局勢。”他還向居住在加拿大的幾十萬華人致以親切問候，再一次肯定學生的愛國熱情。他說，學生希望促進民主，整治腐敗與政府的主張和目標是一致的。這些問題應該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應該用符合理性和秩序的辦法來解決，在動亂中是不可能解決這些問題的。我們要堅定地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萬里指出，根據我國憲法，政府有權採取必要的維護社會秩序的手段，沒有安定團結的局面，我們什麼都搞不成。改革開放、振興中華的宏偉目標就難以實現，國家的興旺發達就毫無希望。這是大家都不願意看到的。萬里表示相信，我們政府能夠以冷靜理智和克制的態度，克服困難，妥善解決問題。萬里的這些講話，博得了全場華人的熱烈鼓掌。但萬里所講的這些話，據劉振敏講卻遇到了特殊情況，因為回國之後，她沒有查到中央台新聞節目採用的這些稿件，尤其是5月18日到21日，沒有用過一條，這在廣播史上，也是從未有過的。言外之意，也就是

說，國內新聞封殺了萬里在國外的不同聲音。

憂黨憂民槍聲響起最憂己

5月21日，萬里結束了在加拿大的訪問，第二站應該是去美國。但是去與不去，誰都說不准，中央當時也有兩種意見。最後，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聯名打電話讓萬里繼續飛往華盛頓。5月22日，萬里飛到美國與副總統、參議院議長奎爾進行會談，並會見美國國務卿貝克。萬里說，國內最近發生的事情已經影響到社會秩序，為了保障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順利發展，我國政府採取了堅定措施。關於反對貪汙腐敗、官倒和政府的目標是一致的，但是這些問題必須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逐步解決，在動亂中不可能解決任何問題。這條消息在中央台新聞聯播中放在第五條，用了460字。第二天的5月23日，萬里決定中止對美國的訪問，取消了餘下的七天行程，而且找了一個誰也無法駁倒的理由：“因健康原因提前回國。”

經過十個多小時的夜間飛行，萬里的專機於5月25日凌晨3點半降落在上海虹橋機場，機場上一片漆黑，按原計劃，工作人員在上海要停留30個小時。但萬里和夫人乘旅行車進入市區後，卻沒有別的車來接工作人員。正在納悶時，只見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和市長朱鎔基正在與機組閻志祥副局長協商，最後決定專機連夜飛回北京。因為是臨時決定，飛機

馬上要飛走，劉振敏必須要在飛機回到北京之前把消息發出去，好趕在當天早上中央台的“新聞和報紙摘要”播出。在隨行的記者中，她是第一個在機場拿電話發稿的，但當時北京編輯卻告訴她，時政部的記者已經留下了未定稿，說是“萬里已於 25 日回到北京。”劉振敏一聽，則再三強調，萬里是回到了上海，而不是北京。

劉振敏所講的這個情況說明，正如傅高義所分析的，鄧小平與萬里之間“在 1980 年代繼續一起玩牌，但打牌時他們並不談論人事問題。鄧小平是萬里的上級，但萬里從未將鄧小平定位為自己的至交。”傅高義分析，由於擔心萬里可能支持趙紫陽，於是讓他滯留上海，思想轉舵。但這個決定，可能是出於中央的臨時起意決定，不然不會有已經擬好的未定稿說“萬里已於 25 日回到北京”的重要見證。而這件事的具體辦事人就是江澤民、朱鎔基，而傅高義所講還有丁關根，估計就在上海城裡，是專門迎候著萬里來做思想轉化工作的。

十天之後，形勢急轉直下，等到槍聲大作、“六四”屠城之後，為了所謂的黨性原則和自己的身家性命，萬里也不得不轉而譴責他們那個黨所稱的“天安門反革命暴亂”了！（魯直人）■

“六四”以後的一天，在清晨散步時相遇，喬石一反往常的親熱，見面形如陌路，在吳意欲打招呼之前，扭頭轉身，旁若無人，繞吳而行。吳一時愣住，不知所措，好一會兒才反應過來，頓時心冷如灰

喬石對老友吳學謙 突然變臉

中共官方 2012 年推出《喬石談民主與法制》一書，《人民日報》以及前副總理田紀雲撰文高調讚揚其人其事，引起海內外媒體和談士熱議和猜忌此時出版此書背景。筆者讀到這些文章時，想到的卻是中共黨內血腥鬥爭扭曲人性的一樁事。

吳提携喬，喬超過吳

N 面人喬石，是中共在世領導人中最為詭秘和複雜的一位。他曾擔任政治局常委，是中共的第三號人物，長期掌管政法和情治部門，被普遍認為是接替總書記的人選。筆者在此不擬評說喬石的功過，不過“六四”事件中，喬在是否北京戒嚴的關鍵性投票時是如何表態的，至今是個謎，有多種說法。

《喬石談民主與法制》這本新書關於這一期間的文字全無。但由喬主管的中紀委以及政法系統各部門最早表態支持鎮壓學生，以及“六四”屠城後，他得以保留原職，並直接指揮剿殺和清算“六四”參與者，應該說明他的態度和立場。

最讓人不解的是喬石對其老朋友、老同事及革命引路人吳學謙的態度，發生 180 度轉彎。

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吳學謙（1921 年 12 月 19 日～2008 年 4 月 4 日），16 歲參加中共的“革命”工作，17 歲入黨，先後任中共地下黨上海中學區委委員、區委書記、上海地下黨學生運動委員會負責人。1941 年，吳介紹 16 歲的喬石加入中共。在抗戰和國共內戰期間，喬精明能幹，長期在吳的領導下工作，

出生入死，深得吳的信任，一路提拔，先後擔任上海地下黨中學區幹事，學委總交通及上海市北一區學委書記。中共奪取政權後，吳在北京負責共青團中央的外事工作，仕途暢順；喬則因其妻郁文的出身背景（郁文原名翁郁文，父親翁祖望，是蔣介石文膽陳布雷的妹夫），一直不甚得志，被安排參與工業建設，先後在條件艱苦的鞍鋼和大西北酒泉鋼鐵公司工作。

雖然二人相距遙遠，但一直保持密切聯繫。吳學謙 1958 年調往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喬石 1962 年被派到中央高級黨校理論班學習，學習結束後，在吳的鼎力幫助下，1963 年調到中聯部任研究員。一年後喬升任為副局長，級別高於任處長的吳。

“文革”後，吳喬二人均受衝擊迫害，關押批鬥下放數年。吳 1972 年回到中聯部，任西亞北非組組長，後任三局局長，負責非洲工事務。喬也於 70 年代初回到部裡，1974 年升任六局局長，負責東歐中亞事務。1978 年 1 月，吳喬二人同時晉升為中聯部副部長，成為“文革”結束後被最早提拔成部級幹部的少數人之一。他們的晉升是在胡耀邦任中組部部長不到兩個月之內突擊進行的。

1982 年 4 月，吳調往外交部任第一副部長、黨組書記，11 月升任部長；喬則在 4 月升任中聯部部長。但喬石擔任中聯部部長一年後，於 1983 年調任中央辦公廳主任，後任中組部部長。1985 年又升任中央書記處書記、政法委員會書記及國務院副總理，在向掌管核心權力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大邁一步。

吳喬二人在 1985 年召開的十二屆五中全會上同時升任政治局委員，喬石排名在前。1987 年底，喬石在中共十三大中升任政治局常委，進入權力核心圈，十四大上續任，後來被江澤民排擠，以人大委員長出局。而吳學謙在 1988 年擔任國務院副總理，最後以政協副主席退休。

吳學謙之子的無畏壯舉

89 年 6 月 3 日進入北京的軍隊，入夜後對手無寸鐵的民眾和學生進行大屠殺。吳學謙之子吳曉鏞作為中國國際廣播電台英語部副主任、當天的值班編輯，毅然簽發了剛剛寫就的揭露大屠殺的英文新聞稿，於 1989 年 6 月 4 日早晨 6 時 25 分，向全世界發布了“六四”屠殺消息，在第一時間內，作為中國媒體，向世界證實了中共軍隊的暴行，成為唯一一家公開揭露屠殺真相的中國官方新聞廣播媒體。

該英語新聞文稿大意是：

“請記住 1989 年 6 月 3 日。在中國的首都北京發生了最悲慘的事件。幾千名民眾，其中大多數是無辜的市民，被全副武裝的士兵們在向市中心推進的過程中殺害。在被害的民眾中也有我們北京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的同事。士兵們駕駛著裝甲車，用機關槍來對付千萬名試圖阻擋他們向前推進的本地市民和學生們。當裝甲車強行通過之後，士兵們仍然肆無忌憚地向街上的民眾掃射。據一些目擊者說，有些戰車甚至撞向

一些猶豫不前的步兵。北京中國國際廣播電台英語部深切悼念那些在這場悲劇事件中遇難的人們，並呼籲所有的聽眾，與我們同聲抗議這一嚴重違反人權、殘暴鎮壓人民的行徑。由於北京正處在非常時期，我們無其它新聞可向您報導。我們懇請您的諒解，並為您在這最悲慘的時刻與我們在一起而表示衷心的感謝。”

“六四”後不久，吳曉鏞因批准播報這條新聞被抓捕，吃了鐵窗之苦。經反覆審查，吳被釋放之後於1990年調離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到世界銀行駐中國代表處工作，先後任翻譯，顧問，項目官員；1995年加盟鳳凰衛視，任美洲台台長。

當時，吳學謙和夫人畢玲也因吳曉鏞的事受飽受牽連和驚嚇。李鵬在國務院不給吳學謙好臉色，工作上將其架空，使吳的國務院副總理一職形同虛設。吳學謙鬱鬱寡歡，心情沈悶，日子十分不好過。

多年的友誼毀於一旦

李鵬對吳的態度尚在意料之中，但吳卻萬萬沒有想到自己多年朋友喬石竟然也從背後捅一刀。

吳和喬雖然彼時都在中南海工作，但是二人在生活上極為檢點，沒有搬入海內，仍然住在中聯部大院中，兩家相距不遠。吳喬兩人都有清晨散步的習慣，常常是抬頭不見低頭見。過去，兩人幾乎天天見面，見面時相互親切問候，有時間還聊

一陣。“六四”以後的一天，吳喬兩人在清晨散步時相遇，喬石一反往常的親熱，見面形如陌路，在吳意欲打招呼之前，扭頭轉身，旁若無人，繞吳而行。吳一時愣住，不知所措，好一會兒才反應過來，知道應了“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一語，頓時心冷如灰。此後，吳放棄了自己多年養成的清晨散步習慣，改為晚間散步，以免與喬相遇，再受羞辱，擺脫尷尬。自此以後，吳喬致死不再講話見面，多年的友誼毀於一旦。

吳喬二人在中共黨內都是以黨性強、作風正、家教嚴、思想開放著稱，然而中共黨內鬥爭，殘酷慘烈，扭曲人性，讓人無情無義，只要權力，不講原則，彼此陷害，相互仇殺。一旦站錯隊，不管過去有多大貢獻，一概全面否定，批倒批臭，導致化親為仇，化友為敵，令人齒冷心寒。儘管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不許實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黨內生活有所改觀，但是多年來黨內“左禍”橫流，致使此風無法杜絕，吳喬分手反目即是明證。深究中共黨內鬥爭殘酷血腥的原因，恐怕還是中共一黨專政專權、只講目的不講手段的野蠻性所致。

中國傳統文化最講究情深義重的人際關係，但中共黨內的權力鬥爭早已使之蕩然無存。此種做法不僅傷害自己同志和親人，也常常殃及國家和民族，給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

“六四”屠城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只有恢復中華傳統，重情重義輕利輕權，將中共的核心權力關進籠子裡，中華民族的振興才有希望。（冷夢濤）■

許良英先生的典範意義在於世道越亂，他越純潔，始終保持金子一般的心，從來沒有對自己的信念產生動搖。他們為純理念而生

他最早知道 共產黨“六四”要殺人

“許良英給世人留下了光輝的人格榜樣和豐富的思想遺產。今天我們在這裡舉行許良英先生追思會，緬懷許先生的非凡經歷，道德文章。表達我們的哀思，從先輩那裡吸取精神力量。”2月2日下午1時，在紐約法拉盛，《北京之春》主編胡平宣布紐約社會各界“許良英追思會”開始。

2013年1月28日13點25分，科學哲學家、美國物理學會薩哈羅夫獎得主許良英先生在北京去世，享年93歲。

在追思會上，胡平首先向與會者介紹了許良英的生平。他說青年許良英曾立志物理學，曾是著名物理學家、“中國雷達之父”及核物理學家、“中國原子彈之父”王淦昌先生高徒，因為人生理想無法在物理學中找到，他陰差陽錯地投奔共產黨



紐約許良英追思會懸挂遺像。(本文照片除註明外，均為陳小平攝)



胡平（陳清林攝）

去參加共產主義革命；本身與“右派”沒有關係的他，因為批評毛澤東在“反右”運動中的做派不道德，而被打成“右派”20餘年，成了沒有“右派”言論的“右派”。他不僅是中國研究傳播愛因斯坦的學者，也是當今中國高擎民主、科學與人權的旗手。

一生追求科學與民主

追思會召集人、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共同主席之一王軍濤，回顧了他與許良英先生認識的過程和思想交鋒。

他說，許多民主人士被許先生罵過，其中也包括他，那是因為許良英堅持對民主的絕對信念。許良英先生曾經說過：



王軍濤(左)與王書君。

“全世界知道民主的就五個人”，他是其中的一個。這既說明他是一個無情的批評者，也說明他很傲慢。在許良英先生的世界中，他把民主當作一個絕對東西，幾乎是毋庸置疑的。不過，他的思想局限在於，他對民主與自由、憲政的關係實際上並不知曉。

王軍濤說，許良英成為愛因斯坦、民主的守護者，這是因為，對愛因斯坦與民主的追求，就是對科學真理的追求。許良英投身人權事業，就是因為他不能容許有人去壟斷科學真理。因此在有人受到迫害時，他要站出來說話。許良英一生沒有私敵。如果有人傷害了科學與民主，他就會與你為敵。

畢業於山東大學歷史系、胡耀邦趙紫陽基金會秘書長王書君說，許良英的一生，就是要把民主的理念讓所有人知道。

看共產黨殘暴入木三分

原浙江大學學生、校革委會常委、一生兩次入獄的徐水良，回顧了他被捕後許良英為他奔波救援的過程。他說，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無人敢為他奔波說話。

不僅如此，許良英還堅持資助繫獄的徐水良家人的生活。徐水良回憶說，他的知識積累與思考都曾得到過許良英的幫助。在監獄時，許先生通過他太太給他送去不少書籍，他當時在監獄中能夠知道外面世界的信息與思想狀況，就是託許良英之福。

徐水良回憶說，許良英先生的政治判斷力也讓他留有深刻印象。“六四”前，許良英通過他的太太提醒當時還在監獄的徐水良，說共產黨必定會下重手鎮壓學生運動。徐水良認



徐水良

為，應該說許良英是當時最早一位清醒地知道中共在“六四”要開槍殺人的。

徐水良認為，他認識的許良英是一個純真的人，愛憎分明。在黑白之間，沒有灰色地帶。在這個意義上，他是知識分子良心的代表，他是一位“聖者”。

徐水良說，根據他的經歷，雖然生活上有困難時許良英先生會幫你，政治上出麻煩他也會挺身相助，但在思想觀點上，許良英先生會毫不留情面地批評你。他堅持他的思想觀點，是一個具有非凡理念的人；不過一旦發現有錯，他也会馬上更改。他這一輩子都在糾正自己的錯誤。

徐水良回顧說，他曾挑戰許良英關於民主的一些看法，認為民主的目的是為了自由與人權，後來，這個觀點被許良英先生接納。此外，當初許良英也曾天真地相信過“畝產萬斤糧”，被他的科學界同事批評之後，他也修正了自己的看法。正因為這樣，他非常尊敬許良英。

時事評論家陳破空說，許良英先生與許多中國人一樣，曾對共產黨迷思過，他曾加入了共產黨。一旦他意識到這是迷思，他馬上改過，在這方面，許良英先生是我們的楷模，值得追思。

世道越亂，他越純潔

王軍濤認為，許良英先生的典範意義在於世道越亂，他越

純潔。他這一代，還有李慎之、何家棟這些人，他們的人生始終保持金子一般的心，從來沒有對自己的信念產生動搖。他們為純理念而生。許良英這種金子般的胸懷與人格，甚至也贏得了中共黨內包括前全國人大委員長喬石的尊敬。

參加追思會的紐約當代藝術國際策展人榮偉也在追思會上說，許良英先生早年追求科學，追求真理。而科學實際上是一種精神——追求真理的精神，中國文化中缺少的正是這種精神。

不僅如此，這一點也影響了他待人的性格特點。有人說許良英先生一生經歷了各種惡劣時代，但最惡劣的時代就是中國現在這個時代。許良英先生的可貴之處就在於，他看到了中國這種現實，榮偉說：“因此我對他保持敬意。中國就缺這個。”

紐約律師，胡耀邦趙紫陽基金會理事長李進進在會上代



榮偉



李進進

表基金會發言時說，許良英先生難得之處在於，他是一個不談人際關係，只追求真理的人。坊間說他愛罵人，實際上他是在批評人。他更追求的是真理與正義，在這個過程中，他很少計較人際關係與政治後果，中國實際需要的就是要有更多許良英這樣講實話、講真話的人。也正因為失去了這樣一個人，他感到沉痛。

他是一個行動者

參加過 1989 年學生運動、因組建學生地下組織而於 1992–1995 繫獄的原北京氣象學院學生領袖陳清林在會上說，許先生有一種真誠的人格。1996 年他與另外兩人一起拜訪他時，他對他們三個年輕人的客觀直爽批評至今讓他難忘。

陳清林認為，許良英先生雖然是一個思想啟蒙者，但他更多的是一個行動者，他是中國現代公民運動的先賢。從 1957 年站出來反對“反右”運動，自己被打成“右派”開始，一直到他去世，他一直在行動。方勵之、許良英這樣的民主老人們一個一個去世，讓年輕一輩感到悲哀。

人權活動人士谷川認為，許良英先生是中國人權抗爭的楷模，就憑這一點就值得去追思他，紀念他。1989 年，許良英發起簽名要求釋放魏京生；90 年代初，他與江棋生等人發起紀念“六四”簽名運動，在當時的恐怖氣氛下，他能站出來，真正是需要非常勇氣。

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與會者在追思會上補充說，許良英先生已經去世，我們在此紀念他，應當更多想到如何薪火相傳。現在中國大陸民主與法治領域有非常大的活動空間。許良英先生生前不僅追求民主，對法治也格外關注。我們在追思許先生時，不僅要做到坐而言，而且還要起而行。

在追思會上發言的還有前天安門“飛虎隊”成員、現中國民主黨美東地委主任宋書元、《世界日報》主筆孟玄、因參與“八九”學運、組織獨立工會、籌備中國民主黨而二度被中共判處勞教的上海維權人士蔡桂華等。（陳小平）■

同樣是諾貝爾獎,劉曉波被捕坐牢,莫言受到的歡呼吹捧,有如此的差別待遇令人莞爾。莫言的文學作品,與他過往的生活經歷有很大的關係,其機會與機運,也是成就莫言的關鍵因素之一

我差點成了莫言的 頂頭上司

我國同胞很愛起鬨，2012 年又有了個熱點：莫言得了諾貝爾獎。

從 2012 年 10 月起，全國媒體排山倒海、鋪天蓋地似的，全是莫言、莫言、莫言……連他拉屎放屁都是頭條“花邊新聞”。本人無意參與起鬨，卻因此引起關注，也來插上幾句嘴，說說據我所知的事，以便揭示“中國特色”。

何以褒貶愛憎天壤之別

要說這個諾貝爾獎，中國及華人早已有了，近年就得了幾個，但哪個也不如這次“炒”得這麼火。且不說前兩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兩個中華同胞獲此殊榮：一個是原西藏喇嘛達賴，一個是原北師大講師劉曉波。我國不僅不予祝賀，反而一片斥罵抗議之聲，劉曉波還被逮捕坐了大牢，此與莫言獲獎受到的歡呼吹捧，恰成鮮明對比。同為得了諾獎，國內反響如此懸殊，這是為了什麼？據官方解釋，莫言得的是文學獎，所以才這樣大張旗鼓地宣揚，達賴、劉曉波之流，只是“持不同政見者”，正為西方反華反共所需要，這才遭到打壓。

此說其實並不盡然，就是這個文學獎，我國同胞已得到過，莫言並不是第一個，第一位獲獎者叫高行健，早在十多年前就得了。但中國對他卻一字未提，不像莫言突然紅遍了天下，說是因為高已入了法籍，不算是中國人了，所以才未予宣



高行健是第一個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華人，但中國政府卻“未予宣揚”。

揚，實際是將他的祖國之籍給開除了，不承認他也為國——至少是為華人爭了光。不過此說也難自圓其說，更早的幾位諾獎得主，如楊振寧、李政道等等，都早已入了美國籍，早就不是中國人了，但在我國不僅名氣很大，還受到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毛澤東、周恩來和鄧小平等生前，更別說後來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都曾多次接見而大受禮遇，將他們視為中華民族的驕傲，雖然他們其實都已是“美國佬”，只是出生在中國而已，可是同樣出生在中華大地的高行健，也得了諾獎卻不受待見，以致極其冷落誰也不知！而這就是我們的“中國特色”，只是不那麼光彩了。

當今莫言突然爆紅名揚天下，許多人都為與他相識相知

引以為榮，似正往他身邊緊貼，以圖分沾其諾獎之光。同為諾獎得主的高行健，卻至今不為人知，這並不公平，促使本人為此說道說道，在人人樂道莫言之時，我且說說高行健。他也曾是中國作家，1940年出生於江蘇泰州，與我還是小同鄉，他1962年畢業於“北外”法語系，後供職於“中國作協”外聯部，又任“北京人藝”編劇，有《絕對信號》、《車站》等劇作，1999年版《中國作家大辭典》有他的條目。他的夫人曾在《北京周報》法文版工作，因我認識她的上級以及高的兄弟，去過他們在首都劇場後臺三樓的家，與他們一度有過交往。

後來他們去了法國，因為都通法語，很可能以法文寫了什麼著作，竟在國外引人矚目，居然一舉獲得華人文學的第一個諾貝爾獎，可惜中國從來不提此事，似乎他為我國丟了人。他寫的自然是在中國的事，正如有位英籍華人女作家，以英文寫了幾部多國暢銷的書，卻在自己的祖國成了禁書，因為她不幸地暴露了我們“鮮為人知的故事”，致使她的作品在國際上大受歡迎，其作者本人卻在祖國不受歡迎。高行健很可能也是這樣，大概他也寫了我國不那麼光彩的事，才使他雖獲十分光彩的諾獎，在其祖國反遭不光彩的封殺！我雖然見過他們夫婦，卻從未讀過他的著作，尤其是得了諾獎之作，因為國內哪個書店都買不到也找不到他的書，不論是中文還是外文都見不到，這與如今全國所有書店，大量大批地推出莫言著作，又成鮮明對比，我想不通何以至此！

諾獎得主與他的名著

當許多人都為是莫言之友招搖過市時，我也來“顯擺”一番與他之“誼”。

1988年年底，我從《解放軍報》轉往總參政治部，準備籌建新的文藝創作室，已預定我為創作室主任。我報到時被告知，未來的創作室內有幾名創作員，除了兩三位報告文學作家和畫家之外，有一位是因《紅高粱》電影正走紅的原著作者莫言，由於那幾位還在原單位尚未調到，我這室內目前只有本人及莫言二名。後來因為軍內編制等扯皮事，創作室並未宣告成立，我這“主任”也未就任，後來填表時任職一欄只寫了個“創作員”，這就與莫言不相上下了。不過本人不僅年紀不小，軍齡資歷也都不淺，在名次上就排在他前面，使他見到我時，就有禮貌地稱一聲“老師”，就如當年流行的“師傅”一樣，僅示恭敬而已。

若要就此套個近乎，這時莫言與我不只是同一單位，應是同事又是同行，還是同一職務，也在同一財務科領餉，但卻記不得與他有何交往，有印象曾應召參加過同一會議，例如1989年“六四風波”後，都曾奉命表明政治態度，如堅決與黨中央保持絕對一致云云，似乎我們都這麼說了。因為我們都不坐班，散了會就各自回家，我還住在軍報，卻不知他住哪，從無來往也未問過，連他來開會時戴的是上尉還是中尉軍銜都記不清了，我當時是文職，“六四”以後連軍衣都不穿



電影《紅高粱》讓莫言走紅。

了。

如今搜索記憶，他也就是個胖乎乎的中等個子，富態的臉上有一對睡意朦朧的眼睛，還有張幾乎不怎麼開口的嘴巴，既不帥呆更不俊美，參政文化部女部長李靜，常常拿他的長相開玩笑，不過文化部的幹事們，雖然軍銜都比他高，卻對他很尊重，因為他當時已有了名氣。他曾為參政寫過表彰先進人物的文章，還在文藝評獎活動中，應邀擔任過評委，我也曾是評委之一，抱歉的是名次在前，但在評獎討論時，卻記不得

他講過什麼沒有，這就是我與他的全部交道。

那時的他已是名人了，不只常有作品發表出版，一些報刊上還有對他作品的評價，有篇論文說他寫的是“垃圾文學”，引了他的一段文字，見他將一堆大便描繪得淋漓盡致，連味道都寫出來了；還有一段寫他娘的陰毛，怎麼有虱子在裏頭爬等等，令人讀得只覺噁心。他的著作我幾乎都沒看過，除曾看了由其原作改編的電影《紅高粱》，也就翻閱過新出的長篇《豐乳肥臀》，不是不想看或不屑看，而是想等稍空閑時，安安心心拜讀其大作。那時他這部巨著炒得很火，不過有人叫好也有人說壞，有家刊物曾發了幾篇批判文章，說此作如何“歪曲”、“醜化”和“污蔑”了中國人民。與此同時又有家大型文學叢刊，給正有爭議的《豐乳肥臀》頒發大獎，還有 10 萬元巨款，似乎要與批判者們對著幹。不過這一獎項，只是民間性的，並不具有官方權威性，並且評獎限於文學性，批評卻著重於政治性，各執一詞，各走一端，誰也不讓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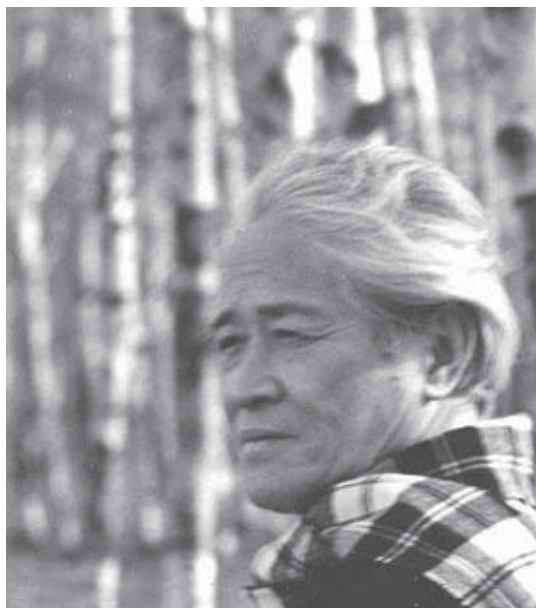
備受爭議卻因禍得福

十分遺憾，本人基本未讀過這部名著，對其褒貶並無定見，卻知道他和此作，已為我們所在單位以及偉大的人民軍隊，惹了不小的麻煩。據說有什麼人向總政當時的于主任，莊重嚴肅地奏了一本，即打了個揭發問題的“小報告”，說莫

言此作如何反動，必須嚴加批判，以維護我黨我軍的尊嚴聖潔。因為其揭發批判者很有來頭，更代表了意識形態的主流，也是正統的或官方的立場，而莫言正在的部隊單位，當然應是官方的、正統的，亦即主流的方面，有關領導必須對此表示應有的立場態度，並採取相應的措施，曾派負責幹部向他傳達上頭的有關指示，轉達外界對其作品的嚴重批判，責令他對此作出自我批評甚至檢查，並要求有關方面立即停止發行和銷毀存書等等。

幸好直到這時，我這“創作室主任”並未就任，對於莫言不負任何“領導責任”，不然這一重任就得由我去承擔了。似乎是由我們所屬的總參政治部，在參政領導和文化部李部長和楊幹事等等，聯袂執行了這一公務。到底是那些負責幹部出面，對莫言又是怎麼說的，我概不知情也未打聽，只感到參政文化部其實是庇護他的，因為本部屬下有此名人，不僅風光也有好處，他曾積極參與本部有關活動，遵照領導指示寫過有關文章，誰都不願破壞這一和諧良好關係，只是迫於上頭與外界壓力，不得不也公事公辦了一番。

據我所知，此前軍中有位著名作家，即寫過《苦戀》電影劇本（拍成後改題為《太陽和人》）的白樺，這一作品遭到國內“左派”的嚴厲批評，中共中紀委也對此表了態，認為應予嚴肅處理。《解放軍報》等組織了新的“革命大批判”專文，但白樺就是不認錯不檢討，他原在的武漢軍區，只得將其“清退”，讓他離開了軍隊單位，這才了結了此“案”。面對新發



白樺

生的莫言及其《豐乳肥臀》事件，參政也就沿襲了此法，將此人“清”或“請”出軍隊，正好有地方單位歡迎這位名作家，也就順水推舟地讓他轉業離開軍隊，從此結束了他 21 年的軍旅生涯，部隊因此扔掉了這一“燙手山芋”，他自己也另有出路皆大歡喜了。這一“事件”從頭到尾我都未參與，也與我毫無關係，他是什麼時候走的，又都有過什麼表示，本人一律一無所知，只是我與此名人曾同一單位又同事同行之榮幸，也就此丟了！

此後若干年，我除了在報刊和電視上，偶爾見到他的大名，與他再無任何接觸，只知他又出了不少書，也出了多次國，還榮任了中國作協十幾位副主席之一，他的著作我仍然

未讀，對他的名聲及其高位從不眼饞，他走他的陽關大道，我走我的獨木小橋，大狗小狗，老狗少狗，各叫各的，互不相關，更不相擾。直到今年，他忽然獲了諾獎，許多人包括中共中央領導人，都向他熱烈祝賀，似乎他為我國又放了一顆“人造衛星”。

我對此不吃驚，當然也未祝賀，只覺國內更該獲獎的大作家好作家多的是，不知怎麼就碰上他了，簡直是“天上掉下個餡兒餅”，撞大運了。我這麼說，也許會被人認為是“吃不著葡萄，就說葡萄是酸的”，其實不論是“餡兒餅”還是“葡萄”，都與我井水不犯河水。卻想到了一句老話，即我黨我軍和我國發現人才與使用幹部的標準，從來都講“才、德、資”三條，有人又加了一個“機”，“才、德、資”都有，但若沒有“機”就全是白費，凡是成功人士，寧可缺“德”無“才”沒“資”格，卻不可失“機”，這已為眾多實例所證明。

莫言獲獎之道得之於“機”

上文所言之“機”，即機會、機遇和機緣，都是“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性的，要能在轉瞬即逝的時機內，及時抓住機會，逮到機遇又獲得機緣，本人必須有相當的機靈、機智並處於機動位置，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此話看來有些玄，其實莫言就是實例，他這輩子的“機”真是太多了！據稱，他在他的“高密東北鄉”，連飢餓帶孤獨地生活了20來年，直到



莫言當兵時的照片。

1976年，即“文革”的最後一年，他已21歲了，卻獲得了可望不可求的參軍入伍的機會，這也是他有此良機的最後一年，因為過了這個村就沒有那個店了，他可能就再也跳不出“農門”了。正是此時他機靈又機智地抓住機會，期間他找過什麼人、使過什麼法兒、走過什麼後門，已有人披露了，他終於如願以償當上了兵，得到了此生第一個重大機遇。

正當他因為他當兵之地在膠東黃縣、離老家高密不遠略感失望時，卻又獲得機遇，調到離北京不遠的保定，因為已是總參的一個下屬單位，這就使他又獲得到北京總部的機會。當了兵還得提幹並留隊，才能永遠離開農村，他入伍前就打聽到門道，當兵後便下定決心又排除萬難地，以耍筆桿子寫

作文來謀求提拔為軍官和留在部隊，從新兵時寫“決心書”，到寫“反擊右傾翻案”等大批判稿，又在駐地小刊物上投稿發小說，竟被所在部隊發現了人才，還是戰士時就“以兵代幹”成為軍官，開始走上“仕途”而實現了夢想。

就在這時好運又降，北京的“軍藝”新成立文學系，為軍隊培訓寫作人才，他得訊就去報了名，恰逢新任文學系主任徐懷中，由於識才又愛才，一下看中了這個土得掉渣的他，曾說此人即使文化課考試不及格他也要了。這就是又一機遇和機緣，全被莫言碰上了，他果然入了“軍藝”文學系，這才根本的改變了他的命運，也就此奠定了他後來獲得諾獎的基礎。而他機靈、機智地抓住機會，得到機遇，加上與系主任徐懷中的重要機緣，都造就了未來的諾獎得主。這些可遇不可求的好事，都被他一一碰上並及時抓住了，所以我說他是個幸運兒，被“天上掉下的餡兒餅”，一下砸中了他那略顯肥胖、已經禿頂的、沾滿高粱花子的腦袋，而這並不是所有人包括比他更優秀的同行們，都能有此良“機”的。

離開軍隊才能得獎

各個媒體都在炒作莫言的事，我見《解放軍報》上有篇原參政文化部楊幹事的文章，我偶然給他電話說起此事，問他莫言是怎麼離開部隊的，他說確是因為《豐乳肥臀》被人告到總政，只好將他處理出了軍隊。老楊說到這裏，忽然強

調說道：“他要不離開部隊，肯定得不到諾貝爾獎！”這話真是一語中的，一下點出了此中奧妙，莫言的入伍和離隊，正是他獲獎的必由之道。

上文說到的一連串“機”：機會、機遇、機緣，加上莫言自己的機靈、機智等等，軍隊成為他走上文學之道的第一個臺階，但是如果他仍然待在這裏，他的事業也就到此為止了，他很可能被迫夭折完了蛋。好的是軍隊正容忍不了他，他的主要著作《豐乳肥臀》，被認為褻瀆和玷污了我軍，因此不得不將他趕了出去，但其實這恰恰成全和成就了他，使他從此獲得了解放與自由，他得以遨遊並高翔於文學的天空中，原有的框框、桎梏和牢籠等等，再也限制不了、鎖不住也關不上了，這就把他推上了又一個臺階。正是他離開軍隊以後，他才寫作並出版了又一批名著，將他在文學上的地位墊得更高，也與諾獎的獎臺更為接近了。

如果他還在當兵仍在軍隊，就根本沒有這個可能了，因為我們軍隊是全國最無產階級化也最黨化的最堅固堡壘，自有許多嚴格禁忌與嚴密規則等等，凡軍人都必須服從遵守的，莫言的作品受到批判揭發和他的被處理出軍隊，就是明證。所以他最大的幸運是他來到了部隊，更大的幸運是又及時地離開了軍隊，第一次幸運使他上了第一個臺階，第二次幸運使他升了更高臺階，第三次幸運是他一舉登上了諾獎的領獎臺。他的幸運之道，不正是這樣嗎？



莫言在諾貝爾文學獎的領獎台上。

幾個“家”都造就了他

楊幹事寫莫言文章的標題是：《部隊永遠是我家——莫言軍旅生涯片斷》，這很有些意思。莫言老家的“高密東北鄉”，是他作品的生活源泉，也是他作為作家的生活根基；他在部隊的這個“家”，使他受到文學的基本訓練，掌握了文學的必要技能，他這兩個“家”都使他成為一個獨具特色的作家。若勉強打比方，一個家給了他骨骼和身架，另一個給了他肌肉和血液，還要有第三個家，能賦予他思想、精神和靈魂，這才能成為一個完整有力的人，三者缺一不可。

他在“高密東北鄉”的老家，自己概括為四個字：飢餓，孤獨。正是為了逃脫可怕的飢餓與孤獨，才努力爭取以參軍

來實現這一目標，所以當別人離家時都流下了難捨之淚，他卻連頭都不回，慶幸自己終於遠離了這一苦海，還因部隊駐地離家鄉不太遠而覺掃興。當時他已 21 歲，進入成年階段了，只是他的前 20 年，充滿了苦難甚至恐怖，成為他永遠的記憶和深刻的印象。他不堪回首又不得不時回首，竟成了他源遠流長的創作素材，並且是與眾不同、十分“各色”的獨家發現，當別人還在以文字編造“大好形勢”，竟相歌頌“人民公社是金橋”、“社員都是向陽花”等等時，他筆下出現的卻是完全相反的景象。

由於這時他已身在軍營，不僅衣食無憂，還有了足夠的精力和時間，甚至有著一些也要筆桿的哥們弟兄，他就以慶幸的心態和調侃逗樂的方式，來回顧記述當年的一切。原本痛心和殘酷的歷史，卻用了幽默甚至樂觀的語調，這使他與其同行們一下拉開了距離，他突破和超越了各種局限，不再是一個到處都有的歌功頌德者，只按照自己的記憶和印象，如實描繪著人間世事，他的作品日益受人矚目，同時也引起了爭議和質難，因為他離經叛道，太不守規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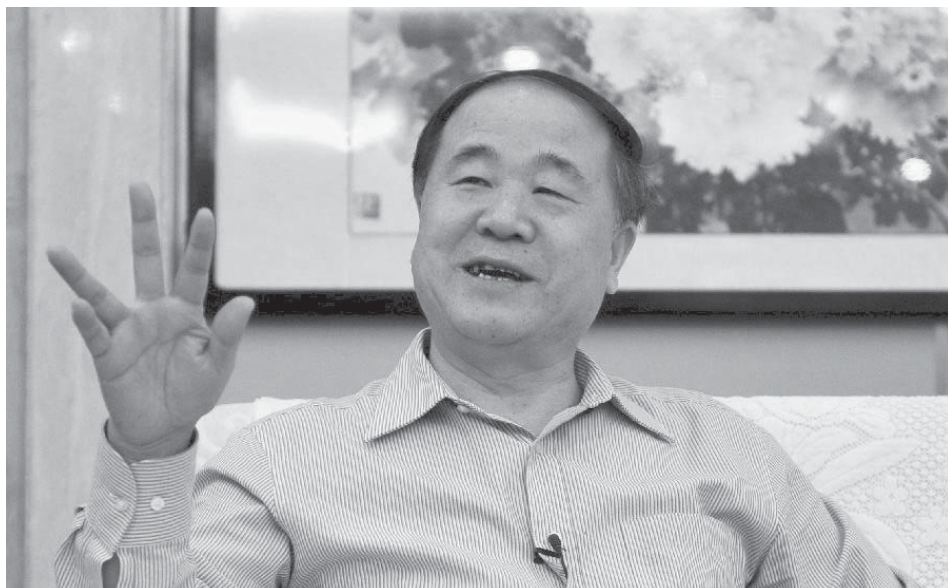
這時他雖然還在軍隊，思想卻已“飛出牢籠”，借著改革開放的東風，開始接受各種國外的信息、知識和思想，使自己不再有精神上的飢餓與孤獨，獲得了更多的啟示與鼓舞，正將騰飛，天馬行空，並且更為獨往獨來，達到了更高的高度。同時卻以自己的“莫言”，無聲地抗拒著仍有的限制與束縛，最後還是離開了軍隊，軍方維護了自己的“軍紀”，

他卻因此得到了解放，各得其所互為解脫了。這段時間從1976年到1997年，恰恰也是21年，正是在此期間，他完全成長並成熟了，從內到外都是個真正的壯漢了，也就真的飛向了世界。

沒有一字批判的批判

不過後來，他的作品我仍然未看過，卻又知道他的許多著作，都不是歌頌黨和政府及其所謂社會主義的，只是又無一字反對和批判，雖然揭露了違反人性、人道的事，但卻抓不住什麼“把柄”。可能正因為這樣，連那些意識形態“執刑官”們，也看不出他作品的“反動性”，相反還為他得了諾獎，向他祝賀對其表彰，說他的獲獎體現了“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不斷提陞”，似乎他為我黨我國增光添彩作出了巨大貢獻。其實這不僅高抬了莫言，更高抬了那個諾獎評委會，他們只是歐洲一個小國內，十幾個文學評論家的個人所見所言，與所謂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絕對不沾邊，只是我們有人偏偏這麼自說自話自吹自擂了，這麼說的人很可能沒有看過或是沒有看懂莫言的小說，自己明明被人臭罵了，還稱讚人家罵得多好多美！

諾獎評委們曾聲稱，給莫言的只是文學獎，與政治無關，倒是我國有人非將此事提到了政治高度，如什麼“綜合國力、國際影響力”之說。又是那個評委會，說所以授獎給他，是



莫言

因其有什麼“魔幻現實主義”云云，魔幻者，誰都抓不住摸不著也看不見之謂也，所以莫言雖也罵了人甚至揭了隱私，但被罵、被揭者卻不覺得，致使人們都皆大歡喜地一齊來祝賀歡呼，這也許就是其“魔幻”之功，相當於孫悟空的無比法力吧！

莫言與“前輩們”大不相同

以上是將“據我所知”的事，信馬由韁地想到哪說到了哪。

再說說莫言對他在“高密東北鄉”的老家，留給自己的只是飢餓和孤獨。據說“部隊永遠是我家”的另一個“老

家”，其實也是飢餓和孤獨，不過前者是物質上的，後者主要是在精神上的，所幸的是他都及時跳出了苦海。他的作品大都是關於第一個家的，但是對於他的第二個家，即也待了20多年的軍隊，除了當時奉命寫作的以外，他的文學筆端，特別是其獲獎作品，幾乎從未涉及，這表示了他對這個“家”——即軍隊的鮮明態度。看來軍營只是使他吃飽穿暖可以飛翔之處，真正投入了全部深情之地，還是他的“高密東北鄉”，那裏與他才是真正水乳交融又骨肉難分的，他所有的親人都生活在那裏，他自己後來幾乎從不離開，也離不開這片土地。

戶口早在京城，卻在縣城買了房子，諾獎揭曉當晚他就在那兒，他獲獎的新聞發布會，就是在縣城的賓館舉行的。他已榮宗耀祖，又正光照故土，從縣城到老家，都借了他的光，從此都已載入了史冊併名揚天下了。當全國媒體都在熱炒時，連我這與他毫不相關的人，也為曾見過他而沾沾自喜，以致命筆寫來，有了此文。

我還想說，他的作品都是寫農村和農民的，在他之前，我國現代作家中也以此為題材的，有趙樹理、孫犁、柳青、周立波直至浩然等等，莫言和他們顯然不同，這很值得注意，值得研究，更值得深思。那些先輩們都是黨培養和聽黨的話的，創作辦事和生活都遵照黨的指示，到了最後那一位，更是竭盡全力不擇手段，描繪了我國農村農民的“金光大道”和“艷陽天”等等，其中塑造其實是編造了一批“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藉此歌頌了我們黨的“偉大、光榮、正確”。然

而恰恰是這些作品，當年無比風光，“八億人民八臺戲，一個作家一部書”，他就是這唯一的作家和唯一作品作者，只是後來反而成了反面典型，連作品和作者都遭到了唾棄和唾罵！

莫言當然是其後輩，但他沒有繼承前人事業，寫出了絕對另類的作品，反其道而行之，大寫了農村和農民生活的黑暗、飢餓、殘酷、恐怖甚至血腥等等，結果不只受到了國內外的歡迎，還一下撈了個諾貝爾文學獎，也將為我國留下一部部經典之作，這到底是因為什麼……？

（2012年11月11日-11月22日斷續寫出）（盧弘）■

莫言不是英雄，
只是講故事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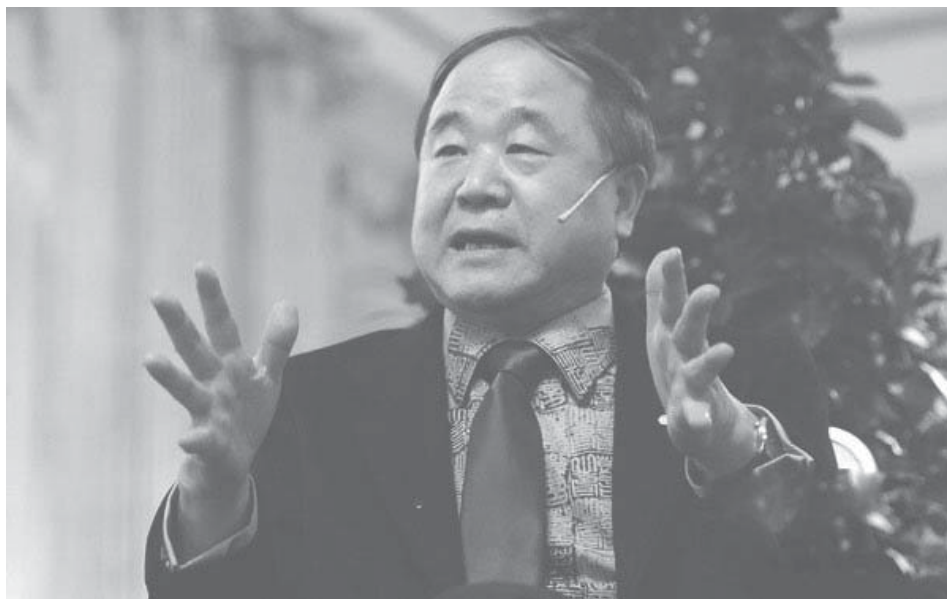
無論如何，莫言的政治風波總有平息的一天，屆時人們能更理性、更依據文學價值來評斷他這個人，他顯然沒有意願當個打破獨裁、拯救劉曉波的英雄，但我們也得尊重他為許多中國平民說故事的權利

莫言不是英雄， 只是講故事的人

諾貝爾獎始於 1901 年，至今已有 100 多年歷史，累積眾多得獎者，其意義在於肯定各領域卓越人士，而以中國之大，歷史之悠遠，百年來卻僅有 4 位得主，不免顯得不太相稱。主因在於，20 世紀的中國接連面臨社會動盪，推翻滿清革命、軍閥割據、日本侵華戰爭、國共內戰、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和六四事件等，交織成中國近代史上的黑暗期，文化成就自然低落；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諾貝爾獎一旦與中國有關，總是容易被政治模糊焦點。

莫言選錯邊

中國的 4 個諾貝爾獎，正巧兩個是文學獎，兩個是和平



莫言為中國人長久以來的諾貝爾情結畫下句號。

獎。按照時間順序，1989年由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拿下和平獎，2000年華裔法籍作家高行健榮獲文學獎，2010年《零八憲章》起草人之一劉曉波雖人在獄中，仍阻擋不了和平獎加冕，最後是，2012年莫言具爭議性的文學獎。再平凡的人都看得出，當達賴喇嘛流亡、高行健選擇入籍他國，遠離故鄉、劉曉波身陷不見天日的監牢中，唯有莫言，他能自由地行走在中國土地上，自在地寫作和說話，甚至背負滿滿的驕傲和祝福前往斯德哥爾摩領獎，如此差異，或許說明何以西方媒體格外關注莫言，尤其他與共產黨親近又是不爭事實。

自古以來，中國就不乏膽敢違抗朝廷，不隨波逐流的文人烈士。楚國屈原寫下“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投汨羅江而死；唐朝杜甫歷經安史之亂，作品展現“對中興濟世的熱切、對橫行霸道的憤慨和對生靈塗炭的悲憫”；近代一點還有詩人北島，他因在六四運動中的特殊作用，不見容於中國政府。這些均是文以載道的例子，也沒有人會否認他們的偉大，然而，蘇珊·布盧姆（Susan D. Blum）在《赫芬頓郵報》（Huffington Post）撰文提到，莫言得獎之所以爭議環繞，實在是他太靠近共產黨，也拒絕以此平台為劉曉波發聲，讓很多人視他同當局鷹犬。

要不要跟政府站同一邊，是作家個人選擇，而莫言身處很多方面都“荒唐”的中國，問題明顯是選錯邊。印度作家潘卡吉·米舍爾（Pankaj Mishra）在《衛報》（The Guardian）上為莫言辯護。他指出，身為最新出爐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

言吸引許多來自西方的敵意，舉例來說，以創作《撒旦詩篇》（The Satanic Verses）一書遭伊斯蘭世界追殺的薩爾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認為，莫言是政府的“替罪羊”；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則說：“現代的中國作家，無論在系統內與否，都必須對他們的獨裁政府表態，很可惜，莫言沒有做出正確選擇，他不是一個勇於對抗政府，直言不諱的異議人士。”

但是，米舍爾認為，這些活在西方自由世界的作家，很難理解亞洲的特殊環境，因此，以其自身框架在看世界、在批判莫言。許多拉丁美洲、亞洲或非洲的作家必須暴露在赤裸裸的暴力中，當中包含國家機器對平民之壓迫，或種族及宗教衝突，他們無法享受與西方作家同等的安全和穩定，就算是西方人感到最自然、最無害的主題，都可能成為專制國家或宗教極端份子的禁忌，導致一定程度的自我審查，但審查不全然一無是處，它提供文學想像更豐富的資源。

莫言的文學獎恐怕是最詭異的一座文學獎，很少人提及他的寫作，最嚴厲的批評都是針對其政治選擇，米舍爾說，莫言支持審查，將它比喻成機場安檢固然可悲，但如果把一些西方作家放進跟莫言相似的背景下，他們還有可能達到相同成就嗎？

誠實面對自己弱點

每個人對文學與政治間的連結有不同詮釋，弗吉尼亞大

學 (University of Virginia) 中國文學教授羅福林 (Charles Laughlin) 認為，諾貝爾文學獎本身就有政治性。他於 “亞洲社會” (Asia Society) 博客寫到，從該獎項過去的歷史來看，時常頒給勇敢反對政治壓迫的作家，這些人往往來自政治紛爭或具獨裁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國家，藝術成就反而不那麼被重視，而至於發達國家的得獎者，也均是能為邊緣化族群發聲的作家，因此若說文學獎不涉及政治意義，是錯誤的觀點。將榮耀歸給共產國家公民並非罕見之事，但頒給像莫言這樣與政府關係良好的情況極少，先前唯一的例外便是 1965 年的蘇聯作家米哈伊爾·肖洛霍夫 (Mikhail Sholokhov)。

假使能事先認知諾貝爾獎的政治目的，那莫言引發的爭議就不是什麼意外之事。19 世紀一度流行 “為藝術而藝術” (Art for art's sake)，該理論認為，美感應是藝術追求的唯一目標，不過，羅福林並不認同。他指出，所有文學都有政治意涵，沒有任何文學成就能僅依賴美感。無庸置疑，莫言以人道主義和良心關懷書寫共產黨錯誤政策下的人倫悲劇，即使他沒有遭到流放或監禁，卻不意味著他不是一位反抗體制的出色作家。批評者過於二元對立、非黑即白的判斷方式只會造成盲點，對他們而言，中國作家的自我救贖彷彿一定得招致政府的憤怒和處罰，否則就是一個懦夫。

在莫言的得獎演說中，他說了一系列關於自己生命的故事，展示其迷人敘事風格，也說明他只是一個 “講故事的人”，不是一位貴族或英雄。莫言歷經文化大革命，那是極其殘酷的

代，而現在人們正同樣殘酷地對待他。羅福林說，世人無不希望諾貝爾獎得主——尤其來自專制政權的中國——個個都是英雄，但英雄主義的外衣只會掩飾人性弱點，莫言不走這條路，大方呈現他的脆弱。藝術表達需要勇氣，也需要誠信，以及痛苦地誠實地面對自己，莫言為我們，以及為中國當代文學做出示範。

被閹割下的集體文化失憶

中國作家慕容雪村曾於一次講話中問：“為何現代中國缺乏偉大作家？”他的答案是：“因為偉大作家在幼兒園時期就被



詩人北島曾是文學獎熱門候選人。

閹割了”，當然這裡的閹割不是生理閹割，而是教育、審查和自我審查交互作用下的閹割，莫言雖自詡“莫言”，但不管他說什麼（支持審查）或不說什麼（劉曉波），都已引起軒然大波。

支持莫言的人會說其作品時常著重於中國社會問題上，藉此辯證對政府剝削和無情官吏的反動，不過《每日電訊報》指出，這是一種模糊焦點的戰略，讓不幸從中央轉向地方，英國漢學家藍詩玲（Julia Lovell）稱此為“歇斯底里的現實主義”（hysterical realism），文學評論家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則發現，莫言的語言十分混亂，且他也未認真處理文革或大躍進之類的民族創傷，用枝微末節的諷刺聲音來尋求可被政府接受的政治異議。

近幾年來，中國的文學自由已有顯著解放，只因中共的控制重點從出版品轉移到大眾媒體。儘管如此，《每日電訊報》認為，莫言還是做得太少，他在斯德哥爾摩的發言仍是不可原諒，因為它象徵一種“集體文化失憶”，如何處理該國政府令人不安的歷史，永遠是中國藝術家之難題。

無論如何，莫言的政治風波總有平息的一天，屆時人們能更理性、更依據文學價值來評斷他這個人，他顯然沒有意願當個打破獨裁、拯救劉曉波的英雄，但我們也得尊重他為許多中國平民說故事的權利。（蕭憲聰）■

所謂“改革開放”，對外是要開門，對內就是鬆綁，對思想，更不應施加任何束縛。鄧小平恰恰是以權力為施政的圓心，他的左右搖擺，他的倒行逆施，他對黨史重大事件的裁決和處理，一切都是圍繞鞏固自己的權威，他是自由的敵人

阻撓改革開放的鄧小平

很早就知曉阮銘其人，中國官方媒體上，他的姓名前常常冠有“文革打手”“台獨分子”等等頭銜。他十多年前從美國前往台灣任教，很少回美國，直到 2013 年年初，這位 82 歲的退休老人才從台灣“回到”美國定居，於是我登門拜訪，請他回顧他的人生中的幾個重要階段。

按中共論資排輩的算法，阮銘堪稱“老革命”——他 15 歲就在上海加入中共，比江澤民的黨齡都長，雖然江澤民比他大 5 歲。阮銘告訴我：江澤民是在大學裡入黨，我是在高中一年級入黨，入黨介紹人是一個高三學生，“我的上級是錢李仁，後來當過中國常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使、中共中央對外



阮銘。（高伐林攝）

聯絡部部長和人民日報社社長。”

中共黨章不是規定 18 歲才能入黨嗎？年齡這麼小、思想尚未成熟，怎麼就能入黨？阮銘告訴我：那時地下黨對年齡沒有那麼嚴格，他還知道有一個 13 歲就入黨的黨員呢。阮銘夫人阮若瑛在一旁說：入黨不限年齡的不是光地下黨，我也是 15 歲就被批准成為預備黨員的，年滿 18 歲轉正——我是在晉察冀解放區入的黨，但入黨時也是秘密的，當時黨並未公開。

看來，共產黨不守自己訂的規矩，源遠流長。

阮銘雖然黨齡長、資格老，但在中國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風浪中，飽受顛簸，就像坐上了過山車。中共建政初期，他就被任命為清華大學兩個系的團委副書記（後升任書記），與胡啟立、艾知生、何東昌這些後來炙手可熱的政要同堂議事；1958 年，他調任《北京日報》政法文教部副主任、理論部主任；1961 年更調至中宣部，在“文革”前和“文革”初期因為寫了批周揚的一篇文章，他頗受陶鑄青睞，被欽點擔任調查研究室主任，中宣部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但隨著陶鑄垮台，阮銘也就一頭栽下，被抄家六次。改革開放初期，他應胡耀邦之邀，到中央黨校為《理論動態》效力，又擔任理論研究室副主任，參與起草了不少重要文件和領導人的講話；但隨著胡耀邦政治上失勢，他再次遭遇厄運，受到嚴厲批判，1987 年被開除出黨。

阮銘對我說，“我這個人的個性就是不願受束縛，我說

話隨便，想到什麼就冒出來，那時批評我最多的就是“自由主義”。

他說，自己 82 個春秋的經歷以 1988 年出國劃界，分成兩段，兩段的主題，都圍繞“自由”：

第一段是在中國的日子：自由的追求與毀滅

第二段是在美國、台灣的歲月：自由的見證與挑戰

“自由”確實就是理解阮銘命運和理念的關鍵詞。他在 60 多年前的 1950 年夏天，在北京團市委主辦的高等院校團幹暑期訓練班上發言時，講過一個故事：馬克思去世後，美國一家雜誌創刊，請恩格斯用一句話概括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恩格斯回信說，他在《共產黨宣言》中找到了一句話：在他們所期望的未來社會，“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句話讓阮銘深深地折服。他在接受我的採訪時談到馬克思主義有合理成分，脫口而出的例證也正是這句話。他說：“我一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就被這句話抓住了心！”

阮銘對鄧小平、胡耀邦等人搞改革開放的評價，也是以“自由”為準繩。他說：所謂“改革開放”，對外是要開門，對內就是鬆綁，“市場經濟就是要自由，把束縛的繩子解開。”而思想，更不應施加任何束縛。而鄧小平恰恰是以權力為施政的圓心，他的左右搖擺，他的倒行逆施，他對黨史重大事件的裁決和處理，一切都是圍繞鞏固自己的權威，他是自由的敵人。

阮銘的親身經歷很有獨特性，既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社會轉型的參與者，也是台灣民主走向正軌、政黨輪替的見證人。他對《新史記》記者的回憶，也涉及這兩部分內容。本期先刊出關於他談及中國大陸的部分。

鄧小平周期性地左右搖擺

新史記：阮銘先生，你是中國“文革”之後大轉折的親歷者，最敏銳地感受到當時氣氛。我讀過你的《鄧小平帝國 30 年》等著作，書中你寫道，鄧小平左右來回搖擺，一年偏向改革派，一年偏向專政派。那段日子我也在北京工作，也親身感受到中央的風向一年一變，單年左轉，雙年扳正——鄧小平為什麼會這樣搖擺呢？

阮銘：鄧小平左右搖擺，是以權力為中心的。多年身在高位，鄧小平將國家的權力、黨的權力，與他個人的權力分不開、分不清了——他認為他自己就是黨、就是國家。從蔣介石、到毛澤東，到鄧小平，都是一樣的：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我就是馬克思主義！所謂一年一變，其實不離其宗：他要維護自己的權威。

人們都說鄧小平“三落三起”。這第三次，當他爭取復出時，他寫信表態：要輔佐華國鋒——葉劍英倒是真的要輔佐華國鋒，鄧小平說要“輔佐”呢，我看是假的！鄧小平看不起華國鋒。他逼華下台，實際上沒有什麼正當理由。鄧有很強烈的

個人權力欲。他說過他不抓權，不想當第一把手，說要讓“年輕人”來幹，但他又要控制“年輕人”。

現在人們形成一個很錯誤的印象，說鄧小平要改革開放，鄧小平改變了中國。實際上哪裡是這樣？！

對鄧小平，如果只看其“南巡講話”，他當然是講了倡導改革開放的話。但另一方面的話他也講得很厲害呀：反和平演變，警告“無硝菸的世界大戰”、提防和平演變中國等等。他自己誇耀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看看“鄧選”第三卷，就很清楚了！1991年之後他還說過：中國絕不能出戈爾巴喬夫。

有人說他“否定毛”，我看他沒有“否定毛”；有人說他“否定文革”，我看他也沒有“否定文革”——他把“文革”的禍害說成是“大民主”，他“否定文革”其實是否定民主，他把1989年的請願抗議風潮，也說成是“文化大革命”！

新史記：鄧小平不是在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發表了講話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

阮銘：是的。我寫過這段歷史，我參與過，知道情況。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實非常重要，但是跟鄧小平有多少關係呢？——全會前開中央工作會議開了將近一個月，工作會議前一段，他在國外，根本沒參加；出國之前他委託胡喬木寫了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的發言稿，但是他出訪回國之後，發現中央工作會議整個會場的氣氛與他預想的完全不同，胡喬木起草的稿子根本不能用，這才讓胡耀邦趕快給他臨時找了幾個人，

連夜趕出你提到的那篇講話稿，後來被稱為是“給十一屆三中全會定調的報告”，但這其實是個急就章。而且，僅僅三、四個月後，1980年春天，他就在理論務虛會上講話，提出“四項基本原則”，這才是他真正心中所想的。

改革開放的歷史始終被顛倒

新史記：你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鄧小平並沒做出多大貢獻？

阮銘：傅高義在《鄧小平傳》中認為，沒有鄧小平就沒有改革開放。我看不能這樣講。鄧小平在一定階段、一定程度上，確實對改革有推動；但是許多事並不是他的功勞，也記到他的帳上了。

例如，在鄧小平還沒有控制全部權力、還在輔助華國鋒的時候，葉劍英、鄧小平和胡耀邦，還有谷牧這些人，都在華國鋒領導下工作，那時就開始搞開放了呀，被陳雲批成“洋躍進”，這種批評，我看沒有什麼道理！陳雲批得最厲害的無非就是要引進十幾套化工、化肥、化纖成套設備。過去毛澤東自誇我們中國“沒有外債”——那時是想借外債也借不到啊！到了華國鋒時代，外國願意借錢、願意投錢了，當時要投資100億，現在看起來，也算不了什麼！這些項目，雖然是華國鋒最後批准的，但是當時鄧小平、胡耀邦都贊成。——胡耀邦就很光明磊落，沒有把責任推給華國鋒，而是承認自己有份。

新史記：胡耀邦批評華國鋒搞“兩個凡是”。

阮銘：“兩個凡是”當然是錯的，但是華國鋒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自己認錯了嘛。我對胡耀邦的觀感是，他對華國鋒很尊重。因為他與華國鋒“文革”前就在一起共過事——那時胡耀邦下到湖南，他認為華國鋒這個人很務實，重視生產，重視經濟。華國鋒並沒有反對改革開放啊，在理論務虛會上，華國鋒是支持胡耀邦的，反倒是鄧小平打擊理論務虛會，讓胡喬木起草了那個“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

這段歷史，我覺得，始終是被顛倒的！

後來陳雲向改革開放發難，對特區都說是“租界”，要廢掉，鄧小平覺得這樣不行，才又偏向改革。但是碰到專政問題，鄧小平總是向陳雲屈服的：1981年的中央工作會議，1983年的批胡耀邦，1985年的全國黨代表會議……在政治思想領域，黨內高層一發生爭論，鄧小平要麼附和陳雲，要麼一聲不吭。

像胡耀邦等黨內改革派的處境，我看，在葉劍英參與中央事務的時候還好一點——葉帥是支持華國鋒、支持胡耀邦的。如果華國鋒不下台，改革派的處境可能更好一點。回過頭來看，胡耀邦能發揮作用的時候，還是在華國鋒時期；華國鋒被鄧、陳搞下去了，黨內保守勢力馬上就把矛頭指向胡耀邦了。

這個歷史後來又重演了一遍：胡耀邦一下台，他們馬上就將矛頭指向趙紫陽。

胡、趙自己可能不醒悟，但是我作為旁觀者，是很清楚的！



鄧小平與胡耀邦在一起。

華國鋒並未阻撓鄧小平復出

新史記：記得把華國鋒整下去時，說他的一項錯誤是多次阻撓鄧小平復出。

阮銘：不是這麼回事！華國鋒並未阻撓鄧復出，他主要是強調，“文革”剛結束，震動很大，在全國範圍內要讓人民轉彎，要有一個過程。那時要否定毛澤東對鄧小平的批判，並不容易。

真正不願讓鄧小平出來工作的，是汪東興。我親耳聽見汪說過：“鄧小平有什麼了不起？他那兩下子根本就不行！”汪東興那時的口氣很大，因為他覺得抓“四人幫”是他的功勞——確實也應該說，他與華國鋒是起了主要作用，他們倆首先有這個念頭，華國鋒才去找葉劍英商量，行動中主要也確實是靠汪東興的 8341 部隊。所以後來把葉劍英抬得很高，汪東興就不太服氣。後來外面傳得更多了，又是王震、又是鄧小平……其實當時連李先念也與此事沒有關係；鄧小平得知“四人幫”被整掉的消息比我們這些人還晚，他得知了，才給華國鋒寫了兩封信——跟給毛澤東寫“永不翻案”的信一樣肉麻。

新史記：有一個說法：鄧小平、胡耀邦與趙紫陽是改革開放的“三駕馬車”。

阮銘：是的，現在一般人認為，鄧、胡、趙在一起的“三駕馬車”，是中國最好的時候——實際上根本不是這麼回事！他們三個人，每人的想法都不一樣，趙紫陽當時與胡耀邦也有矛盾。當然後來“六四”，趙紫陽遭到那樣的打擊，有些事現在就不提了。

新史記：胡績偉晚年口述寫書《胡趙新政啟示錄》，有人要他在書名最前面加個“鄧”字——“鄧胡趙”，說這樣國內說不定就可以出版了，但他堅決不肯加這個字。

阮銘：是啊，胡績偉當然最瞭解情況，他知道不是那麼回事嘛！

像吳江這些人都認為，陳雲最懂經濟，鄧小平和胡耀邦

都不懂經濟。我看，鄧小平是不太懂經濟，對一切問題他都是從政治著眼，還是毛澤東的那一套，搞平衡。他自己講，鄧力群是不改革開放的，胡耀邦是不反自由化。但他認為，經濟上不改革開放，是可以原諒的，政治上不反自由化，是不能原諒的。所以他不能原諒胡（耀邦）趙（紫陽），卻能夠原諒胡（喬木）鄧（力群）——毛澤東也是這樣，對左派就比對右派寬容得多。

他們這一夥勢力——主要是陳雲、王震、李先念、姚依林、胡喬木、鄧力群等人——要陳雲出面，向鄧小平施加壓力，要鄧小平支持他們。我後來看鄧力群的回憶錄《十二個春秋》，他寫得非常清楚，自誇自己的功勞，所以那幾年逢單，是他們將鄧小平拉過去，跟陳雲站在一邊了，就是馬克思主義；逢雙呢，就是鄧陳有點不一致了，馬克思主義就不行了——鄧力群這本書，很能驗證我自己親歷的那段歲月。當然，他這本書現在也是不讓出版、不讓流通的。

新史記：中共多年來總是認為：左，是認識問題，右，是立場問題。

阮銘：對，幾十年來一直是這樣的。

鄧在政治上是毛的繼承人

阮銘：否定毛澤東，肯定鄧小平，現在不僅是中國的潮流，也是世界的潮流。有人對習近平不滿意，說習要將毛與鄧都



華國鋒雖是毛澤東選定的接班人，但為糾正毛澤東的錯誤決策付出很多努力。

肯定，他們極力要求全盤肯定鄧，全盤否定毛。實際上，鄧在政治上是繼承毛的。

那一年，我受命參加起草葉劍英的國慶 30 週年的講話，把黨史理了一遍，要否定所謂“黨內 11 次路線鬥爭”。那次講話是由葉劍英出面講，但精神、內容實際上是由鄧小平控制。本來我們起草人對“高饒聯盟”，對“反右”，對“反右傾”，都要否定，但是鄧小平不同意我們的意見——只要他有

份參與的運動，他都不同意否定。像整高崗、饒漱石，是他和陳雲兩人去向毛澤東告的狀嘛——毛澤東後來都沒參加整高崗的會，讓劉少奇去主持——鄧小平堅持不給高饒平反；對“反右”是最典型的了，鄧小平堅持說“反右派”是必要的，只承認“擴大化”，非要留下幾個人不平反。只有1959年批彭德懷的那次廬山會議，鄧小平因為打乒乓球摔壞了腿沒去參加，既然跟他無關，他才同意徹底否定。

這些問題，只有到將來公布了歷史檔案，才能真相大白！

現在中共黨史把毛、鄧、江、胡這麼排下來，胡趙那一段主政的歷史，都被勾掉了。傅高義那本書，把胡耀邦寫得很不堪，說他“像個蟋蟀跳來跳去”——當然，傅高義費了很大工夫，對鄧的許多細節掌握了很多……

“上海不為天下先”

胡耀邦這個人胸懷是很寬宏的，他在講話中、批示中，一直都非常支持趙紫陽的工作——他甚至支持鄧力群。鄧力群日子最不好過的時候，是發動“清除精神汙染”受到上下抵制和批評、最不得人心那一段，連鄧小平都對鄧力群很不高興——後來鄧小平的態度才又變了。海內外都罵鄧力群之際，胡耀邦接見外賓時把鄧力群找去一起見，對外賓介紹說，這是我們黨和國家在理論方面的主管。

當時有人說胡啟立是胡耀邦的人，胡耀邦不以為然，說



阮銘在一次會議上演講。

胡啟立雖然在團中央跟我在一起，但是提拔胡啟立的，是鄧小平。胡啟立被派到天津去當市長，讓鄧小平覺得滿意，就提到中央來了——鄧有這個特點：從一件事看人。對王兆國不也是這樣嘛，鄧小平聽了彙報說王在“文革”中抵制“批鄧”，就一下把他提到那麼高。

胡耀邦就不是這樣的。後來王震到黨校來，說胡耀邦在黨校有個“智囊團”，他發狠要打掉這個“智囊團”。胡耀邦說我哪裡有？確實，胡耀邦不出面保那些被看成是他的人。

胡耀邦有軟弱的時候，他的度量也大，能够容忍反對自己的人。可是你這麼對人家，人家不是這樣對你啊，他們是時時、處處挑胡耀邦的毛病！

新史記：胡耀邦與趙紫陽有時也意見不一？

阮銘：胡耀邦覺得，既然讓我當總書記，我不能只管黨務——他是非常重視經濟的，特別是農村經濟、地方經濟。當時的經濟，講是講改革開放，其實還是計畫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趙紫陽呢，認為自己身為國務院總理，就得統管全國的經濟。

胡耀邦到下面各個縣，鼓吹發展地方經濟，各地當然也巴不得發展，但爭先恐後，肯定突破陳雲提倡的“計畫經濟”，趙紫陽也不高興。這樣到1981年中央工作會議，是胡剛當上總書記後主持的第一個會，他沒有講話。那時陳雲已經發話批判兩個東西了，一個是經濟赤字，實際上也批判了趙紫陽，再一個是波蘭團結工會。他的矛頭對著胡、趙，也是對著鄧小平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關於黨和國家政治體制改革的意見的。那次會上，鄧、趙完全是投降，鄧小平讓鄧力群起草講話，“完全同意陳雲的意見”，表態說要退、退夠！——陳雲主張經濟零增長。胡耀邦只好不作聲，但他心裡是不贊成的。

那時我寫了關於特區的報告，我主張特區不要放慢，還要加快發展。胡耀邦一看，馬上批轉下去。後來福建省委書記項南他們看到了，才鬆一口氣。

陳雲、胡喬木他們都是攻擊特區的，陳雲至死都不去特區。這些問題上，鄧小平搖搖擺擺。我寫了那個報告之後，陳雲對特區仍然反對，鄧小平也仍然不吭氣。直到1984年，鄧小平自己去看了，才後悔沒有將上海定為特區。

那時我跟童大林他們也去了廈門，當時廈門經濟很落後，特區也很小——珠海、汕頭、廈門……80年代初都是中國很落後的地方。如果要是選在上海這樣的從30年代以來就是中國管理得最好、經濟最發達的地方，一旦搞成特區，那影響就非同小可！

那年鄧小平視察了廈門，又開了14城市包括上海的會議，胡耀邦找了阮若瑛的弟弟阮崇武來參加北京這個會，阮崇武當時是上海副市長。那天上午胡耀邦找阮崇武談，說上海要是帶頭開放，就會大大加速中國經濟發展。中午阮崇武就給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國棟打電話通氣傳達耀邦的講話，但陳國棟是聽陳雲的呀，他就說了一句話：“上海不為天下先。”

所以上海就還是依然故我，按兵不動！一直拖到了1991年、1992年。本來八十年代中期就可以起飛的，14城市包括上海呀！陳雲的勢力控制住上海，動不了，耽誤了多少時間！

記得我1988年是從北京經上海到美國的，在上海住在重慶南路。那個時節，上海跟我上中學的時候相比就沒什麼變化——我離開了40年呀！直到1992年以後，才面貌大改觀。



阮銘的內弟阮崇武曾經擔任過公安部長和海南省委書記。

不搞設計的“總設計師”

我那個特區報告，胡耀邦批給特區會議，但是他們還是聽陳雲的，不聽胡耀邦的，特區會議開過之後，福建的項南給我寫信說，他們分明是要限制特區，而不是發展特區。

說到阮崇武，後來調到公安部當部長。1986年那一次學潮，鄧小平也是不惜流血啊，幸虧胡耀邦不肯。當時阮崇武叮囑我們說，你們千萬不要去天安門，鄧小平說了，去一個抓一個，不惜流血！後來下起大雪，學生還是去了天安門。阮崇武弄了一些大車，把學生送回學校去了。

有人說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自己都說：誰設計了？他的“貓論”，“摸論”，哪是設計？改革開放，

一是對外開門，就是引進資本、管理；一是對內鬆綁，市場經濟，就是要自由，把束縛的“繩子”解開就好了。要說鬆綁，是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習仲勛……他們起的作用更大。

習仲勛離開廣東之後，省委書記袁南生他們就很困難啊，因為陳雲給他們念“計畫經濟緊箍咒”。那時他們做膠鞋，袁南生給我看過一個陳雲的批語：膠鞋只許出口，內銷一雙就是賣國——他就是這麼批的！陳雲就是這樣的人！

廣東後來派了任仲夷去，形勢才又好轉了。他把秘書雷宇派到海南島去，也幹得很好。但是任仲夷、雷宇、項南，三人都被陳雲他們一夥幹掉了。

對專制派，信而不用 對改革派，用而不信

新史記：如果當時胡耀邦態度更堅決一些、對圍攻更強硬一些……

阮銘：鄧小平支持胡耀邦，胡就敢講話；但是只要陳雲欺負胡耀邦，鄧小平就一言不發。在胡遭受圍攻、比較困難的關頭，鄧小平都不作聲。最明顯的一次，就是1982年，十二大剛剛開過，陳雲他們要把胡耀邦搞掉，開第一書記會議時，鄧力群已經布置下去了，準備了很多拱倒胡耀邦的材料，當時是葉帥旗幟鮮明，堅決反對他們這麼幹，鄧小平才下令都封存起來了。

陳雲很厲害呀，整倒胡耀邦，他是想讓鄧力群上。鄧小

平說，鄧力群是要把我們往左拉，往左拉可以，但是總書記還是要讓趙紫陽當。趙紫陽又被整下台了，鄧小平還是不讓鄧力群和李鵬上，另外找來個江澤民。這就是鄧小平！因為他覺得，胡趙有自己獨立的見解，是右的；鄧力群也有獨立見解，是左的。可以容忍左的，但是不能讓他當總書記——這跟當年的毛澤東如出一轍，毛澤東信任江青，但他心裡明白：江青他們要是掌權，天下會亂；但又不能信任鄧小平，於是就找來個華國鋒。

江澤民是很糟糕的，幹的時間最長，比鄧小平主政的時間還長，造成的腐敗最嚴重。

新史記：鄧力群倒還是敢跟鄧小平頂的，鄧小平要他在會上表態，說一句支持胡耀邦主持起草的文件，他居然當面拒絕說“我不說”。鄧小平也拿他沒轍，只說：你不說，有人說。

阮銘：是啊，胡耀邦就不敢當面頂鄧小平。他要頂的話，早就完蛋了！這就也說明了，左派可以頂鄧小平，右派不能頂他。

鄧小平早就要拿下胡耀邦

新史記：1986年胡耀邦去主持起草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決議，當時給我的感覺，是想“挖牆角”，把鄧力群控制的地盤爭奪過來，在意識形態、觀念更新等領域爭取主動。

阮銘：因為別的都不讓胡耀邦搞啊！連政治體制改革，

鄧小平曾經九上《時代》周刊封面，但是阮銘認為，他的貢獻被大大誇大了。



鄧小平都指定趙紫陽來抓。這個時候的鄧小平，已經不是像1980年那樣主張搞黨和國家政治體制的改革了，而是要搞行政改革，所以交給趙紫陽，搞黨政分開那一套。胡耀邦沒有什麼可作的了，但他還有幻想，因為他1984年搞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決議，得到鄧小平的高度讚揚，所以他想搞一個精神文明方面的決議，跟普世價值接軌，肯定人類的優良傳統。搞這樣一個決議，也不致於觸碰一些政治制度的敏感話題。

新史記：如果沒有在十一屆六中全會閉幕式上的那場爭辯，導致鄧小平強硬地要保留“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中國1986年底到1987年初的風向是不是就不會出現那麼大的逆轉，又連鎖反應到1989年？

阮銘：歷史的走向，不會有根本不同。如果不發生那一場爭論，鄧小平可能會按照原來的盤算，到十三大上再拿掉胡耀邦，而不會提早整掉他；但是就拿掉胡耀邦而言，是鄧小平早就下了決心的——主要還是為權力問題。鄧小平對胡耀邦表示：在十三大上自己要全退，胡耀邦表態贊成，還說自己也半退。鄧當時也當面許諾了讓胡半退，但私下裡，他卻跟王震這些人講胡耀邦同意他全退。所以王震才那麼大膽，跑到黨校去公開地講：誰讓鄧小平下台，誰就是“三種人”！（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定下黨內清理“三種人”：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和打砸搶分子。——高伐林注）

還是趙紫陽聰明啊，他一聽鄧小平這麼說，馬上回答：你不能退。

新史記：我聽到一個說法，楊尚昆得知鄧小平要全退，就說，你要退的話，你放心，我們還不放心呢。楊尚昆是暗指趙紫陽（當時鄧是軍委主席，趙是軍委第一副主席，楊是軍委常務副主席）。

阮銘：這是很可能的。在拱倒胡耀邦問題上，楊尚昆是非常活躍的。胡耀邦被迫辭職，黨內反應很強烈，紛紛質問，薄一波就讓胡喬木、鄧力群趕快炮製材料，把“生活會”上的批鬥發言拼湊成胡耀邦的“十個問題”，作為“中央文件”下發。後來又陸續發下去五個“補充材料”。楊尚昆在軍隊的傳達最出格，竟把胡耀邦說成向鄧小平“搶班奪權”，比喻成同林彪一樣。楊的講話稿曾印發軍隊高級幹部，影響極壞，鄧小平讓他收回——鄧雖然對胡耀邦不滿意，但是他知道胡

耀邦不是這種人，那些說法講的完全不是事實。我們有親戚在軍隊裡，得知這些情況。

我覺得鄧小平最開始的設想，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他的目的還是要走向“均富”。倒是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更壞。他跑到華爾街去敲開市鐘，把高盛引進中國，壓低農民工的工資，讓圈地的地產商發財……中國腐敗的高峰，還是江澤民時代。他的兒子、李鵬的兒子也都是那個時候起來的。趙紫陽的子女也有經商的，哪有他們搞的那麼厲害？王震、胡喬木的孩子更厲害。

江澤民時代是中共最腐敗的時期。說中共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誰是“先進生產力”？過去說只有勞動創造價值，當然不全面，但是到了江澤民時代，變成勞動不創造價值，只有資本才創造價值——只有華爾街創造價值。後來爆發金融海嘯，我看追禍源就要追到華爾街和江澤民。市場經濟並不會自動符合公平正義的準則呀，亞當·斯密就另外寫了《道德情操論》，現在的經濟自由主義分明就是反自由、反平等的！

自由是一生的追求

新史記：我注意到，你高度強調自由的意義，你的自傳，書名就是“尋找自由”，這或許是你對自己一生經歷和志向的高度概括？自傳第一部（上下冊）的標題又是“自由的追求與毀滅”，你在半輩子生涯中多次經歷過蔣介石、毛澤東，以及八十年代鄧小平對自由

的摧殘。

阮銘：我覺得，自由，是所有價值追求的核心，是最根本的價值。我一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就深深地被他這句話抓住了心：每一個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的必要條件！馬克思的話有合理成分，這句話我至今非常贊成。

新史記：是個人本位還是民族本位，是當前國人爭論的焦點之一。

阮銘：有個人才有民族，鄧小平否定人權，只有國權；否定人格，只有國格。但是，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如果不建立在尊重個人的基礎上，就都是假的：不尊重一個一個的中國人，怎麼可能尊重整個民族呢？台灣也是這樣，國民黨搞中國的民族主義，民進黨搞台灣的民族主義——互不相讓，真打起來怎麼解決？只能靠拳頭、靠槍炮導彈來解決了！

現在那些經濟自由派、新自由主義，我看，都是偽自由主義。自由應該是每一個人的自由，不能有了資本的自由，勞工就失去自由。只要有一個人不自由，就沒有自由。自由與平等，是不應該對立起來的。

新史記：你從這個意義上，將自由派與左派的訴求結合起來：應該每個人都平等享有自由權利，才是真正的平等？

阮銘：平等不等於平均——每人的天賦不一樣啊，不可能都平均。我說的是，要給予每個人平等的機會。羅爾斯說社會對殘疾人、對弱勢者，要給一些照顧。亞當·斯密主張讓市場自動調節，但人性有貪婪的一面、功利的一面，他指出了市



陳水扁(右)接見阮銘。

場不會自發地產生道德——華爾街這些人就是典型。格林斯潘的書裡有一章寫到“虛假性繁榮”，美國的虛擬經濟超過實體經濟的幾十倍，這個就是“虛假性繁榮”“非理性繁榮”。美國應該追究那些公司搞的衍生產品，我看對格林斯潘也應該追究，問題的根子，就在他當權的那些年“非理性繁榮”，他明明知道啊。(高伐林)■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天安門屠殺後鄧小平的開放式共產奴役制度，在全球自由國家的資本、資源、資訊、技術、人才強力增援之下迅速“崛起”，正迫使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全球退卻。而人們尚未認識到這一擴張對人類自由的巨大威脅

30 年了， 鄧小平帝國還在“崛起”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從毛澤東帝國向鄧小平帝國過渡的歷史轉折點。

1989年6月4日天安門屠殺之後，我在美國寫過一本《鄧小平帝國》，結尾一段話是：

“鄧小平在‘六四’屠殺後宣布把他的本來不合法的最高權力又一次轉讓給他的第三個接班人江澤民。所以應該說，鄧小平帝國在歷史上已經結束了。‘六四’以後的中國，已進入後鄧小平帝國時代。這是一個將生未死之間的過渡時代。專制制度苟延殘喘，但還沒有斷氣。民主制度已孕育在母腹之中，但還沒有誕生。要使中國自由民主制度和平地誕生下來，還需要每一個中國人作出各自的獨立的貢獻。”

歷史表明，這個結語是錯了。鄧小平已於1997年2月去世，但他留下的鄧小平帝國沒有結束，還在繼續“崛起”；民主中國也沒有誕生。究竟如何解釋這一歷史現象？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現在人們比較熱心批毛，而諱言批鄧；大概是以為徹底批了毛，中國走向自由的障礙即可消除。我看很難。今日中國的統治思想，是“鄧小平理論”。鄧小平理論當然包括毛澤東思想，就是鄧小平自我標榜的“完整、準確的毛澤東思想體系”；你不批鄧，就不可能徹底批毛，此其一。其二，鄧小平對毛澤東思想確有“發展”，在當今世界比毛澤東思想更具



本文作者著有《鄧小平帝國 30 年》。

欺騙性。

1989 年席卷中國的自由民主運動，是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激盪的產物，被鄧小平的屠刀毀滅在天安門下。我當時判斷，鄧小平所恐懼的全球民主浪潮的“大氣候”和中國人民爭取自由民主人權的“小氣候”，豈是鄧小平的坦克和子彈消滅得了的？這“大、小氣候”終將再起結束鄧小平的帝國。

歷史的進程出乎預料：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繞過血腥的天安門廣場，半年後抵達柏林牆下。東德共產黨沒有效法鄧小平下令鎮壓，讓歡呼的民眾推倒了這座分隔共產奴役制度與自由世界的監獄之牆。羅馬尼亞獨裁者齊奧塞斯庫下了鎮壓令，軍隊拒不執行，反而逮捕和槍決了這位共產暴君。整個東歐共產國家獲得了自由。

最後效法鄧小平的是發動蘇聯 1991 年 8 月政變的亞納耶夫。他把在黑海休假的戈爾巴喬夫軟禁起來，宣布自己代行總統職務，成立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接管全國權力，調動紅軍鎮壓莫斯科示威民眾。但當葉利欽爬上一輛坦克演說，與民眾一道阻擋軍隊時，塔曼裝甲師的戰車調轉炮口保衛葉利欽，存在 74 年的蘇聯帝國隨之瓦解。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南歐初興之時，世界上只有 40 個民主國家，絕大部分屬於富裕的西方工業發達國家。20 年後，全球超過半數的國家和人口進入民主國家行列。有人從而認為人類已走向“歷史的終結”。法蘭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寫道：“我們可能正走向人類意識形態演變的終點，並以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化作為人類政府的最終形態。”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共產奴役制度挑戰自由民主浪潮的歷史沒有終結。天安門屠殺後鄧小平的開放式共產奴役制度，在全球自由國家的資本、資源、資訊、技術、人才強力增援之下迅速“崛起”，今天正迫使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全球退卻。而人們尚未認識到鄧小平式新奴役制度的擴張對人類自由的巨大威脅。

從毛澤東帝國到鄧小平帝國

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我說過馬克思有兩個靈魂：追求“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的人道主義的馬克思，認

同暴力和無產階級專政、要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的馬克思。毛只取其一。

秦始皇也有兩個靈魂：一個建設者的靈魂，車同軌，書同文，發展了古代中國的交通、水利、文化；一個暴虐者的靈魂，修長城，修阿房宮，修墳，焚書坑儒，以言治罪。毛也只取其一，說“破字當頭，立在其中”，其實是“只破不立”。

毛澤東用半個馬克思加半個秦始皇，建立起他的封閉帝國。封閉秦帝國的是萬里長城。封閉毛帝國的是意識形態的萬里長城——毛澤東思想。

一個封閉的奴役制度帝國，靠高度集權奴役、壓榨本國人民，也可以“崛起”於一時。陳毅不是說“寧可當掉褲子也要發展原子彈嗎”？毛帝國正是在不但當掉褲子，而且砸掉鍋子、餓死幾千萬人之後的 1964 年原子彈上天；接著在“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文化大革命”中氫彈、導彈、人造衛星上天。

但是封閉帝國的“崛起”有其限度。毛澤東“全面專政”的意識形態長城不但窒息了政治、思想、文化的生機，而且阻塞了資本、資訊、資源、貨品、人員的流通，導致經濟從停滯到“崩潰邊緣”。於是有了鄧小平改革。

鄧小平對毛澤東，既有繼承，又有變革。繼承的是毛澤東在政治、思想、文化領域的封閉，就是他自己概括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那完全是從毛澤東那裡來的，不但“完整、準確”，甚至比毛澤東還毛澤東，他把

毛澤東帝國的“四大”，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從憲法中勾消。變革的是對西方自由國家資本、資訊、資源、貨品、人員的開放。

鄧小平的“兩手硬”戰略

鄧小平的這“兩手硬”戰略，並不是一開始就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是解放思想和民主改革；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中央工作會議上的爭論，是實踐派、民主派對凡是派、專政派之爭，是全開放對全封閉之爭。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鄧小平讓胡喬木替他起草了一篇發言稿。胡喬木在稿子中寫了“要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無論如何不能忘記社會主義社會還有階級鬥爭，黨內還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寫了“我們務必要使階級敵人的一切活動，在開始出現的時候就加以消滅”等等。這是堅持毛澤東帝國全封閉路線的凡是派、專政派的典型語言。

鄧小平把胡喬木的稿子拿給胡耀邦，說：“這個不能用，喬木的思路不行了，你給我找人寫。”那時鄧小平的思路，是拒絕胡喬木代表的凡是派、專政派，而傾向胡耀邦代表的實踐派、民主派的。鄧小平廢棄了胡喬木的稿子，在胡耀邦幫助下組成臨時起草班子，按照鄧小平當時的思路，完成了那篇後來被稱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主題報告”的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講話中突出了“民主是解放思

想的重要條件”。鄧小平說：“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

那時鄧小平還明確支持“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西單民主牆。他說：“群眾貼大字報是正常現象，是我國形勢穩定的一種表現。我們沒有權力否定或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有氣要讓他們出氣。”

可以說，那時的鄧小平，是和胡耀邦一起站在實踐派、民主派的立場上，拒絕了反民主的凡是派、專政派。鄧小平在聽取胡耀邦彙報理論工作務虛會討論情況時，還講過更鮮明的民主言論。他說：



毛澤東與鄧小平。

“十月革命後 60 多年，民主沒有搞好。2013 年上半年要寫出一篇二、三萬字的大文章，‘五四’發表，從世界歷史發展與人類社會的趨勢，講清楚民主的發生和發展。資產階級以民主起家，反對封建專制。它搞民主超過歷史上存在過的一切剝削階級。無產階級民主應當是民主發展的更高階段，要超過資產階級民主；資產階級民主的好東西要大大發揚。過去無產階級沒有搞好，斯大林犯錯誤，我們也犯錯誤。

我們要人民當家作主。怎樣使人民感覺到自己是主人？資產階級有一套使自己成為主人的東西，選舉、立法可以支配政府。我們需要想辦法使人民感覺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

那一天是 1979 年 1 月 27 日。兩天後鄧小平到了美國，回來後發動了一場“懲罰越南”戰爭，西單民主牆出現魏京生警告“防止新獨裁者”的大字報。短短兩個月中，鄧小平的“看法和注意力”從傾向民主派、拒絕專政派轉向拒絕民主派、傾向專政派，於三月三十日發表了胡喬木為他起草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把他兩個月前設想的“民主大文章”拋到了九霄雲外。鄧小平說：

“我們必須看到，在社會主義社會，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敵特分子，有各種破壞社會主義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壞分子，仍然是一種特殊形式的階級鬥爭，或者說是歷史上階級鬥爭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遺留。對於這一切反社會主義分子仍然必須實行專政。這種專政是國內鬥爭，有些同時也是國際鬥爭，兩者實際上是不可分的。因此，

在階級鬥爭存在的條件下，在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存在的條件下，不可能設想國家的專政職能的消亡。事實上，沒有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就不可能保衛從而也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

鄧小平的兩種“思路”

這不是轉回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時被鄧小平廢棄的那篇胡喬木草稿的“思路”了嗎？三個月前鄧小平說“喬木的思路不行了”，三個月後卻成了鄧小平自己的“思路”。

同一個鄧小平，兩種“思路”，三次講話。究竟何者為真？何者是假？

我看都是真的。這就是鄧小平自己講的“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在1978年12月和1979年1月，鄧小平的“注意力”在改變毛澤東帝國留下來的“思想僵化，迷信盛行”、“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的狀況，所以“看法”傾向胡耀邦代表的民主派“思路”。到了1979年3月，鄧小平的“注意力”轉向胡喬木、鄧力群們向他報告的“社會上那股懷疑社會主義、懷疑無產階級專政、懷疑黨的領導、懷疑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思潮；黨內也有人不承認這種思潮的危險，甚至加以某種程度支持”的傾向，所以“看法”也就轉向胡喬木代表的專政派“思路”了。

此後六、七年，鄧小平的“看法和注意力”在民主派和專政派之間，轉過來、倒過去，時而主張“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

改革”，“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從制度上保證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時而主張“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能搬用資產階級民主，不能搞三權分立那一套”，“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

1987年1月胡耀邦下台，標誌鄧小平與黨內民主派的最後決裂；也是鄧小平帝國“反自由化”大戰略的最後確立。之前在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1986年9月28日）上那場“大辯論”，專政派在鄧小平支持下擊敗民主派。然後鄧小平和專政派利用1986年底的學生運動逼迫胡耀邦提出辭呈。那次事件，可以看做1989年天安門悲劇的小型排練。當時學生運動雖因胡耀邦處置得當和平落幕，但仍使胡耀邦和黨內民主派遭到清算。鄧小平當時的講話已經殺氣騰騰，揚言“不怕流血”，“天安門廣場來一個抓一個”！

鄧小平和鄧力群的對話

但事後專政派的奪權目標沒有實現。因為鄧小平確立的“反自由化”大戰略是“兩手硬”。鄧小平認為專政派只有專政一手，沒有開放一手，所以不能用專政派推薦的“左王”鄧力群取代胡耀邦。早在導致胡耀邦下台的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那場“大辯論”前十天，1986年9月18日上午10時，鄧小平和鄧力群之間有一場有趣對話：

鄧小平：新的稿子（指胡耀邦主持起草的《精神文明決議》草案）發下來了，你看了沒有？

鄧力群：看了三遍，有四條意見。……

鄧小平：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你這次對決議草案提意見的方式不好（指鄧力群把他和胡喬木的意見送給陳雲等人）。你和胡喬木不要擴大我和陳雲同志之間的分歧和矛盾。

鄧力群：你們兩位之間有不同意見，我看出來了。陳雲的主張，我宣傳過；你的主張，我宣傳過。宣傳你的主張比宣傳陳雲的主張多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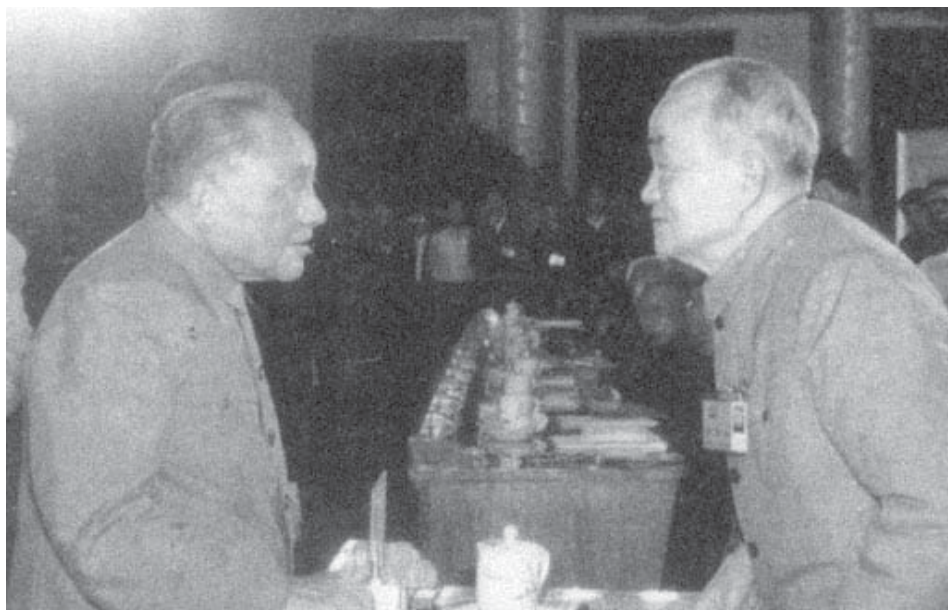
鄧小平：明天開會，你就講一句話，完全贊成這個稿子。

鄧力群：我不講。

鄧小平：你不講，別人會講。

鄧力群在《十二個春秋》自述中說：鄧小平與我談話時，當著面是說：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但與王震他們談話時是說：“要把我們往‘左’的方面拉。”

這表明鄧小平在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之前，還是想支持胡耀邦反對鄧力群的“左”。等到全會上發生那場他意料之外的大辯論，看到除了陸定一、萬里之外，楊尚昆、余秋里、王震、薄一波、陳雲、李先念、宋任窮、彭真等所有老人，都站到專政派一邊，鄧小平也就從反鄧力群的“左”轉向反胡耀邦的右了。



鄧小平與胡喬木。

鄧小平帝國的總綱領

江澤民執政之初，意識形態領域聽鄧力群、胡喬木指揮，提出“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經濟領域聽陳雲、姚依林指揮，回歸“鳥籠經濟”。結果是兩年經濟大滑坡。1992年鄧小平南巡，警告“誰不改革誰下台”，直指江澤民。江澤民慌忙拜託鄧小平牌友丁關根求情，表示完全接受鄧小平批評，同鄧力群、陳雲“保持距離”。

鄧小平南巡講話說：“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這是鄧小平帝國的總綱領。

鄧小平說：“十二屆六中全會我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要搞 20 年，現在看起來還不止 20 年。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把希望寄託在我們以後幾代人身上。我們這些老一輩人在，有分量，敵對勢力知道變不了。但我們這些老人嗚呼哀哉了，誰來保險？我出來後就注意找第三代，兩個人都失敗了，不是經濟上出問題，都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上栽跟頭，這就不能讓了。”

那時胡耀邦已去世，趙紫陽遭軟禁，黨內民主派已徹底清除。鄧小平還放不下心，立此政治遺囑，警告鄧小平帝國的繼承人：“經濟上出問題”可以“讓”，“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上栽跟頭”的胡耀邦、趙紫陽，絕不可“讓”。

這就叫“警惕右”。“防止‘左’”呢？鄧小平說，“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

指的是鄧力群、胡喬木們，實際上也包括陳雲、李鵬、姚依林和江澤民前期。但是不要緊，“經濟上出問題”，可以“讓”。還是“左”比右好。

鄧小平曾批評毛澤東，“一個領導人，自己選擇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種封建主義的做法。”鄧比毛更甚。毛選過劉少奇、林彪，選了又廢，最後選上華國鋒也未站住。鄧選過胡耀邦、趙紫陽，也是選了又廢。但最後一著比毛高明，他不但選定自己的接班人江澤民，還選定接班人的接班

人胡錦濤。兩個都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上經過考驗：一個在上海查禁《世界經濟導報》，一個在西藏鎮壓藏民請願，均威震國際。鄧小平為防備江澤民“經濟上出問題”，還指名“懂經濟”的朱鎔基輔佐江。

所以 1992 年中共十四大後，鄧小平不需要再“出頭”。他的帝國，從政治綱領到組織架構均已完整確立，足以抵擋“國際大氣候”——全球民主化浪潮的衝擊了。

胡耀邦與專政派的根本分歧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到 1986 年 9 月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是民主派與專政派勝負未決的鄧小平帝國過渡階段。

民主派的主要代表是胡耀邦。粉碎“四人幫”後，胡耀邦復出工作，是 1977 年 3 月，出任中央黨校副校長；比鄧小平復出工作早四個月。

先是華國鋒找胡耀邦出來工作。胡耀邦說自己是“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對象之一，不停止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難以工作。“華國鋒試圖說服胡耀邦，說“你先出來工作，問題總要解決，急不得”。胡耀邦未被說動。

華國鋒找葉劍英勸胡耀邦。葉對胡說：“你還是出來工作好，也是幫助我啊！讓你當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華國鋒兼校長是掛名），憑你的智慧和才幹，是可以搞出點名堂來

的。”胡答應了。

胡耀邦一到中央黨校，就選擇了改變中國歷史命運的兩個“突破口”。

一個是打破思想枷鎖。胡耀邦認為，不打破兩個“凡是”，不把被顛倒的思想是非、理論是非、路線是非再顛倒過來，全國人民的精神得不到解放，中國的命運就無從改變起。

一個是打破組織枷鎖。胡耀邦認為，不平反冤假錯案，不把被顛倒的幹部路線糾正過來，牽涉一億人的親人還在冤獄之中，靠什麼力量改變中國命運？

胡耀邦於 1977 年 5 月布置中央黨校三位教師研究、撰寫《把被顛倒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1977 年 10 月 7 日在《人民日報》發表）；1977 年 7 月創辦《理論動態》，就是進攻這兩個突破口的戰略部署。

那時尚未恢復工作的鄧小平，也對兩個“凡是”提出批評。1977 年 4 月，華國鋒派汪東興和李鑫找鄧小平談話，要鄧小平承認兩個“凡是”，承認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但與鄧無關；以便“創造條件結束批鄧”、讓鄧小平出來工作。

鄧小平說：“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問題，也說不通肯定 1976 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鄧小平認為：“毛澤東思想是個思想體系。我們高舉旗幟，是要學習和運用這個思想體系，



鄧力群

以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指導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
鄧小平反對兩個“凡是”，是反對以毛澤東的“片言只語”、
“割裂、歪曲、損害毛澤東思想”。

三支部隊和兩個“不管”

於是在“打破思想枷鎖”這一戰場，有三支思想部隊。

一支是“凡是”派，即主張“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主要代表是華國鋒、汪東興、李鑫、吳冷西、熊復、胡繩、張平化、鄭必堅等。當時占統治地位，實力最強。

一支是“準確、完整”派，由鄧小平個人提出，胡喬木、鄧力群、王震等支持；後來“凡是”派被“實踐”派打敗，大部分“凡是”派轉而依附“準確、完整”派，聯手攻擊“實踐”

派。

一支是實踐派，主張“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踐派認為，兩個“凡是”是維護毛澤東的舊權威，不准改變過去的錯誤的東西。鄧小平的“準確、完整”，是樹立新權威，即由新的領袖或理論權威來判決可以改變過去哪些不“準確”、不“完整”的東西，這不過是打開舊枷鎖套上新枷鎖而已。實踐派不依附一切舊的和新的個人權威，把真理交給社會的、科學的實踐來檢驗，從而徹底否定了教條主義和理論專制主義。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發表後，“凡是”派與“準確、完整”派都來壓制。“凡是”派公開攻擊“文章犯了方向錯誤，理論上是荒謬的，思想上是反動的，政治上是要砍倒毛澤東思想這面旗”！“準確、完整”派的“第一枝筆”胡喬木打上門來，1978年6月20日到胡耀邦家中說：

“爭論是你在黨校挑起的，爭論下去將造成黨的分裂，要立即停止，不准《理論動態》再登可能引起爭論的文章！”

但真理的聲音已傳遍全國，誰也壓不下去。就在胡喬木威脅“爭論下去將造成黨的分裂”後四天（6月24日），《解放軍報》在羅瑞卿大將支持下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給胡喬木當頭一棒。接著周揚在7月24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討論會講演中指出：“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我看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

周揚的講演，在全國產生重大影響；被視為對這場爭論的定論。

在另一個“突破口”打破組織枷鎖方面，胡耀邦在 1977 年 12 月兼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後，立即對平反全國冤假錯案採取行動。他針對兩個“凡是”，提出兩個“不管”：

“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搞的，不管哪一級、什麼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改正過來。”

當時有人問：“毛主席批的怎麼辦？”胡耀邦答：“照樣平反！”

一些毛澤東親批的要案、大案，胡耀邦都組織專人複查。不但毛澤東搞錯了的要平反，華國鋒、鄧小平搞錯了的



胡耀邦

也要平反。涉及幾十萬知識分子命運的“反右派”，直接主持者是鄧小平和彭真，平反阻力極大。在鄧小平、彭真領導下打了大批右派的蔣南翔等人，竭力阻止為自己打的右派平反；胡耀邦力排眾議，為絕大多數右派都平了反。只因鄧小平堅持“反右派鬥爭有必要，錯在擴大化”，最後不得不象徵性地留下幾個“頭面人物”。這個保留至今帶來後患。

三中全會——實踐派全勝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可以說是實踐派對“凡是”派和“準確、完整”派聯盟的一次勝利。

三中全會的議程本來很簡單：一是討論農業問題，二是通過 1979、1980 年國民經濟計畫。鄧小平建議全會前開工作會議，用兩、三天時間討論一下“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問題。鄧小平讓胡喬木起草的講話稿，是把“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完整準確”地納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毛澤東思想體系”。胡喬木寫道：

“全黨全軍經過這兩年對林彪、四人幫的揭批查鬥爭，從組織上整頓了各級領導班子，從思想上清理了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歪曲篡改，恢復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全黨全軍全國各民族的安定團結現在已經有了鞏固的基礎，完全有可能實行工作著重點的轉移。只有這

樣做才叫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才叫完整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體系。”

然而工作會議的進程出乎鄧小平、胡喬木們的預料。胡耀邦選擇的兩個“突破口”，平反冤假錯案和真理標準之爭，在分組討論中欲罷不能。各組還議論開了西單民主牆提出的許多歷史是非問題。諸如：天安門事件，彭德懷和廬山會議，陶鑄和中央宣傳部問題，右派是摘帽還是徹底平反問題，劉少奇問題等等。

“凡是”派在會上發動攻擊周揚在真理標準討論中的講演。胡繩說：“有的同志在公開講演中宣布黨內這種分歧不僅是思想問題，而且是政治問題、路線問題，是關乎國家前途命運的問題。雖然其用語不過是八股老調，但在國內、國際引起人們對安定團結局面的疑慮，其影響是不好的。”

胡繩的挑戰在會上重新燃起戰火，結果以“凡是”派失敗告終。工作會議從11月10日開始，胡喬木的稿子是11月19日完成給鄧小平的。會議開到了11月30日，鄧小平發覺不對了，才廢棄胡喬木的稿子，要胡耀邦找人重寫。

中共官方文獻把鄧小平那篇講話定為“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實在是一大諷刺。那篇講話，不如說是在當時會外西單民主牆“大氣候”和會內各小組討論“小氣候”逼迫下的急就章，是在胡耀邦選擇的兩個“突破口”突破之後的必然產物。講話肯定真理標準討論的語言，是照錄被胡喬木指責為“分裂黨”的周揚在社科院講演。這不但是對“凡

是”派的否定，也是“準確、完整”派的自我否定。

華國鋒在會議結束時的講話，肯定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對兩個“凡是”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華國鋒說：“由於會議時間有限，這方面的問題不可能花很多時間來解決。中央政治局意見按照葉帥（葉劍英）提議，在三中全會後專門召開一次理論務虛會，進一步把這個問題解決好。”

於是“打破思想枷鎖”的戰場，就轉移到理論務虛會。

胡耀邦在十一屆三中全會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擔任黨中央秘書長，同時兼任中央黨校、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職務。解放思想和平反冤假錯案兩個“突破口”，仍在他領導之下；但愈是深入進行下去，遇到的阻力愈大。胡耀邦感慨地說：“禁錮我們這個民族創造力的，一個是精神枷鎖，各色各樣的教條主義；一個是組織枷鎖，各種錯誤的組織結論，壓得抬不起頭，無法發揮各自的聰明才智。這樣一個精神上、組織上被禁錮、被壓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麼可能與世界上的發達國家進行自由競爭？”

對胡耀邦正式發難

陳雲集團策劃第一次倒胡在 1983 年 3 月，爆發點是經濟議題。

胡耀邦的經濟發展戰略，在理論上與實踐上，都不可避免與陳雲集團“抑需求，捨發展，緩改革”的半斯大林主義、半經驗主義經濟思想相衝突。因此陳雲集團對胡耀邦“必欲除之而後快”是勢所必致。

首先發難的是胡喬木。2月16日他把《人民日報》正副總編輯找到家裡，指責胡耀邦的“全面改革”講話不符合十二大精神，是“對大家施加壓力”，囑《人民日報》“不要宣傳”。

姚依林隨後給鄧小平寫信，稱“胡耀邦鼓吹突破‘保四爭五’是提倡高速度。”胡喬木還到鄧小平那裡告狀，說“胡耀邦對社會主義信念動搖”。一時亂雲滾滾，風暴即至。

正式發難是在3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會議上，趙紫陽先講了一段話，說：“歷史經驗是，幾年順利發展，就坐不住，高指標，折騰，搞不下去了，再調整。現在有的同志頭腦發熱，又想折騰一次”。

趙紫陽沒有點名，接著李先念也附和了幾句。然後是陳雲長篇發言，指名道姓，列舉胡耀邦九條罪狀，從“高速度”、“高指標”，“高消費”、“搞亂經濟”，一直到“調查研究方法”，全盤否定胡耀邦的經濟戰略思想和從調查研究不同地區的實際條件出發、因地制宜的工作方法；賣弄他那套半斯大林主義、半經驗主義的“綜合平衡”論和“長期蹲一個點、解剖一個麻雀”的老套套、老方法。

會議一結束，鄧力群當天晚上就在事先安排好的《紅

旗》雜誌聯絡員會上傳達了“陳雲九條”；接著又在第二天（3月18日）新華社全國分社會議上再次傳達，並點出“中央最近出了一點麻煩”，要全國分社向所在省、市、自治區黨委“吹吹風”。

與鄧力群公開點火相配合，胡喬木背著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等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找陳雲秘密策劃，整理出3月17日會議記錄，打算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傳達和討論“胡耀邦問題”；實現其“倒胡”陰謀。

最有趣的一幕是，3月18日夜晚，胡喬木與陳雲謀劃結束後，興奮地跑到胡耀邦家裡，裝出一副同情的模樣對胡耀邦說：“你不當總書記，還可以幹別的，我們友誼長存。”弄得胡耀邦當時莫名其妙。

許多人只看到鄧力群“倒胡”是想取而代之。其實1983年那次“倒胡”，鄧力群還沒有那個資格。那次“倒胡”主角是陳雲和胡喬木，所以胡喬木才會情不自禁在胡耀邦家說漏嘴。胡喬木在1982年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已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他雖然不是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書記，但經常列席中央常委和書記處聯席會議。

鄧小平：胡趙格局不能變

胡喬木沒有自知之明，自以為鄧小平和陳雲都喜歡他；又看到3月17日會議上，趙紫陽、李先念、鄧小平似乎都站

在陳雲一邊，沒有一個人替胡耀邦說話，而且會議完全按照陳雲主張，把經濟工作的決策主導權由書記處轉到中央財經小組。胡喬木認為自己勝券在握，肆無忌憚地背著鄧小平幹起來了。其實鄧小平雖然在反自由化和使用專政手段等方面支持胡喬木主張，但對胡喬木的整體政治評價“不及格”。當年胡喬木投降江青、積極批鄧；鄧小平原諒了他，說他“不是賣身投靠，是軟骨頭”。

胡喬木沒有料到，他操之過急卻壞了事。鄧力群在《紅旗》聯絡員和新華社全國分社長兩個會議上煽風點火，引發全國強烈反彈。3月18日夜裡，廣東、上海等省、市紛紛打電話到中央查問：“究竟中央出了什麼麻煩”？“怎麼剛剛撤了華國鋒又要倒胡”？“到底還要不要同心同德搞四化”？廣東省委把鄧力群的講話記錄連夜報送中央。

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習仲勛接獲各地反應後，報告了鄧小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鄧小平立即與在廣東的葉劍英通話商量；葉劍英堅決反對召開胡喬木、陳雲策劃中的“倒胡”會議。於是鄧小平把胡喬木、鄧力群找去，要他們把整理的材料“全部封存”；告誡他們“胡、趙格局不能變”！1983年3月那場“倒胡”流產政變，到此結束。

鄧力群在他的《自述·12個春秋》中，對此不無遺憾地回顧道：“一九八三年之前，鄧（小平）、陳之間一直合作得很好，到了一九八三年這件事，鄧、陳分歧開始顯露出來”。



陳雲與胡喬木交談。

鄧比毛更斯大林主義

鄧小平在 1983 年“倒胡”、“打周”事件中的表演，充分暴露出他的“半毛澤東主義半實用主義”思想本質。胡耀邦、周揚主張思想解放，是關注中國的前途命運，通過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全面改革實現每一個中國人的物質和精神的解放。而鄧小平和專政派的“思想解放”，只為奪取和鞏固自己的權力。所以十一屆三中全會，對胡耀邦、周揚和中國人民來說，是思想解放的起點；而對鄧小平和專政派來說，是“思想解放”的終點。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三個月，鄧小平和專政派就亮出了“四項基本原則”，鎮壓思想解放運動，取締民主牆，逮捕魏京生。鄧小平要的“準確、完整的

毛澤東思想體系”，只取其“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一半：“四項基本原則”；而拋棄另一半“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哪有什麼“準確、完整”？只能稱之為“半毛澤東主義”。那另一半是“半實用主義”，對打擊政敵有利時，“群眾貼大字報是我國形勢穩定的表現”；當大字報批評到自己時，就成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動亂因素”，“不但要講，而且要專政手段”了。

鄧小平與陳雲、胡喬木、鄧力群、姚依林們的分歧在經濟領域，政治思想領域他們都是專政派，都比毛澤東更斯大林主義。

1956年毛澤東提出“十大關係”、“雙百方針”批斯大林的“左”（教條主義），鄧小平、胡喬木都消極觀望。等到1957年毛澤東反右，批赫魯曉夫的右（“修正主義”），鄧小平、胡喬木緊緊跟上，而且表現得比毛更“左”。

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原來會議主題是討論《中央關於整黨的決定》，準備自1983年冬季開始，用三年時間，對黨的思想、作風、組織進行一次全面整頓，以適應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全面改革”使命。

但鄧小平講話（10月12日）把會議重心轉移到“清除精神汙染”和批判周揚。鄧小平說：“精神汙染危害很大，足以禍國誤民，腐蝕人們的靈魂和意志。有一些同志熱衷於談論人的價值、人道主義和所謂‘異化’，說社會主義存在異化，經濟領域，政治領域，思想領域都存在異化。他們還

用克服這種所謂異化的觀點來解釋改革，使人們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失去信心，可見理論界思想混亂到什麼程度！”

這一段是針對周揚的。還有一段說：“有些同志對精神汙染不聞不問，採取自由主義態度，甚至認為是生動活潑，是雙百方針的體現”。這是針對胡耀邦的。據鄧力群在《自述·12個春秋》中所述，針對胡耀邦的這一段，是王鶴壽看了鄧力群替鄧小平起草這篇講話後建議加進去的。可見胡耀邦的這位在延安時期“推心置腹”的老朋友，1983年就準備對朋友“落井下石”了。

二中全會後，鄧力群得意忘形，他和吳冷西通過他們控制的中宣部和電視廣播系統，敦促各省、市、自治區領導人和知名學者、專家、公眾人物，每天輪流三、四個省，在全國聯播節目表態，聲討“精神汙染”和“人道主義、異化”等“資產階級自由化”言論；從而把“清汙運動”從思想、政治領域迅速擴大到全國城鄉機關、學校、科研單位、工礦企業、農村、部隊，在社會上造成種種緊張、混亂現象，嚴重衝擊全國經濟和人民生活，引起國際輿論關注，以為“文化大革命又來了”。

對批“自由化”一槌定音

1986年9月28日，十二屆六中全會舉行，爆發了一場出乎鄧小平意料的爭論。當時胡耀邦主持會議，工作人員

讀完決議草案後，胡耀邦問：同志們有意見沒有？

陸定一站起來說：“我對這個決議很贊成，這個決議寫得很好。有一點意見講一講。在起草這個決議過程中今天第四次提這個意見了：第14頁第12行有一句話，‘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等等，我主張‘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這幾個字刪掉。這個‘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來歷，是1956年我們黨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時，蘇聯方面說我們這個方針是資產階級自由化。以後到了‘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中央有一個文件，題目是兩個字：‘通知’，說‘二月提綱’是彭真一個人搞的，是背著康生和其他人搞的，是資產階級自由化，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放，就是只讓資產階級放，不讓無產階級放。1967年，《人民日報》登了一篇大文章，是反對我的，批判我資產階級自由化，證據是我在中南海懷仁堂對科學家、文藝界講‘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講了好幾個自由：批評的自由，反批評的自由，保留意見的自由，信教的自由，不信教的自由等等，這個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經過情況就是這樣。我覺得文件去掉‘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這幾個字，對於這個決議絲毫沒有損害。只有一個好處，就是不同那些錯誤的東西混淆在一起。”

胡耀邦對決議稿中保留這幾個字作了解釋，說明是按照鄧小平的定義，“資產階級自由化”指“否定四項基本原則，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個範圍。

接著萬里發言贊成陸定一意見，主張取消這幾個字。
陸定一、萬里發言都博得會場一部分人掌聲支持。

然後，楊尚昆、薄一波發言，反對去掉這幾個字，也博得會場另一部分人掌聲支持。

這時鄧小平說話了。鄧小平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為什麼？現在群眾中有一種思潮，這種思潮就是自由化。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第一件做了什麼事？就是人大通過決定取消憲法的一條，叫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為什麼首先做這件事？就是說明現在有一股思潮，如果搞自由化，就不可能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搞自由化本身要破壞我們安定團結局面的。看來，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管什麼這裡用過，那裡用過，無關緊要，現實政治要求我們寫這個。”

鄧小平講完，政治局常委趙紫陽、陳雲、李先念均發言主張保留。

胡耀邦說：“保留對我們當前局勢有利，以後實踐證明這個名詞不恰當，再重新考慮”。最後胡耀邦提請全會表決，一致通過。

鄧反自由化講話與胡決裂

鄧小平這篇反“自由化”講話導致中國政治氣流的大變



鄧小平：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

動。原來鄧小平的注意力，在防止鄧力群代表的思潮把中國政治氣流往左拉，阻滯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陸定一的發言使鄧小平的注意力轉向“自由化”思潮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而在鄧小平看來胡耀邦對“自由化”思潮的“軟弱”比鄧力群的“左”更危險。

這篇講話也是鄧小平與胡耀邦最後決裂的標誌。鄧小平在他的講話中提出了一個重大政治原則問題：

——粉碎四人幫以後第一件做了什麼事？

對胡耀邦來說，這第一件事，就是真理標準討論，終結“兩個凡是”。糾正冤假錯案，糾正歷史錯誤。

而對鄧小平來說，這第一件事，變成“決定取消憲法的一條，叫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

如果當初真是鄧小平說的那樣，華國鋒、葉劍英在“粉碎四人幫以後第一件事”就是決定取消“四大”，恐怕就沒有後來的真理標準大辯論，沒有後來的西單民主牆，沒有後來的糾正歷史錯誤，也沒有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轉折和鄧小平復出掌權了。

1986 年底的鄧小平已經自己否定了自己。鄧小平的“四項原則”，就是華國鋒的“兩個凡是”。差別只在華國鋒搞毛的“凡是”，可以糾正；鄧搞自己的“凡是”，同毛一樣無法自己糾正。這就是鄧小平的悲劇。

胡耀邦下台後，陸定一曾對他的發言產生的後果向胡耀邦表達歉意。胡耀邦對陸定一說：“我是由衷贊成你的主張的，只是在那個場合，不便多說”。

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上那場意料之外的大辯論引發出鄧小平一篇“反自由化”的即席講話，改變了全黨、全國的政治氣流。《精神文明決議》剛一誕生，生命即告終結。一場比“清除精神汙染”更大規模、影響更深遠的“反自由化”之戰，已蓄勢待發。（阮銘）■

阮銘小檔案

1931 年出生於中國上海，15 歲（1946 年）加入中共。1948 年考入燕京大學，後併入清華大學，擔任機械、水利兩系學生黨總支書記、團委副書記（後任書記）。1958 年調任《北京日報》政法文教部副主任、理論部主任；1961 年調至中宣部，後任調查研究室主任。

“文革”後 1977 年調至中共中央黨校，任理論研究室副主任，參與中央文件、領導人講話起草。1987 年，被中共開除黨籍。

1988 年，前往美國，先後在哥倫比亞大學、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做訪問研究。1997 年到台灣，在淡江大學任教，2002 年取得中華民國國籍，2004 年至 2006 年被聘為台灣總統府國策顧問。他是台灣綜合研究院顧問。

著有《歷史轉折點上的胡耀邦》、《鄧小平帝國》、《中共人物論》、《兩岸統一百年大計》、《透視總書記》、《民主台灣 vs. 共產中國》、《從寧靜革命到寧靜建國》、《歷史的錯誤——台美中關係探源》、《我看台灣與台灣人》等書，以及自傳《尋找自由》（第一部）。

一張偽造的雜誌封面，折射出太多圍繞著吳仁寶與華西村模式的不實甚至虛偽的光環。爭議焦點集中在：華西村究竟是一個“社會主義新農村”，還是吳仁寶獨裁下的“獨立王國”？吳仁寶是政治上的變色龍，還是探索者？華西模式能否持續？

吳仁寶虛偽的光環

3月22日上午8時8分，江蘇省華西村原黨委書記吳仁寶的追悼會在華西村民族宮大禮堂舉行。8時35分，追悼會結束，賓客即到吳仁寶家中，參加遺體告別儀式。12時，載有吳仁寶遺體的白色靈車掛著黑白畫像，車頭鋪滿鮮花，緩緩從靈堂開出，靈車繞華西村一週。道路綿延數公里，兩側站滿了人，數萬名民眾從各地趕來送行，手舉悼念橫幅，追車而行。但奇怪的是，“少林 temple”發微博和圖片稱：“在‘中華第一村’華西村原黨委書記吳仁寶的追悼會上，在街上等待靈車經過的人群中，有好幾個婦女面露喜色，目測是仇家吧！”

被稱為“中國最有名的農民”的吳仁寶備極哀榮。3月19日以來，“萬米長廊”兩側逐漸排滿了從中央到地方、個人，



等待吳仁寶靈車經過的人群中，有婦女喜笑顏開，網友推測：“是仇家吧！”

以各種級別、名義贈送的花圈；設在吳仁寶家中的靈堂接受公開弔唁。華西村民、周邊村民、從外地趕來弔唁者太多，華西村為此採取交通管制以控制人流量。

從中央到地方，各種媒體的報導連篇累牘，這也並不意外，因為吳仁寶的知名度、影響力遠遠超過一些身居高位的官員，更超過一些大紅大紫的明星。

但蓋棺未能論定，圍繞吳仁寶及“華西模式”的爭論並沒有隨他的辭世而平息，近日更有沸騰之勢。

誰忽悠了眾官方媒體？

吳仁寶因患肺癌醫治無效，於3月18日18時58分在華西村家中逝世。不到半小時後，@新華網19時26分即以快訊發出訃聞：“原中共江蘇省江陰市華西村黨委書記吳仁寶因患肺癌醫治無效，於2013年3月18日18時58分在華西村家中逝世，享年85歲。”20時33分新華網即發表文章《“中國最有名的農民”吳仁寶辭世曾登上時代週刊封面》，開門見山便說：

3月18日，原華西村黨委書記吳仁寶因病去世，享年85歲。他被稱為“中國最有名的農民”，曾將貧窮落後的華西村建設成為中國公認的“天下第一村”。他曾於2005年作為封面人物登上美國《時代週刊》。

隨後，新華社、中央電視台等中國多家主流媒體報道吳



吳仁寶虛偽的光環

國內媒體稱吳仁寶 2005 年被美國《時代週刊》作為封面人物。網友找到該雜誌 2006 年 1 月 26 日封面，近似度極高。

仁寶去世的消息時，均稱他曾在 2005 年作為封面人物登上美國《時代週刊》雜誌，並刊登了這個“封面”。但這個“封面”，隨後被證實為“偽造”。

新浪微博網友 @ 五道口奧薩瑪首先發文指出，吳仁寶登上《時代週刊》封面的圖片是經過 PS 的，也就是說，這張封面圖純屬子虛烏有。“我花了一分鐘就找出的原圖如下。”在博文下方，他配上了自己查得的原封面對比照。

從配發圖一來看，“The Man Who Men of the Moment”語法不通，且在《時代週刊》網站檢索可見 2006

年1月26日的類似封面。

對此，IB Times 中文網記者致電《時代週刊》北京站人員核實，《時代週刊》人員表示，網上的說法屬實，在他的印象中，並沒有做過對吳仁寶的專題報道。至於吳仁寶是否登上過《時代週刊》的封面，可以在《時代週刊》網站上通過查詢封面得知。

20日下午，華西村黨委副書記孫海燕澄清，截至昨晚12點，華西村從能找到的資料來看，吳仁寶並沒有登上過《時代週刊》封面，網上照片不是真實的。但是，吳仁寶老書記和吳協恩新書記的確接受過《時代週刊》採訪，時間是2008年4月。

那麼，偽造的“封面”最早出自何處？



“中國最有名的農民”吳仁寶。

20日網易博主“群星的盡頭”發文《吳仁寶登〈時代週刊〉封面之謎：是誰忽悠了新華社和央視？》。文章說，感謝偉大的谷歌，通過以圖搜圖，發現這張PS假圖最早是在2008年11月發布的，騰訊財經頻道、新浪財經頻道都使用過這張圖片。一分析又發現，騰訊、新浪報道的都是同一個事情：第一財經大型紀錄片《激盪·1978-2008》。而這個紀錄片的總撰稿是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先生，google“吳曉波+封面+吳仁寶+2005”，發現吳作家曾為《贏在華西》寫過一篇書評，裡面有如下一段：

在吳仁寶身上融在了一起，讓無數“企業家應遠離政治”的忠告破產，也讓世人每每產生好奇之心，其中包括美國的《時代週刊》，這家全球最有影響力的雜誌在2005年用了一期封面文章來解讀吳仁寶。

這是目前為止，能在網絡上查到的關於吳仁寶登上《時代週刊》封面的最早文字描述。繼續順藤摸瓜，吳曉波還寫過一本頗受好評的書《激盪30年——中國企業1978-2008》，出版日期是2007年1月，寫作日期肯定更早了，題記是2006年1月寫的。就目前掌握的信息而言，由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在2006年左右寫作、中信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的這本書，是吳仁寶登上《時代週刊》封面假圖和文字描述的更早出處。“當然了，不排除還有更早的，如果有誰知道，請不吝告知。”網易博主“群星的盡頭”說。

“屹立 50 年不倒”的秘訣

一張偽造的雜誌封面，折射出太多圍繞著吳仁寶與華西模式的不實甚至虛偽的光環。

在官方媒體中，吳仁寶被稱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當代農村幹部的傑出代表”、“中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探索者、開拓者和卓越的帶頭人”。然而爭議卻從未停止過。

吳仁寶是優秀黨員，還是暴君？是政治上的變色龍，還是探索者？華西村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共同富裕？還是烏托邦，掛羊頭賣狗肉？華西模式是個騙局嗎？能否持續？……這一切都有爭論。焦點集中在：吳仁寶究竟是將華西村變成了一個“社會主義新農村”，還是他獨裁下的“獨立王國”？

在過去的幾十年間，在中國歷史的各個時期，吳仁寶幾乎都是典型：從幹互助組、人民公社，到辦鄉鎮企業，直到成為“中國最有名的農民”，進北京城、進大會堂，同領袖握手、與領袖交談，從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到江澤民時代、胡錦濤時代，直到今天，他是“代代紅”，是“不倒翁”，更在共和國歷史上成為一個時代的典型：吳仁寶退休前，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吳仁寶當即組織創作出三個劇本，歌頌“三個代表”。

華聲在線發表《“天下第一村”的傳奇還能持續多久》的文章，揭示“多面吳仁寶”，指出：吳仁寶治下的華西村一直飽受爭議。他被認為是這個“獨立王國”的“國君”。自

1961 年建村以來，這個面積不足一平方公里、1600 多村民連吃飽飯都困難的村莊，蛻變為 2010 年銷售收入 512 億元、人均純收入 8.5 萬元的超級企業集團，村民都變身為股份持有者。吳仁寶是這一切的締造者，他本人，也在汗牛充棟的報道中扮演著各種角色，與華西村一起，成為普通人口中的傳奇。正是因為這些標籤背後的故事，吳仁寶才在越來越多的揭秘後更似一個近乎破滅的神話泡沫。

學者指出，吳仁寶之所以能在華西屹立 50 年不倒，關鍵在於“兩頭保持一致”：對底下，一定滿足他們（的需求），不



年輕時的吳仁寶，無論田間勞動還是開會都習慣光腳板，被村民稱為“赤腳書記”。

斷地滿足他們，總是比外面超前；對上面，他有著高度的政治敏感，永遠跟得緊緊，走在時代前列。

搜狐推出的特稿，名為《吳仁寶：最會把握政治脈搏的村支書》，可謂一針見血。編輯在網面中還插入類似《華西村吳仁寶真實內幕》等網帖鏈接，並翻出早年專題《華西村模式不是新農村建設出路所在》，這家門戶更想說的是《吳仁寶的中國夢是孤本》、《“強人治村”模式不可複製》。

臉譜在《中國第一代農村改革者謝幕》中說：吳仁寶的逝世宣告著華西村將告別吳仁寶時代，進入吳協恩時代。……在幾位倒下的“前輩”面前，人們更關心的是華西村的“共產主義烏托邦”失去靈魂人物吳仁寶之後最終將夢歸何處？

就如一隻密封的罐子，外人隻能看到表面的華麗包裝，而罐子裡面的真實世界是怎麼樣的罕有知曉。因為這份好奇，有人試圖揭開這只密罐，它果然沒有讓外界“失望”。2011年，某雜誌一篇《雙面華西村》的報道詳盡講述了華西村內部存在的種種矛盾：烏托邦理想與貧富差距的現實、大土和大洋的畸形產業、天下大同的形象與家族控制的真實面孔……

溫鐵軍發表了《吳仁寶是華西村的探索鼓舞改革者》說，他的課題組把華西村的經驗歸納成“一二三四”。其中“四”是打了四張彩色的牌——四個基本特徵：

一是打紅色的社會主義牌，獲取長期穩定的政治保護和因此不可能被減少的經濟資源；二是打白色的資本擴張牌，成為天

下第一社區資本總量村；三是打灰色的村莊黨委公司化的治理方式牌，取代城市政府治理，以及私營經濟開發區等多樣化牌弱化產業資本擴張中的各種張力；四是打綠色的生態旅遊牌，保持多元文化及多樣化經濟結構（包括糧食農業維持村民生計），實現可持續發展。

其中，“打紅色的社會主義牌”最為重要，一語道破其成功秘訣。對吳仁寶個人，溫鐵軍的評價是：“我與吳老有幾十年的交往。他是一個具有中國農民典型特點的人，外圓內方，實事求是，他最擅長的就是用農民的思考和表達，把旁人看來對立的意識形態和政策方針都理順了，並以此為指導在實踐中贏得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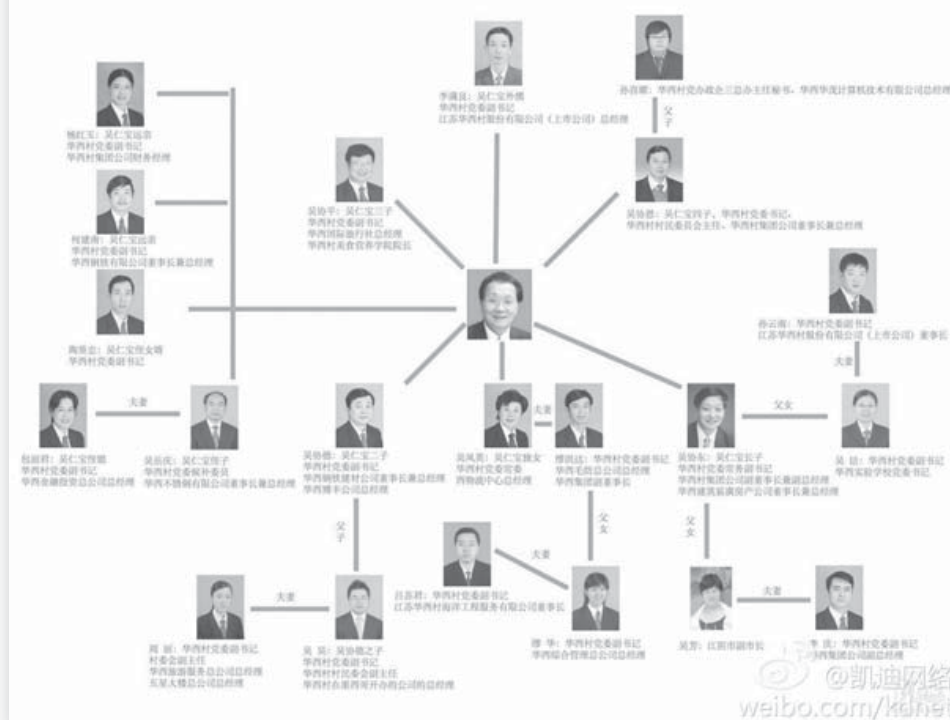
溫鐵軍稱：“華西村不僅是社會主義制度下農村經濟發展模式的一種探索，也是一次對集體主義優越性的充分挖掘和成功詮釋。”但他又不無矛盾地承認：“對華西模式的爭議至今仍未平息，也許華西村的成功在一定意義上有其不可複製性。”

中國的“小朝鮮”

《南都週刊》評論說，華西村是個怪胎。它看似堅持“公有制”，沒有被瓜分，實則是整個中國官僚資本主義的縮影，其最大的也是唯一的特權利益集團是吳氏家族。

聖勞倫斯大學 (St. Lawrence University) 的侯小碩

华西村吴仁宝家族官谱



吴仁宝家族官谱。

在 2 月出版了《中國的社區資本主義：國家、市場和集體主義》(Community Capitalism in China: The State, the Market, and Collectivism), 這本 168 頁的新書發現了大量模稜兩可的概念。為了寫作這本書, 侯小碩走訪了富裕的華西村、堅持毛澤東主義的南街村, 以及民營企業發達的溫州附近的上院村。侯小碩認為, 這些村子實踐著她所說的“社區資本主義”。

侯小碩在回答《華爾街日報》的提問“社區資本主義是什麼？”時，指出：“它是另一種形式的典型資本主義，與毛澤東時代的集體主義不同。社區資本主義可能聽起來很矛盾。但是我認為，它可能避免公有制的悲劇，即所有人擁有的資產沒人珍惜，所以人人享有的資產相當於誰的資產都不是。我認為社區資本主義可行，是因為社區內的成員得到了照顧，他們成為這些集體所有企業的股東，就像是華西村那樣。”

他還說，“這其中存在高壓政治。它完全不是民主制度。許多決定不會諮詢村民的意見。但是人們共同分享經濟利益。這種做法通過一種激勵機制而制度化。這種激勵機制結合了集體與個人利益，並且使脫離集體代價巨大。村民離開社區的代價非常高昂——就像是他們與集體結了婚，你要分手，就需要支付分手費。”

華聲在線的文章指出，嚴格說來，華西並不是完全的社會主義，因為它有嚴苛的村規民約；它與純市場經濟的股份制也不同，村民的股份無法抽回，如果離開，一切浮華轉瞬成空。因此，華西村注定是一個無法複製的成功。

中國農村的典型，此前有過山西的大寨、安徽的小崗村、河南的南街村，以及天津的大邱莊，都已銷聲匿跡，只有華西村依然風頭不減。

在這個典型背後，鮮為人知的是，華西村已經成為吳仁寶家族控制的企業。有研究者統計後指出，吳仁寶四個兒子可支配的可用資金（可用資金被定義為扣除所得稅後的淨利

潤)占華西村資金總量的90.7%(據《北京青年報》2003年7月17日)。

從黨內職務來看,華西村黨委的50多人中,“以吳家為核心的圈子達到36人,占黨委總人數的72%”(2003年7月16日《21世紀經濟報道》)。有學者整理了42年來華西歷任村幹部名單,一個確鑿的事實是:華西村最高掌權者始終是吳仁寶。

臉譜指出:一直以來,華西村的各個管理職位均為吳家人把持,在集體經濟的外衣下隱藏著一張巨大的“封建資本主義”面孔,家族和世襲制主宰著這個“大同社會”的命運,恰如一個活靈活現的封建王朝,處於金字塔尖的吳仁寶就是這個王朝的“天子”。

經濟學者肖仲華在博客發文表示:思想上高舉毛澤東思想和計畫經濟大旗,管理上奉行家族式集權專制,靠市場模式掙錢,用計畫模式分配。(華西村)這種特色模式其實正是所謂中國特色模式的縮影。如今“強人”已逝,號稱“天下第一村”的特色怪胎,還能走多遠呢?

王思想把華西村比喻為中國的“小朝鮮”,期待中國“小朝鮮”的解放。他在《吳仁寶之死能否拯救華西村?》一文中說:“華西村村民的生存狀態:出賣你的自由,與統治階級交換金錢。”

他分析說:“統治階級控制一切資源,區別是朝鮮讓人餓肚子,華西村讓人能吃飽飯,並且還賞賜汽車洋房。注意,

是賞賜。……與朝鮮一樣，華西村統治集團實行家族世襲。吳仁寶早就把統治權交給了他的兒子吳協恩。當然，他的孫女做了江陰市副市長（估計與電力李女士一樣，也是‘能力之外的因素是零’吧），算是朝廷有人撐腰。華西村吳家與朝鮮金家的區別是：朝鮮金家靠暴力維持，華西村吳家則以資產控制為藉口，披上了合法外衣，讓被統治者更難反抗。”作者說：“2011 年底的時候，我問：大邱莊倒了，南街村垮了，華西村的末日什麼時候到來？我們已經迎來了突尼斯的解放，埃及的解放，利比亞的解放，也門的解放，正在期待敘利亞的解放。小小的華西村，又能阻止什麼呢？”

分裂的網民

搜狐網發表特約評論員李德民的文章《吳仁寶“強人治村”模式不可複製》，指出，吳仁寶這種“強人治村”模式的背後，也是公眾對於華西村村務、財務、基層民主等諸多問題的關注與疑慮。華西村畢竟不是吳仁寶一個人的“土圍子”，從去年連吳仁寶的孫女吳芳任江陰市副市長也曾引發不小關注，就可見一斑。如何更好地實現對基層權力的監督，究竟怎樣實現中國鄉村的良好治理，華西村到底是共同富裕的範本，還是集體農莊的虛妄，在剝離“吳仁寶”的個人標籤後，華西模式能提供的範本價值究竟幾何，值得今人好好掂量。

文章的留言評論達 6500 多個，網民們觀點分歧、甚至



參加吳仁寶悼念儀式的人默哀。

對立，言辭犀利尖銳，反映出社會上不同群體的立場與態度。以下是幾條有代表性的留言，從中可以窺視分裂的網民所反映出的分裂的社會：

我是明人 44587994 (搜狐雲南省昆明市網友)：

一個農民，一個村支書，能讓全村的老百姓住上別墅，開上汽車……不管他用啥手段來治理這個村，不管他用什麼方法從毛時代……一直跟隨到昨天，那是他的能力，一個讓老百姓得到實惠的，那才是一個好幹部，一個村支書離去，媒體都在報道，說明我們這個社會需要這樣的村幹部。

無所不匯 51268329 (搜狐廣東省深圳市網友)：

無論對吳仁寶有多少看法，重要的是，他沒有私心，就這點可以說是成就他的華西村的最基本真理，相對比，國外的、

中國的大企業，就因為有這樣那樣的私心占了一點先，必然導致實體的倒塌。……他不貪，他視村民為友為父母為子女，就是這樣的心才能讓華西有今天的成果。試問，富了以後，想得最多是什麼？共（公）有制在華西落地生根，這就是境界和胸懷的報答。誰有胸懷誰就得天下，得人心，得尊敬。

清風蕭雨 5501872（搜狐北京市網友）：

要不是國家給錢，給政策，華西村算個鳥！不就是為了樹立一個共產主義的典型，給別人看看嘛！國家不可能給每個村這麼多錢和政策，當然不可複製了！否則你華西村這麼好的改革經驗，全國推廣呀！

松桂楊桐（搜狐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市網友）：

華西模式並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準”。以前就有人提出，“華西沒有普遍的可複製性。1000人中，很難出現一個吳仁寶。”即便按此說法，2000人中出一個吳仁寶，中國農村早就過上了幸福安康的日子，為什麼沒出現這種局面，才是值得反思的。那些有權有勢，前呼後擁，左擁右抱，受益於這個時代的既得利益者，是不會肯定華西模式的。

530726（搜狐北京市網友）：

想想華西村就覺得恐怖，本應該是一片綠色田野，美麗的田園風光，活生生被變成鋼筋水泥的世界！中國不缺這些玩意！還嫌城鎮化速度不快嗎？！有機會到歐洲去看看，人和自然環境完美結合了在一起。有本事把歐洲農村模式拿到中國來實現，那才是造福於子孫萬代！

秋思 2010 (搜狐北京市網友) :

把一村人帶富了, 這就是成功的村長! 把一個村子能創造得那麼好, 大多數人受益了, 還不足以做為全國基層各級領導的榜樣嗎? 如果各地的領導都是踏實地想為人民服務、做為人民服好務的事, 華西村的成就就不會是這樣鶴立雞群, 有這樣多的非議了。那些占著領導位子, 又做不出成績的人, 對華西村的成功, 大喊無複製性, 但總應該有可學習性吧?

用我心換你心 1105 (搜狐北京市網友) :



吳仁寶全家福。這些親屬多擁有各種頭銜, 掌控著華西村。

唱衰華西村不可複製，其用意無非是唱衰集體經濟模式，唱衰共同富裕模式而已。事實證明，共同富裕不是夢，當全中國大多數人在改革開放的洪流中還在繼續做夢的同時，華西村早已脫穎而出，走上了依靠集體，共同富裕的康莊大道。感謝真正的共產黨人引領著廣大幹部群眾，同甘共苦，創造了中國第一村的奇蹟。

搜狐網友 50097156 (搜狐江西省宜春市網友)：

吳雖然死了，但我作為跟華西村一個鎮的說幾句公道話，華西村本村的滿意不滿意我不知道，但前年被華西村合併的幾個村準備發動幾萬人反對吳，消息提前泄露，後來通過吳的關係，把帶頭的抓了起來，其中有人還被判了刑，就能說明在華西村的人過得怎樣了！其實很簡單，他這種高度集權，根本培養不出人才來，你看華西村這麼多企業，那個產品在全國叫得出名的，就猜想的到華西村的創造效益的能力了，它只不過一個村，我們鎮的領導都必須聽華西村的，甚至市里都要看華西村的臉色，因為它倒了，江陰的旗幟就倒了——現在的領導最怕兩個字：失敗！

自我證明 52205383 (搜狐河北省網友)：

吳老您一路走好！您文化不高，但您對毛澤東思想、社會主義理解的最為深刻，並用自己的一生踐行了一個共產黨人的信念，帶領華西人創造了中國第一村，甚至是天下第一村，您的英名千古！

半夏時光 51022099 (搜狐上海市網友)：

有多少人去過華西村？有多少人瞭解華西村？電視上宣傳的是真實的華西村嗎？去過華西村的人難免被汙濁的空氣感到憋悶，難免因河道的汙染而抱怨，這就是媒體所宣揚的“天下第一村”？只顧物質發展，卻不遵循客觀規律，破壞環境，面子工程背後難掩欺世盜名。

如果中國的所有農村都按照這個模式發展，這個社會的方向是可悲的，必將斷子絕孫。道理很簡單：錢賺得更多，人死得更快。吳老先生，生前獲得舉世矚目的榮耀，可是難逃破壞環境釀成的惡果——肺癌！發展帶來的巨大環境破壞和過度開發，這種所謂造福於民的發展策略，通過他的死，體現了矛盾，他因為肺癌死了，這對他自己是一種諷刺，對一個國家來說何嘗不是一個諷刺？不根據實際情況，瞎起鬨，亂追捧，國人啊，都病了！（皮智敏）■

“有什麼新聞嗎？”這句話，幾乎是他與所有來訪朋友談話的“開場白”。這是他的職業病。這個中國第一大報的總編輯，現在居然要從來訪客人那兒打聽新聞了！那條本來幾乎萬能、但只為極少數人提供信息服務的新聞渠道，對他關閉了！在中國，權力和地位的失落，就意味著人們生存或發展佔有資源的失落

胡耀邦說他 “又可愛，又可氣！”

——胡績偉自述早年心路

胡績偉是上世紀中國社會政治制度轉型時期思想解放運動的主將之一。但胡老去世的消息在微博上刊出時，大部分年輕人卻表示對這個名字不熟悉。此時，距離胡老叱吒風雲的年代僅僅 20 年，已經有些“兒童相見不相識”的味道。歷史車輪的轉速飛快，令人欣喜，但胡老是不該被忘記的人。

令我心驚的是，胡老的女兒胡雪濤和女婿王鏡寄來的訃告首頁上刊出的那首胡老寫於 2005 年元旦的詩句：

餘絲盡獻一老蠶，靜待北東觀西南。

樂看前驅後湧浪，群群安泰托新天。

碰巧我住在北京西南角，屬於“後浪”，我也確實對胡老有過為之寫《評傳》的承諾。正是這個原因，使我最終答應



2006 年 11 月 11 日，本文作者看望胡績偉先生留影。（高伐林攝）

《新史記》雜誌，把未曾刊發過的舊文摘編一些內容發表，對逝去而我未能送行的胡老，是一個道歉，一個紀念。

一、初識胡績偉

胡績偉：男，身高 1.7 米，臉圓，鼻直，薄嘴唇，口齒左上方有一虎牙，皮膚白皙；

他的履歷表能告訴人們更多的內容：民族：漢；籍貫：四川威遠；出生年月：1916 年（陰曆 8 月 18 日）。相傳，他的祖上是明末清初“湖廣填四川”時，從廣東花縣過去的。

這樣的履歷表，在中國大陸，每一個有單位的人都有一份。它的重要意義是，證明你“歷史清白”。

第一次見到胡老，是在 1992 年 10 月 12 日。那天晚飯後，剛看完中共十四大開幕式的電視新聞，我便隨原《新觀察》雜誌副總編鄭仲兵來到《人民日報》社座落在東單煤渣胡同的老宿舍。

院子裏很靜，胡家就住在一樓東頭。因為外面有一個圈定“勢力範圍”的籬笆圈，所以他家也自成一個“小院”。雖然是天黑，也能感覺出院子收拾得井井有條。從房間窗口瀉出的燈光柔和，沒有人影晃動，電視機開著的聲音，在外隱約可聞。在路上，老鄭先向我介紹了胡老的近況：他目前與小女兒和女婿住在一起。他夫人幾個月前因癌症去世。她已久病在床，但他們的夫妻感情很好。他動了眼球的手術，剛剛從醫院

回家……

與許多老人一樣，此時，他面臨著老年的孤獨。

老鄭直奔陽台上的房門。他專注一件事時，別人的話是聽不見的，所以對我關於院子的議論沒有反應。而這時，胡家的門已經開了。開門的是胡的大女兒威威。她是胡老妻子與前夫的孩子，在南方一家電影廠工作。

有個人很快從左邊一間朝南的房間裏走了出來。

這就是他嗎？第一眼見到胡老，我有一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難道眼前這個說話聲音微弱的“小老頭”，就是中國思想解放運動的主將之一，曾任中共“喉舌”，也就是中國第一大報的總編輯兼社長，第一個倡導報紙的“人民性”的改革家、“八九民運”中發起呼籲召開人大緊急會議的民主先鋒胡績偉先生嗎？

儘管有老鄭打招呼在先，這第一次見面，還是有點出我意料。我把眼前的他，與想像中的他進行了對比和修正：他沒有我想像的那麼高大，那麼有棱角，更沒有歷史事件帶給他的“晦氣”或“喜氣”。他比我想像的要隨和、平易近人。而且，他臉上紅潤有光，說話帶著笑容，沒有病人的痕跡。我想，若是在大街上見面，我或許能從他儒雅的氣質中判斷出他的文人身份，但決不會聯想到為中國現代歷史轉折立下過汗馬功勞的一員戰將；更不會把他與那些“殺氣騰騰”的文字加以聯想。

胡老先和老鄭握了手。老鄭向他介紹說：

“這是陳小雅，我們是朋友。”

“那好啊！”不善辭令的他，笑吟吟地，坐在和我們呈直角的一個寬敞的單人沙發上。他和我握手時，我感到那隻手並不大，有一點瘦，但並不僵硬，不粗糙，也不有力。“是一隻握筆的手！”我想。

“有什麼新聞嗎？”老頭兒問。後來我才知道，這句話，幾乎是他與所有來訪朋友談話的“開場白”。

這是他的職業病。不過，我心中也有些悲哀：這個中國第一大報的總編輯，現在居然要從來訪的客人那兒打聽新聞了！那條本來幾乎萬能、但只為極少數人提供信息服務的新聞渠道，對他關閉了！的確，在中國，權力和地位的失落，就意味著人們生存或發展佔有資源的失落……

談到十四大出人意外的人事變動，老頭兒湊近耳朵來聽。看得出，他對拋棄了他的政治，仍然充滿熱情。老鄭使用的欲縱先收的神秘敘述節奏，更是調動起老人渾身的興趣。

大家的討論經常在“理想政治”和“現實政治”中輾轉，但末了還是回到每個人的切身利益。胡老對十四大後的情況總估價是：日子會比過去好過一點。因為江澤民講話中談到一點，左的干擾表現在認為“和平演變”的原因來自經濟領域。這一點作為黨的路線確定下來，今後的干擾會少得多。他對“文化思想會寬不會嚴”的估計，沒有獲得贊同。

1956年“大躍進”前，“人民的大救星”毛澤東曾當面批評這個人和他的同僚主持的《人民日報》是“死人辦報”！



胡績偉在東單的老屋。

這個人，很呆板嗎？

1961年“大躍進”後，劉少奇在譴責《人民日報》助長了“浮誇風”時，對胡績偉說：“有報紙的害處，比沒有報紙的害處還要大！”

十年辛苦，幾至被一朝否定，他又成了“可有可無”的人！

1983年，他衷心擁戴、為之效力、並視之為親密同志和朋友的黨的總書記胡耀邦，這個敢於對前代偉人和領袖執行批判的“新教”頭領，則說他：“又可愛，又可氣！”

第二次與老鄭到胡老的家中已經是11月2日。我們徑自進了客廳。等待中，裏間的抽水馬桶響了一聲，仍是沒有影

子的屋子裏，悄沒聲地走出一個人來。老頭兒仍是紅光滿面，行了握手禮，大家坐下，照例先談開了形勢——不過，這一次老人還能見好就收。一會兒，便從裏間拿出一個卷宗來。我們按原先說好的，進入正題。

他先向我們介紹了自己三年來的工作及今後的計劃：

1989年以來，除繼續與常大林合作，寫第二本《民主論》以外，他主要進行了一些思想理論上的反思，已寫成《借屍還魂的大搏鬥》、《走向絕路的新生》，以及為自己在“八九民運”中的行為辯護的《無聲的辯駁》等專著與文章。下來準備邀請一些朋友，完成自己的《自評傳》。他說，他之所以要寫這個東西，是想從一個真誠信仰者的身份，從他的經歷和理論思想歷程去揭示黨的道路。他說：

“把這一點搞清楚，並貢獻給社會，我就心安理得了。”

之所以叫作《自評傳》，就是不滿意國內過去的一些傳記，如郭沫若，從童年起，就把自己寫成一個“神童”，然後越來越了不起、有出息……

他認為，《自評傳》的結尾，應不是太悲觀的，應該說，中國還是有希望的。至少他個人相信這一點，是“會要出現一個比較完美的社會的”。他說這話時，坐在一旁的老鄭點了點頭。

“也許我已經看不到那一天了，”他面帶微笑，剛剛動過手術的眼睛眯縫著，看著仿佛遙遠但又實在的地方，以略為遺憾又轉為安慰的口吻說：“但你們還能看到的。”

我說我也看不到那一天。沒有說出的潛台詞是：因為那一天根本不存在。學歷史的我知道，任何社會都會有自己的問題。舊的問題解決了，新的問題又會出現。

他把目光從虛空中收回，不解地望著我：

“為什麼呢？我最多還有七、八年，你們最少還有 20 到 30 年吧！”話語間滿懷著慈父般的善意。

我不忍心和老人再兜圈子，於是問他：

“那您說的未來部分，是作一種科學的論述，還是哲學的論述呢？如果是科學論述，就還有大量的社會調查與分析工作，因為要指出未來的生長點在哪裏，要進行動態監測……”

他沈吟了一會兒，回答說：“我是個搞理論的，不是搞實際的。從小就覺得自己只能吃得動筆杆子這碗飯，以後也認定了這條路，所以，我只能在理論上討論這個問題。真的，你如果讓我去管理一個國家，那我肯定管不好。我不善於做實際工作。但理論是要實際作根據的。……”

善於對問題要點進行歸納的老鄭幽默地說：

“我們的許多同志都有一個特點：善於畫‘天使’。”

胡老家的客廳裏，鋪著深紅色的化纖地毯，六個書櫃，呈“品”字形分擺在房間北端的三面牆邊。電話機遠遠地擺在窗前，一個分機匣裝在牆上。一次來了一個找他大女兒的電話，老頭兒撥過分機閘，沒等分機拿起聽筒就掛上了。威威出來責備他：

“還沒拿起來，你就掛什麼呀？”

“不是撥過去了嗎？”老頭兒的口氣很硬，顯然他對分機安裝的原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撥過去還沒拿，你就掛斷了！”威威顯得更生氣。但她沒有想到，誰應該對沒有受過訓練的老頭兒的行為負責。

“他還會再來的！”老頭兒果斷地說。顯然，類似“失誤”他已犯過多次。不一會兒，果真電話又響了。老頭兒勝利似地對著裏屋喊道：

“你看，不是又來了嗎！”

胡績偉也同所有的父親一樣，有著與新時代的距離和與下一代的隔閡。他們固執地堅持“已知”而對“未知”持有傲



胡績偉資料。

慢的態度，不論在什麼情況下，仍然要維護自己作為家長的尊嚴。

他也是一個凡人，我心說。

我們又議論起新近去世的中共意識形態權威胡喬木。

在黨內眾多的高級幹部中，胡績偉與胡喬木的淵源是很深的。1952年，胡績偉由陝西《群眾日報》調京，任《人民日報》副總編時，胡喬木以中央政治局秘書和毛澤東的政治秘書的身份，兼任該報社長，並中宣部副部長，除親自干預編報、經常參與評報外，還親手撰寫社論。1956年《人民日報》大改版，兩胡曾有密切的合作。“文革”後期，鄧小平復出，在許多被打倒的幹部尚未得到“解放”時，是胡喬木推薦胡績偉到國務院政治研究室，並一同參與《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編輯出版工作。在80年代思想戰線撥亂反正期間，他們又以“亂華”的“五胡”並稱^(注1)……

但是，眾所周知的是，後來，胡喬木成了聞名遐邇的“左王”，胡績偉卻以“右”傾蜚聲海內外

“我對他的工作精神，業務能力，尤其是文字功夫，還是很佩服的。”看得出，胡老說這話時，儘量使自己能夠站在比較客觀的立場，“可以說，我們的關係一直很不錯。我得病時，他都要寫信來慰問。我的孩子死了，他也寫信來表示哀悼。特別是‘文革’後，他給我寫信，認為我當總編輯時，是《人民日報》辦得最好的時期。”

他們關係的惡化，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特別是

胡喬木提出“四項基本原則”以後。這個“惡化”幾乎與日俱增，直到胡喬木生命的終點。

眼前，老頭兒提到自己這位先前的好友之死時，看不出有什麼特別的傷感。甚至可以說，他的表情是輕鬆的。聽說胡喬木臨終談到即將召開的中共十四大文件“要好好考慮，要有新時代的特點”。並囑不要再提“兩個基本點”（即“改革開放”和“四項基本原則”）。為此，第三代領導核心頗為不悅，所以，他的遺體告別儀式搞得冷冷清清。

“對他的評價夠高的了，那麼一大篇！”胡老似乎並不滿意。其實，問題不在於“大”，而在於以下這些關鍵詞：“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政治家和社會科學家、我黨思想理論文化宣傳戰線的卓越領導人……”

很難說，此時此刻的胡績偉，沒有想到自己的身後。“忠誠的”反面是“叛逆的”。但他還沒有“叛逆”到不在乎黨的評價。他對那“一大篇”感到了壓抑。

那天，天下著小雨。胡老送我們出來，仍是送到陽台上，揮了揮手。威威替爸爸送我們出門。她說她和父親完全不一樣。她與陳雲、喬木的孩子都是朋友。喬木病重時，她去看過他。可她父親聽了很惱火，說：“為什麼不告訴我一聲呢？別人還以為你是我派去刺探情報的呢！”

說到這裏，我們兩個同代人，以不可思議的眼神對望了一眼。她又說，老頭兒一說起政治來就精力旺盛，一遇到生活

問題就耳聾眼花，記憶力也不行了。我忍不住的笑聲和著三個字脫口而出：

“政治人！”

我意識到，是政治，賦予了胡老特殊的性質、意義和價值。作為執政黨的一員高級幹部，他同時也是為中共“黨文化”的建設起過重要作用的人；他也曾充當過中共建國以來，那“一步步向左轉直至極左”的鏈條的有力環節。最終，由於這類不受外部制約的革命政黨生存的鐵律——通過不斷的內部鬥爭和清洗以保持自身活力的機制——支配，他受到了自己所參與建造的體系的報復，遭受整肅。由於一次次政治運動的積累，這個被排出“體外”的群體不斷壯大。所以，他代表的不是一個人，而且是一批人，甚至是整整一代人！

二、崇拜革命的因由

把胡老當作一個共產黨員看待，得之於我們與他的第二次見面。當時，胡老遞給我一份材料。這份題為《我的思想脈絡》的提綱，第一句話便使我大出意外：

在所謂共產主義世界土崩瓦解的今天，我仍然覺得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時至今日，以“馬克思主義者”自稱已不是一種沽名釣譽之舉。而仍然支撐著這位老人信念的究竟是什麼呢？我感到，這個概念對於胡績偉先生來說，並不是像許多人一樣，只不過

是一件“衣裳”和身體的關係，而是某種可溶化在血液中的東西。為此，我們不得不從根部溯源，探究他思想的來龍去脈。

胡績偉祖居的地方，是神州西南腹地的中國第一大省。它的四週，有 2000 到 3000 公尺以上的高山和高原環抱，距海兩千公里，對外交通，只有一條天險橫踞，水深浪激的川江航道。在近代歷史上，曾有一個典型的故事說明它的世隔絕狀態：1840 年鴉片戰爭爆發後，為接濟沿海的兵員不足，清政府曾調川軍馳援廣東、浙江。第一批開赴廣州的 2000 川軍，於 1841 年 1 月 16 日啟程，79 天以後到達；1841 年 10 月 26 日，道光皇帝又令 2000 川軍馳援浙江，《清宣宗實錄》記載：直到第二年 1 月 8 日，“此項兵丁尚未到浙，未知現行抵何處”。96 天以後，頭起 380 名才出現在浙江大地，110 天後，末起 300 名尚未到達。而此次戰役，英軍從香港出發，攻陷廈門、定海、鎮海、寧波，總共只用了 53 天。^(注 2)

由於距海遙遠，地域封閉，運輸成本的昂貴，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的入侵，相對於沿海要晚了近半個世紀。直到 1890 年重慶開埠，中英《煙台條約續增專條》訂立，規定英商可自備華船，掛外國旗進入川江，在此之前，“天府富利”始終是清政府獨家的專利。湘軍巨酋胡林翼曾有誇張之詞形容天府的富庶：“天府之富，十倍於江西，二十倍於湖北。”^(注 3)與這種“富甲天下”並稱的另外兩個突出特點，一是在近 200 年中的人口陡增：由 1840 年居全國第二位（3830 萬），到 1850 年便躍居全國第一（4410 萬）。^(注 4)其二，便是它的民風凶悍，



威遠靜寧寺。

社會治安問題顯著。據《道咸宦海見聞錄》記載，1847 年道光皇帝在論及全國死刑終審情況時說：“四川刑名之繁，甲於海內……每年勾到時，^(注5)四川一省，就要佔住一天，緩決黃冊堆積滿地。四川實係戾氣所鍾，洞脅貫胸之案，層見疊出。”

在胡績偉父輩生長的年代裏，四川終於發生了歷史上最重要的變遷——一代新文化的崛起。19 世紀 70 年代，正當全國維新空氣漸起之時，奉旨到四川任鄉試副考官的著名洋務領袖張之洞，“目睹四川知識界的沒落狀況，決意改革教育，振興蜀學，培養人才”，創辦了對四川學界影響極大的尊經書院。聘邀全國著名學人薛煥、王闓運、宋育仁等為書院山長，講求“經世致用”之學，培養經邦濟世之才，使尊經書院成為

後來維新運動的一個重要基地。與清朝以來，四川地方的人才凋蔽形成鮮明對照，尊經書院自 1875 年建立到 1902 年改為高等學堂的 28 年裏，培養出許多四川乃至全國聞名的俊才，如“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楊銳；曾出任大清駐英法使館參贊的宋育仁；對康有為產生過重要影響的經學大師廖平；書法名家顧印愚；有清一代四川唯一的狀元駱成驤；辛亥革命著名人物蒲殿俊、羅倫、張瀾、彭家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幹將吳虞；共產黨人吳玉章等。在 1898 年“公車上書”中具名者 603 人中，四川舉人就佔 71 人！^{（注 6）}

在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期的政治、文化、社會改良運動中，這些由舊式文人轉化而來的新式知識分子，發揮了極大的歷史主動性。由於歷史的局限性，改良的政治成果雖然所剩無幾，但它卻為當地社會進步留下了一筆特別的遺產——新式中、小學，特別是師範學堂。據統計，到 1907 年，四川省共有各類學校 7775 所，僅次於地處京畿的直隸省，學生數有 24 萬 2 千餘人，居全國之首。到 1910 年辛亥革命前夕，全川共有教員 12824 人。胡績偉的家鄉，在 1909 年時，已開始有了第一個留學生。到 1911 年，已有 71 所學校。^{（注 7）}在新的文化氛圍的化育之下，四川成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搖籃。

“我家裏有兩個同盟會員。一個是辛亥革命烈士——我的伯父，名叫胡馭垓，是保路同志會川南七縣的民軍總參謀長。另外一個是我的叔祖父，叫胡素民。他是個舉人。在很小的時候，我的這個伯父就跟他到外面讀書。我這個叔祖父在我

們縣裏面開辦了第一個小學校和第一個中學校。他帶著我的伯父到縣裏，到成都去讀書。辛亥革命時我這個叔祖父是京津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國報》的編輯，以後又當過孫中山元帥府的秘書，當過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的顧問。

胡老提到的第一位同盟會員胡馭垓，字良輔。與胡家一同祖居威遠縣界牌四和堡。在同輩兄弟中居長。1911年5月9日，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產物——清政府“皇族內閣”宣佈了“幹路均歸國有，定為政策”的“鐵路國有政策”，激怒了原來擁有川漢鐵路操辦權力的紳商民眾。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會成立，胡馭垓被推舉為嘉定府所屬七縣的評議長。^(注8)不久，同盟會決定以會黨和民團為掩護，組建保路同志軍，他又被選為威遠同志軍統領川東民團總機關總參謀。^(注9)

1911年9月7日，四川都督趙爾豐為撲滅已成燎原之勢的保路運動，設計誘捕了保路同志會正副會長蒲殿俊、羅倫。並血腥屠殺了請願營救的人群。同盟會員龍鳴劍等三人，趁暴雨之夜，錦江水漲，向各地發出內容為“趙爾豐先捕蒲羅，後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的“水電報”，^(注10)各地保路同志軍紛起響應，由救蒲、羅轉而舉起反清義旗。同盟會員胡馭垓與會黨首領甘東山率領的威遠同志軍也於此時起事，進攻成都，與趙爾豐的清軍作戰。但因兵力單薄，武器過差，兵敗而歸。9月15日，與威遠相鄰的榮縣在同盟會員王天傑、龍鳴劍的領導下“託名保路，佈告起義”，“傳檄近縣”，並於9月28日建立了辛亥革命中的第一個革命政府。胡馭垓在這個



胡績偉大伯父胡馭垓的烈士墓塔。

政府中任行軍總參謀。此時，正逢吳玉章受同盟會委派，回川主持工作，來到榮縣。他感到小小一縣的革命政權，難於單獨存在，必須向外發展。於是派威遠同盟會員胡馭垓率 2000 多同志軍進攻威遠。11 月 1 日，威遠宣佈獨立。^(注 11)在威遠革命政府中，士紳們選舉的豪紳董伯和擔任正軍政長，胡馭垓為副軍政長。不久，清廷派端方領湖北新軍進剿威遠時，董伯和等豪紳企圖改擁清朝知縣徐昭益復辟。榮縣同志軍司馬法得知後，商得胡馭垓等同意，殺死了徐益昭，並以屍示眾。11 月 11 日，董伯和等趁胡馭垓熟睡之機，將其殺害。懸其頭於縣城門，割其兩耳，向端方邀功。

胡績偉出生在中國歷史上兩個最近的統一時代的間隙之

中。對於一個國家來說，統一，是這個時代世人所公認的主題。但統一於誰？在這個時代裏，政治舞台上來來去去的人物中，是那些穿著新式軍服、戴著顏色鮮艷的飾物，使用著新式武器、口操濃重方言，割地為王的一幫武人。人們把他們叫作“軍閥”。人們把這個時代，稱之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二個戰國時代”。它讓新出生來到這個世界的人們的視野裏的第一幅畫面，除了赤地千里、生靈塗炭，便是“槍杆子裏面出政權”。

這是一個軍閥混戰的時代。用學術的語言說，是一個“整合與反整合”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裏，軍閥、官僚、地主統治下，民不聊生。各種改革緩慢、沈重、斷斷續續，但仍然頑強地進行著。曾經在這裏首先爆發，又轟轟烈烈地推動過歷史的革命，在胡績偉懂事的年代，已經漸漸融進了傳說。

但儘管如此，革命的光榮，仍是那些革命者後代時時緬懷的內容。胡馭垓是胡家貢獻給中國歷史從古代過渡到近代的那次革命中唯一的烈士。因此，也成了胡家子弟後來的守護神。這一點，我們從老年的胡績偉回憶幼年時的情景仍然能夠略見端倪。當時，胡老首先提到的不是自己的父親和母親，而是自己這個家族近親中的兩位辛亥前輩。

“這些事情我原來並不知道，是我的一個堂姐，也就是胡馭垓的小女兒告訴我的。她比我大四歲。”胡績偉告訴我。

這個堂姐，也就是後來成為他妻子的人，是他的第一個啟蒙老師。她的影響不僅可以見之於胡績偉一生信仰的奠定，

並在他的性格、志趣方面留下了深刻的痕跡。

“她告訴我關於她父親的情況。怎麼參加革命，怎麼殺縣官。她還同我兩人經常到我的叔祖父家裏去——叔祖父家裏離我們不遠。我的叔祖父經常給我們講講孫中山。我現在還記得，講他革命怎麼樣子十次革命，九次失敗，到第十次才成功。還講一些孔子啊，孟子啊……我小學的時候也讀了一點，什麼《論語》啊，《孟子》啊，《幼學瓊林》啊這樣一些東西。所以也知道一些‘民為邦本’、‘本固邦寧’這樣一些思想。那時候就是有一種朦朧的崇拜，覺得孫中山推翻滿清，很不容易，多少次失敗。我的大伯父就是這樣子死的……”

三、貧苦的幼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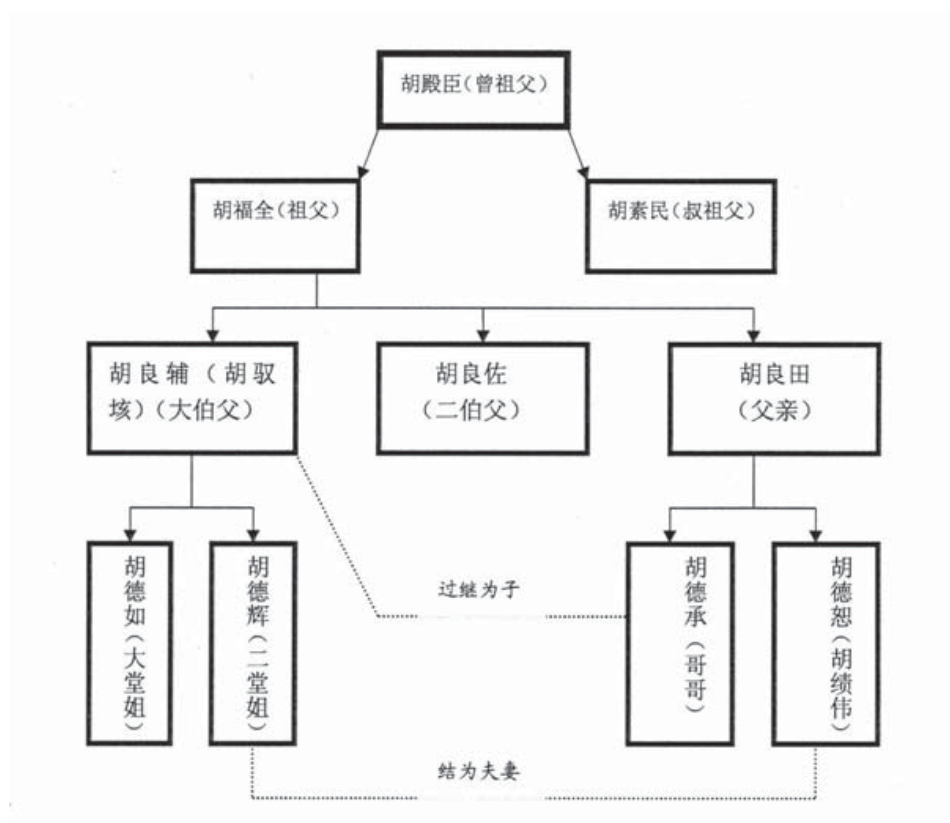
胡績偉原名胡德恕。他出生時，正逢原有的封建大家庭解體之時。由於命運的差錯，那位大伯父的恩澤，在當時並沒有惠及他的小家庭。

胡馭垓犧牲以後，國民政府為了嘉獎他的貢獻，讓這位烈士的親屬去當官。那時胡德恕的父親，已先行拋下妻子和不到一歲的兒子病故。大家庭中的男人中，只剩下一個二伯父胡良佐可以出去做事。也正是這一命運的“差錯”，使胡德恕走上了一條與國民黨政府敵對的道路，形成了與其二伯父的後代完全不同的人生。

“我的二伯父到川西北的一個縣裏去當了釐金（稅務）局

長。咱們四川人叫‘刮地皮’，撈了一筆錢。大約一年以後，他就回來了。拿錢買了一些土地。

“原來我的祖父是開了一個茶館，賣一些點心什麼的。到我6、7歲，祖父就死了，家裏當然就是我這個二伯父當家。家裏的成員，除了大伯母以外，就是我母親和我——孤兒、寡母。所以，所有家產，就被二伯父霸佔了。他成了當地的一個比較大的地主和高利貸者。而我們呢，我的大伯母因為上過學，所以在大伯父犧牲後，就在縣裏的女子師範學校當校長。



胡績偉的家庭關係圖。

帶著她的兩個女兒到縣裏去了。所以，家裏除我母親外，還有一個祖母。祖母下面還有一個小的，我們叫孃孃（姑姑）。祖父死後，二伯父就另外開了一個茶館，比原來那個當然就更大了。他就變成這個地區一個最有錢的人了。而我們實際上就變成這個富人家裏的一個窮人了。這以後，他把我們趕走了。不讓我們住在界牌場了。界牌場是一個鎮子。他把我們趕到附近的一個寨子裏住。

“那時候，他每個月就只給我們一點米，給一點零花錢。我記得一個月給兩次肉，一次給一斤——初一、十五打牙祭。我的母親伺候祖母，大概過了沒幾年，我高小的時候，祖母就死了。家裏就剩下我母親一個人。那時候，家裏還請了一個丫頭。孃孃過了沒多久就出嫁了。那時候，她自己有一塊菜地，自己種菜，養雞。在此以前，她要伺候公公、婆婆、做飯、做衣服、打掃清潔衛生，實際上就和家裏的一個傭人差不多。婆婆死後就剩她一個人了。”

當胡老向我們敘述自己人生的開端時，有意無意地使用的是“階級分析”的方法。

隨著家事的變遷和年齡的增長，幼年的胡德恕漸漸懂事。他感到了家境的困難，也逐漸能體會到母親的痛苦。這些感知，給成長中的少年性格帶來了變化。當他回顧自己的這段經歷時說：

“我開始變得很沈悶。小孩子原先那種無憂無慮，活潑天真的樣子就慢慢地變了。”



本文作者為胡老執筆所寫《報紙生涯五十年》在海外報刊登載。

與晚年的胡老接觸時，我仍能感到，那段幼年經歷在他心中投下的濃重陰影。這表現在他對我的一段文字的修正上。1992年冬，當我為他執筆《報人生涯五十年》時，最初選擇了這樣一個開頭：

“有一條江河，它從冰山開始，滲入黑色的草甸，經過漫長的地下旅行，終於從一個溫暖的泉眼湧出地面……”

即使是對於這樣象徵性的描述，他也覺得無法接受。在這段文字的一旁，他認真地加了批註：

“我不是冰山下的水流，只是陰暗崖壁上滲出的水珠。”

四、求學的艱難

正是在這段“陰暗”的日子裏，胡德恕讀完了初級小學。因本地沒有高小，繼續讀書必須到遠在 30 多里的自流井（今自貢）去。然而，這需要錢。

“二伯父不給我錢，不讓我去。但是他自己的兒子卻讓去。他有兩個兒子。大兒子比我還小一歲。這樣，家裏就產生了矛盾。我大伯父家有兩個女兒，第二個就比較潑辣，和我們還比較好。她在成都讀的中學。在那個時候，她感覺到很不平，就起來和我的伯父作鬥爭。一定要他供我上學。伯父不肯，吵了一場。最後只給了很少的一點點錢。還是我有一個舅舅在自流井，我母親求了他。所以，我在自流井讀的兩年高小，實際上是舅舅出錢供的。

到自貢以後，他與堂兄弟之間待遇的差別，在這個少年的心中也刻下了深深的痕跡。他感到壓抑，人生第一次體會到被遺棄、被冷落的情景。當他沈浸在被自己的政治領袖鄧小平“遺棄”的晚年淒清中，講述那段經歷時，傳達的是同一種來自“人性”基本要求的不平：

“因為，我在那兒讀小學，我的（叔伯）弟弟也在那個地方，但他當時就很闊，我很窮。那裏離家只有 30 里路，我伯父經常到自貢市來玩。他玩的時候經常帶我的弟弟（堂弟）去，卻從來不帶我去……我感到心裏很不痛快。”

小學的經歷，給胡德恕還留下了一個當時並不理解的印象，那就是，在教會學校，老師很少體罰學生，教師和學生的

關係，總的來說比較“民主”。而在其他的學校，他總是經常看到老師厲害地打學生。

高小畢業後升中學，面臨的是要花更多錢的問題。他的二伯父仍然不給錢。而那個時候，擺在母子倆面前的唯一出路，就是兒子繼續升學。學而優則仕，兒子的前途，母親的依靠，全部維繫於這一條舊中國窮苦人改變命運的道路之上。

但怎樣才能繼續升學呢？與舊中國許多貧寒的求學者相同，胡德恕只得走投親靠友這條路。當時，他的叔祖父的女兒的丈夫，也就是他的堂姑父，在上川南雅安師範學校當教導主任。那個師範是公費。姑父願意帶他去念書，於是，他在那裏開始了初中的學業。然而，他在那兒只讀了一年。

“到了雅安那一年，心情也是很很不愉快。因為那個學校是上川南附近幾個縣的學校，我是屬於下川南的。是因為我的姑父的關係，我才能去的。別人總覺得我是一個外來的、

‘走後門’來的——雖然那時候沒有這個名詞——所以對我都是持一種歧視態度：如說一些諷刺的話呀，欺負我，大的學生還打呀……所以那一年也是很很不痛快。到放假回去時，我母親哭著不要我再去，我也不願再去，這樣才回到自貢又讀了兩年。所以，在這個階段，小孩子的心情是很不好的，壓抑，憤恨這個家庭、這個社會的不公道。”

就在這個少年人初步感知到階級的分化、社會的不平等、不公道和人生的灰暗時，是他的第二個堂姐胡德輝——胡馭垓烈士之女，給了他最初的啟蒙。

〔附：年表〕	
1916: 8月18日生于四川省遂寧縣界牌坊。	
1922 (6歲) — 1927 (11歲) 遂寧小學 (高小)	
1927 (11歲) — 1930 (14歲) 自流井培英小學二年	
1930 (14歲) — 1931 (15歲) 雅安上川南師範一年	
1931 (15歲) — 1933 (17歲) 自流井培英中學二年，畢業	
1933 (17歲) — 1934 (18歲) 成都華英中學一年	
1934 (18歲) — 1935 (19歲) 成都省立第一師範一年	
1935 (19歲) — 1936 (20歲) 成都華西大學一年	
1936 (20歲) — 1937 (21歲) 成都四川大學一年	
1937 (21) — 1939 (23) 成都編輯《大南報》、 《華英報》、《四川日報》	13
1939 (23) — 1949 (33) 延安 主編《邊區群眾報》 華北《新華日報》編輯主任	
1939 (23) — 1952 (35) 西安 群眾日報總編輯	
1952 (35) — 1984 (65) 北京《人民日報》社論編輯 總編輯、社長	

胡績偉自書年表

“我上初小、初中，都是她領著我同二伯父進行鬥爭。我初中畢業以後，她又鼓勵我到成都去繼續陞學。我記得，那次我們跟二伯父吵了一次，吵得很厲害。大概是我二伯母悄悄地給了我們很少的一點錢。就這樣我到了成都。”

儘管有二姐這樣一個滿腦子“革命”思想的小導師，但直到抗日戰爭爆發，整個中華民族面臨危機的大時局改變之前，胡德恕基本上還是個一門心思發奮讀書，企圖靠讀書改變家境、改變母親處境，自己也可以出人頭地的舊式青年。因為，在他讀初中的時候，發生了日本入侵佔東北的“9·18”事變，但那次事件並沒有立即把他捲到救國救民的事業中去。他回憶那時的情形說：

“在我讀初中的時候已經發生‘9·18’了。那時候，我們也是跟一些大同學一起，到外面去講演。有時在茶館里弄一

個橈子，站在上面講；有時站在橋頭講。我們那有一個大橋，橋頭擺一些攤子賣東西，所以人比較多。我的口才還可以。因為我們讀中學的時候，學校有兩個會，一個叫‘講演會’，一個叫‘辯論會’。講演會就是你自己出題目，自己準備講演的內容。每個禮拜開那麼一次。你報名，就可以去講。辯論會就是出一個題目，比如日本人來了，你認為怎麼樣。我經常參加講演會，發言沒有問題，因為我看的東西還是比較多的。當時講演，無非是號召大家愛國啦，按照報上登的那些內容，我們不當亡國奴啊，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啊，這些。那時候還不知道紅軍啊、蔣介石的‘安內攘外’啦這些事情。在雅安聽到一些大同學講到過共產黨，那是我最早聽到關於共產黨的時候；也知道一點國民黨腐化，不抵抗的消息。但知道得太少。

“但回想起來，那時自己沒有什麼主動的積極性，也是跟著潮流走。所以我當時的思想還是個人進取的思想。救國救民的思想還是很少。主要是救自己。想趕快讀書，上學，上了學以後可以自立。”

五、喜歡看男女戀愛小說

除潛心學業外，他開始大量地閱讀課外書籍。而性格的內向和家境的沈淪，迫使這個在發育期的孩子不得不在這樣的閱讀中去尋找情感的寄託。

“從我到雅安去起，以後每年我都看一些小說。初中這三年裏，中國的這些《三國》、《水滸》、《紅樓夢》、《西遊》、《西廂》差不多都看過了。現在看來，當時的思想覺悟還是比較低，因為如果我的政治覺悟比較高的話，我既然崇拜孫中山，就應該找點這方面的書來看。而且這些書也不是沒有，我的伯母家裏面有的是。但對這些東西不懂，也沒多大興趣。……當時對郭沫若、蔣光慈的書感興趣，他們思想比較解放，無非是講一些男女戀愛方面的事，大概名氣比較大，也容易找到這麼一些書。……魯迅的《阿 Q 正傳》看不懂。那時候反正只要是找得到的書，就拼命地看。有時甚至在課堂裏也看；或者晚上看上了勁，打著電筒看。因為自己心情比較壓抑，也不怎麼喜歡和同學去玩。”

“缺少情趣，缺少浪漫的性格。”晚年的胡績偉這樣評價自己說。這或許不是胡績偉個人的特徵，而是屬於一個時代，一類社會，一個階層的印跡。當貧窮成為忠實的伴侶，幻想，就很少與貧窮的孩子攜手同行。

六、花 20 大洋變“胡績偉”

在 20 世紀 30 年代初期，擺在胡德恕面前可以救自己的道路，就是去當一名教員。而這種現實性，與他的家族狀況是不無關聯的。因為他的家族可以稱得上是一個“教育之家”。他的大伯父是教員，叔祖父是教員，他的父親也是教員。以

後，他的大伯母也投身教育工作，成為一個女子師範學校的校長。但是，又是這個“錢”字，再次成為了少年人無法跨越的命運牆垣。

“到了成都以後，我的經濟比較困難。因為我在家裏上的是教會學校，到了成都以後，一些同鄉還是勸我上教會學校。說象我這麼好的學業，到教會學校就很容易得到公費，用教會的錢你可以繼續升學、留洋。所以，我剛到成都時就進了基督教會辦的華英中學。在那兒讀了一年。在這一年中，當然主要靠我的大姐、二姐給我一些錢。離開家裏時，伯父給了一點錢。

“但我不願意入教會，覺得教會是帝國主義的東西。特別是英國。鴉片戰爭的這個影響很大。所以，讀了一年以後，還是去讀師範學校。”

1934年，18歲的胡德恕，終於考入成都的省立第一師範。在省師就讀的兩年中，第一年算是平平安安地過去了。但到了第二年，舊社會與窮人作伴的另一個魔鬼——疾病，又悄然尋上門來。

“因為小時候心情經常處於壓抑的狀況，所以，我的身體弄得很弱。先是發痔瘡，到醫院裏差不多住了三個月。然後回來，又得了瘧疾。所以第二年基本上就沒有怎麼讀書。那時候，住食費都是學校給，但醫藥費還是要自己出。對我來說，要支付它還是很困難的。大姐、二姐給一點錢，但我不怎麼願意去要她們的錢。慢慢大一點也知道她們當小學教員、

中學教員也沒有多少錢。自己有幾個同學之間，互相資助。到第二年的暑假，我已經窮得沒有辦法了。最後我的幾個同學回家時把自己的被子拿去當了，用當來的錢資助我。等他們從家裏回來的時候，又問家裏要錢，把被子取回來。“所以，到第二年時，思想就比較消極了。覺得讀不下去了，想找個工作。師範讀了兩年，可以當個小學或中學教員。就在這個時候，我有一個同鄉，在華西大學的附屬中學裏當教育長。他介紹我到高級中學去教書。他建議我半工半讀：一邊讀華西大學，一邊教書。那時候一週教四堂課，一堂課 5 角錢，四堂課 2 元錢。而我們一週的伙食費只要 7 角錢。一個月我可以有 4、5 元的餘款，所以讀大學是可以的。可是我的中學沒有畢業呀，怎麼辦呢？我的幾個同學就湊錢，買了一張文憑，一張人家高中畢業的文憑。花 20 塊大洋，就可以買到。我原來的名字叫胡德恕，但賣文憑的這個人叫胡績偉。這樣，我從那時候起就變成胡績偉了。”

這一年，是 1935 年。

七、道路選擇

如果說，胡績偉幼年時期的經歷，對日後把他造就為一個共產黨員有什麼作用的話，那就是那個社會貧富分化的“不公平”現實，少年人天性的壓抑，以及社會所能提供的發展機會的難得和稀少。



2006 年，胡績偉 90 壽辰時與賀壽親友合影。

但是，儘管如此，到這時為止，擺在我們面前的這個少年人的前途，仍然有許多未定的因素，因為，在那個起點上，他為尋求個人出路，還可以選擇獻身教育事業、宗教的事業；為尋找社會共同的出路，他也可能選擇信仰“三民主義”。

“因為從小就遇到幾個比較好的數學教員，所以，從初中開始，我就迷上了數學。在省師休病假的一年中，我把高中三年的數學（包括根本沒有接觸過的解析幾何、微積分）都自學完了。由於我的數學成績比較好，所以，到 1935 年，我 19 歲的時候，考取了華西大學數學系。同時，還一面在高中代課教書。”

華大是一所教會學校。1910 年由美國、英國、加拿大的五個基督教會創辦，當時僅設文理兩科。地址在成都南門外二里許、錦江之濱、南台寺之西，一個叫華西壩的地方。校園據傳為古“中園”舊址，風景以清幽聞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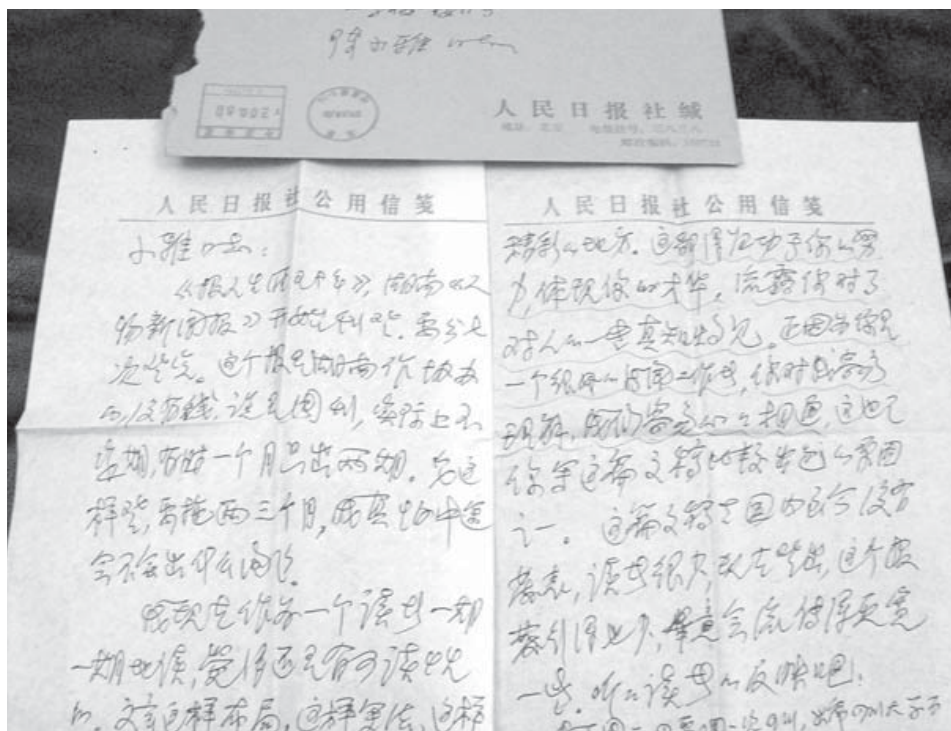
剛入學的半年，胡績偉基本上是埋頭讀書，不問政治。

整日地做數學題，讀英文、法文。因為華大的老師有時不說中文，所以非學英文不可。看得出胡績偉對外語並沒有什麼興趣，他說：“沒辦法，逼得你非得讀一點。好在數學要求的英文程度不太高，比較容易看得懂，不像讀文學。”

雖然學校中的教師大部分是中國人，教學水平高於一般的學校，但課程除了數理化以外，基本上是外國歷史。與一般中國人或中國政府開辦的學校相比，那裏不可能讀到多少中國歷史、傳統文化，以及灌輸民族意識的內容。在這裏，胡績偉遇到了他人生第一個可以自主選擇的關口，這便是他是否加入教會的問題。

按照一般規律，讀完華大後，畢業生的前途便是被保送留洋。留洋回來，便是繼承教會的事業，成績優秀者留在華大當老師，差一點的到全國各地的教會學校任教，發展教會在中國的教育事業。在胡績偉的同鄉中，有些已經走上了這條道路。對於貧窮，而又成績不錯的他來說，這也是當時一條最筆直、最便捷的謀生道路。所以，當有人願意介紹他加入教會時，他意識到，這是一個事關前途的問題。

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事業，起於 1601 年利瑪竇的東來。與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入主中華的佛教事業相比，這個後來者借著由齒輪和蒸汽機開創的新時代的文明成就，在中華大地這個信仰的“自由市場”中，顯示出了強大的競爭力。1919 年五四運動之後，天主教為了應付中國民族意識日益覺醒的新形勢，採取了天主教“中國化”的策略。四川，即為當時重新



《報紙生涯五十年》在國內發表後胡績偉致陳小雅的信。

劃分的中國 17 個大教區之一。1933 年 6 月 11 日，羅馬教皇為之“祝聖”的三名中國籍主教中，就有一人是四川省雅州人。到 1936 年，中國籍主教已增至 23 名。教會的設置不僅在成都。重慶等大中城市有，而且深入到寧遠、敘府、打箭爐一帶。基督教會在建立傳教據點的同時，還開展了“鄉村建設”運動，並陸續開辦起了小、中、大“洋學堂”。到二十年代中期，教會學校總數約達一萬五千所……

所以，如果加入教會，胡績偉的前途是廣闊的。

但他沒有加入教會。從他的回憶中，我們可以找到兩個決定的因素：一個是鴉片戰爭在中國激起的民族主義思想的

傳播。這種思想視列強在中國的事業，為他們侵略中國的產物。其宗教事業與工商貿易的目的一樣，只不過是奴役中國人民精神的帝國主義事業而已。

而另一個更直觀的原因，則是他並沒有從教會的活動中感到一種文化的親和力與終極的關懷。胡老回憶自己當時的心情說：

“我覺得做禮拜沒什麼意思。讀《聖經》沒什麼意思。我記得在培德中學時做禮拜還有一點意思。因為那時候是男女分校。我們是培德男中，還有個培德女中。做禮拜的時候是男女在一起。中間有一個木頭板板，隔著的。這邊坐男生，那邊坐女生。那時候覺得做禮拜有意思，就是因為還可以看到女生。有那麼一點吸引力。到了高中，男女同班，也沒那個好奇心了。講《聖經》，什麼主啊，上帝啊，耶和華啊，對那些沒有什麼興趣。然後是星期天，他們喊我到英國人家裏去，舉行晚會啊這一類的東西。一些同學對外國人奴顏卑膝的樣子，看不慣。心裏很不痛快，很不舒服。這些加在一起，我就覺得這條道路不能走。覺得讀完高中讀大學，讀完大學留洋，留洋回來當一個教授，無非是一個洋奴。”

那種文化氛圍，對於一個受過深厚的愛國主義教育，革命思想薰陶，有著強烈的自尊心而又食不裹腹的青年，是沒有什麼吸引力的。但是，顯然，直到晚年，胡績偉還為自己沒有選擇那條道路而慶幸：

“它是我一生中一個比較重要的選擇。假定我走的是那

樣一條路，那就完全不一樣了，因為我有一些同學，畢業後留洋，回來後到華西大學當一個教員，了不起當個教授。全國解放以後，當個右派，就完了。”

胡老的這段憶述，再生動不過地反映了他自幼養成的自由與自尊性格，同時也不乏對於命運自主的慶幸之情。但在反思時，他沒有想過，如果相當數量的知識分子信了基督，並真正踐行基督的事業，還會有中國式的暴力革命嗎？還會有“反右”嗎？誠然，基督教的原始平等思想，天下一家的世界觀，是馬列共產主義理論的基石之一。但二者的區別也是最本質的區別，靠什麼去弭平人間的不公和罪惡，恰恰是胡老沒有反思到的地方。關於借宗教慈善搞殖民主義活動的問題，確是近代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治的一塊心病，但放眼全球歷史，“政教分離”的規則已經成功地處理了宗教組織的“野心”問題，一個最顯著的例子是，天主教首都梵蒂岡至今是世界上最小的國家。所以胡老的慶幸之情表明，他對自己道路的思考，還未走出感性的畛域。（陳小雅）■

注釋：

1，當時流傳“五胡亂華”說法的“五胡”，係指胡耀邦、胡喬木、胡績偉、胡啟立、胡克實。

2，參見隗瀛濤主編《四川近代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

第 22 頁。

3, 《胡林翼全集》書牘, 卷一六。

4, 參見嚴中平《中國近代史統計資料選輯》, 第 365-366 頁。

5, 勾到, 死刑判決。

6, 參見《四川近代史稿》, 第 264、270、290 頁。

7, 同上, 第 397、398 頁。

8, 據劉宗祿、黃宗揚《辛亥威遠保路同志會殺除威遠縣“知縣”徐昭益始末》。

9, 《蜀中先烈備徵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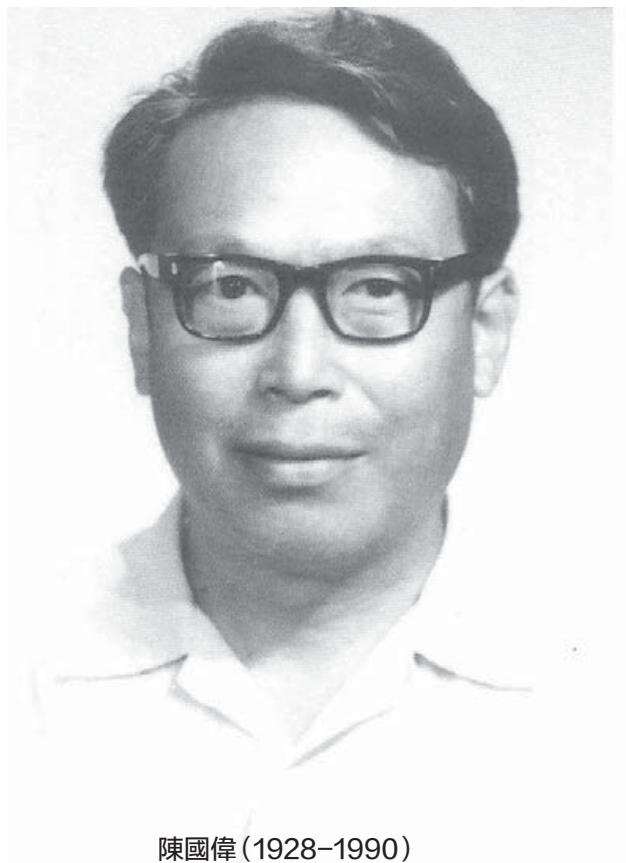
10, 書寫於木板, 上塗桐油, 裹油紙, 借水流傳送的信件。

11, 參見《四川近代史稿》, 第 690 頁。但劉宗祿、黃宗揚文稱榮縣獨立時間在 9 月 7 日。見《威遠文史資料選輯》, 第一輯。

在流放中回首故國往事，在反對共產黨的時候又去回想早年怎樣參加共產黨，革命已經走入歧途之後再來回憶青春歲月的革命，心中是何等悲涼、何等苦澀、又何等無奈！如此說來，是否悔不當初？否，決無悔意。第一次選擇並沒有錯，更重要的是第二次選擇

是黨變了，我沒有變！

——回憶我的青春歲月 and 革命引路人



陳國偉(1928—1990)

題記：陳國偉(1928—1990)，江蘇無錫人。1947年參加中共地下黨，任無錫城中區委委員。五十年代任中共無錫市委辦公室副主任。六、七十年代任新華社參編部組長、支部書記。八十年代任新華社駐哈博羅內(博茨瓦納首都)分社首席記者。逝世前是新華社參編部國際內參組主任編輯。為紀念陳國偉逝世20週年，他的生前友人紛紛撰寫回憶文章，結集自費出版《活在人心便永生》。2009年我動筆寫作此文。由於這是痛苦的回憶，中途幾度擱筆，遷延時日，將近三年始告草成。耽誤了時間，未能列入

文集。

■ 墳堆裏集會

中
共
高
層
恩
怨

在荒涼的無錫公墓的墳堆裏，有一群年輕人在集會。他們是私立輔仁中學高中一、二、三年級的少數學生組成的秘密組織——星火社的成員。第一項議程，討論接受一個新成員，那就是我。

有一位高三的同學對我說：“喂，你到那邊去站一回兒，我們要討論你的資格問題。”他手一指，大概三十米遠，我走了過去。不一回兒，叫我回來，說：“通過了。”接著，大家壓低嗓門，討論今後的活動。高三的同學已經畢業，暑假後即將各奔東西，高二和高一的同學表示要接續星火社的傳統，努力奮鬥。給我的印象，好像蘇聯小說中描寫的“青年近衛軍”。當時我讀完了高一，是星火社幾個年齡最小的成員之一。

我永遠不會忘記，這一天是1948年7月16日。我年方十六。這本是少年的歡樂時光，我們這一代人過早地涉入殘酷的政治。

這一天以前，我憤世嫉俗，進行個人的反抗。這一天以後，我參加了一個組織，走上革命的道路，投入推翻國民黨的鬥爭。這一天是我的人生轉折點。

第二天，另一位高三的同學找我，自我介紹，名陳國偉。他說：“昨天有人叫你到那邊去站一回兒，我注意到你的表情，

很坦然，可以看出你心地光明，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好像很注意觀察人、研究人。他從一個細節看到我的內心，看到我的未來，從此我成了他的培養對象。他還說：“這種做法是不對的，以後討論接受新成員，應當讓本人在場。”但以後再也沒有討論接受新成員，我是最後一個。

陳國偉就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我在星火社中重生

星火社沒有領導機構，不知道一些決定是怎樣作出來的，只看到有事大家一起幹。我漸漸發現，陳國偉是靈魂人物。

星火社通過公開的活動，如組織歌詠團、讀書會、籃球隊，團結群眾，發展進步勢力。我本是書呆子一個，外號“老夫子”，對於唱歌、跳舞、打球一概不感興趣。作為星火社的成員，我有了使命感，強迫自己改變興趣，積極參加各種活動，精神面貌煥然一新，簡直就像換了一個人。

以前，我痛感中國的黑暗、社會的不公，苦苦思索，不得其解。終日愁眉不展，自稱是“悲觀主義者”。在學校裏，我最討厭兩門課，一是“公民”，一是“軍訓”。“公民”課是國民黨的政治課，我常常在課堂上提怪問題，唱反調。上“軍訓”，我常常做怪動作，故意搗亂，破壞氣氛。軍訓教官李鳳山（國軍連長）曾對我單獨“訓話”。我養成了反叛的性格，強烈要求改變現實，但深感個人的力量有限，也不知道改變現實的正

確道路。

在星火社的活動中，特別是陳國偉同我的個別談話，使我看到中國的希望，光明的未來，個人只有投入革命的洪流才能有所作為。我一改以往，奮發向上，成了“樂觀主義者”。陳國偉的談話，從國際到國內，從社會到人生，總是娓娓道來，流入心扉，既親切又深刻。他雖只長我四歲，由於他的思想成熟、作風穩健，我們之間好像是兩代人。後來我和別人談話，進行思想工作，就是以他為榜樣，學習他的風格。

我被任命為星火社的小組長。小組有一項重要的活動，是記小組日記。日記由小組成員每人輪流記一天，記載當前大事、個人活動，彼此交流思想，也有相互批評。在污濁的舊社會，我們這個群體好像是沙漠中的綠洲，群體內外，完全是兩種不同的人與人關係。在社會上所受的屈辱，產生的憤慨，經小組討論，就在互相關懷的溫暖中化解了。小組日記是保持經常聯繫的一種方式，記錄了我們那個難忘年代的經歷，十分珍貴。解放以後，我多方打聽，到處尋找，不知所終。

蔣渭農的家是星火社的一個活動據點。我們開會，常常假裝打橋牌；有人進來就打牌，沒人進來就開會。那裏有許多進步書籍，供星火社的成員借閱，不定期地進行討論。還有一台短波收音機，可以收聽解放區的電台。那時擁有短波收音機是違法的，所以白天把它藏起來，夜裏才拿出來，緊閉窗戶，收聽陝北新華廣播電台的“記錄新聞”。“記錄新聞”播報的速度很慢，可以逐字逐句記下來。然後手抄、油印，廣為散

發，傳佈真相，揭露國民黨中央社的造謠。

批判反動教育制度受迫害

暑假以後，陳國偉和蔣渭農去上海南洋無線電專科學校學習，我住到蔣渭農家，看守這個據點。

我討厭學校裏“公民”課的灌輸，決心自己去尋找真理。經多方涉獵，終於找到馬克思主義。我反覆閱讀渭農家的進步書籍，孜孜不倦。由於學習馬克思主義是自覺的追求，吸引我全身心地投入。早年的努力，奠定了我畢生的理想。共產黨掌權後，把馬克思主義也像國民黨的“公民”課那樣，對學生進行灌輸，反而使人生厭。

除了組織讀書和討論，每天夜裏“記錄新聞”的任務，就由我一個人承擔了。音量很小，干擾很大，我必須聚精會神。再加警惕周圍的動靜，防止有人闖進來，精神十分緊張，記錄完了，一時還難以入睡。

中央社多次發新聞，說劉伯承被“擊斃”，已經死了好幾次，每次都附有“照片”，“記錄新聞”報道了劉伯承還在指揮作戰；中央社不斷發新聞，說國軍在“徐蚌會戰”中節節勝利，實際上淮海戰役已經打完了，以國民黨軍的失敗告終。後來有人揭發，中央社事先寫好一週的新聞，不管戰局如何，每天發一篇。

從電台廣播中得到的解放戰爭勝利的消息，鼓舞人心，我

的精神越來越振作。由於過分亢奮，我做出了一些魯莽的舉動。當時無錫《人報》有一個專欄“學府風光”。我以化名寫去一篇稿子，抨擊國民黨的訓育制度和軍訓制度，以輔仁中學為實例。這在一潭死水中掀起了一點小小的波瀾。校方很震驚，查找作者是誰。因為文中的說法與我平時的言論相仿，一查就查到我頭上。校長楊四箴的代理人李康復、訓育主任王祖璲輪番找我談話。開始，我既不承認也不否認，只說“你們可以到《人報》報館去查”。心想：我沒有留下真名，要查也查不出來。接著，他們又找秦伯益。秦是介紹我加入星火社的，我們兩人被老師和同學認為是搭檔。我怕連累秦伯益，所以就承認稿子是我寫的，與秦伯益無關。校方向全校公佈，給我記大過兩次、留校察看的處分，沒有比這更嚴重的了！我本是年年被評為“品學兼優”的好學生，這一學期的變化，使人感到驚奇。也有人猜到我“赤化”了。有一位陳壽文同學對我說：“你功課好，本來考上國立大學是不成問題的，我為你惋惜。不過，我也對你佩服，為了……可以犧牲自己的前程。”

我反問：“你說我是為了什麼？”他說：“不要說下去了。”

我本人認為，我是因堅持真理而受打擊，而且背後有強大的力量在支持我，心情極為平靜。同年級女同學、也是星火社的成員惲志吾（她告訴我：父親是惲逸群，當時任解放區新華社濟南分社社長），住的地方離我很近，常來看我，有一次她說：

“我本來想安慰你，看來你不需要安慰。”年輕時的這一經歷，鍛煉了我的心理素質，為真理而鬥爭，滿懷自信和自豪。五十

年代以後，歷次政治運動中，沒有一次不受衝擊，我能保持清醒的頭腦，以至在北大得到這樣的評語：“打而不倒，批而不臭。”

寒假以前，校方以拒收定額金的形式將我和秦伯益開除，到底還是連累了秦伯益。

立志作“成熟的革命者”

寒假中，陳國偉和蔣渭農回到無錫。國偉同我長談了幾次。他一方面表揚我立場堅定，另一方面又批評我過於衝動。他希望我成為“成熟的革命者”。我第一次聽到“成熟的革命者”的說法，牢記在心，努力踐行。

國偉為了培養我成為“成熟的革命者”，介紹我參加一個革命組織。我問：“什麼組織？”他在紙上寫了幾個字：“中國共產黨”。我大為驚訝，原來他是地下黨員！國偉是無言的榜樣，從他身上，可以看到共產黨員是什麼樣的人。我迫切希望作為他的戰友，成為他所在的組織的一員。當時，對我來說，共產主義不過是抽象概念，具體要求是自由、民主。但意志堅定，流血犧牲，在所不惜。

星火社是地下黨的外圍組織。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在一些地方也建立了地下組織，無錫沒有。星火社實際上就是無錫的地下青年團，培養和輸送了一批優秀青年加入地下黨。

國偉對我進行了一番考察。他問我：“你是不是出身於書

香門第？”我年輕時風度翩翩，真像出身於大戶人家，其實不是。

他又問：“你家裏是地主？”我說：“不是。”

“那麼你父親是資本家？”

“也不是。”

他說要到我家裏去看看。

他跟我到家一看，明白了。我的家是破破爛爛的，父親做小買賣，賣些針頭線腦，草紙香煙，香煙是論支賣的。周圍的環境也不好，鄰居是大餅油條店、老虎灶。他說：“真不能想象，你是出身在這樣的環境。”這一次大概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解放後，他常常提醒我“回家看看”。年輕時，我是一個激進分子，一心幹革命，六親不認，不顧家庭。1958年，父親過早地去世。那時我在北大學習。在無錫辦完喪事回到北京，收到國偉的一封信，附有他代我父親歸還人民銀行的貸款96元的收據。我和母親都不知道這筆貸款。他是怎麼知道的？看來他比我更關心我的這個家。“三反五反”時，核定我父親的資金是人民幣100元，欠人民銀行的貸款倒有96元，一生的財產，只有賬面上的4元。

國偉考察了我的家庭，又讓我談思想經歷。

我出生於“九一八”事變的次年，正當國難臨頭。1937年日軍轟炸無錫，我才五歲，人生的記憶是從流血、逃難、戰爭開始的。少年時代生活在淪陷區，深感亡國奴的痛楚。由於我身處社會的底層，家境貧困，不僅從小培養了反抗侵略者的

民族意識，也具有追求平等、變革現實的社會意識。1945 年抗戰勝利，我對國民黨抱有極大的希望，以為將會迎來一個民族獨立、社會平等的新中國。誰知迎來的是接收大員的“五子登科”（“五子”指房子、車子、票子、金子、婊子）。接著是物價飛漲，遍地災難，國運沈淪。我在作文本上寫道：“中國吃了慢性原子彈了！”老師在這句話的旁邊畫了一連串的圓圈，表示是警句。1946 年內戰又起。我思想極端苦悶，因憂國憂民而病了一場。1947 年，我就奮起參加學生運動。所以，我在 1948 年投身革命，參加共產黨是合乎邏輯的。

後來我發展地下黨員，也是學習國偉的做法，先到他家裏看看，再談思想經歷。

當時我以為地下工作很神秘。國偉對我說，我們的工作既不拿武器，也不搞情報，生活方式和普通人完全一樣。不一樣的是，為人方面要做表率，以後人們會知道，共產黨員是什麼樣的人。那一代共產黨人確實是為人的表率。他還說，在政治思想方面要指引人們前進，聯繫群眾，團結群眾，為未來的新政權打下基礎。毛主席說，解放軍作戰是第一條戰線，國統區的學生運動是第二條戰線。我們這條戰線的任務就是和國民黨爭奪人心。

入黨以後，我在聯繫群眾、團結群眾和國民黨爭奪人心方面是起了作用的。

我也可算為新政權打基礎的人物了。誰能想到，新政權建立以後，又反過來迫害我。



郭羅基

奉命開闢陣地

由於我體力和精力過度消耗，1948年冬天大口吐血。我不讓別人知道，怕剝奪我的工作。我咳出來的血不能隨便亂吐，總是捂著嘴吐在手帕裏，然後悄悄地洗掉。一次疏忽，換洗衣服時沒有把口袋裏那帶血的手帕掏出來，母親發現了。

她對我說：“你這是癆病呀！”癆病就是肺結核。那時認為，癆病必死無疑。我殺頭都不怕，還怕癆病嗎？

她又說：“你不要上學了，回家休養吧。”

我說：“我不上學也不能休養，我有重要的事情。”

母親說：“我也不問你有什麼重要的事情，做重要的事情還得有個好身體呀。”

她聽說，用紅棗、紅豆、血糯米加冰糖熬成粥，喝了能補血，每天晚上給我熬一碗。

1949年2月，我拖著吐血的身子，接受地下黨的派遣，轉到私立無錫中學（私錫中）。

私錫中的所在地羊腰灣當時是無錫的郊外，必須住校。國偉先問我：“你夜裏是不是說夢話？”我感到奇怪。他解釋道：“我們的同志，因夜裏說夢話泄露了機密，遭到逮捕。你如果會說夢話，不能住校。”我明白了，說：“我不會說夢話，夜裏和白天一樣，守口如瓶。”他給了我一本油印的《秘密工作條例》，說：“文件的每一條、每句話都有血的教訓，這裏就有這麼一條：說夢話的人不能住集體宿舍。你要熟讀，牢記在心，然後把小冊子燒掉。”我將《秘密工作條例》背了下來。他還陸續給我其他一些學習文件，並且交待文件不能隨身帶，也是看過後燒掉。因為燒掉以後再也找不到了，我都一一背誦。解放後，有人說：“《為人民服務》你怎麼看一遍就能背出來了？”我說：“我不是看一遍，而是看了無數遍，解放前就會背了。”

私錫中是無錫人數最多的一所中學，有一千多人，大部分住校，再加地處郊外，便於開展學生運動，但沒有地下黨的力量。我奉命前去開闢陣地。從輔仁中學同去的還有秦伯益和

夏樹釗。秦會指揮唱歌，夏熱心體育，他們成為我發動群眾的得力幫手。我們三人一到私錫中就很引人注目，進步勢力和反動勢力兩方面的人都注視著我們。

開學沒多久，父親特地來找我，說家裏接到學校的通知，給我一個警告處分。問我怎麼回事？通知上說是“不敬師長”，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父親說：“你剛剛在輔仁中學記大過兩次、留校察看、開除學籍，現在一到私錫中又吃警告，弄不好沒有學上了。”在舊教育制度下，我是罪人，領教了從警告到開除的所有處分。我說：“爹爹，你放心，我沒有學壞，不是我做錯了，是學校做錯了。”父親對他的兒子是信任的，嘆了一口氣。我想起了朱自清的《背影》，久久站立，望著在羊腰灣上緩緩遠去的父親的背影。親人傷心，使我難過，更使我堅定決心，改造這個顛倒的社會。

我去問訓育主任許伯堅，為何給我警告處分？他說是童（有儲）先生提出、校長點頭的。學生開飯時，有教師值班巡視，叫做監膳。有一次是童有儲監膳，他走過我們飯桌時，我說：“童先生，和我們一起用飯吧。”我得知，他思想反動。我是故意表示和他親近，不料他以“不敬師長”的罪名給了我一個下馬威。“記大過兩次、留校察看、開除學籍”等等沒能影響我的情緒，區區一個“警告”又何足道哉！只能使我提高警惕，加緊工作。

我在私錫中做了五件工作，第一件就是迅速摸清政治情況。

一開始，我注意上軍訓教官，他姓狄，在學生中很有影響。不知是什麼地方的口音，他把“教官”念成“叫關”（這兩個詞在無錫話的發音中是有區別的）。同學們都喊他“狄叫關”。經深入瞭解，他倒是沒有什麼政治傾向，是個中性人物，只是與學生的感情較好。

值得注意的是“公民”課教師童有儲。他與別的教師不同，善於施行小恩小惠，拉攏學生。他的宿舍，人來人往，特別熱鬧。我也側身其間，深入虎穴。有一次，趁他不在，我在桌子上亂翻，在一個照相簿上看到一張中央政治學校某期畢業典禮的照片（一律穿軍裝）。這樣，可以確定，他不是一般的思想問題，而是國民黨培養的政工人員。^{（注1）}我在調查中，進步教師和學生告知：以童有儲為首，還有兩個參加過青年軍的教師，形成這個學校的反動勢力中心。他們在學生中有一批以高三的項元生、初三的呂祖壽為首的依靠對象，這些人深受蒙蔽。

私錫中雖然沒有地下黨的力量，但進步勢力很強大。歷史老師華山（後為山東大學歷史系教授），在課堂上公然講授歷史唯物主義，並從歷史到現實，分析國共形勢。國文老師李延秋，課本不用，自發講義，教毛澤東的《沁園春·雪》、《七律·長征》和魯迅的作品。有的教師在課堂上公開讚揚共產黨，批評國民黨，言論大膽，令人吃驚。

寒假之前，楊爾烈、顧紀瑞、姚湛一等六個學生秘密出走，奔赴蘇北解放區，參加革命。走了六個，又來三個。進步學

生主動與我接近。同班同學陸大福（後改名為陸拂為），對我說，他是地下黨員，關係在無錫縣郊區東亭鎮。我立即向陳國偉匯報。他說，郊區的地下黨不能插手城區的工作，陸輕易暴露自己的身份也是不對的。陸還問我：“你是不是地下黨？”國偉說：“你怎麼回答？”我說：“是和不是，都不是自己說了算的。”國偉說，回答得很好，既不能說“是”，也不能說“不是”。這個回答包含了對陸的批評。

初中部的歷史教師何曉滄（後改名為何剛），是地下黨員。他是以教師的職業為掩護，實際負責城區職業青年的工作。我們之間沒有橫向的聯繫，他也不參與學校的活動。

私錫中有一種優良風氣，叫做“榮譽考試”。考試時，老師往往走出教室，沒有監考，卻無人作弊。學生們具有強烈的自尊，並以“榮譽考試”自豪。學生中的一股正氣，易於接受進步思想。

我在私錫中團結了一批進步學生，與以童有儲為首的反動勢力相對抗。我的同班同學祝頌和對我說：“你要當心，你是上了城防指揮部的黑名單的。”我問：“你怎麼知道？”他故弄玄虛：“不能說。”我將信將疑。

私錫中活躍起來了

第二件工作是發動群眾，活躍起來。

1949年4月3日、4日，地下黨發動了一次春遊，來自各

中學的男女學生 300 多人，聚集在太湖邊上的江南大學，實際上是對進步力量的一次檢閱。

私錫中有 20 來人參加春遊，回校後成了搞活學校的骨幹。他們帶來春遊的收穫，在全校教唱歌、跳集體舞。當時社會上流行的是靡靡之音，唱什麼歌，也是一種鬥爭。我們唱的歌，除了健康的民歌《在那遙遠的地方》、《康定情歌》、《半個月亮爬上來》等等，還有諷刺性的，如：《你這個壞東西》、《五塊錢的鈔票沒人要》、《古怪歌》、《茶館小調》；也有啟蒙性的，如：《山那邊呀好地方》、《你是燈塔》、《跌倒算什麼》、《四月的風》、《團結就是力量》等等，這些歌簡直就是政論。

《你是燈塔》的歌詞是：

你是燈塔，照耀著黎明前的海洋，
你是舵手，掌握著航行的方向。
年輕的中國共產黨，
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
我們永遠跟著你走，中國一定解放，
我們永遠跟著你走，人類一定解放。

唱的時候，“年輕的中國共產黨”改成“年輕的中國學生們”，但故意將聲音提高，以示別有含義。

《跌倒算什麼》是鼓舞鬥志的，唱道：

跌倒算什麼，
我們骨頭硬，
爬起來再前進。

生，要站著生、站著生，
死，也站著死、站著死。
天快亮，更黑暗，路難行，
跌倒是常事情，常事情。

跌倒算什麼，
我們骨頭硬，
爬起來再前進！

還有一首《四月的風》，旋律優美，像是預言詩，同學們特別喜愛，歌詞是：

唱吧，唱吧，四月的風呀盡情歌唱，
唱吧，唱吧，四月的風呀快樂歌唱。
歌唱那偉大理想的日子將來到，
歌唱那永恒燦爛的春天已在望。
自由的號角吹呀，民主的大旗飄呀，
歌唱吧，四月的風，
歌唱那戰鬥，歌唱那風暴，
帶來了大希望。

《團結就是力量》本是解放區的流行歌曲，又成為學生運動的戰歌。

這些歌曲的最強音是自由、民主、解放，唱得人們熱血沸騰。當年高唱“向著法西斯蒂開火”，反對國民黨，打倒蔣介

石。國民黨和蔣介石被趕走了，但在“新中國”不民主的制度並沒有死亡。我們這一代人，被稱作“舊中國的最後一代青年、新中國的最早一代青年”。我們見證了“舊中國”和“新中國”的交替。五十年代，確曾一時氣象新。曾幾何時，一切“舊中國”的壞事死灰復燃，甚至變本加厲，就因為不民主的制度並沒有死亡。

跳集體舞，放學後把大部分同學都吸引過來，走出了教室。跳了幾天，又生出新花樣。我們班有一位郁志雄，是從蘇北來的，會跳秧歌舞，大家慫恿他教秧歌舞。操場上四百米的跑道圍了一圈，排成長龍，下了晚自習還在跳。跳秧歌舞具有極大的象徵意義，敢於跳秧歌舞就是一種政治態度。解放後，從無錫城防指揮部的檔案中看到，有人因為跳秧歌舞上了黑名單。私錫中幾百人跳秧歌舞，要上黑名單也無從下手了。無錫城裏的老百姓說：“快了，快了，私錫中跳起秧歌舞來了。”意思是共產黨快來了。

當時私錫中沒有女生，演出時男扮女裝。我就扮演過農作舞中的農婦。後來又和沒有男生的競志女中聯合起來，組織歌詠團，秦伯益擔任指揮，普及和提高相結合。

唱歌跳舞起了巨大的政治作用。那時發動群眾不是靠說教，而是採取青年學生喜聞樂見的形式。在歌聲中轉變思想，在舞步中活躍身心。這些活動中，我所在的高二廉組（班）湧現出許多骨幹分子。我是從輔仁中學學來的學生運動經驗，但私錫中比輔仁中學搞得更有聲有色，進步勢力完全壓倒了反

動勢力，為地下黨領導的活動奠定了群眾基礎。

第一個真正的學生自治會

第三件工作，抓緊時機，組織起來。

在江南大學春遊時，傳播了一條國民黨封鎖的消息：4月1日，南京的大學生舉行示威遊行，反對假和平，要求真和平。當時蔣介石隱退浙江奉化，李宗仁任代理總統，派出和談代表團赴北平。實際上並無和談誠意。南京11個大專院校六千餘人舉行遊行，遭到國民黨軍警鎮壓，血灑珠江路，死二人，傷一百多人。我們回到私錫中，當天晚上就組織了“四一事件後援會”，第二天召集全城中學生代表到私錫中開會，準備大幹一場，於四月中組織遊行，聲援南京學生，抗議血腥屠殺。我週末才能離開學校，與地下黨單線領導接頭，事先來不及請示。事後匯報，我還以為行動及時，會得到表揚。不料，陳國偉說：“趕快停止活動。南京地下黨犯了錯誤，已經吃批評了，我們不要再去加重錯誤。”“四一”事件的口號是正確的，但行動是錯誤的。然後他就耐心地解釋為什麼是錯誤的。地下工作的方針是“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大軍即將南下，不要再暴露自己，作無謂的犧牲，一切都要為迎接解放作準備。我當即表示：“堅決服從組織，立即停止活動。”

我回到學校，心想：立即停止活動太生硬，會挫傷同學們

的積極性。我和周圍幾個夥伴商量的結果，將“四一事件後援會”轉變為“私立無錫中學學生自治會”，還要考慮到兩者的銜接。我們高二廉組（班）是私錫中的進步堡壘。上晚自習的時候，派人到各班遊說：“四一事件後援會”只是臨時性組織，我們需要成立長期性的“私立無錫中學學生自治會”，領導各項活動，也包括聲援“四一”事件的活動。各班選出代表，召開學生代表大會。我起草了一個章程，模仿西方的內閣制。學生代表大會選舉陸大福（高二）為主席，金錫坤（高三）為副主席；我任理事會主席，李燮平（高三）任副主席。我找訓育主任許伯堅，得到支持，還撥了圖書館的一間屋子作為學生自治會的辦公室。其他中學，或是被壓制，沒有學生自治會（連地下黨力量強大的輔仁中學都沒有），或是只有官辦的學生自治會（如女中），私錫中產生了唯一真正學生自治的群眾組織。這一回，我得到了地下黨的表揚，說我做得對、做得好。我到私錫中才兩個月，折騰出一個學生自治會，事後連我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

解放後，童有儲被逮捕，進步教師華山在大會上揭發：“四一事件後援會”成立後，童有儲開了一個名單，找校長章質夫要開除一批學生。章校長施緩兵之計，去了上海。等他回來，“四一事件後援會”已改為“私立無錫中學學生自治會”，開除學生的事也就不了了之。可見，地下黨的指示是正確的，避免了進步力量的損失，否則，我又要被開除了。



學生在校門口站崗。

組織應變，保護學校

第四件工作是做好應變護校。

我入黨的時候，以為潛伏地下需十年、八年，至少還要幹三五年。誰知到了1949年4月已是大變動的前夜。陳國偉對我說，他要奉命撤退到太湖游擊區，把我的關係交給“老張”。握手言別的時候，我說：“相會在勝利的時刻！”

我和“老張”第一次接關係，暗號相當複雜。我的打扮：身穿長衫，右手撩起長衫，左手夾一本厚書，上面寫 Algebra。地點：皇后電影院門口。有人來問我：“你買票了嗎？”

答：“沒有。”

“你要票嗎？”

“我要下一場的。”這一句很關鍵。

“老張”說：“我有，請跟我走。”

我跟著他走進一個僻靜的小巷。他同我熱烈握手：“郭羅基同志，很高興和你見面。”他向我分析了解放戰爭的形勢，交代任務：緊急關頭成立應變組織，做好應變工作，護廠護校。

1949年4月21日，毛澤東和朱德發佈《向全國進軍的命令》，當天人民解放軍即強渡長江。22日可以聽到江陰方向炮聲隆隆。23日，簡直是兵荒馬亂了。私錫中門前是運河，河岸上是公路。這一天，河裏只有一種船隻，向南運送從江陰方向下來的傷兵，缺胳膊斷腿，血跡斑斑，十分可怖。公路上行人絕跡，敗兵在向南撤退。

學校裏的校長和教師都跑了，只有一位照顧初中部小同學、名叫梅根的工友沒走，他說：“這麼多孩子留在這裏，爺和娘怎麼能放心？”私錫中大部分是寄宿生，交通已經斷絕，有幾個同學想步行回家，被國民黨軍隊拉夫。跑到江溪橋，溜了回來。這樣一來，誰都不敢出校門了。留在學校不能回家的還有五、六百個孩子，大人只有梅根一個。當時，我也是一個不到17歲的大孩子，有事都來問我，成了孩子王，指揮一切。

祝頌和是走讀生，他的家在離學校不遠的無錫南門。他對我說：“你跟我回家，到我家避一避。”我回答：“我不能走，學生自治會有責任保護學校，保護同學。”他急得跺腳：“國民

黨撤退的時候可能會大逮捕，你的名字在黑名單上，是千真萬確的。”他這才告訴我，是他的一個親戚在城防指揮部看到的。他給了我家裏的地址，說：“要是情況緊急，隨時可以來。”（注2）

雖然我對上了黑名單的事將信將疑，但不得不有所防範。

我採取了幾條應變措施。

首先，把守大門。門房的工友名文奎，足有疾。我對他說：“文奎，看好大門！”他說：“我腿腳不便，有事跑不了。我也要走了，有人會來接我。”他建議：“我這裏有一條鐵鏈子。我走後，你可以用鐵鏈子把大門鎖上。”我根據他的建議，用鐵鏈子把鐵門鎖住，阻擋敗兵進來騷擾，防止憲兵進來抓人。

其次，組織同學站崗、放哨、巡邏，手持童子軍軍棍，保護米倉、實驗室、圖書館。後來發現，夜裏米倉外面被掘了一個壁洞，幸而未掘穿，糧食沒有被盜。大概小偷聽到巡邏的腳步聲，或看到手電的晃動，逃走了。我們在敗兵經過的混亂時刻保護了學校，沒有受任何損失。

私錫中有兩面是農田，沒有圍牆，只有籬笆。我先偵察一番，如果來抓人，從什麼地方鑽籬笆，可以逃出去。我在那些地方佈置人站崗，說是防止外面的人鑽進來，實際上是讓他們在必要的時候可以協助我從裏面鑽出去。

再次，國民黨抓人大多是在夜裏，重要的是對付夜裏抓人。宿舍樓只有一個大門，窗戶上釘有鐵條，封住了大門，真是瓮中捉鱉。我讓所有的同學搬出宿舍，住在一樓的幾間大

教室裏。我混在群眾之中，可以得到保護。我又選了一個門邊的位置，情況緊急時如何逃走，設計好路線。

教室裏打上通鋪，成了一個大舞台。很多人在一起，也有親密團結的氣氛。白天，有人還想家流眼淚，晚上，在大舞台上翻筋斗、豁虎跳，好不熱鬧，全然忘了憂愁。我們入睡時，外面的公路上還不斷走著敗兵。到天朦朧亮的時候，忽然被歌聲和號聲吵醒。有的同學罵起來了：“斷命的敗兵，唱什麼歌，吹什麼號，神氣點啥？”開始聽不清唱的是什麼，當我聽到：“向前，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太陽……”這是我在新華廣播電台聽到的歌聲！我一骨碌爬起來，說：“不是敗兵，解放軍來了。同學們，快起來！”

後來得知，解放軍的一個團在4月23日晚上11時已從光復門入城，兵不刃血地佔領了無錫。國民黨的黨政軍機關早已棄城而逃，他們要大逮捕也沒有時間了。入城的部隊，番號是第三野戰軍10兵團29軍87師260團。唱著歌從我們學校門口經過的是解放軍另一支向南的追兵。

各個教室的同學都被我叫起來，臉不洗，飯不吃，集中到校門口，鼓掌、唱歌、喊口號，歡迎解放軍。不久前學會的進步歌曲，都派上用場了。《你是燈塔》中的“年輕的中國學生們”，又改回“年輕的中國共產黨”。昨天和今天，我們看到兩支完全不同的隊伍，從校門口經過。昨天的國民黨敗兵，長官和官太太騎著馬，當兵的歪戴著帽子，倒掛著槍，稀稀拉拉，真是潰不成軍。解放軍雖然衣服破舊，但隊伍整齊，士氣高昂。



無錫圖書館。

同學們看不出誰是長官，這一點印象尤其深刻，不時交頭接耳地議論。特別感動的是解放區支前的民工，把農村的獨輪車推進了城市，運送糧食和彈藥。

到了10點鐘，我忽然想到，應當去找地下黨的領導，接受新任務。陳國偉撤退後，我的領導是“老張”。每次接頭的地點都不固定，到哪裏去找？那就找入城的解放軍吧。我和陸大福兩人進了城。商店都不開門，但馬路上人來人往，喜氣洋洋，還有人高喊：“天亮了！”我們兩人都覺得肚子有點餓，先到我家裏吃點東西。正捧起一碗稀飯，看見“老張”在馬路上

仰著頭查門牌號碼。我立即上前打招呼，他說正要找我。他自我介紹，真名是陳秉基。解放軍雖然佔領了無錫，但接管城市的幹部隊伍還沒到，地下黨要站出來。第一個決定是發動一次大遊行。他要我趕快回學校，把隊伍拉出來，到市中心的圖書館集合。

我和陸大福，稀飯沒喝一口，又回到學校。拉出 500 多人的隊伍，奔向圖書館。私錫中雖然路途遙遠，卻是最先到達，因為我們的隊伍是現成的，不像市區的學校，要挨家挨戶把同學們叫出來。兩點鐘，集合了 2000 多人。開會，有一個人講了幾句話，隨即遊行隊伍出發。前面打著橫幅：“迎接解放，走向光明”，從圖書館，經崇安寺、中山路，出控江門，到江陰巷，那是解放軍來的方向。等了一回兒，並沒有迎來解放軍，又折回，經光復路進光復門。這又是昨夜解放軍入城的路線。回到圖書館，遊行隊伍解散。

遊行隊伍一路高喊口號。私錫中的隊伍還不斷地唱進步歌曲，有時扭一程秧歌，使人刮目相看。

遊行隊伍在光復路經過我的家門。我和幾位學生領袖走在隊伍的最前面。一位鄰居後來告訴我，他對我母親說：“你們的阿大在領頭遊行，危險呀，快點去把他拉出來。”那時國民黨的飛機還在頭上盤旋，確有危險。但母親說：“勿可以的。那麼多人在遊行，個個都是娘身上掉下來的肉，人家不危險啊？”我母親沒有文化，但深明大義。

私錫中的隊伍回校時，到東門亭子橋，已過六點，宵禁開

始，有解放軍士兵站崗，不准通行。我在救火會打電話給軍管會，軍管會派來一位海秘書，讓哨兵放行。這位海秘書就是海哮，後來我們成了朋友。

回到學校，開飯時間已過，食堂關門了。同學們在宿舍裏高談闊論，興奮不已。大家在暢想十年、20 年後的幸福生活。

這一天，我沒有吃過一頓飯，不覺得餓，歡天喜地入夢鄉。

90 年代，老同學聚首，聯歡會變成了訴苦會。訴說往事，幾乎每個人的經歷都是一部悲劇。不少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反黨分子”、“反革命分子”，有幾個人蹲過監獄，還有一個人被押赴刑場陪斬。想起 1949 年 4 月 24 日晚上迎接解放時對未來的憧憬，好不心酸！他們在我的影響下，心向共產黨，參加了革命，卻落得如此下場，我向他們致以深深的歉意。

建立私錫中的黨團組織

第五件工作，發展黨團員，建立黨團組織。

解放後，不時舉行各種各樣的聯歡會。大家都想參加，而聯歡會的票數有限，沒有得到票的人就心生不滿。童有儲在後面煽動，^(注 3) 高三的學生項元生出頭，指責學生自治會發票不公，主張推翻學生自治會，要求重新選舉，實行一人一票的普選。我和陸大福召集學生自治會的負責人開會商量，認為

拒絕普選是不明智的，只能接受挑戰。童有儲操縱的勢力為項元生競選，作為教師，他竟然在上課時為項元生拉票。他們還在操場上用白粉寫了幾個大字：“請投項元生一票”，招來國民黨的飛機用機槍掃射，大概以為是中共基層政權選舉。子彈在屋頂上開花，私錫中幸而無人傷亡；但殃及池魚，門前運河上的一條輪船被擊中，有人受傷。

那時還沒有“黨的領導”發號施令。我們之所以敢於接受挑戰，也是因為對選舉抱有信心。高三的項元生助選團改變策略，不再辯論學生自治會工作上的得失，而是著重拉攏初中部不明事理的小同學，讓他們起鬨。投票的結果，原學生代表大會主席陸大福落選，當選的是李燮平，他也是進步學生；項元生當選為理事會主席，我以幾票之差當選為副主席。但項元生心有旁騖，沒有開一次會、幹一件事，反而證明煽動重新選舉的目的就是為了拆台。學生自治會的實權仍然操在我手中。^(注4)

項元生又忙於秘密串連去了。當時私錫中的學生中有一股風，希望到北方、特別是去北京參加革命大學，以致人心浮動，嚴重地影響正常的教學秩序。這是無錫其他中學沒有出現的問題。從參與者的動機來說，各不相同：高三的一些學生是為了逃避畢業考試和陞學考試，直接混上一個大學生的資格，其中有些人是一向和進步的學生運動作對的；有些學生是出於對舊教育制度的厭倦，追求新的學習生活，而且可以享受免費；少數人確實有志於革命。這一行動，為童有儲所利用，

搞亂學校。他極力鼓勵，資助銀元，指使項元生帶頭組織學生“北上”。有人說：“北上參軍是童有儲派出混進去的”。當然不能一概而論。但硬說政治上反動的童有儲支持學生“參加革命”，也是說不通的。^(注5)私錫中在解放前夕應變的時候保護了學校、保護了學生，解放以後卻陷入了混亂，有的班級竟至無法上課。

市公安局有一位張碧，經常跑私錫中，童有儲、項元生等人的活動都記錄在案。

6月份，社會上銀元販子的活動很猖獗，擾亂金融，哄抬物價。那時陳國偉在青年團市工委工作，他負責東區的學校，是我們的領導。他提出，取締銀元販子不是政府下一道命令就完事的，我們要上街宣傳，號召人民抵制銀元販子，形成群眾運動。我們學習文件，組織力量，上街宣傳，從南長街進南門，一直到市中心。我們的宣傳有演講，有活報劇，還發材料，受到市民的歡迎。這一活動，對於學校的穩定也起了良好的作用。我們用事實說服同學們，在新解放區同樣可以幹革命，不必“到北方去參加革命”。

原來我依靠我們高二廉組推動全校的運動，現在高二廉組在陸大福的帶動下，也有許多人加入了北上的行列，班上亂哄哄，我指揮不靈了。

我就想到，要趕快建立黨團組織。

我在私錫中發展了一名地下黨員，是同班同學周佩琛，由陳秉基代表上級黨委於1949年4月21日批准入黨。因臨

近解放，還有幾位培養對象沒有來得及發展。解放後黨組織決定，有一些地下黨員不公開身份，作為秘密黨員。周佩琛是其中之一。他不屬於我領導，由市公安局一科單線聯繫。他也不參加公開的政治活動，有時還要偽裝成中間分子或落後分子講話。當時年輕人意氣風發，爭相出頭露面，周佩琛能耐得住寂寞，說明他的組織性、紀律性很強。

陳國偉曾指示我發展秦伯益入黨，他在輔仁就是地下黨外圍組織星火社的成員。秦對我說：“我們兩人說好將來要學醫的，看來你改變主意了，我還堅持。我不願入黨，但我會配合你的工作。”我們兩人從抗戰勝利後輔仁復校，讀初中二年級開始就是好朋友，相約學醫。我看了魯迅《吶喊》的序言，知道魯迅本來是學醫的，因為看到體格健全的中國人成為日本人屠殺中國同胞的看客，他認為醫治中國人精神上的麻木比消除肉體上的病痛更重要，所以拿起了文學武器。我的心靈深受觸動，於是改變初衷，決心喚起民眾，改造社會，走革命之路。秦伯益高中沒畢業就進了上海東南醫學院。後來他還是入黨了，而且成了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院長（少將銜）。

陸大福曾說他是地下黨員，我讓他把組織關係轉來。他說，東亭黨組織不承認他的黨籍。解放後，他的思想有變化。他家裏是地主。解放軍向地主借糧，他大為不滿，說是“搞得大家沒飯吃了”。他還和我辯論，是自由重要還是吃飯重要？我說自由重要，他說吃飯重要，互不相讓。他的行動也不像黨員。他不顧新解放區穩定秩序的需要，多次說服無效，與一夥

人擅自離校，北上“參加革命”去了。這些人大多半途而廢，又不好意思復學，回了老家。暑假中，陸大福進了“蘇南新專”（全名蘇南區新聞專科學校），與林昭是同學。

我向陳國偉提出，發展黨團員，建立黨團組織。他請示以後答覆：新解放區一般不發展黨員，可以慎重地發展團員。解放前，我接到指示，要大力發展黨員，解放後，卻停止發展。這種方針的轉變無疑是正確的，為了在共產黨掌權的條件下防止投機分子混入。但長期的一黨專權，後來共產黨內還是麇集了一大批追求權勢和謀取私利的人。

我被任命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私錫中團支部書記。暑假以前發展了十來個團員，重點在高一，有王國增、陶一川、李宗元、孫中原等。暑假中全部參加了在省錫師舉辦的團訓班。

剛解放，教師中的黨員何曉滄就走了。暑假開學後，調來兩位黨員：佘名清（女）和仲安仁，學生中，從解放區轉來的初三的張仲行是黨員。四名黨員組成一個支部。私錫中黨支部的第一任書記是佘名清，我是副書記兼團支部書記。不久，佘名清調離無錫，我接任黨支部書記。

1949年，在無錫的學生運動中，私錫中是走在前列的。解放後成立的無錫市學生聯合會，主席是蘇南社會教育學院的孫希民，副主席是江南大學的江之光，另一個副主席就是代表私錫中的郭羅基。

1949年9月以後，學校和工廠相繼舉行基層團組織公開

儀式。私錫中是先進典型，在全市第一個舉行團支部公開儀式。^(注6)

我作為學生代表，七月份參加了無錫市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十月份又參加了蘇南區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我就是在蘇南區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結束後，調任青年團學生工作委員會委員，從此結束了學生生涯，成為黨團幹部。

“我沒有變，是黨變了！”

我從參加星火社到加入地下黨，以及解放後成為學生運動領袖，都是在陳國偉一路引導和扶持下前進的。1949年夏天，陳國偉在蘇南黨校學習結束，調到吳縣搞土改，後來又到蘇州市搞“五反”。我們不僅在工作上上下下級關係，在生活上又是親密的朋友。他每次從吳縣或蘇州回無錫，總要找我聚聚。

1953年，陳國偉調回無錫，任人民銀行儲蓄部主任，兼銀行系統的團總支書記。這時，我是無錫市一級機關團委書記。昔日的上級成了我的下級。上下級關係的戲劇性變化，更顯得國偉的品格高尚。他沒有半點傲慢。我在會議上講話時，他那認真作筆記的模樣，令我內心十分感動。

就在這一年，黨政軍機關抽調一些年輕幹部上大學，叫做“調幹生”。我也要求上大學，沒有被批准。鬧了兩年，終於如願，1955年9月，我進了北京大學歷史系。早年曾立志學

醫，現在志在探究歷史的奧秘，醫治社會的弊病。在共產黨奪取政權的時候，決心當“職業革命家”；在共產黨掌握政權的時候，重新作人生的選擇，結束革命生涯，轉向學術研究。

雖然我少年得志，一帆風順，但在政治生活中常常感到不自在。我的天性愛好自由。在國民黨的統治下，因為痛感不自由，所以才反抗，才鬧革命。在共產黨的天下，依然覺得不自由。官場只論權力大小，不問真理多少。開始還沒有對共產黨如何運用政權進行思考，只覺得我的個性不適於在政壇生存，於是遠離權力中心，退居文壇。我考大學的時候，周圍的朋友們都說我傻，他們不能理解我的舉動。他們說，我已是局長級幹部，上了大學就成普通一兵。我所享受的調幹助學金，雖比其他人為高，也只有原工資的三分之一。我是為了保持自由的心靈，不受壓制，免遭扭曲，衝開物質的枷鎖，不為五斗米而折腰。誰知文壇和政壇一樣，還是黨天下。無處可退了，只能面對現實，發生衝突，以至被共產黨領導人敕封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冒尖人物”“代表人物”。

懷念國偉，不由得想起我的青春歲月。我的青春歲月，在革命的浪潮中浮沈，懷抱理想，奮不顧身。因追求自由、民主，反對國民黨，參加共產黨。誰知後來共產黨給予我的不自由、不民主之苦，更勝於前。《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作者奧斯特洛夫斯基臨終前說：“我們所建成的，與我們為之奮鬥的完全兩樣。”中國和當年的蘇聯一樣。我們為之奮鬥的理想毀滅了，我們所建成的這個國家，又反過來壓迫我們。1989年“六四”

開槍，我像反對國民黨鎮壓學生運動一樣，反對共產黨的暴力行為，因此而被清除出黨。我當眾宣告：“我沒有變，是黨變了！”我被腐敗的共產黨清除出黨，也可以說，在我身上清除了腐敗的共產黨。對腐敗的共產黨來說，爭自由、爭民主又成為一種罪名，我被放逐海外。16歲的時候，被國民黨政府列入黑名單；60歲的時候，又被共產黨政府列入黑名單。被國民黨政府列入的是抓捕的黑名單；被共產黨政府列入的則是流放的黑名單。流放海外20年，至今不得回江東。

“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此時此地，在流放中回首故國往事；在反對共產黨的時候又去回想早年怎樣參加共產黨；革命已經走入歧途之後再來回憶青春歲月的革命：我的心中是何等悲涼、何等苦澀、又何等無奈！

我們青少年時代，雖然熱烈追求民主，但不知道暴力革命、奪取政權，並不能實現民主。槍杆子裏面可以出政權，不能出民主。槍杆子可以反對不民主，不能建設民主。以暴力奪取的政權，再以暴力維護政權、運用政權、鞏固政權是很自然的。從現在來說，我寧要和平改良，不要暴力革命。從當時來說，又是不可選擇的。共產黨也是走在被歷史規定的道路上。共產黨與國民黨是對立的，但走的是同樣的歷史道路。暴力革命的道路是從孫中山開始的，以黨領軍，以黨治國，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是繼承了孫中山的遺產。

在一定的歷史環境中，個人的行為是可以選擇的。國民黨專制腐敗，導致社會黑暗，民不聊生；共產黨發動革命，反對

國民黨，是正義的。投身革命，加入共產黨，是站在歷史的正確方面。即使已經知道共產黨同樣會腐敗的謎底，如果回到當時的歷史場景，也不可能作別樣的選擇。投入國民黨的懷抱？那是站在歷史的錯誤方面。不問政治，超然中立？就成為歷史的旁觀者。而且，當時走“第三條道路”的人們，最後也不得不分化：少數跟著國民黨去了台灣，多數轉向共產黨陣營。因此，根本問題是必須反思近代中國一百多年的歷史道路，從暴力革命的道路轉軌，走上民主法制的道路。

我的第一次選擇並沒有錯，更重要的是第二次選擇。為了反對國民黨的腐敗，選擇共產黨；當共產黨也變得腐敗的時候，我同樣也反對共產黨的腐敗，選擇憲政民主。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權之後，又反對共產黨的一黨專權，我保持了為人的一致性和理念的完整性。

但願我們的後代能夠走向光明的中國，避免我們這一代人所遭受的痛苦和挫折。

2012年3月於美國奧馬哈（郭羅基）■

注釋：

1, 1951年“鎮反”時，童有儲被逮捕，判刑十年（一說15年）。當時我早已離開私錫中，而且也不在無錫。童有儲的逮捕、判刑，有關方面沒有找我調查、取證，我也沒有看到判決書。如果徵求我的意見，我會說判得太重。據童有儲的中學、大學同窗朱康復說：1944年童參加了青年軍，“曾被授予軍銜（據說是少校），職務是政治指導員一類（具體不詳）。據我估

計，極有可能他曾進過某種訓練班，否則不可能擔任這一類職務（不過具體事實未能查證落實）。”（朱康復《關於童有儲老師》，《羊腰灣弦歌》第111頁，私立無錫中學49/50屆高中同學會編印，2005年1月）朱康復的估計不錯，我所看到的那張照片證實，他是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的學員。

2, 1950年，我的公開職務是中共無錫市委學校總支保衛幹事，實際上參與公安局一科（偵察科）的秘密工作。我看到了國民黨城防指揮部檔案中的黑名單，果然我名列其中，還有秦廷棟。名單上大部分是教育學院的大學生，也有工人，中學生只有我們兩個。列入黑名單的理由是滑稽可笑的，有的是“跳秧歌舞”，有的是“唱匪區歌曲”，有的是“參加營火晚會”，還有“夾帶馬克思的書籍招搖過市”，秦廷棟和我好像罪名最重，曰“共匪嫌疑”。

3, 朱康福《關於童有儲老師》中說，據童有儲的家屬記憶，判決書的內容主要是三條，其中第二條就是“鼓勵落後學生與進步學生對抗”。

4, 劉靖圻《錫中拾拾》（原文如此）中“爭當老大”一節中寫道：“無錫解放後，學校有短暫的停課。恢復上課後，學校提出要選舉、成立學生會，並公佈了學生會候選人員名單，這個名單絕大部分由高二年級的同學組成。此事在我們高三年級引起很大震動，一向以老大自居的我們，自尊心受到傷害，一致表示學校提出的候選人員名單不全面、不公平，提出要以高三年級同學為主組成學生會。經過醞釀，擬出了一個以高三年級同學為主的候選人名單，並向校方提出要在全校範圍內參加競選。隨即，組成了競選班子，到全校各年級特別是初中各年級中發表競選演說，鼓動他們選高三年級同學組成學生會，還張貼標語，敲鑼打鼓，大造聲勢。初中部同學為配合我們，從宿舍的窗戶伸出被單，在被單上貼上大字，幾個窗口組成

一個‘選舉×××’的大標語。結果，高三年級提出的名單獲勝，把學校原來的部署打亂了。”（《羊腰灣弦歌》第22頁，私立無錫中學49/50屆高中同學會編印，2005年1月）這一段敘述完全失實。第一，當時成立的是“學生自治會”，不是“學生會”。無錫市學聯成立，暑假以後，才將“學生自治會”改為“學生會”。第二，學生自治會的選舉不是校方主持的，說是校方“公佈了學生會候選人員名單”，純屬子虛烏有；還說“把學校原來的部署打亂了”，只是自己的想象，學校原來就沒有部署。候選人名單是由各班提名產生的。第三，這次選舉也不是“成立學生會”，而是重新選舉。無錫解放前，1949年4月10日左右，私立無錫中學學生自治會已經成立，在領導應變活動中樹立了威信。5月的重新選舉，還是由學生自治會主持的。高三年級作為“老大”，臨危時刻走得一個都不剩，這時，又來“爭當老大”了。

5，劉靖圻《有關童有儲老師三、四事》，《羊腰灣弦歌》，私立無錫中學49/50屆高中同學會編印，2005年1月。

6，陸大福（拂為）在他的回憶文章中說：“無錫解放後，私錫中成立了一個當時不公開的新青團（共青團）支部。支部書記郭羅基，我任組織委員。”（《羊腰灣弦歌》第4頁，私立無錫中學49/50屆高中同學會編印，2005年1月）發展團員、成立新青團支部，都是陸大福“北上”以後的事。暑假中，所有的團員參加了在省錫師舉辦的團訓班。陸大福不是團員，也沒有參加團訓班，更不可能是“組織委員”。私錫中團支部的第一任組織委員是王國增。

（本文圖片均由郭羅基提供）

胡喬木坐下後，首先對吳祖光說：“我來是奉命執行一項任務，這是經過慎重研究，由我來看你最為恰當。時間很短，不和你辯論”。“根據這些問題，你不適合做一個共產黨員。因此中紀委決定勸你退黨”

啼笑皆非進出黨

——胡喬木勸吳祖光退黨記

胡與吳曾有一日之雅

1986年8月1日上午，耄耋之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胡喬木，雖有大量重要工作等待他處理，卻仍然首先去到劇作家吳祖光的家中，進行不平常的拜訪。

吳祖光與胡喬木曾有過一日之雅，1985年，胡喬木親筆修書給吳祖光，表達“建交”之意，愛才之心；不久，又親自來到這座普通樓宇，吃力地爬上四層，拜訪吳祖光和新鳳霞夫婦，以顯示其廣交朋友、廣結善緣之誠。他與兩位文藝家親切交談，頻頻叮囑今後有事多聯繫。他稱讚新鳳霞的回憶錄寫得好，並說：“如果你讓我當編輯，我會把你的文字修飾得更漂亮”。這位中共中央理論權威、知識分子問題專家的來訪，曾經使兩位文藝家受寵若驚，而老人的熱情、坦率和平易近人，更給他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年後胡去吳家不是交友而是絕緣

1987年“八一”這天，時鐘指向八點，門鈴就響了。吳祖光親自開門熱誠迎進胡喬木。卻只見這位老人態度嚴肅，完全不似前次來訪時的滿面春風，還迫不及待地請新鳳霞來客廳一起座談。氣氛雖然有點異常，但他二人誰也沒有想到：這位中共理論權威是為宣告吳的所謂三條“反黨言論罪行”而來的。胡喬木坐下後，首先對吳祖光說：“我來是奉命執行一項



胡喬木

任務，這是經過慎重研究，由我來看你最為恰當。時間很短，不和你辯論”。接著他打開皮包，取出一份文件，開始嚴肅地宣讀起來。文件指出吳祖光從五十年代就“反對黨的領導”，並列舉了吳祖光的三條“反黨言論”：

1, 1980 年吳祖光入黨後接見新聞記者時說：“入黨使我啼笑皆非”；

2, 1982 年，反對精神污染期間，吳祖光說：“反對精神污染是一場居心把國家搞亂的瞎胡鬧”；

3, 1986 年吳祖光在《羊城晚報》上發表題為《理應取消



吳祖光

戲劇審查制度》的文章中說：“誰有權，誰就可以決定一個作品的生死命運，這種現象是可笑多餘的。”“這種制度是完全繼承了過去腐爛沒落、瀕臨死亡的國民黨的腐朽傳統”。

胡喬木接著對吳祖光說：“根據這些問題，你不適合做一個共產黨員。因此中紀委決定勸你退黨”。

“這種話你是絕對說得出來”

前一天，有人轉告：“喬木說他明天要去看你，廣結善緣”，吳祖光以為還是像上次一樣來交友談心的，因此對此一點思想準備都沒有。當胡喬木宣讀他的“反黨言論”時，他幾次插話

想說明文件列舉的這幾條，或者烏有，或斷章取義，但都被胡喬木申明“今天我們不辯論”而阻止住了。

最後他仍堅持澄清自己從未說過“入黨使我啼笑皆非”的話，並希望知道此話的出處。胡喬木回答：“是香港雜誌上說的”。吳祖光說：“半個月前就有人問過我這句話，我當時不知道是從什麼地方傳出來的。今天聽你說，才知道來自香港……”胡喬木說：“這要查一查，我也不大清楚香港的雜誌可能沒有什麼根據”。

但他立即又說：“這句話儘管你可能沒說過，但這種話你絕對說得出來。你這個人呀，一向說話隨便，什麼話你都說得出來的，你就是說得太多，言多必失。”

接著問：“是什麼人介紹你入黨的？是否有的去世了？”吳祖光回答：“都活著，一是周巍峙同志，一是夏衍同志”。胡喬木說：“這樣的同志要受批評。因為你不夠共產黨員的條件，卻讓你入黨。當然，你也可以有不同的意見。不過，這個決定是對內的。你退黨後，一切照舊，你還是作家，你還是享有一切已有的社會職務和待遇。方勵之我們還同意他出國嘛！當然，不宣佈，遲早人們也會知道。如果你不接受勸退，那就開除出黨”。

吳為免再起風波而退黨

吳祖光開始意識到：面對這位老人已不是去年來訪的可

以談心的朋友，現在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在和他談話。他不能不認真思考；如果我堅持不退，公開開除可能又會引起一場政治風波，那又要影響黨的信譽。因為中共中央四號文件明確說過：只開除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三個，不再處理他人。而且半個月前（7月16日），也就是這位政治局委員，在中宣部長王忍之、副部長王維澄、文化部長王蒙、廣播電影電視部長艾知生、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李煥之、中國文聯黨組書記、中央音樂學院院長吳祖強等負責幹部座談音樂問題的會上，還一再強調：“有人議論我們還將處理一些人，哪有這回事哩！就開除三個人嘛！誰還聽說有第四個？那一頁已經翻過去了。至於有人說過錯話，那有什麼關係呢？說錯了以後不說了就是了”。這一席話已在文藝界傳開，知識界的緊張空氣開始逐漸緩解。

可是，時隔半月，胡喬木竟親自來宣佈勸他退黨，在而且還說：“這次勸退，不止你一人，還有別人”。如果自己堅持不退，公開開除，肯定會引起黨內思想混亂，不如悄悄退了，可以維護黨的信譽。於是，吳祖光略加考慮，便作出如下回答：“因為是你喬木同志親自來勸我退黨，我很感動，所以我決定接受。”而這裏他內心所想的是：他不願做新聞人物，不願捲入一場政治風波中去，不願再製造混亂，只希望國家安定團結，希望改革順利進行，特別希望他的接受退黨，有助於黨不再失言於民。

“你對祖光愛護多於幫助”

一直沈默的新鳳霞這時忽然請問胡喬木：“我呢？我是不是也要退黨呢？”胡喬木安撫道：“怎麼能要你退黨呢？那不是又成了封建株連了嗎？你是好黨員，你為黨做很多工作，但你對祖光愛護多，而幫助不夠啊！”可是，新鳳霞真想告訴她心目中十分尊敬的這位中央領導人：“如果說我為黨做了許多工作，那確實是與祖光對我的幫助分不開的啊！”

當胡喬木歷數祖光的“反黨”言論，指出祖光不夠共產黨員條件時，新鳳霞聽著聽著心潮翻滾，往事出現在腦海之中。

——1949年冬，北京剛剛解放不久，周恩來總理在北京飯店舉行招待會，文藝界名流聚集一堂。當時還在天橋唱戲的青年評劇演員新鳳霞也應邀出席。她坐在剛從香港回來的老舍、夏衍等名作家旁邊，聽到周總理關切地問夏衍：“吳祖光同志回來了？”夏衍回答：“回來了”。總理說：“很好！這位黨外神童作家過去做的工作，不比我們黨員作家少啊！”這是新鳳霞第一次聽到“吳祖光”的名字，而且是聽敬愛的周總理親口讚揚的這個名字，因此深深印記在心中。後來老舍先生介紹她認識了吳祖光，由相互敬慕而產生愛情，終於締結良緣。周總理十分讚美他們的結合，並關心地对吳祖光說：“你要幫助鳳霞學文化啊！”正是在祖光的幫助下，她才從一個文盲演員提高到今天能創作出版上百萬字的回憶錄，成為中國作家協會第一個——也可能是最後一個民間藝人的會員，受到廣大

讀者的好評，也曾受到胡喬木的熱情誇獎啊！

夫婦曾捐贈文物與行頭

——她從六歲開始演戲、唱戲，挨了多少打，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淚，終於成名，並用血汗錢積攢了價值高昂的兩箱行頭（戲衣）。1951年她參軍後，是祖光勸她把自己的行頭捐獻給國家劇團。祖光說：“你參軍了，仍私有行頭，還像個革命軍人嗎？”她雖然捨不得，卻聽信祖光，將全部行頭捐獻給國家了；她母親埋怨女兒聽信女婿，把一所房子的錢都捐掉了。

——1955年，祖光說服父母，把家中父親珍藏的大批價值連城的古董、文物捐獻給國家。故宮博物院曾在一篇介紹建國以來社會捐獻文物情況的文章裏，高度評價吳氏的捐獻均屬一級文物。當1957年吳祖光被打成右派，遣送北大荒勞改時，母親埋怨說：“你這樣愛黨，卻被打成右派”。祖光：“這是兩碼事。捐獻文物沒有錯。”

慷慨答應無私捐獻私宅

——十年浩劫期間，她和祖光都被趕出自己位於帥府園馬家弄九號的四合院住宅。這所住宅擁有18間寬敞的住房和別致的庭院，是祖光當年從香港回來後，為了結婚、生子而用多年積蓄的全部外匯向私人購買的。祖光在庭院中親手栽



吳祖光與新鳳霞 1956 年於馬家廟家中。

植了許多樹木花草。“文革”開始，他們被造反派掃地出門後，這所住宅搬進了五家人家。1979 年中央落實知識分子政策，許多文藝家的私宅都是修繕一新，退回給本人了。唯獨吳祖光的私宅，政府要將五家人全部遷走，需要許多單元房交換，困難很大。有關負責人來向祖光求助，請他體諒幫助時，祖光想到自己應該為黨排憂解難，便慷慨答應將自己的私宅無私捐助。儘管鳳霞不願意，她哭了，因為她受到過傷害，行動不便，需住平房。但祖光仍然心目中只有黨，硬是說服妻子，將這座私宅捐獻給黨了。他背著妻子爬上四層樓，在目前這套普通單元居室中重新安了家。

他的毛病是愛直言不諱

——祖光四十年代初期就跟著共產黨，他為抗日、為民主、為解放，為黨做了不少工作，這是周恩來親口說的。他是對黨有功的人，而且一直追求進步，維護黨的榮譽。1980年吸收他入黨是應該的，相信周總理在天之靈聽了也會高興的。幾十年的共同生活，她最瞭解祖光一生輕財重義。他的毛病就是愛直言不諱。遇上有損黨的形象，危害黨利益的事，他必挺身捍衛；對黨的工作中出現的一些問題，他直言批評，也是“春秋責備賢者”。他是一個好黨員。即使說錯了話，黨也應該首先幫助、教育，怎麼能憑一些無中生有、斷章取義的言論，使要勸他退黨呢？黨為什麼不瞭解自己的演員，這樣不珍惜自己的力量呢？

——祖光總是把黨的利益擺在第一位！現在勸他退黨，他首先考慮的，不是怎樣維護黨的信譽，不要損害黨的形象。黨籍，對當領導的人不詳，可能是很重要的，不是黨員不行。對祖光，退黨對他個人並沒有什麼損失。他是作家，讀者看他的作品，是看內容和文采，不是看他是否黨員。祖光這樣的好黨員退黨，對他個人沒有損失，對黨卻是很大的損失。

新鳳霞默默地回憶著、思索著，漸漸臉色蒼白，心臟開始絞痛，手腳逐漸冰涼……經過及時搶救，才恢復過來。她無比悔恨：在喬木同志面前，我為什麼不能為祖光說一句公道話

呢？

“退黨，真使我啼笑皆非了”

吳祖光在同意退黨之後，特意找出中共十二大 1982 年 9 月 6 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作最後一次學習。其中《黨員》一章第三條規定黨員義務之一：“對黨忠誠老實，言行一致，不隱瞞自己的政治觀點，不歪曲事實真相，切實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勇於糾正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支持好人好事，反對壞人壞事”。吳祖光捫心自問：無愧。接著他往下讀到《黨員》第九條規定：“黨員缺乏革命意志，不履行黨員義務，不符合黨員條件，經多次教育仍無轉變的，應該勸他退黨。勸黨員退黨應當經過支部大會討論決定，並報上級黨組織批准”。這一點使他感到茫然了。他所在的文化部藝術局剛剛有同志來電話，對中央政治局委員親自去勸一個基層黨員退黨的行為，感到很不正常。而且藝術局黨支部從未討論過這個問題。

8 月 2 日，文化部黨委的代表才來通知吳祖光：中紀委決定勸他退黨。可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胡喬木早已捷足先登了。

吳祖光不禁苦笑。過去，他確實不曾說過“入黨使我啼笑皆非”的話。可現在，他真想說：“退黨，真使我啼笑皆非了”。

（潘狄）■

當鄧小平伸出右腳踢倒“凡是派”、踏上了中共實權的最高階梯後，突然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把左腿一蹬，將支持他打破僵化保守的排頭兵踢了個人仰馬翻

鄧小平如何戰勝華國鋒

歷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終於結束了。沉重的一頁歷史翻過去了。

逮捕“四人幫”後，葉劍英就提出，應該讓鄧小平趕快出來工作，葉劍英還把鄧小平一家接到西山居住。這時，鄧小平已經解除了“軟禁”，可以自由行動。深秋的一天，鄧小平從西山進城到 301 醫院看望劉伯承。正巧這一天華國鋒也到 301 醫院看望劉伯承。鄧小平對華國鋒說：“我作為一個‘走資派’，對於已經發生的事感到非常高興，我是完全支持你的。”劉伯承對華國鋒提出一個要求，說自己久病不起、來日無多，希望死後由鄧小平來主持他的追悼會。華國鋒沒有直接回答劉



“文革”結束後的“兩主席像”力圖證明華國鋒是毛澤東選定的“英明領袖”。

伯承的要求，只是說；“小平同志一點也沒有減少活力啊。”然而，這次偶然的會見，使華國鋒形成了“兩個凡是”的想法。

鄧小平：“兩個凡是”不行

華國鋒和他周圍的人一直在用毛澤東作其權力合法性的辯護士。他們極力向社會顯示，握有毛的全部“指示”，同時擁有隨時發放毛指示和解釋毛指示的權力。他們要社會認同的是毛澤東的指示就是真理；他們竭盡全力所做的是宣傳毛澤東指示的神聖性和無庸置疑性。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發表了題為《學好文件抓好綱》的社論。公開提出“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3月10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華國鋒在講話中說，“中央對於解決鄧小平的問題和關於天安門事件問題，是堅決地站在維護毛主席的偉大旗幟這個根本立足點上的，如果不這樣做，就會發生有損我們旗幟的問題。“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如果不這樣看，就會有損我們的旗幟。”他強調，“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要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

華國鋒等人反復宣傳“兩個凡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因素是遏制鄧小平這個最大的權力威脅者的復出。

陳雲、王震都可算是毛澤東的同代人。毛死後，他們老資格老革命的地位尤現突出，遠遠超過華國鋒。如今，他們屈居於華國鋒、汪東興之下，特別是汪，在他們眼裏，或許不過是中央首長的高級侍從，是難以忍受的。

可是，要動搖華國鋒業已確立的地位，得到自己渴求的利益也並不那麼容易。這需要搬出一個有影響力的鐵腕人物。這個人要有和他們相關的利益，要有足夠的與華國鋒對抗的謀略和勇氣，才能幫助他們擺脫心理上難以承受的遭挾制的“屈辱”。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非鄧小平莫屬。

“四人幫”垮台後不久，鄧小平曾明確表態堅決擁護華國鋒作中共最高領導人，以為日後爭取東山再起留下方便之門，但是，換來的卻是華對鄧復出的百般阻撓，這又增加了鄧對華的不屑。

鄧小平和陳雲、王震有相似的背景和經歷，有共同的利益，他們之間至少達成了某種默契。於是，陳、王等人利用社會上民眾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和鄧小平平反的激烈情緒和行動，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與華國鋒唱了一齣對台戲。

他們在會上說，為了中國革命，黨的事業需要，讓鄧小平重新參加中央領導工作是完全正確的、必要的。現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熱切希望鄧小平早日出來參加領導工作。他們還說，應當查一查“四人幫”在“天安門事件”上的詭計。“天安門事件”是我們民族的驕傲，是全黨全國人民階級鬥爭覺悟大提高的集中表現。誰不承認“天安門事件”的本質與主流，實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華國鋒戰勝了“四人幫”，敗給了鄧小平。

際上就是替“四人幫”辯護。

華國鋒所代表的利益集團明白，鄧小平出來工作產生的連鎖反應會是什麼。於是，利用手中的權力，不允許陳雲、王震的發言刊登在會議簡報上。然而，在會內會外的壓力下，也不得不說，要“在適當的時機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群眾在清明節到天安門去表示自己對周總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

鄧小平知道陳雲、王震的講話在中共高層及社會民眾間均產生了巨大的迴響。也清楚華國鋒、汪東興等人對他的態度。他必須抓緊時機，抓住華國鋒的把柄，迫使華迅速作出讓步。

4月10日，鄧小平給華國鋒、葉劍英和中共中央寫了一封信，針對“兩個凡是”指出，“我們必須世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

5月3日，中共中央轉發了鄧小平的信，肯定了鄧的意見。實際上增加了在鄧的復出問題上給予華國鋒的壓力。同時，向全黨全民顯示，鄧小平重新開始活動了。

鄧小平在4月10日的信上並沒有直接提到“兩個凡是”，這是他的高明。當試探汽球發出去並得到了預期效果後，鄧小平便公開了對“兩個凡是”的態度。在中共中央辦公廳兩位負責人看望他時，鄧很明確地說，“兩個凡是”不行。對於華國鋒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對鄧小平問題上和“天安門事件”的無奈讓步，鄧針鋒相對地說，“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1976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

5月24日，鄧小平又說，“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列主義，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都沒有說過他們說的做的都絕對正確，不能改變。他認為，“毛澤東思想是個思想體系”，必須完整地準確地理解它應用它。他強調，“毛澤東同

志說，他自己也犯過錯誤”，“一個人講的每句話都對，一個人絕對正確，沒有這回事情”。

鄧小平用所謂毛澤東自己的話來批駁“兩個凡是”；也是對華國鋒說，你更會犯錯誤。同時，為他今後變通毛澤東思想埋下伏筆。在大力推行毛澤東個人崇拜的社會環境下，鄧小平能突破毛澤東的話句句是真理的僵化教條，確實為老百姓的思想解放拓展了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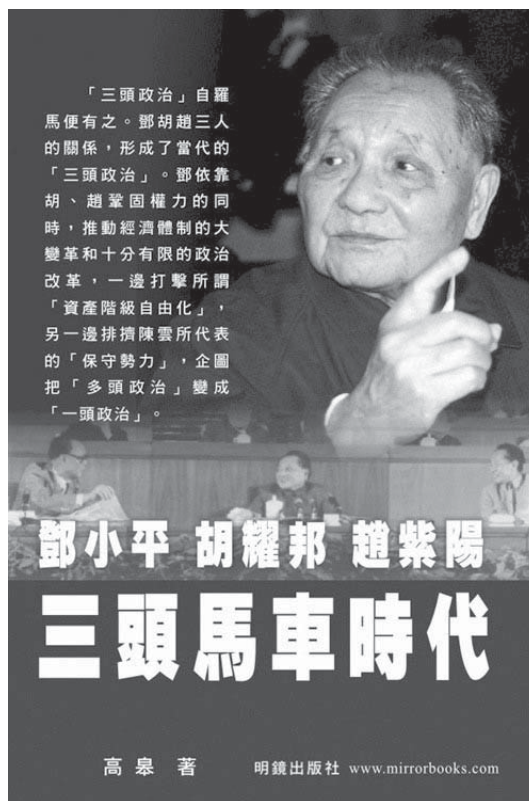
以毛之矛，攻華之盾

鄧小平就“兩個凡是”與華國鋒擺開的陣勢，不僅代表了因為受“文化大革命”打擊而未能完全復蘇的老一代高官的利益，為他們奪回文革前的榮耀和地位，甚而再往上踏幾步創造機會，同時，也讓他們看出，鄧小平確實是政治高手，只有推出他來與華國鋒抗衡，才能取得勝利。

鄧小平復出的問題成了華與鄧各自代表的利益集團之間爭鬥的焦點。

華國鋒固守“兩個凡是”的陣地。利用手中握有的權力和輿論工具，宣傳毛澤東，也宣傳他自己。但在中共內部和整個社會壓力的威逼下，華國鋒不得不迅速作出讓步。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中央十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議不僅通過了《關於追認華國鋒同志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決議》，《關



本文作者著有《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三頭馬車時代》。（明鏡出版社）

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的決議》和《關於提前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而且通過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鄧小平重新擔任了中國共產黨的副主席、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參謀長。

鄧小平在 7 月 21 日作了題為《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的講話。他說，“要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作指導”，“要對毛澤東思想有一個完整的準確的認識，要善於學

習、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體系”，“不能夠只從個別詞句來理解毛澤東思想，必須從毛澤東思想的整個體系去獲得正確的理解”，批評“四人幫”“歪曲篡改毛澤東思想”，“引用毛澤東同志的某些片言隻語來騙人、嚇唬人”。指出，“毛澤東倡導的作風，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這兩條是最根本的東西”，“特別重要”。

鄧小平在此特別強調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當時，老百姓普遍期盼鄧小平全面恢復工作，如是，當然就是走群眾路線了；而強調實事求是，則理當改正在處理“天安門事件”時，加在鄧小平身上的不實之詞。

鄧小平對華國鋒步步為營的策略在十屆三中全會上已見端倪。緊接著召開的十一大則正式宣告鄧小平權力回升。

十一大是 1977 年 8 月 12 日至 18 日召開的。會上，華國鋒當選為中共中央主席，鄧小平則與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一起當選為副主席。鄧小平在致閉幕詞時不得不說：“我們這次代表大會，在英明領袖華國鋒同志主持下，在以華主席為首的大會主席團的正確領導下”召開了，經過全體代表的共同努力，“一致通過了華主席的政治報告”，“選出了新的中央委員，圓滿地完成了我們的莊嚴任務”。但是，他在講話中強調，應當創造一種毛澤東所倡導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氣氛，應當堅持“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為他日後繼續與華國鋒抗爭埋下伏筆。

此後，鄧小平作為政治老人的總代表，越來越多地左右著

整個政局。雖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報紙、電視、廣播中表現出來的是華國鋒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但他的權力卻在暗中一點一點地被鄧小平蠶食。

“實踐法庭”的裁決

1976年4月5日，“天安門事件”被鎮壓下去後兩天，政治局通過了“兩個決議”，任命華國鋒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撤銷了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只要“天安門事件”不翻案，鄧小平就不可能取代華國鋒掌握最高權力。

自從鄧小平1977年7月復職後，人們要求平反“天安門事件”的情緒更加強烈。中共高層中與鄧小平利益相關的人，亦利用“天安門事件”作為鞏固自己權力和地位的籌碼。官民之間，相輔相成，共同向華國鋒一夥施壓。

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前夕，葉劍英幾次向華國鋒、汪東興提出“天安門事件”應該平反。華、汪認為“天安門事件”是毛澤東定的性，不能改。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王震分別在小組會上，提出為鄧小平和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問題。華國鋒在會上明確說：“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定的。凡是毛主席決定的東西，我們不執行，還談得上繼承毛主席的遺志嗎？”

同年9月新復刊的《中國青年》雜誌刊登了“天安門事件”的詩詞和韓志雄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文章。9月14日，

《光明日報》用了近三大版的篇幅，刊登了一篇文章《宗教·理性·實踐》。這是全國性的報紙最早公開為“天安門事件”翻案的文章。文章的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嚴家其。嚴家其以《光明日報》記者的身份，以跨越時空的“哲學幻想小說”的形式，訪問了十七世紀義大利的“宗教法庭”、十八世紀法國的“理性法庭”和未來中國的“實踐法庭”。這篇文章借“實踐法庭”法官的口，對“天安門四五運動”進行了熱情的讚頌。文章說：“當四人幫用‘宗教法庭’對人民的革命行動進行判決的時候，人民卻用‘實踐法庭’最終宣判了四人幫的死刑！”這篇幻想小說還談到，記者在法官 42 層樓辦公室的陽台上，看到了在人民大會堂附近的正義路，有一個“巨型薄殼結構建築物”，後來在人民大會堂附近建造的“鳥蛋”，竟然正是“巨型薄殼結構建築物”。

1978 年 11 月 10 日，又一次中央工作會議在京西賓館開幕。第二天，進行分組討論，譚震林、傅崇碧、李昌、陳再道提出要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第三天，陳雲在小組會發言中提出了“六個歷史遺留問題”，其中就包括“天安門事件”問題。呂正操等也在小組會上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

在陳雲發言後一兩天內，在葉劍英的推動下，華國鋒直接向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林乎加佈置，中共北京市委在常委擴大會議上宣佈：

“1976 年清明節，廣大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沉痛悼念敬愛的周總理，憤怒聲討‘四人幫’，完全是革命行動。對於因悼念

周總理，反對‘四人幫’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復名譽。”

15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為宣佈“天安門事件”平反作輿論準備。

16日，《人民日報》公佈了北京市委有關為《天安門事件》受害者平反的決議。

次日，《人民日報》又報導了北京市公安局宣佈為388位因參加“天安門事件”被捕的人平反。稱這些人中沒有一個反革命分子，應給予徹底平反，恢復名譽。但實際上，以各種藉口給很多人留了尾巴。不過，無論如何，畢竟對“天安門事件”的性質給予了公開的正面的肯定，使許多人憋悶在胸中兩年多的那口冤氣，終於吐了出來。

同時，中共江蘇省委常委作出決議，稱“南京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對參與者一律平反，恢復名譽，銷毀所有材料。

配合為“天安門事件”受害者平反的宣傳，上海宗福先創作的反映“四五運動”的話劇《於無聲處》在上海演出後，於11月15日開始，在北京公演，引起了巨大反響。

《人民日報》還在11月17日刊登了，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中文教研室以童懷周為名主編的《天安門詩抄》前言《革命人民的吶喊》，並選刊了天安門詩文。

在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過程中，《人民日報》社副總編輯王若水領導一批中青年記者、編輯為澄清事實真相，作了大量工作。11月21、22日，《人民日報》連載了由王永安等人撰

寫，署名本報記者的長文《天安門事件真相——把“四人幫”利用人民日報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贏得了讀者巨大共鳴。

1978年11月25日，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代表中央宣佈：“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眾運動，應該為天安門事件公開徹底平反”。

一直為平反“天安門事件”奔走呼號的人，把他們的勞動成果奉獻給了社會：1979年初，吳鵬、王正義、嚴家其等編輯的大型照片集《人民的悼念》出版了；繼之，《天安門詩抄》（童懷周編）、《天安門詩文選》、《心碑》出版了；記敘“天安門事件”的書籍《四五運動記實》（嚴家其、劉長林、李惠國、樂文華等六人著）、《偉大的四五運動》（陳子明、王軍濤等著）也出版了。

青年團中央還組織了“天安門事件”宣講團，由“天安門事件”參與者在全國各地進行宣講。

鄧小平政壇作秀

真理標準討論和平反冤假錯案等一系列向華國鋒、汪東興的挑戰，前線指揮是胡耀邦，後面掌舵的卻是鄧小平。胡耀邦取得的一個一個戰役的勝利，讓鄧小平在與“凡是派”的爭鬥中占盡上風，聲譽也越來越高。

鄧小平在中共政局中的地位非常微妙。他在華國鋒之下，但是，從上到下絕大多數人都把他視為老大。鄧小平在政治



同席異夢。左起：汪東興，鄧小平，華國鋒，葉劍英。

遊戲中，又必須表現出甘居華國鋒之下且無意超越。

為此，鄧小平聲言願意抓科技教育，甚至在全國科學大會上公然宣稱“我願意當大家的後勤部長”。後勤部當然不是龍頭，何況是科技教育。他自封了這個後勤部長，便可以名正言順地為知識份子說話。鄧小平太清楚了，雖然“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但是，知識份子的最大能耐就是製造輿論，贏得知識份子，便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贏得輿論。

鄧小平還在 1978 年春召開的五屆政協第一次會議上接受了政協主席的職務。誰都知道，政協牌位雖大，責權卻虛。其高層職位只不過是一種榮譽名銜，用以安撫那些正在退出最高權力圈的大佬。鄧小平所以接受這個職位，是要讓人們感到，他已無心在最高權力圈中角逐；實際上卻可以利用這個帶有濃郁名望色彩的位置，從事廣泛的社會活動，提高知名度，

擴大影響力，為取代華國鋒打樁腳。

鄧小平窺探華國鋒實權的意志從來沒有動搖過。在權力角鬥場上，他又必須時時為這種勃勃雄心做掩飾，以待時機。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他被華國鋒任命為12個副總理之一。為了表示對華國鋒的尊重，鄧小平在公開場合多次表示他與華“對每一件事情都總是完全一致”的，他不願意當總理，因為“總理這個工作，對我的年齡來說不太合適，那是很繁重的工作。年輕的才能勝任”。他的講話明裏暗裏都似乎在袒護華國鋒派系的人，使他的對手感覺到，鄧小平是在維護領導集團的穩定，是顧全大局的。暗地裏鄧小平卻不斷對華國鋒使絆子，不僅在國內而且在國際事務上，釜底抽薪。

借助民意當鍾馗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是為隨即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準備，更是元老派決心與“凡是派”亮劍的生死較量。

這時，鄧小平代表元老們出頭就“兩個凡是”與華國鋒為代表的僵化派交鋒，業已進行了1年又7個月；大規模開展的真理標準討論也進行了整整半年；全國性的民主牆活動在鄧小平和胡耀邦支持下正如火如荼。華國鋒被元老派和社會聲勢步步緊逼，只能負隅頑抗，這“一隅”便是毛澤東。只是，即

使華國鋒有再大的靠山，亦玩不過老鄧。

鄧小平把握著政治脈搏，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提議，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作為工作會議的主要議題。這樣的議題，既不違背華國鋒一派的意願，從表面看，亦不摻雜派系鬥爭的意念，因而獲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通過。

鹿死誰手，就要看會議的操縱權掌握在誰人手中。

汪東興是會議的秘書長，直接領導會議文件起草小組的工作。會議的主要文件，包括華國鋒、葉劍英的講稿和會議決議均在會前就準備妥當了。



七十年代末的西單“民主牆”，影響到中共高層角力。

共產黨開會，往往是誰主持籌備會議和起草決議，誰就能主導會議方向。這次會議的主動權本是穩操在“凡是派”手中的。鄧小平另有計謀。他倚重胡耀邦與華國鋒分庭抗禮。不過，這牌玩得非常非常老道。

胡耀邦徵得華國鋒的同意，舉薦了一些思想開放、志同道合、在突破僵化教條中起作用的著名知識份子領導幹部，諸如周揚、胡績偉、李昌、于光遠、秦川、楊西光等人參加會議，欲借他們的敢言，給“凡是派”施加壓力。

此時，街頭民主活動正在蜂起，民主牆得到廣大民眾的心靈呼應，成為一種強大的社會力量。“得民心者得天下”。關鍵時刻，鄧小平一派需要民意。鑒於此，胡耀邦通過中共中央黨校、新聞機構、共青團等管道，不斷地把民主牆的情況，採用簡報形式反映到會上。簡報可是大有學問。採編的角度、語氣、用詞都影響簡報的作用。由胡耀邦主導的民主牆簡報，當然是要扭轉華國鋒、汪東興等既定的會議方向。

民主牆上反映的大量歷史積案和現實問題吸引著與會者的眼球。而所有重大的歷史冤案都脫不了與毛澤東的干係。人人心知肚明。華國鋒背靠的那個牆角在隱隱約約地搖動著。

元老派開始動作了。

會議召開後不久，胡耀邦組織班子為葉劍英起草講話稿，為的是推翻汪東興早已為之準備好的演講稿。而鄧小平講稿的起草工作也由胡耀邦主導。不過都是在有意避開汪東興等的視線下進行著。

11 月底，鄧小平利用會見外賓和外國記者的機會，表示對民主牆的公開支持，還有意識地將會議動向透露出去。通過媒體和民主牆的廣泛宣傳後，街談巷議的影響力又反過來作用於會議。

會間，陳雲在東北組發言，圍繞著工作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這一中心議題提出，發展安定團結才是保證工作重點順利轉移的關鍵。而要保證安定團結，必須面對“文化大革命”中遺留下來的一大批重大問題和歷史上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為此，他要求解決“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以及陶鑄和彭德懷問題；認為“天安門事件”是一次偉大的群眾運動；提出應當對康生進行批判。針對當時經濟工作中急於求成的作風，陳雲提出，經濟工作要從國情出發，克服“左”的思想影響。

會上，還有很多人提出重新評價“文化大革命”中已定性的“一月風暴”“二月逆流”“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等一系列要案。

葉劍英的講話強調在黨的組織工作中，必須健全民主集中制，選好領導班子；胡耀邦提出要徹底平反冤假錯案，放手恢復老幹部工作；胡喬木就少宣傳個人問題作了發揮。所有這些都是針對華國鋒和汪東興一班人，並為老幹部重掌實權鳴鑼開道。

會上，對華國鋒、汪東興等人近兩年工作中堅持“兩個凡是”，繼續犯“左傾”錯誤並造成的工作失誤進行了批評。

會風全轉了。

■ 鄧小平的右腳和左腿

中
共
高
層
恩
怨

中共中央政治局明確表示，“天安門事件”、“反擊右傾翻案風”，薄一波、彭德懷、陶鑄、楊尚昆等人的問題，都是過去處理錯了的案件，應當實事求是地予以糾正；對於康生、謝富治，應當揭發批判；關於地方性重大事件，由省市自治區黨委實事求是地進行處理。

■ 12月13日的閉幕會上，鄧小平作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演講，既是工作會議的總結報告，又是隨即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導向。鄧小平首先批評當時許多幹部還處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狀態”，造成“許多重大問題往往是一兩個人說了算”的局面。不過他補充一句，“這並不是因為他們不是好同志”，“這種狀態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擺出一付對事不對人的高姿態。其實，通篇講話就是針對華國鋒和汪東興的。他講了真理標準討論的重要性，講了“當前這個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要創造民主的條件”，“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他支持群眾的街頭民主活動，認為有人“想利用民主鬧一點事，也沒有什麼可怕的”，“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對於冤假錯案，他認為“凡是過去搞錯了的東西，統統應該改正”。他亦講到法制問題、經濟問題，並提出允許一部分人“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

些，生活先好起來”。

歷時一個多月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以華國鋒、汪東興籌備主持開始，卻以元老派穩操勝券而結束。

1978年12月8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

會議期間，對華國鋒、汪東興等人堅持“兩個凡是”的錯誤進行了無情地批判。決定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對於權力過分集中的經濟管理體制著手進行改革並發展同世界各國的經濟合作；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全會還審查了一大批歷史遺留問題，改正了對彭德懷、陶鑄、薄一波、楊尚昆等人所做過的結論，為“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平反，撤銷中共中央發出的有關“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和“天安門事件”的文件，為鄧小平和“四五運動”正式平反。

全會增選陳雲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副主席；鄧穎超、胡耀邦、王震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採取臨時措施增補黃克誠、宋任窮、胡喬木、習仲勳、王任重、黃火青、陳再道、韓光、周惠為中央委員。成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選舉陳雲為第一書記，鄧穎超為第二書記，胡耀邦為第三書記，黃克誠為常務書記，王鶴壽等為副書記並選出了中紀委的常委和委員。

全會對缺乏監督的專案審查幹部的方式進行了嚴厲批評，決定永遠廢止專案審查機構。解除了汪東興手中審查幹部的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華國鋒雖然仍端坐正中，卻已決定性地輸給了鄧小平。

權力。

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確定胡耀邦為中共中央秘書長，胡喬木、姚依林為副秘書長，處理日常工作。免去汪東興中央辦公廳主任的職務。事實上剝奪了汪東興掌管理論和宣傳工作的權力。

汪東興在解決“四人邦”問題時，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論資格閱歷、論智慧謀略他都不在華國鋒之下。他雖然非常明白，維護華國鋒權力偶像地位的重要性，但由於處在同一個權力層次中，故而難免不對華國鋒起了有形無形的鉗制作用。華國鋒需要汪東興式的支撐，又欲意擺脫汪東興對他的過多掣肘。他們陷進了可被分化的權力關係的泥沼中。作為政治盟友，同生死、共患難是殺出困境的唯一可能，即便這種可能微乎其微亦應當毫不動搖。可惜，華國鋒像幾乎所有處在他

那種地位的人一樣，在處理汪東興時，雖沒落井下石，卻也是見死不救。這裏有他的許多為難，以他的聰明才智傾其全部亦無力挽住狂瀾，但也有他自己的許多考慮，至少脫不了捨車馬保將帥之嫌。他或許還沒有完全理解權力夥伴的重要性。為此，他必將付出沉重的代價。

從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權力分配看，汪東興成了沒有實權徒有虛名的副主席。元老們各得其所，佔據了中共中央領導高位。表面上看，華國鋒的權力似乎沒有變化。會議公報仍把他高高捧著，但在新的權力架構中，他被進一步架空了。

鄧小平為了復出，發起與“凡是”派的論爭，他需要用民主這面旗幟攻擊政敵，公開表示支持街頭民主活動。然而，在不到4個月的時間內，當他伸出右腳踢倒“凡是派”、踏上了中共實權的最高階梯後，突然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把左腿一蹬，將支持他打破僵化保守的排頭兵踢了個人仰馬翻。

1979年12月初，在北京市委的威逼下，民主牆從繁華的西單，搬進了人煙稀少的月壇公園。初冬的北京，寒氣逼人，看似官方應允的“民主牆”，在颼颼寒風中飄蕩著零零落落殘破不全退了色的紙片，發出喳喳聲響，一片淒涼。

不讓華國鋒多露臉

從非議“兩個凡是”起，華國鋒一步步踏進了鄧小平為他設置的陷阱。使他面對強悍的鄧小平和一大批老謀深算，決

心扳倒他的對手。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個標誌，華國鋒的實際地位急轉直下，只是表面上還維持一種穩定。這是因為，經過“文化大革命”和大起大落的權力更迭，鄧小平一派如果操之過急，用突擊政變方式立即取代華國鋒，會使剛剛鎮定下來的老百姓一時無所適從，引發社會震撼；再者，華國鋒政權雖無大作為，卻也沒有做太多壞事，老百姓奚落他無能，卻又非深惡痛絕；加之，華國鋒承襲下來的政權有一大批“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凡是”思想非常頑固，需要時間分化；而鄧小平等人開創的改革又需要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因此，鄧小平派與華國鋒派的權力交接呈現出來的是一種犬齒交錯的漸進模式，只是主導權基本上掌控在鄧小平手上。

華國鋒接掌政權後，為了表明打倒“四人幫”的正確性，保持政權的穩定及合法性，被刻意美化與大肆吹捧，被奉之為“英明領袖”，他的標準像和毛澤東並列懸掛在所有公共場合，以顯示他合格的接班人及無可動搖的領袖地位，並且開動一切宣傳機器進行大規模宣傳，突顯他個人的權威位置。對“兩個凡是”的批判和真理標準討論雖然實質上矛頭對準的是華國鋒，但是，華國鋒地位表面上看並沒有多少改變。要扳倒他，首先要讓他在民眾的視線和感覺中減少甚至消失。

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少宣傳個人的決定。少宣傳個人，可以看作是對毛澤東崇拜造成的惡果的反省，符合共產黨宣稱的集體領導原則，看上去沒有什麼針對性，不過從黨派鬥爭的角度審視，它分明是直接針對華國鋒的。這是黨的決議，由黨

主席親口道出，個中滋味只有當事人最知道。

配合對決議的宣傳，輿論界大展拳腳，1979年3月1日《光明日報》發表了上萬字的長文《堅持少宣傳個人的方針》，從理論原則，歷史教訓和現實意義全面論述了這個問題。

又有人想出以節約為由，決定建國30周年慶祝活動不大搞。

誰都知道，大規模的群眾集會和對它的新聞報導是突出個人的最佳機會。三十是而立之年，是大年，經過“文化大革命”沉寂的一大批老幹部業已官復原職，甚而官進三階，按照中國人的習俗，本應轟轟烈烈、大張旗鼓地好好慶祝一番。如是，所有宣傳機器必定聚焦在黨主席兼國務院總理華國鋒身上。怎麼辦？以“把有限的錢用到最急需的地方”，“不要在這方面多花錢”作托詞，取消了天安門集會，亦即避免了一次華國鋒在公眾場合及所有媒體上顯示他地位和社會認同的機會。這對岌岌可危的華國鋒不免是雪上加霜。

為了體面地把華國鋒拉下馬，還須消除他在社會上已有的影響。

198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堅持“少宣傳個人”的幾個問題的指示》，要求報上要少宣傳領導人個人的沒有重要意義的活動和講話；減少在公共場所懸掛過多的毛澤東像，語錄和詩詞。鄧小平特別提到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文件”。接著，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在今後20至30年內，一律不掛現任中央領導人的像，以利肅清個人迷信。

作為黨主席的華國鋒只能遵守書記處的決定。為此，他給中共中央寫信提出，今後在公共場所不再懸掛他的像和題詞。

從少宣傳個人開始到華國鋒像和題詞在民眾視野中消失，以及他在重大國內外事務中作用的消退，為華國鋒徹底下台作了輿論和民心上的鋪墊。

鄧小平還須找出正當理由，亦即具體錯誤，才能“名正言順”地讓華國鋒就範，並讓老百姓心服口服。最冠冕堂皇的理由當然是在經濟上的冒進。一個一個的陳年老帳被翻了出來，華國鋒和他的一班人馬在經濟工作中的失誤受到公開強烈批評，所投射出的信息是，華國鋒沒有能力統管經濟工作。這便是人大五屆三次會議上，華國鋒被迫辭去總理職務以及國務院系統作重大人事調整的背景。

元老們窺視的決不僅僅是政府權力，他們更看重凌駕於政府之上的黨的權力，必須剝奪華國鋒仍佔據著的黨的最高權位，這需要從政治問題上下手。

華國鋒和江青一夥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竄升為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處理了“四人幫”後，他才躍居黨和政府的第一把手。可以說，他是“文化大革命”最大的受益者。雖說他與江青等人心不合，畢竟都是毛澤東選定的接班人，有某些相象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這就是可以被人抓住的把柄。鄧小平在批判“兩個凡是”時便說過，“他們基本上是林彪‘四人幫’那樣一種思想體系”，“他們打著擁護毛澤東同志的旗

幟，搞‘兩個凡是’，實際上是換個面貌來堅持林彪、‘四人幫’那一套。這些人大體上都是文化大革命中提起來的，是既得利益的。他們感到現在的一套對他們益處不大，所以對過去很留戀”，“他們一遇機會就會出來翻騰的”。

清算“文化大革命”，定罪“四人幫”便是給華國鋒的下馬威。

華國鋒的“一、二、三”

劉少奇是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最大靶子，江青等人直接參與定案，毛澤東最後拍板並寫進了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二中全會公報。儘管冤假錯案逐個平反，老幹部們紛紛東山再起，劉少奇家屬不停申訴，當局卻總用種種托詞延宕，始終沒有排上議事日程。政治需要時，轉機降臨。1980年2月召開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作出了為劉少奇平反的決定。隨後，追悼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當人們通過傳媒看見滿頭華髮的王光美面對丈夫的骨灰無奈而又淒悲的情景時，自然而然地激起對這場悲劇的元兇的憎恨，這憎恨被當局掌控的公共輿論導向“四人幫”，有意淡化毛澤東的關鍵作用。

作為“法制體現”的對“四人幫”的審判，在當權者看來已然水到渠成。經過王張江姚專案組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長達3年半審查的“林、江”案移送司法部門追究刑事責任，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協助進行偵查預審。



審判“四人幫”。

1980年9月底，五屆人大常務委員會第16次會議，決定成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檢察審判“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10名主犯，特別法庭的判決是終審判決。

11月2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正式起訴“林江集團”。林彪、江青怎麼談也不能算是一個集團，但鄧小平就是要把他們捆在一起。1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查了起訴書，決定受理此案，並將起訴書副本送交被告人。允許被告委託律師辯護。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開庭公審“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江騰蛟，並於1981年1月25日作出判決。在公開審理中，沒有觸及毛澤東和華國鋒，給

華國鋒留了大面子。

既然是要用審判林彪“四人幫”來壓華國鋒，外邊給了面子，裏面可就不客氣了。正值審判期間的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9次會議，討論華國鋒主持黨政工作中的問題，批評他在十一大前後提出一系列基本上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口號；從來沒有主動提出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的倡議；阻礙解放大批老幹部和平反冤假錯案；熱衷於製造和接受新的個人迷信；對前兩年經濟工作中的冒進和錯誤，負有重要責任。會議討論、批准向十一屆六中全會提出的人事更動方案，認為華國鋒已不適宜繼續擔任現有職務。

華國鋒以身體不好為理由，未全部到會。在會上，華國鋒就人事更動方案和《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討論稿）》表示態度說：“一反對、二保留、三不接受”。“拉倒大旗（指毛澤東思想的旗幟），我反對；胡耀邦同志任中央委員會主席，我保留；決議（討論稿）中說我在粉碎四人幫後的頭二年，指導思想犯了左傾錯誤，我不接受。”“我想不到、防不及，你們要顛倒一切。主席（指毛澤東）是英明的，是看到了你們要另搞一套，但不會想到你們會走得這麼遠、這麼徹底。”在會上，華國鋒受到了鄧小平、陳雲、葉劍英、胡耀邦、李德生、李先念的批評，華國鋒不得不表示要求辭去現任職務。會後，全國的宣傳機器以不點名的方式大肆鞭撻華國鋒，民眾間醜化他的傳聞不脛而走。仍頂在他頭上的頭銜形同虛設。華國鋒徹

底潰敗了。

鄧小平用右手擊潰華國鋒後，擔心的是他為審判“四人幫”一時放縱的來自右方的年輕人的力量。

1980年8月，廣州民刊《人民之路》的何求、王一飛策劃在廣州召開全國民刊代表會議。9月在廣州聯合成立了“中華全國民刊協會”並決定出版刊物《責任》，傅申奇任主編。曾經被迫停刊的一些刊物也嘗試復刊。年底，北京大學學生還草擬了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印刷發行法》（草案），廣泛徵集簽名支持，以期用法律為武器保護言論出版自由。以青年學子為主力的競選活動更是如火如荼。

俟華國鋒之事塵埃落定，鄧小平又要揮動左手握著的四根棍子了。恰在此時，波蘭人民奮起與共產黨和蘇聯的大規模抗爭事件影響到中共最高層，他們唯恐波蘭事件在中國重演。鄧小平手握棍子揮得更狠了。他在政治局工作會議結束的12月25日，作了題為《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的長篇講話。措詞強硬地說，一小撮唯恐天下不亂的人正在用“文化大革命”中的辦法進行煽動和鬧事，有些人甚至叫嚷什麼要進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階級鬥爭確實仍然存在，不可小看。必須加強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機器，堅決打擊和分化瓦解各種破壞安定團結的勢力。禁止不同單位之間，不同地區之間的串連，禁止非法組織的活動和非法刊物的印行，不能放縱他們，不能聽任他們胡作非為。堅持對各種敵對勢力、反革命分子、嚴重危害社會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實行專政，決不對他們心慈

手軟。

剛跨進下一個年頭，各大宣傳機器立即跟隨鄧小平的指揮棒發出聲響，指責民刊人士成立非法組織，出版非法刊物，不利於安定團結；要及時認真妥善處理新的歷史條件下滋生起來的不安定因素，對現行反革命子的活動要給予有力的打擊。198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處理非法刊物非法組織和有關問題的指示》。民刊人士紛紛中箭落馬。

《四五論壇》主編徐文立在1981年4月9日被捕，被判刑15年。參與人民代表競選的年輕人，在當局要防止青年學生“第三次造反”的思想指導下，亦遭到整肅。

鄧小平左右開弓，盡顯了他的強者風範，贏得了政壇上的勝利。在華國鋒派節節敗退中，鄧系人馬步步升遷。

鄧：趁我們在時解決接班問題

中共中央進行重大人事變更的序幕拉開了。

與華國鋒對抗的重要武器之一是發展經濟中的冒進問題。元老派將針對冒進的經濟調整擺在議事日程的首位，在無情鞭撻經濟發展中的失誤的同時，配合媒體的宣傳，在經濟工作中卓有成效的趙紫陽、萬里等人自然而然地成為受人矚目的領導人選。

作為人事調整的鋪墊，鄧小平在1979年9月的十一屆四中全會召開前夕講話說，“現在我們還沒有解決的問題是什



鄧小平一手安排胡耀邦、趙紫陽分管黨、政。

麼呢？是組織路線問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一個要什麼人接班的問題。”“要趁著我們在的時候解決這個問題”，“把那些表現好的同志用起來，培養幾年，親自看他們成長起來。選不準的，還可以換嘛。”“老同志在，問題比較好解決，如果我們不在了問題還沒有解決，就要天下大亂。”

作為接班人，趙紫陽在十一屆四中全會上躋身為政治局委員。第二年春的五中全會，胡耀邦、趙紫陽被增選為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設立中共中央書記處，選舉胡耀邦為總書記，組成萬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窮、余秋里、楊得志、胡喬木、胡耀邦、姚依林、彭沖等 11 人的中央書記處。決定批准汪東興、紀登奎、吳德、陳錫聯的辭職請求，免除或提請免除他們擔負的黨和國家領導職務。

隨後，經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和政治局常委批准，決定趙紫陽負責經濟方面工作，擔任財經領導小組組長；胡耀邦負責書記處全盤工作。從政治局常委的分工看，胡耀邦管黨務，趙紫陽管政務的雛形業已形成。

下一步就是準備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最終解決華國鋒問題。在鄧小平直接統轄下，穩紮穩打，逐步蠶食華國鋒派的權力，以完成元老派規劃的人事佈局。

接在五中全會後的五屆人大第14次會議決定任命趙紫陽、萬里為國務院副總理，免去紀登奎、陳錫聯副總理職務；接受吳德辭去當屆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職務。

繼而，國務院發出《關於加強外事工作的幾項規定》，決定國務院外事方面的工作由趙紫陽主持，萬里、姬鵬飛、陳慕華協助。趙紫陽取代華國鋒主管經濟的權力後，又取代了華國鋒主管外交事務的權力。

鄧小平高調唱起要廢除實際上存在的領導職務終身制，並作表率提出要辭去副總理職務，為的是拉扯上華國鋒。1980年8月，他在與義大利記者法拉奇談話時說，“不但我辭職，我們老一代的都不兼職了。華國鋒主席也不兼總理的職務了”。鄧小平的這番冠冕堂皇的話語讓人們覺得，華國鋒辭去總理與他和其他老人辭去兼職是一視同仁。殊不知，華國鋒當時年齡並不大，絕算不上是老人幫。只是自“文化大革命”後，他任黨政最高首腦職務的時間最長，所謂“長”也不過是三、四年而已。而且，鄧小平辭去自己兼任的一些職務後，他手中的

實權正在擴大，華國鋒卻在一步一步地被架空。不過，無論如何，華國鋒和如此多高官一起不再兼職，在心理上確實是一種慰藉，或許亦是他夢想保住黨主席位子的迫不得已的退讓。華國鋒可能並非十分清楚，政治權力的讓步是既要有謀略又需要鐵腕的。他被步步逼退只證明其軟弱無能。當然，其中包含更多的可能是無可奈何。

9月召開的五屆人大第三次會議接受華國鋒辭去國務院總理，鄧小平、李先念、陳雲、徐向前、王震、王任重辭去副總理職務的請求，由趙紫陽任總理，增補楊靜仁、張愛萍、黃華為副總理。接受聶榮臻、劉伯承、張鼎丞、蔡暢、周建人辭去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職務的請求，增補彭沖、習仲勳、粟裕、楊



鄧小平維護毛澤東的旗幟有他的政治圖謀。

尚昆、班禪額爾德尼·卻吉堅贊為副委員長，楊尚昆兼人大常委會秘書長。

華國鋒兩度企圖自殺

從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人事變動至此，華國鋒已成了孤家寡人。就在華國鋒處於孤苦伶仃的境況時，公審“林江集團”和政治局擴大會議內外夾擊，令他不得不為當政者在“文化大革命”後繼續“左”的錯誤承擔過多的責任，而要求辭職。政治局會議毫不遲疑地表態：向將要召開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建議，同意華國鋒辭去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當然，亦給華國鋒留了一點面子，肯定他在粉碎“四人幫”這一事件中是有功勞的，在過去四年中作過一些有益的工作，希望六中全會將繼續選舉他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會議還決定，黨主席和軍委主席將分別由胡耀邦與鄧小平擔任，並將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選舉形式確認。在六中全會前，暫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工作，由鄧小平主持中央軍委工作。新的政治格局就此形成。

在華國鋒請辭大約 7 個月後，確認新的權力分配方案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於 1981 年 6 月 27 日至 29 日召開。會前召開了政治局會議，鄧穎超、李先念親自到華國鋒家，請華國鋒參加政治局會議。華國鋒到會後只講了一句話：“我的立場永遠不會變。”就離開了會場。當晚，華國鋒企圖自殺。晚上 12

點左右，鄧穎超、方毅到華國鋒家與華國鋒談了近四個小時，承諾向政治局提議，華國鋒任黨的副主席到十二大時不會變動。接著召開十一屆六中全會，全會一致同意華國鋒辭去黨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的請求。通過無記名投票選舉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主席；趙紫陽、華國鋒為副主席；鄧小平為中央軍委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組成，他們是：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陳雲、華國鋒；習仲勳為中央書記處書記。鄧小平在閉幕會上講話說，“我們這次把胡耀邦同志選作黨的主席，剛才他作了一個簡短的講話，我想，這一段話也證明，我們這個選擇是正確的。當然，趙紫陽同志提到比較更重要的地位，我相信，也是選擇得正確的。”

1982年8月6日，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七中全會召開。會議決定9月1日召開十二大。從十二大起，把黨的主席制改為總書記制。華國鋒在會上看到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候選人名單上沒有自己，便離開會場回家。華國鋒感到自己已經完全不能影響政局了，在“十二大”前幾天，他又一次要輕生，服了許多安眠藥。鄧穎超、方毅、倪志福、李德生趕到華國鋒家，對他安撫。然而，華國鋒和安撫他的人都大勢已去了。

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這由鄧小平駕轅的三頭馬車式的領導體系正式形成了。它標誌著一場權力鬥爭的結束，又預示著另一場新的權力鬥爭的開始。

（摘選自高聳《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三頭馬車時代》）■

1966年2月毛澤東給王任重的信與王任重給劉少奇的信，實際上，已經公開發動了這場借農業機械化之名針對劉少奇的反對“走資派”的鬥爭，形成“文化大革命”的又一啟動工序

毛澤東打倒劉少奇的政治武器

1966年初，毛澤東繼文藝戰線批“海瑞罷官”、“三家村”揭開“文化大革命”序幕以後，又在經濟戰線上從農業機械化入手批判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戰略目標都是“炮打司令部”、“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

在“文革”中一場批判劉少奇“先機械化、後合作化”反革命修正主義理論的鬥爭，實質上是50年代初期批判劉少奇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反對農業社會主義思想的繼續。從1966年2月毛澤東給王任重的信與王任重給劉少奇的信，實際上，已經公開發動了這場借農業機械化之名針對劉少奇的反對“走資派”的鬥爭，形成“文化大革命”的又一啟動工序。最終打倒了劉少奇，造成了十年浩劫。同時，兩封信和湖北省委關於



農業機械化是客觀經濟過程。

農機化的“設想”，將農機化與政治鬥爭相聯繫，作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階級鬥爭手段，主觀地確定1980年湖北省“實現農業機械化”和全國“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目標，造成不必要的浪費與損失。1978年以後，重新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將農業機械化作為客觀經濟過程，才使農機化穩步、健康發展。

一、毛澤東的“先有合作化，然後才能使用機器”的理論來源，及劉少奇對農業社會主義思想的批判和“重工業建立之後，使農業機器化”的思想

毛澤東1955年在《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中肯定“農村中的改革將還是以社會改革為主，技術改革為輔”，斷言“在農業方面，在我國條件下則必須先有合作化，然後才能使用機器。”這個理論同文革中批判劉少奇“先機械化、後合作化”論點針鋒相對。毛澤東的論點實質上是有理論來源的，即所謂“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的設想；同時正是對1951年劉少奇批判農業社會主義思想的反批判。

在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可以看到對落後國家利用農村公社能不能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的不同看法。

1881年馬克思提出“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在回答查蘇利奇的信中寫道：俄國農村公社的一個基本特徵是“土地公有制”，它“構成集體生產和集體佔有的自然基礎”，這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土地個體耕作變為

集體耕作，並且俄國農民已經在沒有進行分配的草地上實行著集體耕作。俄國土地的天然地勢適合於大規模地使用機器。農民習慣於勞動組合關係，有助於他們從小土地經濟向合作經濟過度。”“給予它以實現大規模組織起來的合作勞動的現成物資條件。因此，它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吸取資本主義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它可以借用機器而逐步以聯合耕種代替小土地耕種。”“如果它在現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導到正常狀態，那它就能直接變成現代社會所趨向的那種經濟體系的出發點，不必自殺就能獲得新生命。”^(注1)

1882年1月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進一步明確提出了問題和答復：“俄國公社，這一固然已經大遭破壞的原始土地公共佔有制形式，是能夠直接過渡到高級的共產主義的公共佔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還須先經歷西方的歷史發展所經歷的那個瓦解過程呢？”“對於這個問題，目前唯一可能的答覆是：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麼現在的俄國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注2)

但是，12年後的1893年10月，恩格斯改變了看法，在給丹尼爾遜的信中寫道：“在俄國，從原始的農業共產主義中發展出更高的社會形態，也象任何其他地方一樣是不可能的，除非這種更高的形態已經存在於其他某個國家並且起著樣板的作用。”^(注3)1894年1月恩格斯又說：“當西歐人民的無產階

級取得勝利和生產資料歸公有之後，落後國家才可以利用原有“公社所有制的殘餘和與之相適應的人民風尚作為強大的手段，來大大縮短自己向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過程。”^(注4)從原來的“能夠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公共佔有制形式”的判斷，改變為“從原始的農業共產主義中發展出更高的社會形態”是不可能的結論，是恩格斯分析俄國農村公社瓦解與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等現實情況，深思熟慮得出的。

在半個世紀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劉少奇又一次提出了恩格斯反思過的問題。早在1949年6月劉少奇就認為：“只有在重工業大大發展並能生產大批農業機器之後，才能在鄉村中向富農經濟實行社會主義的進攻，實行農業集體化。”^(注5)

1951年7月3日，劉少奇對山西省委《把老區互助組織提高一步》的報告批示：“在土地改革以後的農村中，在經濟發展中，農民的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已開始表現出來了。黨內已經有一些同志對這種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表示害怕，並且企圖阻止或避免。他們幻想用勞動互助組織和供銷合作社的辦法去達到阻止或避免此種趨勢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這樣的意見：應該逐步地動搖、削弱直到否定私有基礎，把農業生產互助組織提高到農業生產合作社，以此作為新因素，去‘戰勝農民的自發因素’。這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山西省委的這個文件，就是表現這種思想的一個例子。特印發給各負責同志一閱。”

在劉少奇作出這個重要批示之前的1951年4~5月間，他

曾對薄一波、劉瀾濤明確指示：現在採取動搖私有制的步驟，條件不成熟。沒有拖拉機，沒有化肥，不要急於搞農業生產合作社。按照劉少奇的意見，華北局針對山西省委“農民的自發力量是發展了的，它不是向著我們所要求的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而是向著富農的方向發展”和“對於私有基礎，不應該是鞏固的方針，而是逐步動搖它、削弱它，直到否定它”的意見，在批覆中提出“不同的判斷：用積累公積金和按勞分配辦法來逐漸動搖、削弱私有基礎直到否定私有基礎是和黨的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政策及共同綱領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錯誤的。”“提高與鞏固互助組織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充實互助組的生產內容，以滿足進一步發展生產的要求，而不是逐漸動搖私有制的問題。這一點必須從原則上徹底搞清楚。”

劉少奇 1951 年 5 月 7 日在全國第一次宣傳工作會議的報告中說：“在三年準備之後，我們來一個十年計劃。到十年之後，新中國的面貌就要改變，那時我們將不但有強大的農業，而且有我們自己強大的工業，使中國變成一個富足的國家。到那時，我們的國家才可以考慮到社會主義專政的問題。”“山西省委在農村裏邊要組織農業合作社（蘇聯叫共耕社），這種合作社也是初步的。”“這種合作化是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可是單用這一種農業合作社、互助組的辦法，使我們中國的農業直接走到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種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是實現不了的。”“我們中國黨內有很大一部分同志存有農業社會主義思想，這種思想要糾正。”



1949 年秋，劉少奇夫婦在中南海。劉少奇提醒防止“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

1951 年 7 月 5 日，他又強調“離開城市工人階級和強大國有工業，不能有農業集體化。單純依靠農民來實行農業集體化的思想是錯誤的，是幻想。”^{（注 6）}

劉少奇的沒有拖拉機，沒有化肥，不要急於搞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論斷，和十年之後有我們自己強大的工業，才可以考慮到社會主義專政的問題的觀點，是容易引伸出“先機械化、後

合作化”的推論的，但是劉少奇這個重要論點，主要是從“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理論高度出發，反對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歷史的悲劇在於，劉少奇的正確觀點在毛澤東的錯誤批判之後，成為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罪證。被“文革”的造反派提煉、變形的“先機械化、後合作化”的口號，成為強加到劉少奇頭上的一條反革命罪狀。

劉少奇的反對農業社會主義思想的批示，受到毛澤東的堅決反對，並且在5個月後的1951年12月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不但提出“要援助農業互助組和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發展”，還提出“在農民完全同意並有機器條件的地方，亦可試辦少數社會主義性質的集體農莊，例如每省有一個至幾個，以便取得經驗並為農民示範。”再發展到1958年，就出現了“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的“人民公社化”了。這樣，就把1893年恩格斯反思過的“從原始的農業共產主義中發展出更高的社會形態……是不可能的”科學結論否定了，最終遭到歷史規律、經濟規律、自然規律的懲罰，黨、國家，特別是人民遭到了災難。

平心而論，劉少奇並沒有明確提出“先機械化、後合作社”的方案。事實上，劉少奇是站在反對農業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論高度，在1951年就公開反對黨內危險的、空想的錯誤思想和過急地合作化。

至於劉少奇關於農業機械化與工業化先後關係，他早在

1950年《國家的工業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文中，提出過中國工業化過程的一個主要觀點：第一步“以發展農業和輕工業為重心。因為只有農業的發展，才能供給工業以足夠的原料和糧食，並為工業的發展擴大市場。……在農業和輕工業發展的基礎上，也可以把勞動人民迫切需要提高的十分低下的生活水平提高一步”，接著強調：“只有在這一步做得有了成效之後，我們才有可能集中最大的資金和力量建設重工業的一切基礎，並發展重工業。只有在重工業建立之後，才能大大地發展輕工業，使農業機器化，並大大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7)這裏，劉少奇提出了農－輕－重的發展順序，先以農輕為重心，在“重工業建立之後”，才能“使農業機器化”的正確思路，這符合農機工業發展不能超前於重工業和工業化的發展，農業機械化不能超前於工業化而孤軍前進的客觀規律。而毛澤東的合作化指導思想確實是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劉少奇的上述思想才是正確的、可行的。

二、50年代初期堅持新民主主義的理論，提出“我們的基本口號是：民主化與工業化！”

在1948年6月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公開批判南共、波共以後，東歐各國清洗“鐵托分子”，將“人民民主制度”改為“執行著無產階級專政的職權”、蘇維埃制度和人民民主制度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兩種形式”。

毛澤東在1949年1月會見米高揚時已提出：“在工農聯



毛澤東對“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說法很不滿意。

盟基礎上的人民民主專政，而究其實質就是無產階級專政。”

(注8) 在毛澤東這年7月1日發表了《論人民民主專政》的同時，劉少奇7月4日向斯大林提出報告說，新中國將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工人、農民與革命知識分子為基礎的，小資產階級與自由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和政治派別參加的人民民主專政。它“不是資產階級專政，也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他認為，建國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主要矛盾是“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及與國民黨殘餘勢力的矛盾。”“有人說：在推翻國民黨政權或者實行土地改革之後。中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便立即成為主要矛盾，工人與資本家的鬥爭，

便立即成為主要鬥爭。我們認為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因為一個政權如果以主要力量去反對資產階級，那便成為或開始成為無產階級專政了。這將把目前尚能與我們合作的民族資產階級趕到帝國主義那一邊去”，並尖銳地指出這是“冒險主義政策”。

他在回國途中向東北局幹部會上作報告，批評“東歐搞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就也要搞無產階級專政”的觀點是教條主義，明確指出：“我們要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和資產階級合作，所以不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只能是人民民主專政。”

1949年9月21日，劉少奇在第一屆人民政協會議上指出，“把社會主義的前途寫進共同綱領的建議是不可取的，因為要在中國採取相當嚴重的社會主義步驟，還是相當長久的將來的事情。”^(注9) 1949年9月29日通過的《共同綱領》肯定：“中國人民民主專政是中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政權。”實際上以法律形式肯定了“人民民主專政—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和國家權力組織結構。

雖然斯大林懷疑中共走南斯拉夫道路，蘇聯駐華總顧問科瓦廖夫認為中共親美反蘇的人現正得勢，而人民政府的組成，民主人士佔的比例很大，實際上變成了各黨派的聯合會；但是，劉少奇仍堅持新民主主義思想，1951年2月28日，在北京市人大會上講話說：“經濟建設現已成為我們國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務。但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必須有新民主主義

的政權來領導和保障。”“我們的基本口號是：民主化與工業化！在我們這裏，民主化與工業化是不能分離的。”

在 1951 年 3 月黨的組織工作會議上，劉少奇明確提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口號，並把“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鬥爭”規定為“共產黨員標準的八項條件”之一，為會議所通過。

劉少奇在 1951 年 3 月《共產黨員標準的八項條件》中明確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制度的要點：“新民主主義革命一般地不破壞私有財產的制度，但社會主義就首先要在工業中然後要在農業中破壞私有制。在農業中組織集體農場，只能依靠工人及貧雇農，不能依靠一般農民，只是團結農民。”他還認為“鄉村中互助組、互助會、合作社，就是社會主義經濟方式之一，是半社會主義。不怕犧牲自己一點，努力為合作社工作，就是社會主義。”（注 10）

這樣，他提出的“共產黨員標準的八項條件”中，認為“中國共產黨現在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鬥爭，在將來要為轉變到社會主義制度而鬥爭，最後要為實現共產主義制度而鬥爭”。（注

¹¹⁾即黨和黨員要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鬥爭，一般地不破壞私有財產的制度，而合作社是社會主義經濟方式。這樣的認識，可以理解為合作化慢一點、放後一點。但不是“先機械化後合作化”，而是先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將來再轉變到社會主義制度，實質上是“先新民主主義，後社會主義”。

但是，毛澤東很快就尖銳地批評劉少奇的“鞏固新民主主



1958年7月18日，劉少奇在濟南農村視察。

義制度”的觀點。在1952年6月批示：“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即已成為革命對象、階級鬥爭的對立面。

1953年6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嚴厲批評劉少奇“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為“右傾觀點”。1953年12月，毛澤東審定的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宣傳提綱”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

誌著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結束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在《關於目前政權性質問題的指示》中說：“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但在公開場合仍然提人民民主專政。到1954年9月第一屆人大通過的憲法提出“依靠國家機關和社會力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任務。選出的國家最高領導人全是共產黨員，產生了斯大林希望的“你們就可以組織一黨政府”，^(注12)完成了由“新民主主義的人民民主專政”向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轉變。

劉少奇接受了毛澤東的尖銳批評，放棄了自己的“人民民主專政—新民主主義”思想。

因此，對劉少奇的“先機械化，後合作化”的批判，實質上是為批判他的“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不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只是人民民主專政”、“經濟建設是中心任務”，把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作為主要矛盾是“冒險主義政策”等一系列正確觀點而羅織罪名。

但是，在後來，特別是1966、1971、1978年三次農業機械化上堅持“1980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口號，宣傳毛澤東批評劉少奇這十年“抓得不太好”，正是脫離實際、脫離國情，從階級鬥爭、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將工農聯盟建立在農業機械化的基礎上”，同備戰、備荒、為人民聯繫起來的理論出發，認為“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問題，不僅是一個重大的經濟問題，而且更是重大的政治問題。”^(注13)這樣，就將農業機械化這樣一個經濟、社會、技術的發展過程，人為地、主觀地貼上

“階級鬥爭”的政治標籤，作為群眾運動、政治運動而推進，全黨動員，出現脫離中國國情的高指標、高速度、高損失的負面效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三、毛澤東從階級鬥爭觀點提出農業機械化發展戰略和“1980 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戰略目標，是脫離實際的失誤

在“文革”緊鑼密鼓敲起序幕的 1966 年 2 月 19 日，毛澤東給王任重的信中提出：“用 25 年時間，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這同他 1955 年 7 月 31 日在《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中提法在期限是一致的：“估計在全國範圍內基本上完成農業方面的技術改革，大概需要 4 個至 5 個五年計劃，即 20 年至 25 年的時間。”要求達到的目標改變了，從“在全國範圍內基本上完成農業方面的技術改革”縮小為“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但是實現目標的最終期限，由“20 年至 25 年”改為“25 年”。幾乎同時，在毛澤東寫信給王任重的第二天，1966 年 2 月 20 日，由王任重給劉少奇寫信，兩次提到毛澤東同意王任重和湖北的意見：“主席批了我們關於農業機械化的設想。徐業夫同志把原件送給你了。”“希望八機部不要搞‘托拉斯’，這樣便於發揮地方的積極性。……這個問題向主席報告了，他表示贊同。”而《劉少奇選集》中最後一篇文章的題目正是《試辦托拉斯》，肯定了托拉斯，認為試辦托拉斯的目的，就是要使“整個國民經濟更有計劃些，更有組織些”。^{（注 14）}

實際上，從農業機械化和辦托拉斯兩個方面，毛澤東通



1958年，毛澤東、王任重參觀沼氣利用展覽。

過王任重給劉少奇以壓力、批評和警告，“目前是抓緊從今年起的15年。已經過去十年了，這十年我們抓得不好。”劉少奇在王任重寫信後三天，迅速地而被動地給周恩來、鄧小平寫信，建議將《湖北省委關於逐步實現農業機械化的設想》，毛澤東批語及王任重的信，“發給政治局、書記處各同志，並發給計委、經委、建委、科委、物資部、八機部、華北局李雪峰、劉子厚各同志研究，並準備意見，幾天以後，中央召集一次會議討論這個問題。因為這個問題牽涉的方面很多，所以應當這麼辦”。劉少奇仍然天真而認真地把“這十年我們抓得不

大好”的農業機械化問題，當作一個複雜的牽涉方面很多的經濟問題來一步步研究、準備意見、討論。而毛澤東實際上早作好部署了，在1966年3月12日對劉少奇3月11日的信作了極為具體的回答，主持會的人選、時間、地點、人數、規格都作了定論，小計委余秋里、林乎加去湖北，“同湖北省委共同研究農業機械化五年、七年、十年的方案，並參觀那裏自力更生辦機械化的試點。——如果讓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也派人去的話。似以管農業書記一人、計委一人去為宜。總共也只有大約70人左右去那裏開一個7—10天的現場會。”把劉少奇認為“牽涉的方面很多”的需要多個中央部門、書記處、政治局和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認真研究的農業機械化工作會議，簡化為70人的“七一十天的現場會”，即學習、照搬、複製湖北制訂五年、七年、十年的農機化發展規劃。

至於各地的規劃，毛澤東提出“大約今年8、9月間召開的工作會議上才有可議”，“若事前無準備，那時議也恐怕議不好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澤東集中注意力修改《林彪委託江青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和寫了《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的政治鬥爭批語的1966年3—4月時，1966年3月11日劉少奇給毛澤東的信中，明確提出“湖北省委這個文件暫緩轉發各地”。他提出“在有各在京副總理參加的中央常委會上談了這個問題，大家意見，要小計委就這個問題對有關各方面情況先摸一摸，提出一個方案，中央再來

討論，並要提交下一次中央工作會議加以討論，以使各地方的努力更加符合實際。恩來同志已要小計委派人到湖北，同省委共同研究他們的方案，先在湖北進行試驗”。^(注 15)即要先在湖北進行試驗，要更加符合實際，要提出方案。中央討論，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因此暫不轉發文件。

而在第二天的 3 月 12 日毛澤東即回信：要開現場會，8、9 月的工作會議才有可議。劉少奇似未理解，仍未轉發。在緊鑼密鼓地起草“516 通知”時，1966 年 4 月 10 日，才批轉湖北文件，“中央對《湖北省委關於逐步實現農業機械化的設想》的批示”也肯定要將這種計劃草案“提交今年 8、9 月間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討論”。

1966 年 8 月確實如期召開了中央會議，有名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但是討論的不是各省農業機械化計劃方案，而是通過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定”（16 條），劉少奇在天安門上就靠邊站了。“炮打司令部”火藥味很濃的中央全會過後，1966 年 8 月 16 日，周恩來對本擬開 7 ~ 10 天的湖北農機化現場會，一直開了一個月開到北京大學大字報現場的會議作了講話，他反覆地檢討：“我們認真抓農業機械化，是主席看了湖北省委的報告，寫信給中央在北京工作的同志，中央同意給主席復信後，主席又寫信，中央在 4 月 10 日轉發了湖北文件，在批示中，把主席思想表現出來了。這才開始認真抓全國農業機械化，按綱要說，我們晚了十年，按十中全會說晚了四年，這次才認真抓。”“主席說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要用 25 年的時間



毛澤東在武漢。

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從主席 1955 年提出到現在，過去十年了，只有 15 年了，足有三五、四五、五五年三個五年計劃，要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過去十年，我們抓得不太好，主席批評是很寬的，實際上抓得很不好。我們在中央做實際工作的抓計劃、政府、農業工作的同志來說，抓得很不好。當然也做了一些工作。”“很明顯，我們沒有完全瞭解主席思想，後來到主席那裏開會，才把主席批示作為中央批示發給地方，說明趕不上，要趕緊學習，趕緊跟上，認真實踐。我們跟主席一道工作，有時，毛澤東思想舉得不高，錯誤是經常會犯的，當然不是站在對立立場上。”“農業機械化如果（主席思想）學得不夠，跟得不緊，就有差距，但是發現了就跟上去。小計委抓得比較

好。希望各省市、大區，各部共同努力。”“我們要拿出愚公移山的精神，學習老三篇，不要 15 年，一定能大大提前，搞得好，十年略多一點。但現在還是提 15 年，口號不要提過高，時間爭取提前。”^(注 16)周恩來的講話，可以確實反映出“跟不上”毛澤東的戰略佈置和戰略思想的檢討心情，至於毛澤東《炮打司令部》大字報打中的劉少奇，連在群眾大會、農機化現場會作類似檢討的機會也沒有了，永遠被剝奪了。

因此，從某一個角度看，毛澤東選擇武漢，從湖北省委逐步實現農業機械化的設想開炮，是他部署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步重要的落子，從經濟方面進行政治批判，確確實實打在劉少奇的要害，這是同他堅持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認為過急地農業合作化是空想社會主義、工業化以後才能農業機械化等等觀點，不能與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為綱的理論同步，甚至相對立是密切有關的。1966 年 2 ~ 3 月毛澤東關於農業機械化的信，在“文革”前夕發出，絕不是一著閑棋，在 8 月與八屆十一中全會同時結束的湖北農機化現場會絕非出自偶然，偶然性寓於必然性。實際上，在“機械化抓得不好”問題上的批判，從 1966 年 2 月開始，同 1965 年末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同時從意識形態戰線與經濟建設戰線發起了對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進攻信號。所不同之處，在湖北的進攻矛頭直指劉少奇本人而不是死老虎彭德懷。當 1966 年 8—9 月成立中央文革小組時。在上海批“海瑞罷官”的張春橋、姚文元和操縱者江青成為領導成員。在武漢提出“湖北省委

農機化設想”和反對托拉斯的王任重也被吸收為文革小組成員。得到毛澤東覆信(信中直言農業機械化“這十年我們抓得不太好”),實際上批到劉少奇頭上的王任重,能擔任文革小組副組長,當時受到與各省省委書記完全不同的政治待遇,這可能不是偶然的。

這種從階級鬥爭角度,揭發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揪出“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的“文化大革命”前夜的槍炮聲中,劉少奇似乎還沒有意識到矛頭直指自身,在佈置農機化的會議上,還當作需要多方面、多部門、多位同志“研究”、“準備意見”、“討論”的純經濟問題,“因為這個問題牽涉的方面很多,所以應當這麼辦”,遲遲不批發湖北文件。周恩來在1966年8月16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的前兩天,還認真地檢討,自己“跟不上”、“抓得很不好”,同時還是將農業機械化發展規劃作為計劃問題、經濟問題,提出余秋里的總結,“當然不是沒有什麼可斟酌的地方,主席歷來教導我不要爭數字,幾年來引到數字中去了,就要犯錯誤。”“現在還是提15年,口號不要提過高。”最後還諄諄教導:“我們今後一定要遵循毛澤東的教導,堅決按照黨的八屆十中全會提出的,計劃數字應該實事求是地(而不是主觀主義),因地制宜地(而不是千篇一律)、及時地(而不是拖拖沓沓)、有重點地(而不是分散力量)、慎重地(而不是輕率)來正確處理這個任務。做一切工作都應該是這樣。”^(注17)婉轉地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劉少奇、周恩來與朱德。

即使如此，周恩來到 1969 年 8 月 13 日，在接見全國建設縣農機修造廠工作會議代表時的講話中，也不得不違心地批判劉少奇的“先機械化、後合作化”。周恩來說：“1951 年當時是有爭論的。當時山西老區有的領導主張土改後緊跟著搞互助合作，當時已有試辦的了，陝北是變工隊，劉少奇說經過合作化不可能，那經過什麼道路呢？他就提出要搞機械化。”“一進城七屆二中全會就講到這個問題嘛，土地革命徹底完成後，就要搞農業合作化，走社會主義道路。（有些人的理論是）土地改革以後先機械化，後合作化，結果是個體經濟大發展，從農業合作化問題就可以看出，他們是走資本主義道

路的。”“有人提出現在提倡農業合作化是實在的空想，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實際上他們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注18）

這樣，周恩來不僅在政治上、思想上與劉少奇劃清界限，同時也改變了1966年8月提出的“口號不要提得高”，計劃數字應該“實事求是（而不是主觀主義）、因地制宜（而不是千篇一律）”的正確方針，在政治壓力下不得不提出堅持用25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要看今後的11年。每省、每縣、每社都要基本完成。山地那麼多，沼澤、沙漠，各種類型機械要跟上。從常規到高級的收穫、加工、運輸、電動、殺蟲、塑料薄膜都要，將來一個縣搞個小化肥廠是需要的。十年把這些事都完成是大事。”（注19）因此，從上到下、從中央到基層社隊，全黨動員，為完成“1980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這個脫離實際的口號而努力奮鬥，以巨大的投入、沈重的代價換來了明顯的成就和嚴重的教訓。

四、毛澤東與劉少奇關於農業機械化和農業合作化爭論的教訓

回顧、反思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批評：“農業機械化我們這十年抓得不太好”，和一系列有關農機化發展指標、方針、理論的爭論，至少有以下幾方面的失誤是值得思考與討論的。

1. 對中國農業機械化發展目標提出了脫離中國國情、違反農業機械化客觀發展規律的過高、過急、全國一刀切的脫離實際的指標。

在1966年2月19日毛澤東給王任重信中提出“用25年

時間，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即從 1955 年算起，1980 年要在全國範圍內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而在王任重提出的報告中是更高的指標：湖北全省實現農業機械化，把“基本上”三字也不要。到了 1980 年 7 月，農機部楊立功部長以答《農業機械》記者問的形式指出：“1980 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是多年來全國人民共同為之奮鬥的目標。現在看來這個要求是不切合實際的，也是難以實現的。”“本來就不大可能，現在更不可能達到了。要求過急是不行的。實踐證明是達不到的目標就降下來，不應該再堅持這個口號了。”

實際上，毛澤東對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提出過更高更急的指標：1958 年提出我們的任務是：在七年內（爭取 5 年內做到）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和半機械化，實現農業生產力的大發展。”^{（注 20）}，即要求在 1963 年或 1965 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和半機械化。

1959 年 4 月 29 日毛澤東在《黨內通信》中又指出：“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四年以內小解決，七年以內中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即要求在 1963、1966 年小、中解決，而在 1969 年大解決，即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

毛澤東特別讚揚的、中央批轉的《湖北省委關於逐步實現農業機械化的設想》（1966 年 2 月 5 日）提出的指標是：“在五年、七年、十年的時間內，在全省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和部分的化學化、電力化是否可能？我們認為經過努力，是可以實現的。從今年算起，力爭在五年、七年、十年內（從第一個五

年計劃算起，就是 20 年左右的時間），在全省實現農業機械化，完成黨中央和毛主席交給我們的偉大歷史任務。”在“設想”文末，還提出了更高的指標：“20 年左右時間，在全省實現機械化。”^{（注 21）}即將毛澤東預計的 25 年時間又縮短 5 年，即在 20 年時間基本上實現湖北全省的農業機械化，甚至全省實現機械化。因此，這個具有高指標特徵的設想格外受到毛澤東的高度重視，確定在湖北召開全國農機化現場會，起到了以湖北高指標的典型，幫助、壓服各省群起而效之的作用，使失誤由局部擴展為全局性長時期的失誤。特別是毛澤東批示中要求各省區“應當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做出一個五年、七年、十年的計劃”，就是帶有政治性指令性的要求。

在 1958 年 10 月 18 日，中央批轉農機部向中央、主席的第一次報告批示中還提出更高的實現農業現代化的指標：“從 1958 年起以十年至 15 年的時間實現農業現代化，即實現農業機械化、水利化、化學化、電氣化的總任務和四年小解決、七年中解決、十年大解決的機械化的步驟來擬定，要儘可能地促進農業技術的改造，不斷提高農業各方面的勞動生產率，促進農業生產的不斷躍進。”^{（注 22）}實際上，毛澤東提出的一些高指標，已為黨中央接受，形成新成立的農業機械部的中心任務。因此，它不可能不為落實這個難以實現的高指標而艱苦奮鬥，以很高的代價、巨大的投資獲得與投入不太相稱的重要成就。

2. 違反農機工業作為工業的客觀經濟發展規律，強調地方為主，“八機部不要搞托拉斯”，造成農機工業佈局分散

化、小型化、低效益、低水平重複建設的嚴重問題與後遺症。

在 1958 年 4 月 8 日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關於農業機械化問題的意見》中，對農機工業佈局提出的方針是：“農業機械的製造（包括機引農具、新式畜力農具和改良農具），除了大型的和技術要求較高的農業機器以外，一般的應該以地方工業為主。由各個地方或者經過各個協作區，根據當地的條件和需要，自行安排；中央有關部門在技術和經驗交流方面予以幫助。”^{（注 23）}這樣，實際上是把全國農機工業的總體佈局的統一規劃，分散為地方為主、各省為主自成體系。

在 1966 年 3 月 12 日毛澤東給劉少奇的信中強調農業機械化“此事只能以各省、市、自治區自力更生為主，中央只能在原材料等等方面，對原材料等等不足的地區有所幫助……為了農業機械化，多產農林牧副漁等品類，要為地方爭一部分機械製造權。……一切統一於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辦法。又此事應與備戰、備荒、為人民聯繫起來，否則地方有條件也不會熱心去做。”這已經將“地方為主”提高到備戰的政治、軍事高度了。

對毛澤東的“地方為主”、各省自力更生發展農業機械化和農機工業的思想領會得最深的王任重，於 1966 年 2 月 20 日給劉少奇的信，儼然是上級命令下級、代傳“聖旨”似的口氣，“主席批了我們關於農業機械化的設想。徐業夫同志把原件送給你了。我對這個文件在文字上又作了一點修改，望你批轉時按這個修改過的稿子。另外就是對於地方辦的農機工廠，

希望八機部不要搞‘托拉斯’，這樣便於發揮地方的積極性。關於地方農機產品的分配辦法，要早日定下來，以便地方心中有數，全面安排。這個問題我向主席報告了，他表示贊同。”（注24）

在這樣的政治壓力、組織壓力下，原來在1965年主張試辦托拉斯的劉少奇也只好退卻了。他說過：“你們說當前工業管理上的一個突出問題是個‘散’字。什麼叫‘散’？就是沒有組織起來。我們的國家計劃是粗線條的。辦托拉斯就是要組織起來。不只是一個企業要組織起來，一個行業要組織起來，整個國民經濟都要組織起來。你們考慮一下，一個市，一個省，全國，這麼多的工廠，怎麼很好地組織起來？要算總帳。試辦托拉斯的目的，就是要解決整個國民經濟更有計劃些，更有組織些。有些行業的大批發站，歸托拉斯比較合理。組織起來，就可以搞專業化、標準化、系列化，提高質量，增加品種，降低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這樣，對國家有利，對地方有利，對整個社會都有利。”（注25）有了毛澤東給王任重的信和王任重給劉少奇的信，這些意見也只能不提了。196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的國務院農林辦公室、八機部、農業部關於改進農業機械化工作管理體制的報告中，提到“成立全國統一的農機銷售公司。其任務是：統管全國農機產品的銷售工作，實行托拉斯式的經營管理方法，以克服全國各地銷售業務過於分散、中間環節過多的現象。”雖然這是根據譚震林同志的提議，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同志的同意，並經總理

指示，經過農辦、農業部和機部共同協商的共同意見，由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批轉的文件。有了王任重轉達的主席表示贊同八機部不要搞“托拉斯”的給劉少奇的信，一切提議、同意、指示、批轉的報告，都成為泡影、隨後成為“文革”的批判對象。

因此，農機工業在地方為主、自力更生發展的方針下較嚴重的“散”的問題，只能越來越嚴重，為了急於在十年、15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只能更“散”，為後來的農機工業的技術改造、結構調整留下了致命的後遺症。

3. 將農業機械化這個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的過程和農機是先進的生產力要素，納入階級鬥爭範疇，拔高為“實現農業機械化，是黨在農業問題上的根本路線，是一場偉大的革命，是關係到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鞏固工農聯盟，加強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闢的大問題。我們要深入持久地開展革命大批判，不斷地提高路線鬥爭覺悟的政治鬥爭”（注26），致使農業機械化的發展戰略、目標、速度在上相當長時期進入誤區。

農業機械作為先進的生產力要素，能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有利於土地生產率的增加，受到農民的歡迎。但是，如果把農業機械化作為兩條路線、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的標幟，以政治壓力和群眾運動強令實現脫離實際的主觀主義、千篇一律的指標，如“1980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口號，帶給農民和農機戰線職工的是得不償失的教訓與失誤的損

失。

在“1980 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戰略目標上，毛澤東以王任重的湖北省委四年、七年、十年實現農業機械化的設想，批評劉少奇這十年抓得不大好，此事需與備戰、備荒、為人民聯繫起來的政治壓力，強行推廣到每個省，甚至周恩來也不得不在 1966 年連聲檢討後在 1969 年表示“我們在執行主席農業政策上，就是機械化抓慢了，因此提出“今後 11 年（即到 1980 年）每省、每縣、每社都要基本完成（農業機械化）”、“土地那麼多，有沼澤、沙漠，各種類型機械要跟上。”^{（注 27）}更



王任重得了毛澤東的聖旨，給劉少奇的信很不客氣。

可以理解各地對實現農業機械化的目標的盲目性與狂熱性之嚴重。這主要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政治壓力下，對農業機械化這個技術、經濟發展過程，作出歪曲、變形的理解與規劃，出現了非理性、非經濟的一系列錯誤判斷與決策。

不僅在農機化戰略目標上，而且在推廣具體機具上，也常採用“左”的政治壓力。1958年4月16日《人民日報》社論《提高雙輪雙鋤犁的效用》中，分析“雙輪雙鋤犁不能推廣的主要原因，是當生產資料的個體私有制改變為集體公有制的時候，當推廣雙輪雙鋤犁來代替舊犁並鞏固集體公有制的時候，一些富裕農民對社會主義的抵觸情緒及農民的保守思想和習慣勢力的一面，就在某些農村工作幹部的思想上反映出來，他們對雙鋤犁不懷好感。再加上右派分子們從中興風作浪，就一度形成了反對雙鋤犁的一股逆流。業務部門本身也有一部分幹部存在著右傾保守思想，或者缺乏革命的朝氣和勇氣，或者是心中無數，因而在小颱風和反冒進的逆流中沒有硬著頭皮頂住，從而形成了退縮不前的混亂局面。”雖然，這種適於東北幾匹大馬牽引的雙輪雙鋤犁，也不是全國所有耕地，一律都能用雙鋤犁耕。但是，社論最後仍然要求，“各地廣大農村工作幹部都要根據當地推廣計劃，積極地大力推廣雙鋤犁。一定要人人都做促進派，個個會用雙鋤犁，讓每部雙鋤犁都投入生產。讓我們在今年農業生產的大躍進中使雙輪雙鋤犁的推廣和使用，也來一個大躍進。”在這樣強大的政治壓力面前，出

現雙輪雙鏟犁的推廣和使用的“大躍進”，當然只會給國家和農民帶來巨大的損失。

再如插秧機剛剛出現，《人民日報》1960年6月14日的社論就認為：“今年我們便可以使70%左右的稻田插秧工作實現插秧機械化。”這個目標，在52年以後的2012年也沒有可能達到。對於各種機械一定要標準化、系列化、通用化，這是一條工業生產高質量、低成本的裝備和便於使用、節約運行費用的共同規律，但是社論熱情地歡呼：“截至目前止，全國已出現兩千多種插秧機，既有土的，又有洋的和土洋結合的；既有結構簡單的，又有結構精密的；既有人力或畜力帶動的，又有用動力機械帶動的，真是百花齊放，萬紫千紅。”為什麼在全國形成了轟轟烈烈的運動？社論說是由於“在插秧機的創造過程中，各地黨委堅持政治掛帥，對右傾保守思想、脫離實際和盲目崇拜外國的資產階級思想進行了必要的批判，從各方面鼓勵、支持廣大勞動人民的創造，國家也在技術上、物質上給予大力幫助”的結果。這種政治壓力下的群眾運動，絕不能說沒有一點正效應，但是技術上、物質上大力幫助造成的巨大浪費的負效應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文革”還未正式開始，就認為農業機械化“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政治問題”（1966年2月5日〈湖北省委關於逐步實現農業機械化的設想〉），《人民日報》1966年4月9日發表這個《設想》的“編者按”提高為“更是重大的政治問題”。《設想》還將農業機械化、農業問題與“解決5億多

農民的問題”聯繫起來。認定是“逐步縮小城鄉差別、工農差別，這對於鞏固工農聯盟，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陣地，防止‘和平演變’、反對資本主義復辟，都是關係極大的問題。”將農業機械化同防止和平演變、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相聯繫，是《設想》的重中之重，是一根能致人於死命的政治大棒。而《設想》中直接提出的尖銳問題：“要不要農業機械化的問題，在大多數同志中，已經解決了。但是，什麼時候才能實現農業機械化，如何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問題，則還沒有解決。”從毛澤東的批示由王任重給劉少奇的異常程序看，毛澤東是肯定王任重不僅解決了“要不要農業機械化”的問題，湖北省委的設想還解決了“什麼時候”和“如何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問題，有必要在湖北召開現場會。而劉少奇則是“大多數同志”之外的少數了，“抓得不大好”（毛澤東語）或“抓得很不好”（周恩來語）的代表人物了。《設想》提出“是努力爭取在 20 年至 25 年內實現農業機械化，還是等等再說呢？是依靠集體經濟和地方工業潛力，走自力更生、勤儉創業的道路，還是單純依靠國家投資和供應機械呢？我們認為，應當肯定的是前者而不是後者，應當持積極態度，而不要消極等待。”這就將持積極態度、執行自力更生、勤儉創業、大搞群眾運動要在 20 — 25 年內實現農業機械化的正確路線的“我們”，劃在讚揚《設想》的毛澤東一邊，就同“消極等待”的劉少奇劃清了界限——劉少奇認為農業機械化“牽涉的方面很多要研究、討論”，直到 1966 年 2 月 23 日給周恩來、鄧小平的信中，還沒有明確表示同意 2 月



1975 年的宣傳畫。

19 日毛澤東給王任重的信中再明確不過地強調“用 25 年時間，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具體期限。對毛澤東的嚴厲批評：“已經過去十年了，這十年我們抓得不大好”，似乎仍無動於衷。怪不得 1966 年 3 月 12 日毛澤東針對劉少奇 3 月 11 日的回信中不無理由地說：“若事前無準備，那時議也恐怕議不好的。”

由此看來，1966 年 2 月由《設想》引發的一場延續到“文化大革命”之後很長時間仍在爭論的農業機械化問題，在一些指標、期限、方針、路線不同觀點爭論的背後，隱藏著一場更重要的爭論：姓社姓資的大爭論，在明面上是討論 20 年還是

25 年或是更長時間才能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問題，實際上準備了一頂是不是堅持反對和平演變、資本主義復辟的大政治帽子，是《設想》所說的“一個政治問題”，《人民日報》1966 年 4 月 9 日“編者按”所指出的“更是重大的政治問題”。這樣，可以看到，1966 年 2 月毛澤東向劉少奇在農業機械化問題上的開火，也是 8 月“炮打司令部”的另一場預演，可能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啟動工序，是繼批《海瑞罷官》、批彭德懷之後，直接批到劉少奇頭上的周到安排。絕不是簡單的就農業機械化談農業機械化問題，這樣實際上就把農業機械化納入政治鬥爭的棋局，將農業機械化作為階級鬥爭的工具、武器，用來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批倒、打倒“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它在“文革”初期、中期和後期都在階級鬥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至於農業機械化這個生產力要素的發展，對農業生產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那也是事實。不過，代價極大，效益較小，口號實現不了。

五、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實事求是地評價與放棄“1980 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口號。按照客觀經濟規律確定一系列正確政策，逐步地有選擇地推進農業機械化

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華國鋒主持中央工作，仍然堅持“兩個凡是”，在 1978 年 1 月召開了第三次全國農機化工作會議，堅持脫離實際的“1980 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口號和“全國農、林、牧、副、漁主要作業的機械化水平，達

到 70% 左右”的高指標。同時，把“文革”中批判劉少奇“先機械化，後合作化”的政治運動，轉變為深入揭批“四人幫”，批判“四人幫”是破壞農業機械化事業的罪魁禍首，是他們“整個篡黨奪權陰謀活動的組成部分，妄圖搞垮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物質基礎”，繼續認為農業機械化是一場“偉大的革命運動”。直到黨中央《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明確指出，“1980 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口號是脫離實際的以後，農業機械化不是“革命運動”，而是社會、經濟、技術發展過程的觀點，才逐漸為更多同志與領導所接受，逐步採取了一系列有利於農業機械化健康發展的政策，主要是：

農業部 1979 年 9 月 14 日向國務院、黨中央的請示報告，“1980 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這類口號不宜再提了。提出農業機械化必須與農業的區域規劃和耕作制度的改革緊密結合，與開展多種經營和發展社隊工業結合、同農業的專業化、經營的多樣化結合。1979 年 8 月 28 日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提出“要積極地有計劃地開展農業機械化”，不再提“1980 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以後在趙紫陽公開的正式報告中和中共中央關於農村問題的一號文件中，提出“有選擇地推進農業機械化”，以選擇性機械化戰略替代了脫離實際的全國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戰略。

鄧小平 1980 年 5 月 31 日提出“廣義的機械化，不限於耕

種收割的機械化”，1982年4月27日國務院通知，農業用拖拉機從事非營業性運輸的範圍，打破拖拉機不可以從事運輸的界限。1984年2月27日國務院發出關於農民個人或聯戶購買機動車船和拖拉機經營運輸業的文件，允許農民個人從事營業性運輸，包括貨運和客運。再次打破了拖拉機不能從事運輸的桎梏和大型生產資料、拖拉機不能私人購買的框框。

從客觀決策上，不再將農業機械化作為階級鬥爭的手段，大搞“革命運動”、“群眾運動”限期完成政治任務的指標，而承認農業機械化需遵循客觀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要按照科學的農機化區劃確定不同地區的農機化重點、步驟、方法與機具系統，採取選擇性機械化戰略。

在微觀決策上，允許農戶個人購買農機，農業機械化將根據農民個人的經濟效益由農民選擇合適的機具、發展速度、規模與經營組織形式，領導部門只是在農民選擇的基礎上進行再選擇、加工、引導。是市場而不是長官意志決定一切。

因此，建國50年來的後期20年，農業機械化的發展在接受了過去30年正反面經驗的基礎上有了更多的成功經驗與新的成就。

回顧過去，往事如煙，劉少奇當年提出的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批判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的正確性，被“包產到戶”的成功實踐所證實。鄧小平提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批判劉少奇的“先機械化，後合作化”的論點，實際上是錯誤地批判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改變生產關

係的正確觀點，劉少奇提出的“我國的基本口號是民主化和工業化”，仍是值得思考的。人民公社化和孤軍深入的“1980 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戰略，是一朵不結果實或得不償失、留下沉重後遺症的花，從反面證實了劉少奇反對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的正確性和歷史意義。也證明地域性差異極大的中國，只能選擇性機械化、現代化。這些歷史教訓，證明了毛澤東左傾路線是完全脫離中國實際和客觀規律的，帶給中國的是大災難。

農業機械化將按照客觀歷史規律、經濟規律、自然規律，曲折地、艱苦地但是勝利地前進，而不是按照某個人的主觀意志確定或變更其發展道路與目標。人民是歷史的主人，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被稱為“人民大救星”的毛澤東實際上是大災星。一切裁判中，最公正的裁判是時間，是歷史。

（1998 年第一稿，2012 年修改）（姚監復）■

注釋：

- 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431、451 頁。
- 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326 頁。
- 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7 卷，第 148 頁。
- 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502 頁。
- 5, 《關於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方針》，《劉少奇論合作社經濟》第 47 頁，中國財經出版社。
- 6, 轉引自余廣人：《對劉少奇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再認識》，《炎黃春秋》，

1998年8月。

- 7,《劉少奇選集》下卷,第5頁。
- 8,《新華文摘》,1998年6月,第76頁。
- 9,《新華文摘》,1998年7月,第77頁。
- 10,《劉少奇選集》下卷,62-63頁。
- 11,《劉少奇選集》下卷,第62頁。
- 12,《新華文摘》,1998年6月,第78頁。
- 13,《人民日報》,1966年2月5日,編者按。
- 14,《劉少奇選集》下卷,第474頁。
- 15,《毛澤東建國以來文稿》第12冊,第21--22頁。
- 16,《中國農業機械化重要文獻資料彙編》,第625頁-626頁,北京農業大學出版社。
- 17,《中國農業機械化重要文獻資料彙編》,1988年4月,第625-626頁。
- 18,《中國農業機械化重要文獻資料彙編》,第627頁。
- 19,《中國農業機械化重要文獻資料彙編》,第628頁。
- 20,《中共中央關於農業機械化問題的意見》,1958年3月22日成都會議通過,4月8日政治局會議批准。
- 21,《人民日報》,1966年4月9日。
- 22,《中國農業機械化重要文獻資料彙編》,第247頁。
- 23,《中國農業機械化重要文獻資料彙編》,第181頁。
- 24,《中國農業機械化重要文獻資料彙編》,第617頁。
- 25,《劉少奇選集》下冊,第473—475頁。
- 26,國務院1971年12月3日關於加速實現農業機械化問題給毛主席、中共中央的報告。
- 27,《中國農業機械化重要文獻資料彙編》,第628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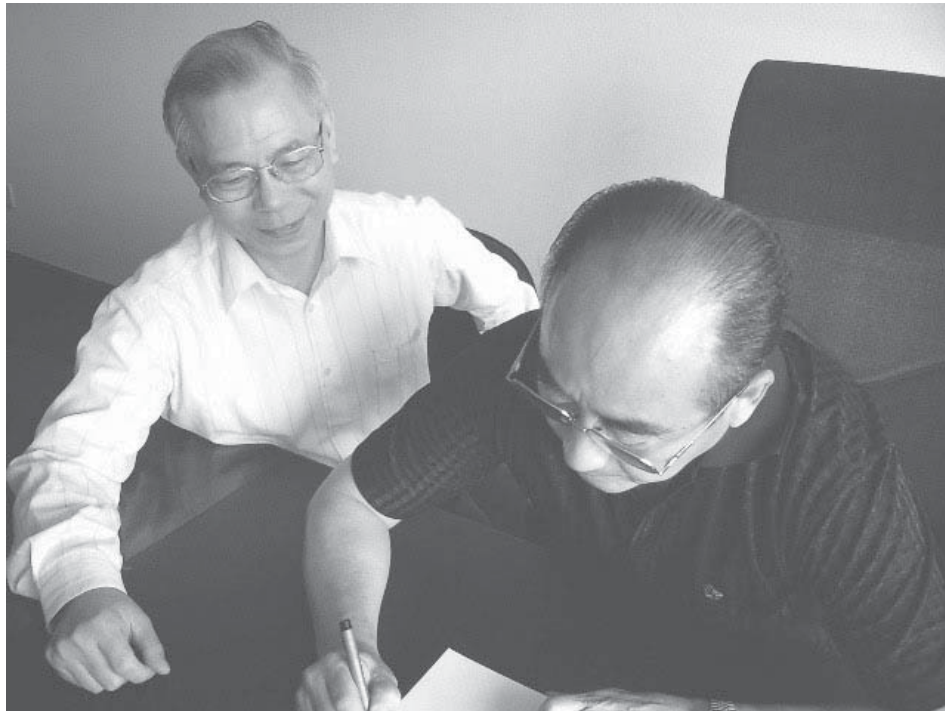
毛澤東吃過安眠藥準備睡覺時，順手翻看擺在床頭的《參考資料》，無意中在 78 頁看到莊則棟與科恩結交的消息，脫口感嘆道：“我的莊爺爺！”他感到莊則棟這個打乒乓球的小青年做到自己心坎上去了

毛澤東叫他“我的莊爺爺！”

——大起大落的莊則棟

兩個女人人生階段中重要男人

2012年2月9日，壬辰龍年的最後一天。除夕夜，在北京佑安醫院一間病房，一位叫“鮑蕙蕎”的女人帶來一頓豐盛的年夜飯，說：“敦子夫人太勞累了，我們怎麼也要吃頓團圓飯。”不過，這頓年夜飯，只是一個象徵意義罷了。鮑蕙蕎，或是敦子，現在哪有什麼心思品嚐豐盛菜餚。至於病房裡的這個叫莊則棟的病人，這兩個女人各自人生一個階段中最重要的男人，更連張開口的力氣也沒有了。



何與懷 2003年9月在北京拜訪莊則棟。



莊則棟與妻子佐佐木敦子。

據悉，前一天中午，莊則棟病情急轉直下，院方通知家屬考慮準備後事。在敦子趕回家中取衣服的兩個小時裡，莊則棟不斷用微弱的聲音呼喚著夫人的名字。他執意讓人用手機撥通電話，用最後的力氣慌亂地呼喊：“敦子，你快回來吧，快回來吧……不然咱們就見不上了。”敦子趕回病房後，他才安靜下來，閉著眼睛緊緊拉著敦子的手。他同時伸出另一隻手，兒子莊飈握住。守在身邊的人問道：“你拉的是誰的手？”也許是潛意識起作用，莊則棟回答說是前妻。站在旁邊的鮑蕙蕎趕緊上去，從莊飈手裡接過這只曾經叱吒風雲但現在一分鐘一分鐘地枯萎下去的手，喉嚨有些發梗，說：“我是蕙蕎。”……

2月10號，癸巳蛇年大年初一，莊則棟永遠合上了雙眼。

中國官方媒體北京 2 月 10 日電：“中國乒壇宿將、中美乒乓外交功臣莊則棟，在與癌症病魔作了頑強抗爭後，終因治療無效，於今天下午 17 點 06 分在北京病逝，終年 73 歲。”電文 60 個字，但這 60 個字如何能夠概括得了莊則棟大起大落的悲劇人生？！

永久的“聖布萊特杯”

五六十歲以上的中國人，沒有誰不知道莊則棟的大名的。

1961 年，北京承辦第二十六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這是中共政權成立以來首次承辦大規模的國際比賽。比賽中，21 歲的莊則棟與隊友過關斬將，最終擊敗稱霸世界乒壇多年的日本隊，首獲男團冠軍。在單打比賽，莊則棟勢如破竹，脫穎而出，第一次登上男單世界冠軍寶座。在視體育也是政治的中國，這個勝利非同小可。特別是，當時的中國大陸，久與世界隔離，又正值大饑荒，內外交困，焦頭爛額，一個冠軍的獎盃就猶如一支起死回生的強心針，讓舉國上下興奮莫名，生活在困難時期的幾億人餓著肚子為莊則棟和他的隊友雀躍歡呼。筆者當時就讀於天津的南開大學，大部分同學都已餓得浮腫了，但那些天一有空便圍在收音機跟前收聽比賽實況轉播。記得莊則棟取得勝利那晚，大家紛紛從宿舍跑出來，在春寒料峭中盡情地敲著臉盆飯碗狂歡慶祝。

此後，在整個 60 年代，莊則棟步步走向巔峰。他橫睨群



毛澤東接見莊則棟。

雄，所向無敵，國家隊內部三連冠、全國三連冠、世界錦標三連冠盡收囊中。從 1961 年到 1971 年，以莊則棟作為主力的中國乒乓球隊，四奪世乒賽男團冠軍。1973 年，國際乒聯永久地授予他一座複製的男單獎盃“聖布萊特杯”。

“我的莊爺爺！”

1971 年，莊則棟一個事先完全沒有料想到的意外的舉動，更讓他成了參與國際政治的風雲人物。

那時，在日本名古屋正在舉行三十一屆世乒賽。一天，一個美國運動員無意中錯上了中國代表團的車，全車的中國人沒

有一個敢打一聲招呼，一片沉默和尷尬。在難以忍受的漫長的十分鐘之後，莊則棟向他走了過去。當時車裡的人紛紛發出善意的警告：小莊幹嘛去？別去！別惹事！別理他！當時文革中，階級鬥爭這根弦繃得特別緊，人人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和“頭號敵人”往來，這能行嗎？但莊則棟還是向前走去，通過翻譯向這個叫科恩的美國選手說：為了表達對美國人民和運動員的友誼，我送你個禮物作紀念……

中美兩個敵對國家的運動員交往，果然引發了國際輿論的極大關注，種種揣測紛至沓來、興風作浪、沸沸揚揚。不過，此時忙於文革的中國國內有關當局卻沒有意識到這一事件的巨大價值。幾天後，外交部收到美國乒乓球隊希望訪華的報告，還是依慣例決定給以否定的答覆；周恩來、毛澤東也先後批示，同意外交部的意見。但是，在批覆這個報告當晚，奇蹟發生了。毛澤東吃過安眠藥準備睡覺時，順手翻看擺在床頭的《參考資料》，無意中在 78 頁看到莊則棟與科恩結交的消息，脫口感嘆道：“我的莊爺爺！”他感到莊則棟這個打乒乓球的小青年做到自己心坎上去了。本來毛澤東說過，他吃過安眠藥後說的話不算數。但這次例外。他收回成命，迅即下達同意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的決定。很快，同年 4 月 10 日，美國乒乓球隊到達了北京，7 月和 10 月，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兩度秘密訪華，翌年 2 月，美國總統尼克松正式到中國進行國是訪問，雙方發表了指導兩國關係的《中美聯合公報》……一個歷史的轉捩發生了，世界格局出現原先絕對無法想像的大變化。

“此人有點政治頭腦”

這就是人們說的“小球轉動大球”。毛澤東後來帶著滿意的笑容說，這個莊則棟不但球打得好，還會辦外交，“此人有點政治頭腦”。此後莊則棟的命運便發生了一次大起大落的奇特的變化——“乒乓外交”使他一夜之間成了中國政壇上迅速升起的一顆新星，也釀造了他人生一個大悲劇。

就因偉大領袖毛主席一句話，莊則棟於 1973 年成了中共中央委員，1974 年開始進入國家體委領導層，不到一年之後，只不過 33 歲，便官至國家體委主任，可謂年少得志，意氣風發。不料，又不到兩年之後，政治風雲突變，1976 年 10 月，當大多數中國人都在為粉碎四人幫而興高采烈時，莊則棟卻從體委主任高位黯然直落成了被監管分子。莊則棟無法明白自己何錯之有，自己一心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怎麼一夜間就變成了“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幫兇？！1977 年 5 月 22 日，又絕望又想不通的莊則棟用一根尼龍繩自殺，雖然沒有死成，但此時的前世界冠軍成了什麼樣子可想而知。

在被隔離審查四年之後，他被發配山西等候結案，那是 1980 年 10 月。又過了三年，在 1983 年，莊則棟回到北京回到 30 年前學習乒乓球的市少年宮任教。人生又回到原點，一切政治活動和榮譽都再也與他無關，包括紀念“乒乓外交”的活動。經過文革十年，他和鋼琴家妻子鮑蕙薈的感情也破裂了，再生活在一起已經沒有意義。最後，在 1985 年，莊則棟與

鮑蕙菁 22 年的婚姻終於走到了盡頭。當他離開鮑蕙菁家的那個小院子時，他的全部財產只夠放一輛三輪車，這輛車還是他自己蹬著走的。他回到北京交道口他母親的家裡，住進了一間十平方米的小房子裡。當然，在他的微薄的財產中，他還有自己視為最珍貴的當年他與毛主席、周總理的合影。

鄧小平親自批准與日本人結婚

在人生低谷中，幸好這時莊則棟遇到了他原先的球迷、日本姑娘佐佐木敦子。敦子小時候在中國長大，能講一口流利的漢語。1971 年中國乒乓隊在名古屋比賽時，回到日本的敦子渴望見到第二故鄉來的親人，兩次坐夜車趕來，見到莊則棟，第二年在東京又見到一次。此後 13 年沒有見過面，但敦子心裡一直仰慕莊則棟。他們再見面的時候，莊則棟已經落難，年過 40 的敦子從來沒有談過戀愛，他們自然很快便墜入愛河。但因為莊則棟的政治問題，兩人的結婚申請竟遭遇到意想不到的難題，最後經鄧小平親自批准才得以通過。1987 年 12 月 19 日，在敦子放棄日本國籍加入中國國籍並定居北京，以及莊則棟同意不能出國這些條件後，他們終於成功舉行了婚禮。敦子是個典型的日本太太，當初為了結婚，她曾專門在日本上過一個家政學校。在他們整潔溫馨的家裡，處處可以感受到女主人勤勞賢淑和二人世界的寧靜祥和。就在敦子的愛心陪伴下，莊則棟走完人生的最後 26 年——敦子是他晚年黃昏中



莊則棟送給何與懷的書：
《鄧小平批准我們結婚》。

的“長明燈”。

一個江青得心應手的工具

這許多年來，莊則棟總說，他要忘掉文革，不去想，也不去寫，這段歷史任由後人去評說。每天早晨，莊則棟都和敦子到小佛堂裡雙手合十敬佛祈福。他說他小時候曾經被班禪和達賴兩位活佛灌過頂，所以一生做成兩件大事：拿世界冠軍和促成乒乓外交。

2003年9月，我在北京曾經專門去拜訪過莊則棟。他送給我的書是他和敦子合著的《鄧小平批准我們結婚》，書中當然不提他文革“飛黃騰達”的事，我們也不談及。不過，我心

裡一直疑問：莊則棟可以徹底擺脫文革的夢魘嗎？

在澳大利亞以及西方其它國家，不乏各行各業的明星因為個人對政治感興趣，而且實在有政治才幹，進而通過個人奮鬥，包括善於利用本身的明星效應，改行步入政壇，並取得出色的成就。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國的里根先生。這位二三流的電影演員，竟華麗轉身變成絕對一流的政治家，成了美國歷史上傑出的總統，他的貢獻甚至伸延到促成“柏林牆”的倒塌。中國的情況卻不同。莊則棟便是一個很好的反面例子。

這個原本單純、熱情、朴樸素的青年，在 30 歲以前只是一個乒乓天才，而對於政治，他的全部經驗只不過是來自文革開始時，每一個中國人所耳聞目睹的一切——政治就是站隊，站錯隊就要倒霉。他看到，跟劉少奇，劉少奇一完，下邊就是一連串的大大小的被鬥得不可開交的“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跟林彪，林彪一倒，他的“四大金剛”都全部落進“林彪反革命集團”。而這一切都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英明決策。那麼，跟著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同志絕對不會錯吧？這裡有一件事是最致命的。1973 年，莊則棟被派往“中央讀書班”學習，學的第一個文件就是《毛澤東致江青的信》。毛澤東在這封日期定為 1966 年 7 月 8 日的信中，把他稱之為“現在不能公開”的“近乎黑話”的內心想法，當然也就是關乎中國全國人民命運的國家絕對機密，都掏出來對江青說了，所以莊則棟把江青他們看作毛主席最信任的人來對待，是最自然不過的。後來過了許多年，莊則棟回憶起都說，這個經歷對自己影響

“真是很大”。

江青當時著意培養自己人，而且要以最快的辦法。她看中了年輕單純的莊則棟。1974年12月莊則棟出任國家體委主任時，她告訴小莊：“你年輕，很多事情不懂，什麼時候有問題找我們，都見。”可以說，當江青選擇了他時，莊則棟已經無從選擇。他成了一個工具，一個江青得心應手的工具。像那個年代許多被“四人幫”拉攏的幹部一樣，莊則棟上任後也著了魔似地推行“四人幫路線”，更換了很多幹部，開始他所謂的“體育革命”。他後來說，“我有私心雜念，就是想要在複雜的政治鬥爭中跟對人，別犯錯誤。”不料正是跟了江青他們，一失足成千古恨，鑄成人生大錯。

鮑蕙蕎提醒丈夫要和江青保持距離

俗話說，知夫莫如妻。莊則棟當上了中共中央委員，又做到了部長級別的體委主任，但鮑蕙蕎憑著一個女人的直覺，對那些東西很不感興趣。她一再提醒丈夫，要和江青保持距離，千方百計要把丈夫拖到她的安全島上來，但莊則棟認為，跟著“第一夫人”，政治上安全。

在那個惡夢般的年月裡，他們常常爭執，鮑蕙蕎常常傷心流淚。政治上的悲劇導致了家庭生活的悲劇，裂痕最後難以彌合。妻子覺得丈夫不是搞政治的料，這倒是其次，她感到最可怕的，是丈夫這個人變了，她最珍視、最喜歡的東西在丈夫



鮑蕙蕎與莊則棟。

身上沒有了，而不喜歡的東西越來越多。從那時起，鮑蕙蕎和莊則棟之間就有了分歧，感情也逐漸產生了裂痕。鮑蕙蕎對那段日子這樣回憶道：

最初的那種幸福與甜蜜早已遠離了我。我突然想起我生第二個孩子瀾瀾的時刻。那時莊則棟已是體委主任，他被那群沒有人味的人綁上了戰車、捧上了天，自己還在飄飄然之中。在分娩前，他匆匆地對我說：“我還要去會見外賓，我先走了。”我一個人留在醫院，獨自忍受了分娩時的擔憂、恐懼和痛楚，眼淚禁不住流了下來。一個下午，遲遲不見他來，後來，他終於出現在產房裡。他背著手，不像在看自己的妻子，倒像一個

大幹部在巡視工作，身後還跟著一位最能標誌首長身分的隨從。我實在感覺不到有半點溫暖。當年那個真誠、熱情、羞澀的青年，怎麼在他身上連點影子都沒有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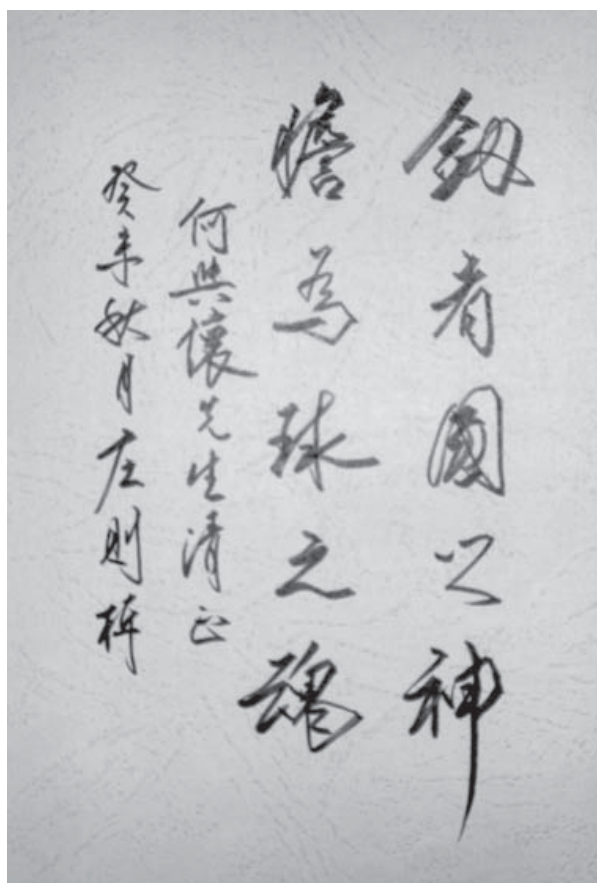
十年“文革”，丈夫離她越來越遠。“文革”結束後，最艱難的時候已經過去了，為什麼一定要離婚呢？鮑蕙蕎說：

“我在最困難的時候沒有離開他，是因為我的性格不允許自己那樣做，不是出於愛情，只是一種道義上的責任。關於我的婚姻，我曾經在接受一家日本電視台採訪時，做過一個比喻：我的家庭是一隻小木船，在漩渦裡頭旋旋旋，最終雖然又旋出了水面，但船上的一切東西都和以前不一樣了，不可能再回到原來的位置。”

這個比喻可能只有切身體會的人才會想出，可以感受得到鮑蕙蕎的無限惆悵。他們是在1959年維也納第七屆世界青年聯歡節上認識的，當時大家都不到20歲。1961年，鮑蕙蕎在埃涅斯庫國際鋼琴比賽中獲獎，在中國音樂界引起一陣的轟動；此時，莊則棟剛好第一次獲得世界乒乓球男子團體和單打的冠軍，一下子成為民族英雄和很多女孩子的偶像。1962年春節，在北京市委舉行的春節聯歡會上，兩人再次邂逅，其後正式確定戀愛關係。當年，他們的愛戀曾引起多少人羨慕啊。真是一對金童玉女！可是，文革之後，當年的青春純潔、錦繡年華、幸福嚮往，早已消逝得無蹤無影……

莊則棟對文革的這一段經歷“沒有反思”

莊則棟弄到妻離子散，甚至差點以自殺了結自己尚還年輕的生命，他政治上的悲劇，家庭生活的悲劇，讓人不勝感嘆。但是，在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這場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多少民眾受到慘無人道的迫害！比莊則棟更慘得多的悲劇千千萬萬，簡直無法計算！就說當時的中國乒乓隊，傅其芳、姜永寧、容國團等名將，莊則棟的教練和前輩，在文革中



莊則棟寫給何興懷的題籤。

慘遭批鬥，蒙受種種羞辱、冤屈，短短幾個月內就相繼上吊自殺了。

莊則棟說他要忘掉文革，不去想，更不會去寫，以拜佛取得內心的平靜。筆者作為一個同時代人，充分理解他的處境他的難處，但是，如果對他作更高的要求——他作為文革時期一個標誌性人物，是應該有更高要求的——那麼，他在歷史面前，似乎欠缺了什麼。不少人也有這個看法，例如，鳳凰衛視的著名主持人陳魯豫。她採訪過莊則棟三次，她個人的感覺是，莊則棟對文革的這一段經歷“沒有反思”。他覺得政治就是跟人，跟對人，就往下走；跟錯了，就倒霉。莊則棟給陳魯豫講過一件很具體的事，就是他特別敬重的大人物都可以隨波逐流，都可以根據需要去表態，他“也就無所謂了”。

這就涉及到對文革的認識；涉及到對毛澤東的認識。今天有識之士都認為，文革是毛澤東極左路線不斷惡化的必然結果；文革是無法無天，是個人崇拜，是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為最大特徵的毛澤東思想的登峰造極。至於江青和毛澤東的關係，江青在 1980 年公審時用了一句既形象生動又透徹準確的比喻已，經說得很清楚：“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他叫我咬誰我就咬誰。”

不過，行文至此，我突然感到，也許，我們還是不應該因為莊則棟欠缺文革反思而對他過於責怪。看看這幾年，薄熙來的“唱紅打黑”這種文革借屍還魂的把戲不是還受到許多官員和民眾熱捧嗎？今天即使在薄熙來經已暴露的罪行已屬天理

難容的情況下，不是還是有人叫嚷“當官要學薄熙來”嗎？再進一步說，雖然 30 多年前就明言要“徹底否定文革”，但 30 多年來，文革卻一直是一個不能摸觸不能公開探討的“禁區”，這不是當代中國政治生活中一樁很難自圓其說的咄咄怪事嗎？再看看今天的中國，不少明星、名人像莊則棟一樣，被挑選當上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或安排在政府部門從政，他們不管在“兩會”或在其它國內國際場合，經常是在簡單地重複官話，根本提不出自己的什麼見解。有一位被戲稱為“活化石”的全國人大代表申紀蘭，從 1954 年第一屆連任至今 2013 年第十二屆，而且以“當代表就是要聽黨的話”“從來沒有投過反對票”來標榜自己。這種天下罕見的類似的“奇蹟”不是天天還在發生嗎？

既然如此，要求莊則棟反思文革，又有多大意義呢？就讓我們以寬容體貼之心對待這位乒乓天才吧。莊則棟臨終前一天，當他急切盼望見到的大師兼好友范曾來到病榻前為他畫素描時，竟然出乎人意料之外堅持坐了起來，極力睜大雙眼，力求給人留下自己最佳狀態的形象。就讓我們記住他這種精神吧，就以范曾給他送來的題字紀念他：“小球推大球，斯人永不朽”！（何與懷）■

中國革命讓一個洋人突然之間升到雲端，又一下子摔到谷底；他見證了兩場 20 世紀最具災難性的事件：“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兩度入獄長達近 16 年，卻依舊對中國革命難以忘情

一個洋人的中國革命之路

對於革命，他曾經抱有熱烈憧憬，但對於革命的殘酷，他至今懊悔不已。他是 Sidney Rittenberg，但中年以上的中國人更熟悉他的中文名字——李敦白，一個傾情投入中國革命事業，卻也兩度入獄的共產黨員；一個參與寫下中國歷史的美國人。如今，一部名為《革命者》（The Revolutionary）的紀錄片問世，鏡頭前，李敦白悠悠訴說著自己大起大落的經歷與人生感悟。

26 小時的訪談

1983 年，當奧斯蘭德（Lucy Ostrander）在製作有關 20 世紀美國左派記者安娜·路易絲·斯特朗（Anna Louise



92 歲的李敦白。

Strong)的紀錄片時，接觸到中國與蘇維埃革命的資料。斯特朗曾在延安採訪毛澤東，當時她的中文翻譯是李敦白。

奧斯蘭德隨後發現，李敦白早已回到美國定居，因此對李敦白做了採訪，但當時奧斯蘭德對李敦白不尋常的人生經歷一無所知，因此整場採訪的重點只放在斯特朗。

21年後，奧斯蘭德的丈夫塞勒斯(Don Sellers)在《紐約時報》上發現一篇有關李敦白的報導，報導介紹了一些美國企業出於拓展中國市場的需要，紛紛聘李敦白擔任公司的顧問，這些企業包括微軟、英特爾、華納音樂等大廠牌。奧斯蘭德還從報導中得知李敦白就住在附近，因此帶著斯特朗的紀錄片再去拜訪李敦白。

這次的拜訪，促成了奧斯蘭德為李敦白製作紀錄片的決心。深受李敦白故事吸引的奧斯蘭德，找來著名媒體人德拉寧(Irv Drasnin)拍攝此片。德拉寧為獲獎紀錄片製片人、新聞記者，拍攝過許多與中國、美中關係相關的影片，如第一部旨在改善美中關係的美國紀錄片《對中國的誤解》(Misunderstanding China)，其他還包括《上海》(Shanghai)、《尋找毛澤東》(Looking for Mao)、《天安門之後的中國》(China After Tiananmen)等。

2005年開始，拍攝團隊共對李敦白進行了四次訪談，訪談時間共長達26小時，最後剪輯成90分鐘的《革命者》。德拉寧在接受《新史記》記者採訪時表示，對任何一位記者或紀錄片導演來說，最具挑戰性的，可能就是什麼材料該保留、什

麼該刪除，又如何把所有材料整合起來。

“你不可能把所有獲得的材料都用上，這是無法避免的情況，但每次編輯時所下的決定，都是為了訴說一個具有連貫性的故事，這個故事還要盡可能符合事實。這是一個反覆編輯材料的過程，它可以很簡單，也可以很困難。”德拉寧說。

在剪輯《革命者》時，德拉寧對《新史記》指出，他們並未事先訂定任何大綱。“我們希望盡可能由影片來訴說自己的故事。從美國新聞傳統的角度來說，李敦白並不屬於編輯過程的一份子，他也不會涉入這個過程，在紀錄片製作完成並公開上映前，他都沒看過影片或片段。”

第一堂課就愛上中文

現在年輕一代的中國人或許不那麼熟悉李敦白的名字，但這位“第一個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美國人”，在 1960 年代曾是家喻戶曉的人物。

1921 年出生於美國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Charleston)一個猶太家庭的李敦白，自從進了北卡羅來納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Chapel Hill)後，開始走上一條不平凡的人生道路。

李敦白 17 歲開始就專注工人運動。19 歲那年，李敦白成了美國共產黨員。當時，雖然念的是哲學，但李敦白對社會運動更感興趣。他參加了大學的政治社團活動，並受到工會組



李敦白在斯坦福學習中文。

織者卡本特(Carpenter)的注意,卡本特寫了一封信給李敦白,詢問是否能幫助他們的紡織廠組織工會,可以讓工人的薪資得到提升。李敦白答應了。

李敦白很快發現自己成了全職的勞工和民權活動家。當時美國社會正掀起一股工人要求提升最低工資和維護工人權益的風潮,李敦白加入了工人的陣營,紡織廠外,他還為公車司機、菸草、鋼鐵工人等爭權。

二次世界大戰初期,李敦白脫離共產黨籍、申請加入軍隊。他被派往美國西岸,在斯坦福大學學習中文,美國女記者兼作

家斯特朗是他的老師之一。第一堂課，李敦白就完全愛上了中文。接著，他被派至中國從事翻譯工作，1945年，即使二戰已經結束，深愛中國文化的李敦白決定留下。

當時，一位中共領導人找到李敦白，問道：“我應該把你留在這裡，還是讓你在明天離開？”李敦白問：“我能做什麼？”對方說：“我們缺工程師。”李敦白稱，他不是工程師，對方回應，不是那種工程師，他們需要“為中國和美國人打造橋樑”的工程師。李敦白一聽，表示：“我非常樂意留下，但有一個條件，就是入黨。”

為了留在中國，李敦白先是設法調到上海的美軍陸軍總部，後又成為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駐華辦事處的觀察員，負責將糧食送至包括解放區在內的災區。李敦白在紀錄片中說，決定留在中國，他當時沒有一絲猶豫，他覺得自己做了該做的事。對於美國人的不認同，他說，當初組織工會時也有人站在反方，總是這樣，他已經習慣了。

李敦白的“工程師”身分，引領著他走入創造中國歷史的篇章。他花了45天的時間，從張家口步行走到延安，到延安的第一天他就見到了毛澤東。李敦白說，看到毛澤東，感覺很像看到一張“從歷史走出來的照片”，他覺得，如今自己也是歷史的一部分了。

毛澤東對李敦白所講的第一句話，就是“如果你不反對，我想讓秘書跟你約個時間，花一兩天，跟我講講美國的事”。李敦白說，在所有外國中，毛澤東最感興趣的一直是美國。毛

澤東雖然想要與美國接上線，但美國拒絕與革命的中國合作。

李敦白認為，毛澤東試圖與美國和歐洲建立良好關係，因為他不希望在中共取得政權後，還繼續依賴蘇聯，因此當時的中共很開放，但美國忽視這點，因為美國用意識型態的眼鏡看事情。

美軍帶來的好萊塢電影，對於在延安的中共黨員來說是件新鮮事。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會在美軍聯絡中心看電影，由李敦白當翻譯，當時最受歡迎的電影是《勞來與哈代》（Laurel and Hardy）。

第一次入獄

對外的抗日戰爭和反法西斯世界大戰結束，中國的國共內戰接著上演，最終導致政治風向的改變。1949年，在莫斯科編輯英文報紙《莫斯科新聞》的斯特朗，被蘇聯當局指控從事間諜活動，李敦白因此受波及，被斯大林指為美國間諜並遭到逮捕。

李敦白在紀錄片中回憶，有一日，他聽到外頭傳來持續的聲響，有人踩著石板而來，門打開後，一名戴著厚鏡片的中年男子出現，男子“車輪般的大眼”令李敦白印象深刻，他拄著一根甘蔗，指著他，用如雷的聲音說：“李敦白，我們奉中國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命令來逮捕你，你接受美帝國主義的任務，破壞中國革命。”聽到這番話，李敦白大吃一驚。

李敦白在獄中待了六年。“你每天坐在那，對面坐著的是另一個可能會發瘋的你，他看著你，你知道，最後瘋掉的不是你就是他。”不過，另一方面，李敦白認為，只要中共調查得越多，就越能發現他說的是實話。

到斯大林死後的 1955 年 4 月，李敦白才獲釋。德拉寧問：“為何中國政府最終讓你出獄？”

李敦白回答：“因為斯大林終其一生做了一件最好的事，他死了。”

李敦白回憶道，一日，獄卒進來跟李敦白握手，說：“我們現在基本瞭解你了，別擔心那些我們以前問你的問題，現在都很清楚了。但是我們還要收一下尾，這需要很大的工作量，在這段時間，你不能出去。但我們會盡可能給你提供閱讀的條件。”李敦白可收到閱讀和寫作的材料，他也有桌椅、有燈。

獄卒對李敦白說：“你可以在這裡讀書直到案子解決，或者，可以忘了中國，回美國去。”李敦白答道：“我要坐在這裡讀書。”

許多人無法理解：李敦白為何蹲了五年多冤獄後，還會選擇留在中國？有人認為，如果他具有遠見的話，早該在 1955 年被釋放後就立即離開中國。德拉寧對《新史記》表示，李敦白會做出留在中國的決定，或許是因為他決定向自己、也向中國領導證明，他所相信的道路是值得的。

毛澤東、周恩來後來甚至向李敦白當面道歉，承認先前犯了錯誤，誤將李敦白逮捕入獄。1964 年 1 月，毛澤東宴請了包

括李敦白和斯特朗在內的外國朋友，毛澤東對李敦白說：“我們犯了一個很壞的錯誤，你是一個好同志。”

“他是一個‘真正的信仰者’（true believer），對他來說，中途退出，等於承認他錯了、承認他是一個‘失敗者’。”德拉寧說。

備受黨的信任

李敦白入獄期間，他的第二任妻子因為長期與他分離而離異。出獄後，李敦白在北京廣播電台獲得一份工作，他也是北京廣播電台英語部中唯一的一位中共黨員，在那裡，他遇到了現在的妻子王玉琳。

李敦白回憶，他當時到主任辦公室瞭解他的新工作，一位22歲的年輕女孩為兩人倒了茶，走出辦公室時，她並未把門關緊，因此李敦白聽得到門外的談話。

門外的四名秘書討論著李敦白的前妻，並因此有了爭論。其中一人說，不能責怪他的前妻，因為李敦白失蹤了整整六年。接著，另一個聲音響起：如果你真愛一個人，六年、十年、20年都該等！這個聲音引起李敦白的注意，但另一個人的回應也讓李敦白印象深刻：“在我看來，你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是不是敵人，也太愚蠢了。”

由於工作關係，李敦白與王玉琳多有接觸，也有著共同興趣，最終，兩人決定攜手下半生。

李敦白在北京廣播電台不只是播音員，還是中共重要文件與毛澤東作品的翻譯員，備受黨的信任，他甚至拿著比毛澤東還多的薪資，過著比一般人要好的生活，但政治風暴始終沒有平息。

李敦白經歷了“大躍進”，這場運動也為中國帶來極大災難。李敦白回憶，村中壯丁都出外去找礦煉鋼鐵，種莊稼都落到老人與孩童肩上，這導致了大飢荒，數千萬人餓死。

一夕之間家喻戶曉

1966 年到 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讓李敦白突然之間升到雲端，又一下子摔到谷底。“文革”一開始，官方告誡外國人遠離這場運動，但李敦白在周恩來的允許下，堅持參與這場運動。當時，革命造反熱火朝天，1967 年 1 月，李敦白與周恩來談話時，周恩來自豪地說：“看看現在的自由氣氛，每個人能說任何想說的事，美國總統能做到這樣嗎？他們能容忍白宮外貼大字報嗎？”

李敦白對“文革”充滿熱情，認為這場革命就是為了打造一個新的民主社會主義世界。當他發現，作為一名外國人，自己不在革命和改造的對象之列時，李敦白進行了一場自我批判：他貼出大字報，指出自己的缺點與錯誤，誓言和“造反派”一起並肩作戰。

《人民日報》1967 年 4 月 8 日刊登了李敦白的《中國文化



李敦白在“文革”中成了名人。

大革命打開了通向共產主義的航道》一文，他也積極參與了批鬥王光美、陳毅、陸定一、梅益等人的大會。

當時廣播局有兩個群眾組織，李敦白說，一個是由廣播局黨委書記指使組建而成，因此被視為“舊黨委”的忠實追隨者，

一個是造反派。

兩個組織無可避免地產生了激烈衝突，李敦白身處造反派陣營中，主張用民主方式消除分歧，但終究未有成效。一次在大禮堂中，兩派人馬互相叫陣，械鬥一觸即發，李敦白決定挺身而出。

拿到麥克風的李敦白說：“年輕人（紅衛兵）是革命的接班人，我們應該用毛主席給我們的民主權利，勇於發出聲音，揭露走資派見不得人的勾當！”

有人將李敦白的演說錄了下來，這段錄音傳遍中國，李敦白一夜之間成了名人，成了毛澤東口中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1967年2月，中央文革小組在廣播事業局成立了一個由造反派代表組成的“三人小組”，李敦白被任命為一號負責人。

擔任要職的李敦白四處演講，台下觀眾從學生到黨員都有；他走在街上，會被認出來索要簽名。李敦白說，這是他該扮演的角色，所以他總是穿著西式服裝，而非中式服裝，“我希望被看成是為中國革命奮鬥的美國人。”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的口號就是“造反有理”，李敦白說，雖然沒有人明說，但“文革”等於一場對共產黨的革命。“文革”造成許多人家破人亡，李敦白曾試圖抗議和制止這些暴力行徑，也因此受過傷，但他最終放棄了，因為他認為，毛主席說得對：“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不過，對於那些他曾批鬥過的人，李敦白還是感到抱歉與懊悔：

“這些都是很好、無辜的人，我想那是我犯過最嚴重的錯誤。”

德拉寧對《新史記》記者表示，在紀錄片中，李敦白指出，在“文革”中，他對於正在上演的事或可能發生的事，存有妄想。他拋棄了對馬克思、恩格斯的信念，但也並非對毛澤東沒有任何批判。

“現在中共的政策和計畫在多大程度上還影響著李敦白，有時很難說。”德拉寧認為，持平來說，李敦白並未放棄他對革命或中共的信念或希望，實際上，關於今日中國正上演之事或其可能性，德拉寧和李敦白的意見並不總是一致。

第二次入獄

1946年，李敦白就在延安認識了江青，李敦白對她最初的印象，就是具有企圖心的女青年：“作為電影演員，江青天分不高，但作為政治演員，江青極具天分。”

“文革”演變到後來，原本的民主氣氛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專政。李敦白找到江青，對她說：“你不應該支持這些人，因為他們鎮壓反對者，他們不是在施行民主。”

沒多久，李敦白還發現江青在“三人小組”中安插自己的人馬、利用這個機構插手權鬥。李敦白說：“我真的犯了大錯誤，我應該在那刻抽身的。”但李敦白被權勢沖昏了頭，仍繼續停留在政治風暴中。

1967年8月，中央文革宣布解散“三人小組”，通知李敦

白有“特殊任務”，要他離開廣播局，李敦白真以為自己被賦予了其它重要任務。直到有一天，李敦白在英文版《北京周報》上看到，在一張中國領導人與外國友人的合照中的自己被塗黑。他知道不對勁了：這張照片兩周前剛發表，當時李敦白的人像還好端端的。

中央文革開始清查“五一六分子”。不久，李敦白被人從家裡帶到一間小辦公室，對方說：“李敦白，你被捕了！”李敦白就這樣從一個呼風喚雨的政治舞台上摔落下來。

命運一夕反轉的不只李敦白一人。此前令李敦白訝異的，就有劉少奇一夜之間從位高權重的位置跌下，最後被虐致死。李敦白明白了，不管你是誰，都不安全。

李敦白後來才瞭解到，江青早就秘密計畫將自己除掉，江青說：“廣播局竟被一個美國特務統治了半年。”

在李敦白第二次入獄時，王玉琳努力試圖證明丈夫的清白，她甚至寫信給周恩來請求協助，但“文化大革命”如此凶猛無情，讓王玉琳也受盡折磨，她曾被毒打，被迫掛上“帝國主義走狗死不悔改的老婆”的牌子，坐在女廁所門口，並被送到勞改隊。

在獄中，李敦白曾聽到婦女受虐的慘叫聲，李敦白愛莫能助，感到痛苦萬分。他甚至認為自己不可能活著出獄，因為就像神一般的毛澤東在同一個美國人身上犯了兩次錯誤，不太可能再次承認自己犯錯。

獄中的李敦白只能藉由《人民日報》瞭解外面世界。一

天，他突然發現報紙上不再有“文革”報導。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一個月後，“四人幫”被捕。第二年，李敦白出獄了，他是外國專家造反派中最後一個離開牢房的人。

“10月初某一天，我聽到一個熟悉的語調，來自中庭對面的牢房，那是江青！我立刻明白，如果她進來了，我就要出去了。”李敦白說。

被釋放後，李敦白對美聯社的記者說，他不能立刻回美國，因為他得把身體養好，並且瞭解中國在這十年間的變化。李敦白第二次入獄達9年8個月，兩次入獄的時間加起來長達15年11個月又14天。

回美展開新生活

李敦白原本站在極左立場上，但最終他重新思考了中共的本質，並離開生活了35年的中國。德拉寧對《新史記》表示，李敦白最後選擇離開的原因，是他發現第二次出獄後的中國，已經不是他1968年被捕前的那個中國。第二次出獄後的中國，已轉變為自私自利、消費主義的中國，並且因為“文化大革命”，帶有對黨的幻滅氛圍。

出獄後，李敦白先在新華社、中國社會科學院擔任顧問。他前往北京的美國使館，告知自己的護照丟失。取得新護照後的李敦白，在1980年3月17日帶著家人回到美國，展開全新的生活。

李敦白與王玉琳育有四名子女，在美國亞利桑那州定居。王玉琳教授烹飪，李敦白教授成人課程。後來，李敦白的人生再度與中國接軌，在美中關係上貢獻所長。他創立了一間公司——李敦白聯合公司(Rittenberg Associates)，對在中國做生意的美國公司提供諮詢服務。

李敦白的人生曲折起伏，他曾在“文革”中激烈批鬥他人，也曾擁護民主，他曾堅信革命，也因為曾讓無辜者受到傷害而自責不已。德拉寧對《新史記》表示，李敦白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他希望由觀眾自己來判斷。在德拉寧看來，李敦白是個



1966年10月1日，李敦白在天安門城樓上掏出“紅寶書”給毛澤東簽名。

複雜多面的人物，在人生旅途中做了很多一般人不會做的決定，有些決定是能夠理解的，有些決定則不是。

但重要的是，德拉寧說，李敦白是毛澤東歷史角色的見證人，也是一些事件——那些現在已從中國公共論述中消失的事件的見證者，包括兩場 20 世紀最具災難性的事件：“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前者造成空前的“人禍”，估計 3500 萬至 5000 萬人死亡；後者造成中國社會和中共的分裂，成千上萬的人死亡、文物遭到破壞。但在中國，卻很難找到這類資訊，不論是書籍、電影、博物館、網路；《革命者》也無法在中國公開上映，而這些，都是瞭解今日中國的重要元素。

可以肯定的是，李敦白是個有幽默感的人。德拉寧對《新史記》說，李敦白在四次訪談中講述了許許多多的故事，最後一次的訪談，李敦白花了幾個小時回答針對毛澤東時代的各種疑問，訪談快結束時，德拉寧問：“你對我們有任何問題要問嗎？”李敦白答道：“有，我們何時吃飯？”

毛是偉大領袖也是重大罪犯

對毛澤東，李敦白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請他簽名的那一刻。1966 年 10 月 1 日，李敦白和其他五名外國友人受邀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7 周年慶典，並與毛澤東合影。李敦白掏出《毛主席語錄》“紅寶書”請毛澤東簽名，毛接過李敦白遞上的圓珠筆時問：該寫些什麼？李敦白登時腦

袋空白，說：簽個名就好。“那是我一生中最愚蠢的時刻”，李敦白懊悔當時為什麼沒請毛澤東寫些話。

李敦白說，毛澤東喜歡開會，喜歡以生氣勃勃又民主的方式討論為什麼他的政策是正確的、哪些人、哪些地方沒遵照他的政策走，或指出黨什麼地方該改進——唯一一點，不能反對他的政策。

毛澤東也善耍謀略。李敦白說，毛澤東設法讓每個人都說心裡話，但有一天，他大刀一揮，突然禁止任何批評，禁止在辯論會上發言，目的是為了剷除反社會主義分子。

李敦白印象中的毛澤東，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他認為，毛澤東是一個偉大的領袖，也是一個重大的罪犯，他是天才，但是個失控的天才；毛澤東總希望向世界展示，中國也能文明化、民主化，中國跟俄國不一樣，他曾開放公共論壇，但一旦結果不是自己所預期的，他就採取殺雞儆猴的方式教育那些“猴子”。

紀錄片提供判斷依據

在拍攝《革命者》之前，德拉寧已完成許多與中國、美中關係相關的影片。德拉寧對《新史記》表示，在研究、拍攝中國的過程中，每一項資源，每一次相遇，通常都有助於拓展對中國的瞭解——紀錄片不只是有助美國瞭解中國，也有助中國瞭解自己。

“如果作為一名記者，你跟我一樣相信紀錄片，那麼就有很多製作《革命者》的理由，包括：說一個不說就沒人知道的故事，擁有一個處理歷史記錄的機會，加深我們對歷史的瞭解，滿足連結過去和現在的需要，以及故事本身跟現代世界的關連性。”

但要完成一個紀錄片並不容易，德拉寧對《新史記》指出，拍攝獨立紀錄片時，最大的困難還是在於籌措資金。“籌錢的動作永遠不會停止，你每進行一個步驟，就必須籌措更多資金。這還影響到你在文獻材料、音樂等等方面上能花多少錢，或不能花什麼錢。”德拉寧說，這可是個折磨人的過程，但這個過程是為了盡可能讓最多人看到完成後的影片。

德拉寧對《新史記》表示，《革命者》紀錄片比較像對歷史的冥想，當大家思考今日的中國時，應該關注李敦白過去經驗所反映出的一些議題，例如權力貪腐，以及“一個社會對個人來說不安全，則對任何人來說也都不安全”等。此外，問題不僅僅在於好人還是壞人，還包括制度問題，如同關於今日中國的許多辯論議題一樣，如果制度不改變、沒有根本上的變革的話，就不會有任何改變。李敦白的人生，就訴說著意識型態確定的謬論（fallacy of ideological certainty）。

“希望紀錄片能給那些對此主題還沒有判斷依據的人，提供一個兼具歷史和政治意義的參考資料，特別是中國這個如此複雜的議題。”德拉寧說。

德拉寧對《新史記》指出，這部影片將帶給觀眾許多收穫，

比如瞭解一個外國人在一些歷史、文化、政治都非常不一樣的國家事件上，影響有限，“這是一個總要透過艱苦方式才會學到的教訓，而且經常被遺忘。此外，與歷史碰撞、瞭解過去、明白過去是如何聯繫現在，不只對中國來說是必須的，對美國和其他國家來說也是必須的。”

《革命者》官網：<http://www.revolutionarymovie.com/film.html>

（本文圖片均原載《革命者》官網）（柯宇倩）■

曾被上海抨擊為“三大文妖”之一的劉海粟，在國中建立首家以美術家命名的美術館，最開始的動力，正是來自藝術大師劉海粟本人。並將自己所有的作品，以及收藏的作品，全部捐獻給國家

守護和弘揚滄海中的 珍貴——“粟”



劉海粟美術館館長張堅。(高伐林攝)

58 歲的張堅，感到自己相當幸運。

學藝術管理出身的他，當過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辦公室主任，當過上海美術館副館長、上海市群眾藝術館常務副館長，還當過《上海故事》雜誌社社長……沒有想到，自己後半生，與一位中國美術大師的名字緊緊相連。

這位上海劉海粟美術館館長，2013 年 3 月因該館與美國新澤西威廉·帕特森大學中國藝術中心共同主辦《戲墨·墨戲》展覽，前來新澤西，《新史記》記者有機會與之長談，他有問必答，話題十分廣泛。

該大學中國藝術中心主任對劉海粟有緣親炙的叢志遠教授也參加長談，他從南京藝術學院畢業又留校任教，而該校的前身正是劉海粟創辦的上海美專，劉海粟是南藝院長；1993年，劉海粟夫婦客居洛杉磯時，叢志遠又曾前往聆教。

“海老”捐出了 300 億

張堅首先告訴《新史記》記者，劉海粟美術館從籌辦到2013年整整20年。劉海粟是1994年以98歲高齡辭世，此館從1993年“海老”（他說，我們習慣了這樣稱呼劉海粟）仍在世時籌辦，可惜1995年正式落成剪彩迎客之際，劉老已經去世。

這個中國首家以美術家命名的美術館之所以能够建立，最開始的動力，正是來自藝術大師劉海粟本人。“海老將自己所有的作品，以及收藏的作品，全部捐獻給國家，畫作如此浩瀚，必須要有一個專門的美術館來保存、展出。他正是看到上海有這樣的誠意，才決定將作品給上海的。”

作品有多少呢？張堅告訴我的數字讓我吃了一驚：“他自己的畫作有360餘幅；他收藏的宋、元、明、清珍品有300多幅。據估價約為300億（人民幣，下同）。 ”

——300億！？不管從哪個角度看，這都是一筆驚人的財富。“劉海粟一點都不留給子女？”

據考，劉海粟先後有三任妻子，生下七個兒子，三個女兒，

長子劉龍生於 1917 年，早已過世，但多數子女現在仍健在。張堅提起劉海粟的最後一任妻子夏伊喬，讚不絕口：全靠她呀，全力支持執行海老的遺囑，子女也非常配合，所以我們接受捐贈非常順利。“海老有話：每個子女選一張他的作品留作紀念，其它作品全部捐獻，他們全都沒有異議。”

對劉海粟的非議翻過去了

話題就此延伸到對劉海粟的評價。《新史記》記者此前曾得知，劉海粟一生謗與名隨，直到去世之後，也一直仍是個“爭議人物”。他在進行美術教學時，在中國首次運用女性裸體模特兒，引起軒然大波，受到的非議如排山倒海，抨擊他是“藝術叛徒，教育界之蝨賊”“禽獸不如”，是上海“三大文妖”之一；政府正式禁止人體寫生，軍閥孫傳芳函令解雇模特，1927 年劉海粟更被以“學閥”罪名通緝……如果說這些隨著時代進步而煙消雲散，罪名日後轉換成了他勇於衝破思想禁錮，頂住權力干預、頂住大眾壓力的美談的話，那麼對他的“漢奸”指責則延續至今。重慶《新華日報》1945 年 8 月 23 日刊載《文化漢奸名錄》，第六名為劉海粟，罪名是“公然對記者發表談話，稱頌大日本的王道”。共和國建國初期，劉海粟還被另一位中國著名美術家徐悲鴻指為“漢奸”，二人的矛盾成為中國當代美術史上一段著名公案。

當《新史記》記者就此詢問張堅，他告訴我：隨著時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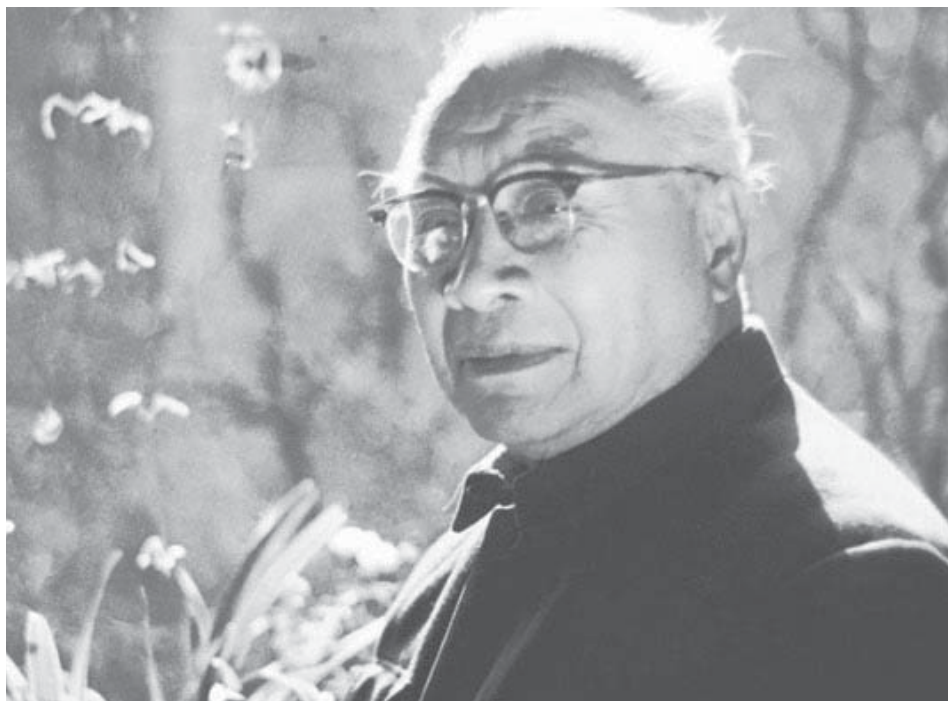
推移，對海老的噪音越來越少，正面看法越來越多。

2012 年是上海美專創校一百週年。一個世紀以來，傳統一直沒有中斷。我們舉行百年美專師生展，展出衆多在美專任教和從美專畢業的畫家的作品，潘天壽、黃賓虹、潘玉良……他們的成就充分說明劉海粟在美術教育方面功不可沒！中國現在恢復了實事求是的原則，對劉海粟的種種非議都已翻過了一頁，不論說他“文化漢奸”還是“政治漢奸”，都站不住腳——在淪陷區參加過日本人涉足的活動，能證明他就是“漢奸”嗎？我們不能走過去階級鬥爭的老路，那只會給後人帶來負面效應，模糊了甚至抹殺了歷史！

張堅說：我在劉海粟美術館工作，看了很多劉海粟傳記、檔案。我認為，對劉海粟要重新評價。他在中國美術教育上的貢獻，他的藝術造詣，他的美學思想，都值得大書特書，我要理直氣壯地講他對中國文化的巨大貢獻！

張堅還介紹，以前說北方比較排斥劉海粟，但是我們近年到北京炎黃藝術館展出，引起很大的轟動。國家和文化部領導人都去了，北京的藝術家也非常認可。2012 年美專百年，我們的劉海粟藏品又到北京中國美術館展出，整個大廳都是劉海粟，沒有聽到非議。（“《美術》雜誌的封面就是劉海粟，”叢志遠教授在一旁補充。）

張堅歸納說：劉海粟在許多方面都有開創性的貢獻，他是中西結合，洋為中用的大師，是中國近現代美術的開創者之一，中國藝術教育的奠基人之一。



藝術大師劉海粟。

從劉海粟到劉海粟美術館

從劉海粟談到劉海粟美術館，張堅更是如數家珍。

劉海粟美術館是集收藏、展覽、交流、研究等多種功能於一身的博物館。多種展覽樹立了品牌，其中三個拳頭產品是：劉海粟藏品展、版畫展覽、青年美術大獎賽獲獎作品展。最後這一項，規模從地方發展到全國，現在已經超出國界，引起了各國青年藝術家的重視，寄來參賽作品，這讓劉海粟美術館加強了國內國際的交流。張堅很自豪地告訴我：我們有館藏

資源，有策展能力，有展出場地，有宣傳渠道，也有一定經費，對外交流就有了很多便利條件，我們如果走出去，不至於讓接待方有什麼經濟負擔，只需要他們提供場地就行，我們的工作人員的食宿都由我們自己負責——對方到上海來展出，我們也提供對等條件。

劉海粟美術館不僅搞展覽，還有典藏研究。張堅介紹：劉海粟美術館有兩座，除了上海，還在海老的故鄉常州有一座，從上海的藏品中拿出 30 件給了常州，劉海粟的作品“我們有 700 來件，常州有 30 件，南京藝術學院有 20 來件。”對劉海粟捐贈的數百件作品，每一件都建立檔案；對他捐贈的 300 多件藏品，每一件都有考證。

《新史記》記者問道：聽起來，你們側重在保存和研究中國傳統藝術？現代美術市場十分活躍，亂象衝擊十分厲害，對民眾的藝術欣賞水準、對民族的審美建設，效應一言難盡。劉海粟美術館是否需要因應？

張堅搖搖頭說：我們對當代藝術非常重視，搞青年美術大獎賽，就是著眼於當代。我們不排斥當代藝術潮流，也不對藝術商業化潮流隨波逐流，會走自己的路。但是對當代藝術潮流，我們不是去阻止它，而是要扶植和引導。

張堅告訴我：上海正投入巨資，用原來一個發電廠改建成當代藝術博物館，加上中華藝術宮，將改變上海無序的美術格局，上海博物館、上海美術館、當代藝術博物館，以及劉海粟美術館，都各有側重，就像法國巴黎的盧浮宮、奧塞宮和蓬皮

杜中心各有功能和特點一樣。

張堅告訴我：我們定位要搞美術教育，區別於上海美術館。推出青年美術大展，就是從高雅和普及相結合。“我們還有一個平台：‘大師從這裡起步’。從哪裡起步？從幼年、從很稚拙的畫作成長，我們每年搞一次‘大師從這裡起步’展覽。”

叢志遠教授補充說，劉海粟本人就非常重視現代藝術，他將馬蒂斯、畢加索、梵高等現代派大師的許多元素融匯吸收到創作當中。90年代初我去看他，他對我說：我把馬蒂斯介紹到中國，多少人罵我？我堅持了60年！現在罵得少了，但還有。

張堅也借《新史記》雜誌公開呼籲：邀請威廉·帕特森大學的版畫系和其它院校的藝術系的師生，踴躍參加該館2013年11月的雙年展等各種展覽。感興趣者可以登錄該館網頁瞭解詳情：<http://www.lhs-arts.org/>

“戲墨·墨戲”走遍世界

這次劉海粟美術館在美國主辦的展覽，精選了林風眠、關良、程十髮、韓羽、朱振庚等十位著名藝術家的44幅戲曲畫作品。題為“戲墨·墨戲”，頗有雙關意味：既可理解為將戲曲人物用中國水墨畫表現精髓，也可以理解為作畫時心態不必那麼嚴肅鄭重，而是可以很輕鬆、活潑地嬉戲。

這個展覽是怎麼策劃籌辦的呢？

張堅告訴《新史記》記者：這個選題，是由前任館長張培

成發明的。上海有許多畫戲劇人物的藝術家，作品很多，一直在流傳，但是也一直在流散。張培成自己也是畫家，人物畫方面很有造詣，抽象的，具象的，變形的……算得上“新海派”實力藝術家之一，他也畫戲曲人物，對這個題材領域相當熟悉，他去武漢找到一位叫朱振庚的畫家，朱振庚創作了一批戲劇人物，但鮮為人知。張培成為首的團隊專程登門，勸朱捐贈給我們來收藏。後來就辦了個“墨戲十年”展覽，選了十位畫家，為“戲墨·墨戲”做了鋪墊。

“戲墨·墨戲”一展而不可收，在各地巡展都受到歡迎，認為題材新穎，形式活潑，又很有中國文化內涵和中國藝術風格，對中國歷史也是一種間接巧妙的弘揚，“藝術和歷史的有機結合，成為一種獨特的現象”。

張堅告訴我，擅長畫戲曲人物的不只限於上海啊，各地畫家也有很多好作品，像丁立人就是江蘇泰州的，畫得非常好；江蘇畫院院長周京新的畫，富有個性，用筆非常蒼勁，一筆就挾帶出多種感受……

這個展覽到過許多國家，張堅對我屈指道來：加拿大、德國、烏克蘭、新加坡、日本、俄羅斯、意大利、澳大利亞……還有港、澳、台，2013年來了美國，還要去挪威和芬蘭，然後要到南非……國內更不用說，“戲墨·墨戲”系列的作品很多，可以同時在幾個地方展覽。長三角地區的美術館都巡展遍了，還去了北京、廣東、福建、寧夏……形式也比較多樣，有時帶戲曲小演員，到新加坡則帶了面具和京劇名伶照片，有時附帶上水瓢

畫的京劇人物，豐富多彩。

收藏・捐贈・寄放

中
共
高
層
恩
怨

隨著美術館名氣越來越大，在美術界的地位越來越高，越來越多的名家也要求收藏自己的作品。張堅告訴我，並不是來者不拒，多多益善。相反，收藏的門檻是很高的，劉海粟美術館要堅持精品路線，藝術委員會的專家嚴格評估、審核，投票決定。

《新史記》記者問：常常看到藝術品賣出天價的報導，動



《戲墨·墨戲》展品
之一：《霸王別姬》（關良，
1900 - 1986 年）

輒數百萬甚至上千萬，你們收購的經費從何而來？除了財政撥款，是否也要到處化緣，向企業和各種基金會申請？

張堅告訴我，劉海粟美術館是國家美術館，不走市場路線。

“每年上海政府在財政預算中撥給我們的經費，有一部分是收藏經費，每年 200 萬，現在減到一年 150 萬，還每年都花不完。”

只有 150 萬還花不完？看到我不解，張堅解釋：我們美術館原訂規則是，只收藏劉海粟及其弟子、門下教師的作品，後來感到藏品太單一、太狹窄不行，就開始收藏一些海派畫家作品，然後又擴大到專項門類，例如戲劇人物、版畫、書法。我們決定收藏了，給畫家頒發收藏證書和不多的一點錢，因為是“收藏”嘛，以精神榮譽為主，經濟報酬為輔。畫家也很高興：國家收藏了自己的作品，體現了一種規格待遇啊。

因為標準定得高，很多藝術家的作品就進不來。張堅承認，很尷尬、很糾結啊——很多著名畫家主動地將作品捐給我們，這些作品也多次展出過，我卻不能要！比如畫人物非常有名的崔君沛癌症去世，作品專門辦了展覽，夫人想捐贈，藝術委員會一些委員看了也覺得好，但是經藝術委員會全體會議討論，覺得還是不夠劉海粟美術館的收藏標準。怎麼辦？家屬幾次來問怎麼決定，最後只能對她實話實說。還有一位上海大學美術學院黃教授，他的作品拿出去，隨便一張就賣到 20 萬，高的能達到 50 萬、100 萬，甚至有人出價 300 萬！他願意 2 萬一張，全部讓我們收藏。我太喜歡他的作品了，但是我不

能答應啊。最後跟他談好，就算他寄放、暫存在我們這裡——我們這樣級別的美術館給你保管，防盜、防水、放火都沒有問題，肯定保證安全。

還有一些不夠收藏標準，我們就跟畫家或家屬商量，請他捐贈，我們頒發捐贈證書。捐贈證書的榮譽當然沒有收藏證書高，但畫家們也很高興。

我問：真正碰到珍品、精品怎麼辦？“那就申請專項經費，哪怕兩三千萬，請國家審批，專項撥給。前一段時間上海博物館從美國私人收藏家收購中國現存最古老的法帖合集《淳化閣帖》，專家鑑定確實是真跡，那得 4000 萬啊！他們博物館當然拿不出來這麼多錢，打報告給上海市政府，馬上拿到了撥



劉海粟美術館。

款。”

遷新館，出全集，復故居

2012年，是張堅忙得不可開交的一年。劉海粟美術館舉行上海美專成立100週年的系列紀念活動，各種主題展覽、外圍展、北京巡展，出版《美專珍檔》的精美畫冊，主辦各種研討會，廣邀世界各國研究劉海粟的學者，舉行不下十次的講座……而劉海粟的遺孀夏伊喬，又在這一年去世，美術館為之策劃操辦了圓滿的告別儀式。

這一年，讓他最忙也最高興的，是劉海粟美術館的遷址。

地處虹橋路1660號的劉海粟美術館，建館較早、規模較小，建築面積只有4610平方米，庫房只有100平方米，六個展廳總面積只有1300平方米，實在是制約發展的“瓶頸”。經過呼籲申請，終於萬事俱備，要遷往三公里外的新館，2012年年底新館建設破土了。“如果將所有配套設施建設全算上，國家投入近十個億。”張堅對我津津樂道：整個建築面積增加三倍，展廳面積增加近五倍，庫房增加十倍……更不用說環境更加優美，功能更加齊全了！

張堅的時間表是：2013年年底封頂，2014年內部裝修，2015年在劉海粟美術館建館20週年時在新址重新開放。“我們廣邀中國和世界名人光臨，海老收藏的歷代名畫，過去從來沒展出過，都會向世人開放！”



劉海粟作品。(1962 年)

“你們還有什麼打算？”《新史記》記者的最後一問，引出了張堅的滔滔不絕：“那太多了！”

——將出版《劉海粟全集》：現在中國出版“全集”的，只有齊白石、徐悲鴻等屈指可數的幾位藝術家，《劉海粟全集》將收入劉海粟全部作品、論文、照片……這是一項投資 1000

萬的大工程。

——將恢復劉海粟故居：現在上海定為市級名人故居的，有宋慶齡故居、魯迅故居，如果劉海粟故居能列入，就成為一個文化景點。

——將把劉海粟藏品拿到世界各地展出，明年第一站可能是新加坡……

劉海粟九泉之下，應該感到欣慰了。

劉海粟遺願：要在美國辦畫展

劉海粟一生畫作無其數，桃李滿天下，但有一件莫大遺憾：從沒在美國舉行畫展。

叢志遠說，1992年，海老到美國來——當時加州大學的一所分校授予他名譽博士，他就想在美國搞一個展覽。那年我去洛杉磯看望劉海粟夫婦時，海老對我說，我們來美國太晚了。師母也感嘆，我們與美國真是沒有緣：美國大企業家、藝術收藏家阿莫德·哈默（Armand Hammer, 1898—1990）對劉海粟非常感興趣，但他第一次到中國，劉海粟正巧不在國內；第二次哈默去中國，想見劉海粟，劉海粟正在香港辦展覽；第三次是劉海粟來美國，打電話與哈默約好了三天之後晚餐，結果到了第三天秘書打電話來道歉，說哈默感冒了，只好取消。

沒想到，哈默後來竟一病不起！

■ 叢志遠介紹，海老對在美國展出有個條件：“非博物館不展”——他絕不肯在畫廊這些地方展出。後來我與印第安納波利斯博物館負責人談好了主辦劉海粟作品展——這是美國第八大博物館，中國藏品很多——選哪些作品，時間，怎麼運來……都談妥了，連贊助都找到了——當地有一個醫生非常有錢，很喜歡海老的藝術，願意資助。我告訴海老，他很感興趣，他們夫婦當時提出的所有條件，像書畫的保險，要來幾個人……基本上都沒有問題，都可以解決；唯一不能解決的，就是海老的人壽保險——劉老當時 96 歲了呀，誰敢買人壽保險？保多少金額的險？1000 萬？博物館實在無法解決這條，就卡在這裡了……

劉海粟認為自己與張大千應該平起平坐，海老有他的舉勁啊，一定要與張大千相匹敵。但是張大千的國際地位，在世界上的宣傳規模，遠遠高於海老。張大千在美國舉辦過多次畫展，紐約、華盛頓、密蘇里……很有知名度。為何如此？有時代的原因：台灣當時財力遠遠高於大陸……

張堅和叢志遠都說：一定要完成劉海粟的遺願，要讓美國、讓世界各國都能認識這一位了不起的中國藝術大師！（高伐林）■

為什麼周揚、陸定一能夠在“文革”中浴火重生？同樣經過“文革”，有人坐了共產黨的監獄，痛感法制不健全了；當他們再度上臺，又頒佈壓制人民的法律來了。有人失去了權力，求助於人民的保護；一旦恢復了權力，又調動軍隊向人民開槍。而大徹大悟的周揚、陸定一，為什麼在共產黨內總是鬱鬱不得志？

浴火重生的周揚

周揚，昔日的“文藝沙皇”，後來成為思想解放運動的旗手。從前者到後者的轉變，中間經過了“文化大革命”。周揚在監獄裏面壁九年，大徹大悟。另一個在監獄裏大徹大悟的共產黨老幹部是陸定一。有幾個問題是值得研究的。為什麼周揚、陸定一能夠在“文化大革命”中浴火重生？同樣經過“文化大革命”，為什麼更多的共產黨老幹部走的是另一條道路？有人坐了共產黨的監獄，痛感法制不健全了；當他們再度上臺，又頒佈壓制人民的法律來了。有人失去了權力，求助於人民的保護；一旦恢復了權力，又調動軍隊向人民開槍。而大徹大悟



晚年周揚多次當眾沉痛反省。

的周揚、陸定一，為什麼在共產黨內總是鬱鬱不得志？

我回憶周揚，就是為了想一想這些問題。

一，反修中頂風批教條主義

1964年7月，中共中央宣傳部召開全國政治理論課工作會議。六十年代的“主旋律”是批修正主義，這次會議的調子卻是反教條主義。差不多同時，劉少奇也批評了中共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的“教條主義”。而之前不久，毛澤東批評文藝界的各個協會“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還勒令文藝界的負責人周揚下鄉改造：“周揚不下鄉，派一個班的士兵押送。”這些都是不尋常的信號，表明上面出現了緊張。

教育部組織大批人馬編寫了六本中學的政治課教材，初中三本：初一《思想品德教育》，初二《中國革命史常識》，初三《社會發展史常識》；高中三本：高一《科學社會主義常識》，高二《政治經濟學常識》，高三《辯證唯物主義常識》。因大學和中學的政治課中的教條主義傾向受到批評，這六本書沒有出版。

我從北大借調到教育部，擔任《辯證唯物主義常識》編寫組組長。我負責編的書雖然沒有被採用，對於反教條主義卻暗自叫好。我對會議敢於頂風反教條主義感到很吃驚，更為吃驚的是中宣部第一副部長周揚和部長陸定一在會上的講話。他們講話的主要部分不記得了，只有幾句話牢記不忘。

周揚在講到批評與自我批評時，說：“活著不讓人家批評，你死了還能阻止批評？”誰能“不讓人家批評”？當然是大大小小的“霸王”，最大的“霸王”就是毛澤東。我當時的思想已經很“反動”，一下子聽出了周揚的弦外之音，但不敢與人議論，說破玄機。毛澤東活著的時候，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偉大的毛澤東思想”，不要說批評，連議論一下都不行，那都是“惡毒攻擊”；“惡毒攻擊”就是“反革命”；“反革命”就得坐牢以至殺頭。果然，毛澤東一死，誰能阻止批評？“反革命”也平反了。

陸定一的講話更為露骨。他不知怎麼說到京劇《打金枝》，講了一個故事。唐代名將郭子儀的兒子郭曖，娶代宗皇帝的女兒昇平公主，當了駙馬。郭子儀七十大壽，傲慢的公主不去祝壽，郭曖打了她。她就向皇帝老子告狀。皇帝說：不向公公祝壽，是你不對。公主說：他還罵你皇上呢！問：在什麼情況下罵的？公主說：在床上罵的。皇帝說：不算，不算，床上罵的不算數。陸定一評論道：“你看，皇帝還有個政策，床上罵皇帝是不算數的！”下面的話，只能讓聽眾去意會了。

小時候聽老人說，姓郭的我們這一支是郭子儀第六個兒子、駙馬爺郭曖的後代。有關老祖宗的故事，我來了興趣，到中文系借了各種版本的京劇《打金枝》。仔細閱讀，就是沒有找到床上罵皇帝不算數的“政策”。我想，這是陸定一的借題發揮。

陸定一和周揚在“文化大革命”之初，作為“閻王殿”的

“大閻王”、“二閻王”被打倒，就不足為怪了。

二，文革中被揪掉了耳朵

1966年6月1日以後，有一句重複了千萬次的套話：“偉大領袖毛主席批發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點燃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這熊熊烈火燒向的對象叫做“黑幫分子”。有一天，聶元梓手裏拿著一摞紙，對我說：“這是黑幫分子揭發周揚的兩個材料，內容差不多，麻煩你把兩個綜合成一個。”我在哲學系好像是公共秘書，有什麼舞文弄墨的事都來找我。要我幹活，就奉承我：“你筆頭快。”其實，不見得。主要是我好說話，來者不拒。

聶元梓交給我的兩個材料，一個是副系主任馮瑞芳所寫，一個是系秘書湯一介所寫。他們都是1961年周揚主持的文科教材會議的參加者，揭發的內容不過是周揚在會上的公開講話。湯一介的材料比較系統，題目是《揭發周揚毒化大學文科的罪行》。我以湯一介的材料為主，以馮瑞芳的材料作補充，綜合成一個材料，交還給聶元梓。

過了幾天，《光明日報》發表一篇文章，題目是《清算周揚毒化大學文科的罪行》，署名“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郭羅基”。我很奇怪，我沒有投稿呀。一看，文章的基本骨架就是經我的手綜合而成的馮瑞芳、湯一介的揭發材料，加上一些“清算”，不知何人所寫。我問聶元梓：“怎麼回事啊？怎麼能假借我的

名義發表文章？”她說：“我也不知道哇，那是工作組搞的。”當時是工作組統治學校。我心裏很惱火，但我知道，同工作組是說不通的，《光明日報》也不會更正。特別是“清算”中說周揚“簡直到了喪心病狂的地步”，我非常抵觸。“文化大革命”前，我對周揚有好感，“文化大革命”一來就把他打倒，我內心極為同情。

粉碎“四人幫”以後，我特地向周揚說明，並表示歉意。我說：“以我的名義傷害了你，十多年來我一直過意不去。”他說：“那時我因肺癌動了手術，外界的事情一概不知，對我來說等於不存在，也無所謂傷害。”他還反過來安慰我：“你不必放在心上。你的名字被人盜用，你也是受害者。”

在《光明日報》發表《清算》這篇文章之前，《紅旗》雜誌發表了阮銘、阮若瑛的《周揚顛倒歷史的一支暗箭》，是為點名批判周揚之始。後來又發表了姚文元的大塊文章《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這些，確實構成了對周揚的傷害。所謂“顛倒歷史”是關於《魯迅全集》中的一個注，這個注也不是周揚所寫。據阮銘說，文章起初並未指向周揚，是陳伯達強行安上這個標題，於是根據標題修改內容。“暗箭”變成“明槍”。文革後，阮銘、阮若瑛向周揚登門道歉。周揚只是淡淡地說：“在當時的情景下，都是可以理解的。”

1982年，王震到中央黨校當校長，整“胡耀邦的班子”，首先拿阮銘開刀。按照王震的意圖，“文革”前中宣部的副部長熊復、張磐石、林默涵、劉祖春等都寫了阮銘的黑材料。有



郭羅基 2009 年在波士頓。(郭羅基提供)

人估計周揚不會就範，鄧力群的班子捏造了一份“周揚談阮銘”。周揚得知後，非常氣憤，隨即另寫了一份，交中央黨校。所有這些材料，只有周揚為阮銘講了好話，以德報怨。

“文革”中，周揚在監獄裏深自反省。出獄後，他到處向人賠禮道歉。有人還批評他過頭了，說：“許多事情是中央決定的，你無權賠禮道歉。”他自己所受的苦難，卻很少提起。我發現他的左耳朵有點異樣，問怎麼回事？他說，被專案人員

揪掉了一塊。別人坐牢都失眠，他卻睡得很好，以至專案人員提審時還打瞌睡。一打瞌睡，就上來揪耳朵，揪來揪去，少了一塊。他像談別人的事情那樣輕描淡寫。我想知道得更多，他揮揮手說：“過去了，過去了。”

陸定一也是。他的夫人嚴慰冰告訴我：“定一在裏面被吊起來打。”1978年12月，陸定一才被放出來，“腳上連襪子都沒有”。陸定一本人從來不對人說。

我猜想，周揚、陸定一的心態是將“文革”中所受的苦難，當作“文革”前自己給別人製造苦難的應得懲罰，默默承受，於心稍安。另一些人，將自己所受的苦難視為極大的不公，而自己給別人製造的苦難，又是理所應當。

三 右派帽子沒有落下來

粉碎“四人幫”以後，北京市革委會主任、市委書記吳德的日子不好過。他在鎮壓“四五”運動的天安門清場之前，躲在汽車裏發表廣播演說，繞場一週。他是事件的主要責任者之一。而後他又標榜自己一貫抵制“四人幫”。西單民主牆的大字報給吳德畫像：“軸承脖子彈簧腰，頭上插個風向標。”當時盛傳陳景潤解哥德巴赫猜想的故事。西單民主牆貼出一份求解“吳德巴赫猜想”的大字報：“左倒+右倒=不倒，誰能證明？”1977年，北京市召開粉碎“四人幫”以後的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吳德決心要開成民主的大會，以扭轉自己的聲譽。

歷來，人民代表大會都是分小組進行的，實際上是人民代表小會，在大會上發言的都是各方面的長官。這一次，大會發言史無前例地向普通代表開放，可以自由報名。我報了名。我發言的題目是《從北大的運動看北京市的領導》，從八個方面批評了北京市領導關於揭批“四人幫”運動“捂蓋子”的錯誤指導思想。來自基層的人民代表在大會上批評領導，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我的發言被代表們的掌聲打斷達十來次之多，還有人跑上臺來同我握手。

吳德的民主弄巧成拙。他急忙向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匯報郭羅基的發言。華國鋒指示：“一定要把他壓下去！”吳德違反大會的程序，將大會延長五天，名曰“討論郭羅基代表的發言”，實為批判圍攻。據說，我的發言“搞亂了思想”，需要“澄清”。形勢急轉直下。小組討論發了大量的簡報，說：“郭羅基的發言是放毒”，“把矛頭指向市委，和1957年的右派差不多。”會議結束後，北京市紛紛傳達：“北大的右派郭羅基跳出來攻擊市委。”還連累到北大，說：“北大就是出右派的地方。”鬧得滿城風雨。這時，鄧小平正運籌帷幄，向華國鋒奪取最高權力。郭羅基對於逮“凡是”派老鼠有用，就是“好貓”，所以他針對華國鋒的“一定要把他壓下去”，翹著大拇指說：“郭羅基是好樣的！”周揚尚未恢復工作，住在萬壽路中組部招待所，聞訊鄧小平此言，託人來向我要發言稿。他看完後說：“郭羅基確實是好樣的！這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

華國鋒、吳德把右派帽子拿在手裏，在我頭上晃來晃去，

由於鄧小平和一大批像周揚那樣的老幹部對我的讚揚以及北大群眾對我的支持，終究沒有落下來。

四，思想解放運動中的三次閃電

1978年5月，在胡耀邦的指導下，《光明日報》和中央黨校發起真理標準的討論。當時的權勢人物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副主席汪東興制定了一個方針：“不表態”、“不捲入”。意思是從旁觀察，看誰跳出來，看誰跳得高。在一個時期中，思想解放運動在壓制中暗潮洶湧，由周揚的一篇講話所引發，噴薄而出。

7月17日至24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和《哲學研究》雜誌編輯部召開全國性的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會，邀請29個省（區）、市和解放軍的理論工作者、新聞工作者、實際工作者共160多人參加，開會的地點是在北京市東城區黨校。開幕式和閉幕式都有北京地區的一千多人參加。這次會議對於真理標準討論是巨大的推動。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鄧力群在開幕式上發表了長篇講話。

他特別針對打棍子的人講了一番話。他說：“喜歡打棍子的人，往往不是因為他怎麼高明，而是因為他有些空虛，無非是不能以理服人，只好用帽子、棍子壓人。”大家都知道，他指的是汪東興。他的講話受到與會者的讚揚。站在思想解放運動

的潮流中的鄧力群是反對打棍子的；後來變成反改革的保守分子的鄧力群，也喜歡打棍子，那就是如他自己所說的“有些空虛”了。

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周揚在閉幕式上發表了長篇講話。

強調真理的實踐標準，是不是正確？周揚說：“這個事關重大，必須要搞清楚。如果不搞清楚，我們這些共產黨員也就實在太馬虎了。這樣重大的問題不搞清楚是不行的。”他講的一段話給人留下深刻印象：“我讀過一本書講萊辛的故事。萊辛是為馬克思、恩格斯所高度評價的一個德國偉大作家。他說如果上帝一手拿著真理，一手拿著尋找真理的能力，任憑你選



周揚和夫人蘇靈揚 1978年登長城。原載顧驤所著《晚年周揚》。

擇一個的話，萊辛講，他寧要追求真理的能力。當時資產階級的偉大思想家還有一股銳氣，他們要自己去尋求真理。我們怎麼能躺在馬克思主義身上過日子？”會下，我向周揚詢問這本書的書名。他說不記得了。我在北大傳達周揚的講話後，很多人對此感興趣，請西語系的教師去找這本書。書還是沒找到，但發現萊辛的另外兩段警句：“對真理的追求比對真理的佔有更為可貴。”“為尋求真理的努力所付出的代價，總是比不擔風險地佔有它要高昂得多。”與周揚所說的差不多。

周揚指出堅持“兩個凡是”、反對實踐標準的實質，是林彪、“四人幫”的陰魂不散。他有一段名言，後來常常為人所引用：“它（陰魂）不僅附著在‘四人幫’的幫派人物身上，也還附在我們某些同志身上。我們需要同林彪、‘四人幫’的陰魂不散作鬥爭。現在我們開這個會就是做驅散林彪、‘四人幫’陰魂的工作。”

對於真理標準討論的意義，周揚比別人看得深刻、講得清楚。他說：“這個問題不單單是個哲學問題，而且是個思想政治問題。這個問題的討論，關係到我們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也關係到我們黨和國家的前途。”堅持“兩個凡是”、反對真理標準討論的人們，特別不能容忍周揚的這一說法。胡繩在中央工作會議 11 月 27 日的發言中說：“有的同志在公開的演講中宣佈（也就不能不反映到報刊上），現在黨內在這樣的問題上存在著分歧，這種分歧不僅是思想問題，而且是政治問題，是路線問題，是關係國家前途命運的問題。我認為，

這種宣佈是過於輕率的，雖然其用語不過是八股老調，但在國內和國際引起了人們對安定團結的局面的疑慮，其影響是不好的。”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也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中說：“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這個關於真理標準討論的結論性意見，完全重複了半年以前周揚的說法，也否定了胡繩的“八股老調”的指責。

周揚最早提出“科學無禁區”，這一次又詳加闡述。他說：“給科學設置禁區，那就是承認某些客觀事物的領域是科學所不能接觸、不能探索的，那就是否定科學之所以為科學，就是扼殺科學，宣佈科學的死亡”。周揚特別強調，對社會主義，“我們應當把它當作一個頭等重要的科學研究的對象，……是不應當設置禁區的”。後來，鄧小平不顧周揚的預警，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對社會主義的研究設置禁區。

周揚的這些名言讜論大大地促進了思想解放。

這次討論會在全國範圍內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會議的參加者回到各地、各部門後，或是在相關的會議上傳達，或是向領導機構匯報，推動一些領導人而後對真理標準討論的表態。

粉碎“四人幫”以後，周揚有三次產生重大影響的講話。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1979年5月，在紀念五四運動60週年學術討論會上的主題報告《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他所說的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是：五四運動，延安整風，真理標準討論。現在看來，對延安整風的論述有缺點。那一次

雖然從共產國際的洋教條主義的束縛中解放了出來，又套上了毛澤東製造的土教條主義的束縛。但周揚報告的現實意義是確立了真理標準討論作為思想解放運動的歷史地位。第三次是1983年3月，在紀念馬克思逝世100週年學術討論會上的講話《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其中，講到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由於胡喬木、鄧力群等人的反對，引起軒然大波。實際上，重拾人道主義比真理標準討論的影響更為深遠。如今“以人為本”不是成為共產黨的時新口號了嗎？

五，反對“兩個凡是”之後再進擊

1979年1月，胡耀邦主持的理論務虛會是思想解放運動的高峰。會議參加者165人，大多是胡耀邦稱之為理論戰線上的“闖將”的人物，歷時兩個多月。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也可以說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上，如此大規模、長時間地集會，就重大的思想理論問題進行自由討論，從來沒有過。

討論是分五個小組進行的。周揚是我所在的第三小組的召集人。

在“兩個凡是”和實踐標準的爭論告一段落之後，周揚又進一步提出問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否存在著問題？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兩個凡是’的問題也就搞不清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是個根本問題，這個問題涉及到毛澤東同志，只有這個問題解決了，‘文化大革命’的定

性問題才能解決。隨著，‘兩個凡是’的問題也不必爭論就可以得到解決。”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是革命之後還要革命，即林彪所說的“革革過命的人的命”。革命已經打倒了敵人，還要革命，只能到革命隊伍中去尋找敵人了。確實如周揚所說，“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是個根本問題。這是毛澤東越來越左傾達於極左以至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問題，也是華國鋒的“兩個凡是”所維護的根本問題。

真理標準討論的發端之作，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之後的《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署名《解放軍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郭羅基。（郭羅基提供）

報》特約評論員，吳江寫作，羅瑞卿審稿），還有“發展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之說，沒有看到“兩個凡是”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內在聯繫。反對“兩個凡是”是第一級真理，而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是更高的第二級真理。接受第一級真理的人們，有人在第二級真理面前停步了。周揚是不斷思考、不斷前進的。他不僅在反對“兩個凡是”時言人所未言，而且將反對“兩個凡是”引向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一更高級的真理，在思想解放派的隊伍中顯示出水平之高下。

理論務虛會期間，在光遠的建議下，張顯揚、王貴秀發起跨組的串聯會，專題討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理論務虛會的成員大多傾向於否定這一理論。

鄧小平直到3月30日所作的在理論務虛會上的講話《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以曖昧的口氣說，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至於作出新的解釋，可以在黨內繼續研究”，顯示出鄧小平和周揚以及理論務虛會多數成員的思想水平的差距。

時間是威嚴的法官。不消幾年，“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不是“繼續研究”，而是遭到判決而退出歷史舞臺了。

六, 1957年的“在劫難逃”

理論務虛會期間，周揚透露了1957年文藝界反右派的一

些重要情節。

當時他已年逾古稀，而且因患肺癌動過大手術，但主持會議，帶頭發言，未嘗懈怠。有一天，他沒有來。次日，問其故，他說參加（馮）雪峰的追悼會去了。（他弄錯了，不是追悼會。後來瞭解，是中組部舉行的一個儀式，宣佈為馮雪峰的右派問題改正，恢復黨籍。追悼會是在這之後舉行的。）他一見雪峰的照片，深感“愧對故人”，痛哭流涕。

1975年，周揚剛從牢裏放出來，獨自一人，坐公交車從西城到東城去看癌症晚期的馮雪峰。看到雪峰窮困潦倒，周揚返回家中，向夫人蘇靈揚要了300元錢，再次送去。雪峰十分感動，寫了一篇寓言《兩隻錦雞》，說：兩隻錦雞各自拔出一根最美麗的羽毛，送給對方。雪峰行將就木，唯念黨籍尚未恢復。周揚連夜給毛主席寫信，代訴衷情。而這時他本人的黨籍也尚未恢復。

我們小組有人直率地問：“當年你怎麼下得了手呢？”

周揚這才說出：“抓右派之前，主席給我一個名單，名單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匯報‘戰果’。我說，有的人鳴放期間不講話，沒有材料，怎麼辦？主席說，翻延安的老賬！我當時常常說‘在劫難逃’，許多人聽不懂。”不知內情，誰能聽得懂？

馮雪峰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就是“在劫難逃”。1957年8月27日，《人民日報》在頭版以大字標題宣佈：馮雪峰是文藝界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第二天，馮雪峰所在的人民文學

出版社收到上級文化部的通知：“你處報來的馮雪峰的材料，經文化部整風領導小組審核後，決定：列為右派骨幹分子。”此前，人民文學出版社根本沒有上報馮雪峰的材料，而是四個月以後補報的。

周揚是有自我批評精神的，他倒並沒有把責任都推給這個名單，說：“在中宣部，陸定一和我都‘左’得不得了。即使沒有主席的這個名單，恐怕也好不了多少。”陸定一曾自責：“中宣部的任務無非就是整人，今天整了這個，明天整那個。”

以前只知道湊“指標”、按“百分比”抓右派，居然還有按實實在在的“名單”抓右派！而且，沒有材料就翻老賬。後來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大規模的翻老賬運動。

有人問：“這個名單是哪裏來的？”周揚說不知道。

有幾位自作聰明的同志說：“一定是江青那個壞女人提供的。”

我說：“不一定。江青不過是看家狗一條！”後來審判“四人幫”時，江青果然說：“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叫我咬誰就咬誰。”

名單上的人，大多是文藝界的名人，打成右派，往往令人吃驚，所以隔三差五便有轟動效應。後來文藝界對周揚自然是怨言聲聲、怒氣衝衝。周揚在思想解放運動中大聲呼喊，為平反冤、假、錯案也出力甚多。但當年的“右派分子”對他在1957年的所作所為仍不能原諒。七十年代，“右派”丁玲等人變成了“左派”，而八十年代的周揚在反自由化運動中卻變成了

“右派”，前者對後者依然耿耿於懷。“胡風分子”賈植芳有言：“如果丁玲、陳企霞當權，可能比周揚還周揚。”

七，為平反冤獄出力

粉碎“四人幫”以後，推動中國變革的，有兩大潮流，一是解放思想，一是平反冤獄。胡耀邦是這兩大潮流的領軍人物。周揚也在這兩方面作出了貢獻。

周揚不像胡耀邦那樣握有實權，他是運用自己的影響，推動平反。

我的前妻劉渝宜的父親劉綬松，是武漢大學中文系教授。他參加了1961年文科教材會議，周揚對他甚為器重，委託他領銜編寫《中國現代文學史》。“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劉綬松就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掛著“周揚的走狗”的大牌子，在武漢三鎮遊街，經受沒完沒了的批鬥，他的研究生陸耀東居然還搥了導師一幾耳光。根據以往的經驗，他期望“運動後期落實政策”，所以忍辱偷生挺過來了。軍宣隊進校後，仍然把他定為“文藝黑線人物”，而且揚言因“態度惡劣”，將作為“從嚴”的典型。他的妻子張際芳年輕時參加過三青團，被定為“歷史反革命”。（按《懲治反革命條例》三青團的區隊長以上才是“歷史反革命”，一般的三青團員是不予追究的。軍宣隊完全是亂來。）劉綬松、張際芳以為這就是運動後期的定性，絕望了。夫妻二人，雙雙上吊自殺。劉渝宜的四個弟弟被掃

地出門，趕到農村。幾個男孩還要照顧一位八十多歲的姥姥。姥姥經不起折騰，死在轉輾的途中，真是死無葬身之地。頓時家破人亡。

粉碎“四人幫”後，武漢大學遲遲不給劉綏松夫婦落實政策。黨委書記名莊果，是一個思想僵化的共產黨官僚。我見過此人。我曾應邀到武漢大學作了一次演說，講的是解放思想。學生們叫好，說是“從來沒有聽過這樣的報告”。莊果卻說：“不知道他要講這個內容，早知道不請他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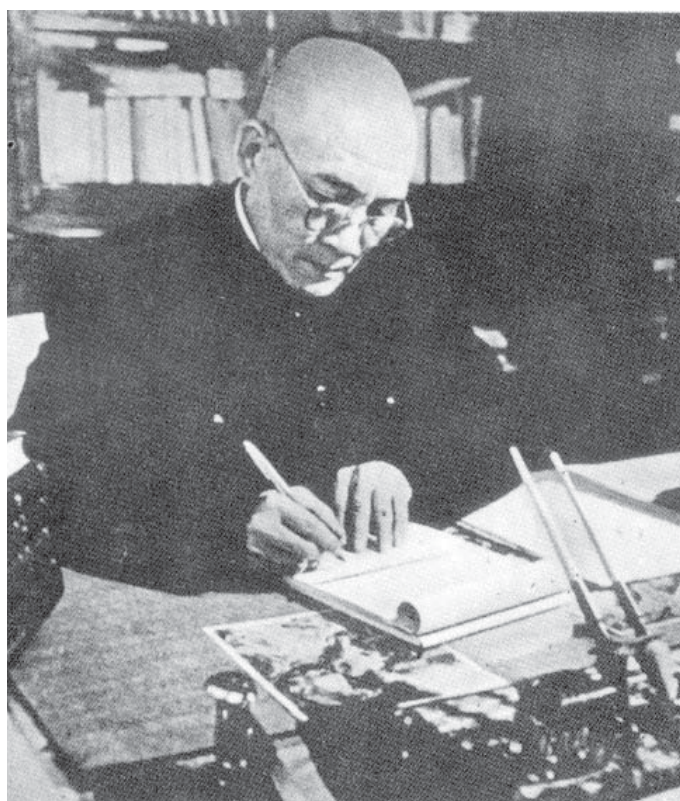
周揚已經恢復工作了，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掛在周揚名下的“文藝黑線人物”劉綏松卻不予平反。我和劉渝宜到社科院找周揚。講起父母和家庭的悲慘遭遇，渝宜傷心落淚。周揚也滿臉哀戚，說：“想不到我連累了你的父母，真是對不起！”相對無語良久，周揚說：“武漢大學不落實政策，我們來想別的辦法。”他想出來的辦法是給湖北文聯主席兼作家協會主席駱文寫一封信，請他們在文藝界為湖北作家協會副主席劉綏松恢復名譽，推動武漢大學落實政策。後來果然如此，湖北文聯和作協開了會，為劉綏松恢復名譽，並提供材料，起草決定，推動武漢大學黨委平反。1978年8月，武漢大學在體育館召開了劉綏松追悼會。那時，開追悼會就是落實政策的標誌。在追悼會上，劉渝宜因父母雙亡的悲痛和對武漢大學黨委的氣憤，當場暈倒。此後，劉渝宜的幾個弟弟才陸續從農村回城。

又有一樁武漢大學的案件。

武漢大學校長李達，是中國共產黨創始時期的重要人物。

他一貫反對林彪的毛澤東思想“頂峰論”。“文化大革命”之初，即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又是珞珈山“三家村”的村長。李達已年高七十有六，本是多病之軀，竟被批鬥致死。1966年8月25日，中共湖北省委宣讀了經中共中央同意的“關於開除李達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戴上地主分子帽子，進行監督改造的決定”，而這時李達已死，屍體即將火化。不知對死人如何“進行監督改造”？

時至1979年，武漢大學還沒有為李達平反。李達的秘書陶德麟文革中受牽連；李達沒有平反，他也不能落實政策。陶



武漢大學校長李達是中共一大代表。

原是武漢大學哲學系的教師，與我認識。他帶了一堆材料，到北京來找我。當時流行的做法，外地不能平反就到北京來找關係、送材料。我說，還是找周揚；陶說：“應當找組織部門吧？”。我就說，周揚為平反冤假錯案熱心奔走，他會想出辦法來的。

正值理論務虛會期間，我每天都能見到周揚。我把關於李達的材料交給了他。過了兩天，他告訴我，材料已交給黃克誠。黃是中紀委常務書記。我說：“不對吧，要交給中組部才是。”他說：“黃老會轉給中組部的，他轉去比我直接交去要好。”我也不知道內中有什麼講究。

果然，理論務虛會結束之後，中組部老幹部局一位姓牛的處長，打電話到北大找我，要我到西單他們的機關所在地去一趟。他說：“這是黃克誠同志交待的案子，我們已經研究過了，還需要補充一些材料。”他以為我熟悉案情。我說，我是受人之託，不過我可以向武漢大學的同志轉達你的意見。陶德麟他們直接給中組部寄去了補充材料。

1980年11月6日，《人民日報》報道：中共中央書記處最近批准了中共湖北省委關於給武漢大學原校長、中共一大代表李達平反的決定。什麼“反動學術權威”、“珞珈山‘三家村’”、“地主分子”等等的帽子，都一風吹了。李達的骨灰由武漢改葬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陶德麟也被落實了政策，後來還擔任武漢大學校長。

八, 向聾子的耳朵進言

1980年12月, 鄧小平提出“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反自由化就是反思想解放。1981年, 進入反自由化的週期, 直到1989年調集軍隊、出動坦克來反自由化。

反自由化的第一個回合是批判白樺的電影文學劇本《苦戀》。人們對《解放軍報》和黃鋼主編的雜誌《時代的報告》所刊登的那些“大批判”文章極為反感, 胡績偉主政的《人民日報》一直按兵不動。戈揚主編的《新觀察》走得更遠, 居然還發表白樺的《春天的厚愛》, 對他表示支持。5月17日, 中共六中全會以前, 胡耀邦召集文藝界和文化部的負責人談話, 說: “我們的意見先把這場風波平息下來, 用一兩句話把這事停了, 不要再批判了。或者說過一段再說, 這叫冷處理。”由批《苦戀》引起的軒然大波逐漸平息, 《解放軍報》打了敗仗。過了兩個月, 想不到鄧小平又出來講話了。7月17日下午, 他找王任重(中宣部部長)、朱穆之(中宣部副部長)、周揚(中宣部顧問)、曾濤(新華社社長)、胡績偉(《人民日報》社長)談話。主要之點是說: “關於《苦戀》的批評, 我們今天達成個協議: 《解放軍報》可以不必再批了, 但《文藝報》要寫出質量高的好文章, 對《苦戀》進行批評。你們寫好了, 在《文藝報》上發表, 並由《人民日報》轉載。現在香港和國外有些議論, 說什麼《解放軍報》打了敗仗, 韋國清(時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郭)地位不穩了, 這完全是胡說, 是造謠挑撥, 但是很值得我們注

意。”鄧小平想出了高招：以轉載《文藝報》文章的方式讓《人民日報》介入，雙方達成妥協，大家不失面子。

鄧小平在談話中忽然指著胡績偉說：“郭羅基和周培源在北大盡搞派性，你《人民日報》熱心發表他的文章是不正確的。”周揚當場為我作了辯護。他說：“郭羅基在‘批鄧’的時候進行了抵制，表現是好的。後來，跟‘凡是’派作鬥爭，很勇敢。他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上的發言，差一點被吳德打成右派。他寫的文章大部分是好的。”周揚的意思是提醒他，當年差一點被吳德打成右派時，你還說“郭羅基是好樣的”呢。

鄧小平又批評王若水和“非法刊物”有聯繫，胡績偉為王若水作了辯護。周揚及時向我通風報信，他說了很多，我只記得這幾句。他還說：“鄧小平耳朵聾，我講的話不知他聽進去沒有？”事實證明，他根本沒有聽進去。

鄧小平的談話先是由胡績偉根據自己的記錄整理成文。他認為鄧小平批評郭羅基、周培源和王若水的幾句話與主題無關，沒有寫上。有人指責胡績偉“篡改了小平同志的指示”，“左家莊”的好漢們跟著起鬨，改由胡喬木重新整理。鄧小平談話時胡喬木不在場，如何“重新整理”？還不是編造一番。經胡喬木之手，鄧小平批評我和周培源的話變成了這樣：“有些人思想路線不對頭，同黨唱反調，作風不正派，但是有人很欣賞他們，熱心發表他們的文章，這是不正確的。有的黨員就是不講黨性，堅持搞派性。對這種人，決不能擴散他們的影響，更不能讓他們當領導。”“他”變成了“他們”，範圍擴大了，

罪名也加重了。

九, 共產黨是寡頭政治

1979年10月, 我為《教育研究》第四期撰寫了一篇特約評論員文章, 題為《補好真理標準討論這一課, 教育問題要來一次大討論》。文章發表時, 教育部長蔣南翔在國外訪問。回國後, 他聽說這篇文章影響很大, 找來一看, 勃然大怒。文章中批評的正是以他為代表的“十七年派”。“他們把十七年當作理想境界, 文化大革命前的說法就是經典定義。這是變相的語錄標準。”文章中還說: “要堅持實踐標準, 必須分析全部實踐經驗, 不能拘守一時一地一校的得失。”拘守他當校長的清華大學“一時一地一校的得失”, 也是他。於是, 他召開各種會議, 對特約評論員文章和它的作者批判了三個月。

1980年1月, 教育部給北京大學下達調令, 調郭羅基去南京大學任教。在批判之後接著調動, 別人和我自己都認為, 這是蔣南翔濫用權力進行打擊報復。按條例, 教育部只能調動和任免重點大學的校長。在這方面, 我享受了重點大學校長的待遇。

北京的教育界、理論界、新聞界以及北大的教師和學生對我表示支持, 教育部調而不動, 雖不足十二道金牌, 也有七八道。我抵制了兩年。1982年初, 上面傳下來鄧小平的講話:

“我已經說了兩年了, 怎麼郭羅基還不去南京?” 這才知道, 蔣

南翔的背後是鄧小平。中宣部和北大黨委緊鑼密鼓，對我進行批判，施加壓力。

北大亞非研究所有一位教師丁始琪，寫了一信，請周揚轉交胡耀邦。信中反映了北大教師對批判和調動郭羅基的強烈反感。周揚去找周培源，說：“我們這個黨，黨內生活很不正常，打擊正氣，扶植邪氣。”周培源已經辭去北大校長職務。之前，他曾責問蔣南翔：“你們調動北大的教師，為什麼不通過我校長？”這時，他說：“我不好講話了，一講又是和郭羅基搞派性。”他們商量的幾點意見，由周揚向胡耀邦提出。周揚的秘書譚小型給丁始琪復信：你的信已由周揚同志轉給耀邦同志，並加上自己的意見。

為我講話、給胡耀邦寫信的，不止周揚，至少還有賀龍的前妻蹇先任。她是我在歷史系的同學賀捷生的母親，我們都叫她“蹇媽媽”。

三月六日胡耀邦作了批示，交中央組織部辦理：“郭羅基和那些造反起家的人是不同的。有什麼問題，攤開來同他本人談清楚。然後調離北大，另行分配工作。不要再拖了。”鄧小平、胡喬木老說我是“造反派”，耀邦的第一句話就是針對他們的。在北大，聶元梓所代表的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和他們所控制的群眾組織新北大公社才是“造反派”，而我們這一派是“造反派”的反對派。周揚得知胡耀邦的批示後很高興，連說：“不錯，不錯。”他分析：耀邦所說的“調離北大”就是不一定調離北京；“另行分配工作”就是不去南大。我們都沒有注意

教育部副部長彭珮雲後來與其丈夫一樣，官至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到尾巴上的那句話“不要再拖了”，果然，一拖事情就起變化。教育部和北大黨委在幕後進行了緊張的活動。教育部副部長彭珮雲的丈夫王漢斌，是鄧小平的牌友。由於王漢斌在橋牌桌上進了讒言，鄧小平再一次講話：“叫郭羅基去南京，不去就開除黨籍。開除了黨籍還要去，再不去就開除公職。”沒多久，這幾句話成了中央書記處第 167 號會議紀要。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韓天石在幹部大會上有恃無恐地說：“給胡耀邦寫信有什麼用？中央作了決定，他還不是照樣要劃圈！”——鄧小平在橋牌桌上的發話才是“中央作了決定”，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的批示“有什麼用”！

周揚約我到他家去好好談一談。我以為他還住在萬壽路，他說早就搬到安兒胡同了。聽人說，周揚的夫人蘇靈揚心直口快，是很有個性的人。我很想見到她，可惜不在家。

本來我還想頂牛，揚言：“我就是不走，你還能用擔架把我抬走？”周揚說：“開除黨籍，也就算了，這個黨員當得沒有意思了。但開除公職就是斷絕生路，你還要連累家人。”因為那時沒有市場經濟，不能另謀生路。他勸我：“不如去了南京再作打算。”

由此，周揚又生發感慨：“我們這個黨是寡頭政治！”

握手言別時，他念了一首唐詩：“千里黃雲白日曛，北風吹雁雪紛紛。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後來，胡平也以這首詩寫在紙上相贈。關心我的人，年長的一代和年輕的一代，所見略同。

十，高揚人道主義的旗幟

1983年3月7日，周揚在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週年學術討論會上作《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報告。其中特別引人注意的是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

中國自五十年代開始就批判資產階級人性論，反對人道主義。六十年代，中蘇論戰的《九評》認為，人道主義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思想基礎。1960年，周揚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我國社會主義文學藝術的道路》，1963年，周揚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會第四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戰鬥任務》，都是批判人道主義的代表性言論。八十年代，共產黨內的馬克思主

義知識分子醒悟了。批判人道主義的結果，出現了獸道主義和神道主義；“文化大革命”就是對人民的獸道主義和對領袖的神道主義大行其道。由周揚來反省批判人道主義的錯誤，以馬克思主義重新解釋人道主義，是有說服力的。但人們對這一理論事件的意義還是估計不足的，倒是經胡喬木、鄧力群的拼命反對，才加深了理解。人道主義在中國的反覆，構成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

這時我已在南京大學，正參加招考研究生的政治課閱卷。有一位年輕的女教師小李，總是坐在我旁邊，端茶倒水，非常熱情。十天閱卷結束，小李送我回家，對我說：“郭老師，是有人派我坐在你旁邊的，要我來摸你的底，對周揚的報告是什麼態度？”

我說：“對周揚報告的是什麼態度？那又不是見不得人的事，我可以公開談論一下。”

小李說：“不要，你不知道他們把你的話作什麼用。派我來摸你的底，看樣子事情挺嚴重的。”

她還說：“通過十天的相處，從你討論問題的深度，為人的風度，工作的態度，我看不出你是‘有問題的人’。我的媽媽是老幹部。她對我說，你這是當特務，不能幹傷天害理的事情。郭老師，你放心，我決不會做有損於你的事。”

我說：“你怎麼向他們匯報呢？”

她說：“你不用擔心，我會應付。不過，他們沒有從我這裏摸到你的底，還會派別人來，你千萬要小心！”



郭羅基 1994 年在劍橋大學校園。(郭羅基提供)

我對她的保護表示感謝。

我這才意識到，周揚的報告惹來麻煩了。

北京傳來的消息是混亂的。

起初，傳說報告會的現場長時間地熱烈鼓掌，中央黨校校長王震、中宣部部長鄧力群都說講得好，向周揚表示祝賀。王震還向周揚“請教一個問題”：“yihua 兩個字怎麼寫？”

過了幾天，又說中央不同意周揚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的觀點。北大哲學系的朋友告訴我：黃枬森被鄧力群叫去，要他和另外三個人在討論會上發言，與周揚唱對臺戲。他根本沒有聽周揚的報告，沒頭沒腦地奉命批判。最後，是胡喬木的一篇講話《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作為批判的總結。為了準備這篇講話，興師動眾，從八個單位湊了一大批“筆杆子”。我知

道，至少其中的一位龔育之表示為難：“我自己都弄不清，怎麼能批判？”從胡喬木的大作來看，連他也弄不清，硬是要批判。胡喬木認為，不能說“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只能說“社會主義人道主義”。那麼，據此推論，“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是不適用於社會主義的；而“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又不是馬克思主義的。

1983年10月，鄧小平在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上講話，提出兩個問題：一是整黨，一是“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他指出：“人道主義和異化論，是目前思想界比較突出的問題。”這是最大的“精神污染”。接著又說“其他類似的問題還不少”。“類似的問題”首先是“宣傳抽象民主，直至主張反革命言論也應當有發表的自由”。這個問題鄧小平講過多次，一般人都認為指的是郭羅基。這是對我的歪曲。我在《政治問題是可以討論的》文章中說：“對反革命言論不能放縱、姑息，但不要動手抓人。”非說我主張反革命分子有言論自由。“類似的問題”還有“在黨性和人民性的問題上提出違反馬克思主義的說法”。這是指胡績偉。胡績偉一貫強調，在新聞工作中人民性高於黨性。這就違反了鄧小平的“馬克思主義”。還有，“有些同志至今對黨提出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仍然抱懷疑態度”。這是指李洪林。他發表過《我們堅持什麼樣的社會主義？》《我們堅持什麼樣的黨的領導？》等四篇文章。如此等等。鄧力群有一個補充發言，把“不能搞精神污染”變成“清除精神污染”，而且把鄧小平點到的問題落實到具體的人的頭上。他點

了六個人的名：周揚、胡績偉、王若水、郭羅基、李洪林、阮銘，作為“清除精神污染”的重點對象。雖然沒有從我這裏摸到底，結果還是把我和周揚掛上了鉤。有人告訴我，在中共江蘇省委擴大會議上傳達文件，胡福明念到“郭羅基”的名字時，還特別提高音量。

“清除精神污染”又搞成一場運動。十二月，被胡耀邦叫停。這場短命的運動只搞了28天。

新華社寫了一個稿子，讓周揚看過後播發，表示擁護鄧小平的講話，算是周揚的公開檢討。周揚被迫表態，內心是很痛苦的，從此鬱鬱寡歡，一病不起，以至成了植物人。1988年，我去北京，想到醫院看望周揚。有人說：“沒有意義了，他已經不認識人。”

1989年7月31日，在臥床五年之後，周揚默默地離開了人間。

周揚的人生以悲劇告終。悲劇總是深刻的。于光遠寫過回憶周揚的文章，他有一個奇怪的說法：回憶周揚是為了研究胡喬木。這倒是從對立面中研究對象的辯證思維。周揚和胡喬木，是共產黨內兩個對立的知識分子的典型。還有一重對立面，那就是共產黨內流氓無產者的典型和知識分子的典型。只有將流氓無產者和知識分子的關係、知識分子中依附型和獨立型的關係，作對比研究，才能理解在經濟文化落後的條件下產生的中國共產黨。

2011年9月，於美國奧馬哈（郭羅基）■

『潘司令』帶走了多少歷史祕辛

“潘司令”帶走多少祕辛



潘國平

上海“文革”風雲人物、以“潘司令”聞名一時的潘國平，2013年4月18日清晨5點，在上海新華醫院去世，享年67歲。

毛澤東說：久聞潘司令大名

“文革”爆發後，上海造反派組織“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乘勢而起，鼎盛時期成員達百萬之眾。才20歲出頭的上海玻璃機械廠工人潘國平，因受到四清工作隊的壓制，也起來造反，被推為工總司成立大會的執行主席。

據潘的一位好友丁德發回憶，1965年時他倆都是上海滬東工人文化宮藝術團成員，小潘很活躍，喜歡拍照，曲藝與聲樂，後來又一同參與發起成立工總司。

潘國平全國揚名，是因為1966年11月初的“安亭事件”。潘國平、王洪文帶領剛剛成立的工總司成員一萬多人攔火車上京，希望得到中央承認，卻被上海市委設計困在離上海不遠的安亭車站。造反派多次攔截北上火車，使得京滬鐵路幾乎癱瘓。中央作出的決定是不支持成立全市性跨行業組織，要工人回上海，由市委解決問題，派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張春橋前來處理。現場指揮的潘國平堅持要張春橋承認工總司是“革命組織”，否則不回去。張春橋最後對工人發表講話，承認工總司是革命群眾組織，也要求大家回去。潘國平、王洪文帶隊

伍回到上海，但並不解散而集結到文化廣場。

回到上海第二天，張春橋與潘國平在雙方約定的“五條決議”上簽字，其中包括承認工總司是革命組織，工人被迫北上為革命行動，其後果全部由華東局、上海市委負責等內容。潘司令在工總司的地位得到公認。

張春橋簽字以後把“五條”匯報給中央，在毛澤東的書房裡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陶鑄指責張春橋“先斬後奏”，毛澤東卻肯定張春橋“處理是正確的，總是先有事實，後有概念，可以先斬後奏”。張春橋這一著險棋符合毛澤東的文革大戰略，深得毛的贊同。以往毛澤東對張春橋的賞識主要是其理論功力，這一次卻讓張春橋在毛澤東面前顯示了他處理重大事件的膽魄，從此讓毛澤東在此後十年一直對張春橋青睞有加。

1967年“一月革命”造反派奪了市委的權，成立上海公社（後改稱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潘進入臨時領導班子。武漢“720”事件後毛澤東乘飛機逃到上海，接見潘國平，很欣賞他，當面對他說：“潘司令，久聞大名，如雷貫耳”。“工人階級沒有根本利益的衝突”的“最高指示”，就是毛對潘團結反對派工作成效的評語。

但與王洪文比較，潘國平太年輕，比王小11歲，王洪文是黨員，潘國平不是，所以最後確定王作為上海工人階級的代表進京，當上了中央副主席。

為國家利益“多次立功”？

潘國平與“文革”中從中央到上海的衆多風雲人物有過直接接觸，對包括“四人幫”、周恩來等人在內的許多人有自己的觀感和分析。他認為周恩來非常圓滑，曾舉例說：有次自己參加北京工人體育館紅衛兵大會，會後大家鼓掌要中央首長繞場一週，周應是第一位，可他退到後面，還扶著比自己年輕 20 歲的江青下台階。

潘國平讚賞張春橋的能力。說張春橋搞政治是個幹才，有信仰，有權力，可以駕馭局面，精於指導，老謀深算。張在被捕之後的不屈表現，贏得人們幾分尊重。他不是一個遺臭萬年的人。

“四人幫”在毛死後一舉被擒，潘國平另有看法：並非葉劍英搞政變，關鍵人物是汪東興。因為汪參加 1970 年廬山會議時站在林彪一邊，毛澤東當面質問汪是否要“改換門庭”，嚇得汪在毛面前下跪痛哭。毛死後，汪東興便聯合華國鋒動手抓了“四人幫”，因為如果江青、張春橋掌權，汪東興沒有安全感。潘國平反對給“四人幫”定“反革命罪”，他認為“四人幫”只是黨內路線鬥爭。

“文革”結束後潘國平被判刑八年，刑滿釋放不久，又以“投機倒把”罪名被判六年徒刑，1992 年獲釋。1996 年潘移民美國，後來據稱是在做古董生意。

潘國平在美國做過心臟搭橋手術，於 2009 年前後回到上

海後，又兩次中風。他在上海隱居，沒有與當年造反派戰友聯繫。直到 2013 年 4 月他第三次中風病危，一些戰友得悉趕來醫院探望，他們都 40 多年沒見小潘了，總算都在醫院見上小潘最後一面。

丁德發在文章末尾似乎絃外有音：據說“潘國平為了國家的利益，曾多次榮立二等功。上海許多人本以為潘國平逃到美國去了，不會回來了！但潘國平為了國家利益忍辱負重，重新浮出了水面。他將是一位被歷史爭議的人物，歷史的真相總是姍姍來遲的”。（翟文）■

林立果、周宇馳、于新野等人密謀策劃武裝起義，企圖刺殺毛澤東，是有人證、物證的。但是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林彪和“五大將”知道和支持“五七一工程”

路線分歧與制度質疑

——林彪父與子的政治區別

林彪接替彭德懷主持軍隊工作後，為“大樹特樹”毛澤東的“絕對權威”，竭盡全力。林彪對毛澤東這個人看得很清楚：

“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為己，過為人。”但為什麼林還要為毛搖旗吶喊呢？他私底下有個解釋：“應照顧他，使他沒有小幫幫的必要，他就不小幫幫了。政治上對其每一創舉與功績公道主動地指出來，則他自無鋒芒的必要。”事實上，林彪失算了。正是由於他的“主動”、“照顧”，使毛澤東得以“鋒芒畢露”，打倒了政治局及常委中的多數同事，實現了“個人獨裁”。毫無疑問，林彪為毛澤東“文革”路線的確立，立下了汗馬功勞。



1980年，陳伯達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被公審。

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以後，林彪認為“文革”應當告一段落了，毛澤東卻要“繼續革命”，於是出現了路線分歧。林彪在1970年廬山會議上主動出擊，遭到失敗。毛澤東要他作檢討，林彪鑒於高崗、劉少奇、彭德懷的教訓，拒絕檢討，形成了政治僵局。在毛澤東緊鑼密鼓地策劃解決林彪問題時，林立果下決心反抗。林立果及其“小艦隊”的詳細情況，至今仍是一團迷霧。但他們的反抗和林家父子的死亡，成為毛澤東“文革”路線由興到衰的轉折點。俗話說“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正可以用在林家父子身上。

一、路線分歧與廬山會議

1949年以後，林彪並非事事都擁護毛澤東，譬如說稱病拒絕領兵去朝鮮，腹誹大躍進和反蘇：“大躍進，憑幻想胡來，是蝕本生意，搞得過分，過極了，破壞了個人積極性。對蘇聯，做絕了，絕則錯。”但是他懂得“誰不說假話，誰就得垮台”，所以在公開場合一直順毛捋，所以毛才會把他指定為自己的“接班人”。但是到1969年以後，林彪與毛澤東的路線分歧加劇了。

林彪根據常理認為，在“抓革命”取得“決定性勝利”之後，應當把注意力集中到“促生產”上。所以他支持陳伯達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陳伯達是林彪在這個時期的主要政治盟友，因此

我們可以透過陳伯達的言論來瞭解林彪的思想。1968年1月29日，陳伯達給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等寫了一封信，信中指出：“我覺得必須有計劃、有步驟地大力發展電子工業，大力發展現代化的電子技術、電子器材的工業。……現代化電子工業的發展，將促進我們的工業大躍進，將是在我國進行人類歷史上新的工業革命的出發點。採用現代化電子技術能夠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產品品質，而且能夠大大節約原材料，這是符合社會主義經濟的增產節約的要求，同時是實現主席歷來提出的趕超世界先進水準的一項具體措施。”顯然，陳伯達此時的注意力已經轉移到“工業大躍進”、“工業革命”、“趕超世界先進水準”上。1969年，陳伯達在中央會議上批評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稿時說：“還是要發展生



林彪和其獨子林立果。

產，搞好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不能盡搞運動、運動，像伯恩斯坦說的：運動是一切，而目的是沒有的。”而張、姚則反過來攻擊陳是“唯生產力論”。

應當說，此時的林彪、陳伯達以及周恩來所主張的回歸常識和常理的路線，代表了中共黨內多數人的想法，他們的路線與1975年的鄧小平、葉劍英路線，是承前啟後、一脈相傳的。但是他們完全誤判了毛澤東。自從“大躍進”失敗以來，毛澤東對於在經濟上、科技上“趕超世界先進水準”已經喪失了信心，也失去了興趣。他此時著迷的是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與實踐”來開創自己的歷史品牌，通過製造“精神原子彈”來震撼世界。真正理解、繼承和發展了晚年毛澤東思想和路線的，只有中國的張春橋和柬埔寨的波爾布特。當毛澤東與林彪談論由“小張”接班的問題時，林彪才從夢中醒來。

九屆二中全會上的路線鬥爭，是林彪、葉群、吳法憲等人首先挑起的。他們動員了大多數中央委員，不指名地圍攻張春橋，企圖把他一舉拿下。但他們不同於堂堂正正對“大躍進”提出批評的彭德懷，選擇了一個極端愚蠢的話題，說張春橋反對“稱天才”是反對毛澤東思想。這樣，當毛澤東本人出來挺張，又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來批判“稱天才”時，反張陣營就不攻自破、土崩瓦解了。如果說1959年廬山會議是一齣歷史的悲劇，1970年廬山會議則是一齣歷史的鬧劇。“文革”中“打著紅旗反紅旗”，不論是林彪還是一部分造反派，最終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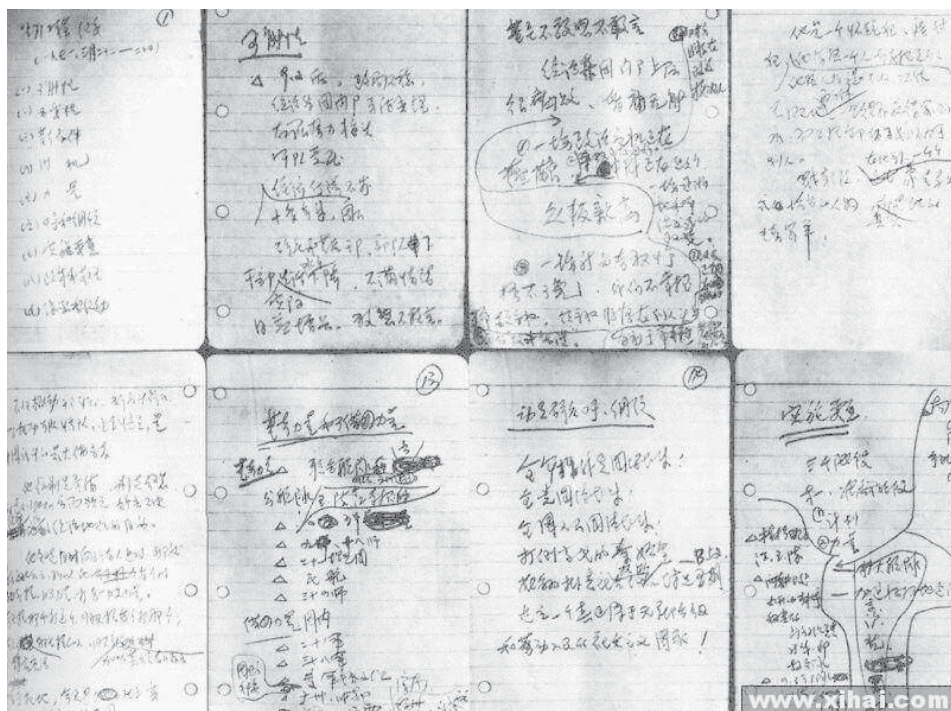
都是成為毛澤東的犧牲品。旗幟鮮明，這是開展正確路線鬥爭的先決條件。

毛澤東“殺雞給猴看”，先拿下陳伯達，再敲打黃吳葉李邱“五大將”，等待林彪繳械投降。但是林彪至死不認錯，中共黨內像他這樣的人，只有不多的幾個，前有陳獨秀，後有趙紫陽。但是，林彪下了廬山以後，只是停留於消極抵抗，並沒有採取任何反對毛澤東及其路線的積極措施。

二、制度質疑與五七一工程

“大躍進一大災難”導致幾千萬人餓死，“文革”中上億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但是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反抗。當年劉少奇曾讚歎，中國老百姓“真好啊”，現在的文化決定論者則哀歎，中國人“真懦啊”。事實上，不論是在“大躍進”還是“文革”期間，人民群眾中都曾經反抗過，湧現出數以千計的所謂“反革命組織”，只是由於專政機器空前殘暴，輿論控制空前嚴密，所以各地的“星星之火”，沒能形成陳勝吳廣式的“燎原之勢”。而由於中央文件下發到全國軍民，使得林立果及其“小艦隊”的“五七一工程”，成為一個廣為人知的反抗案例。

林立果、周宇馳、于新野等人密謀策劃武裝起義，企圖刺殺毛澤東，是有人證、物證的。但是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林彪和“五大將”知道和支持“五七一工程”。後者與毛澤東、江青、張春橋等人的分歧，還屬於路線分歧的層面，最



“五七一工程”紀要。

多只能說是一種黨內路線鬥爭。而“五七一工程”的作者們，已經對現行制度有所質疑。

“五七一工程”說毛澤東“今天拉那個打這個，明天拉這個打那個；今天甜言蜜（蜜）語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須有的罪名置於死地；今天他是他的座上賓，明天就成了他階下囚；從幾十年的歷史看，究竟有哪一個人開始被他捧起來的人，而到後來不曾被判處政治上死刑？”“他每整一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於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於別人。戳穿了說，在他手下一個個像走馬燈式垮台的人物，其實都是他的替罪羊”。這些內容與林彪自己寫的小紙

條，是一脈相承的，表明林家父子對於毛這個人的品行，有著一致的認識。

“五七一工程”又說，毛澤東“他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而是一個行孔孟之道、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毛澤東的“繼續革命論實質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他們的革命對象實際是中國人民，而首當其衝的是軍隊和與他們持不同意見的人。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式的，把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家長制生活。”這些話已經屬於理論性、制度性的剖析和批判，是林彪、葉群、黃永勝、吳法憲這些人說不出來的。

“五七一工程”號召：“打倒當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個真正屬於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可以說正是後來群眾性的“四五”運動的第一個動員令。“五七一工程”主張：“用民富國強代替他‘國富’民窮，使人民豐衣足食、安居樂業，政治上、經濟上、組織上得到真正解放。用真正馬列主義作為我們指導思想，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代替 B-52 的封建專制的社會主義，即社會封建主義。”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這個主張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先聲。（共識網·思想者博客）（陳子明）



嚴慰冰給林彪一家寫了幾十封侮辱人格的匿名信，從挑撥林豆豆同她母親葉群的關係起，直到亂編亂罵。但若說陸定一是因夫人寫匿名信東窗事發而被林彪整下台，就未免將毛澤東玩弄的政治鬥爭簡單化了

嚴慰冰匿名信案 始末與辨析

嚴慰冰匿名信案是“文革”初起時發生在黨內高層的一起不算大的事件。中宣部部長陸定一的夫人嚴慰冰，自1960年3月到1966年1月給林彪一家投寄了50幾封匿名信，以罕有的下流語言，辱罵林彪一家，並挑撥林彪的家庭關係。此事經公安部門的偵查而破案，嚴慰冰因此鋃鐺入獄，日後這起案件被稱為“嚴慰冰匿名信案”。然而，陸定一、嚴慰冰在粉碎“四人幫”後平反出獄，由於林彪已倒台，嚴慰冰寫匿名信的行為被官方譽為“出於一種義憤而進行的揭露和譴責”，更有人乾脆將嚴慰冰的行為拔高為“準確地作出了歷史的預言”。是



陸定一、嚴慰冰夫婦。

耶？非耶？有待於我們對其重新作出歷史的評價。

■ 毀人名譽的匿名信

嚴慰冰投寄給林彪一家的匿名信都是些什麼內容呢？據知情者透露，嚴慰冰的匿名信主要有幾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挑撥林家的家庭關係，指稱林豆豆不是葉群與林彪所生的孩子；二是對葉群個人的造謠，無中生有地稱葉群與他人有染，有染的對象不僅包括早被中共處決的文人王實味，竟然還包括了陸定一；三是惡意辱罵林彪全家。

曾列席 1966 年 5 月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王力說：“陸定一早就受審查了，就是因為嚴慰冰寫匿名信的事。信上說葉群在延安時跟陸定一好，林豆豆就是陸定一生的。林彪到哪裡信就到哪裡。”^{（注 1）}吳法憲回憶說：嚴慰冰在匿名信中還說“葉群不是處女以後又跟別人亂來，生下兩個小雜種。”還說“葉群是王實味的情婦”等。^{（注 2）}邱會作回憶說：“大約從 1960 年起，到 1966 年 1 月五年多的時間裡，她（嚴慰冰）給林彪一家寫了幾十封侮辱人格的匿名信。信的內容主要從挑撥豆豆同她母親葉群的關係起，直到亂編亂罵。例如，說豆豆不是葉群生的，說豆豆長得像劉少奇。……陸定一在延安追求過葉群，這是很正常的事，嚴慰冰在匿名信中謾罵葉群，給葉群造謠，總之，信的內容惡毒下流。”^{（注 3）}林辦秘書張雲生回憶說：“我到林辦工作不久，從毛家灣現存檔案中看到過嚴慰冰



林彪、葉群全家福。

寫的一些匿名信的影印件。這是文革前夜中央公安部偵破的一起重大‘反革命’案。……信的內容令人讀後不堪入目。”^(注4)

嚴慰冰的匿名信給林彪的家庭造成極大的困擾，引發了很多無謂的家庭矛盾。林辦的秘書官偉勛有一次與葉群閒談，葉群忽然問官：“你看豆豆長得像不像我？”官回答說：“像，既像主任又像首長。”葉群說：“是嘛，人家都說她長得像我，可是她就是不相信，老懷疑她不是我生的。都是讓‘壞人’挑撥的！”^(注5)

葉群這裡所稱的“壞人”就是指嚴慰冰。正是由於嚴慰冰長年累月不斷地寫匿名信挑撥葉群和林豆豆的母女關係，

林豆豆與葉群的關係在很長時間內都非常緊張，林豆豆懷疑自己不是葉群的親生女兒。林家為了證明嚴慰冰匿名信的捏造，找到了當年在延安時期的保育員、接生員等，證實林豆豆確實就是林彪和葉群的親生女兒。儘管如此，這已經給林彪一家造成了無可挽回的嚴重傷害和無窮的煩惱。

人們不禁要問，嚴慰冰為何持之以恆地給林彪一家寫匿名信？她的目的何在？1960年以前，林彪一家與陸定一一家基本上沒有往來，以往也沒有任何私人的恩怨。林彪從事軍隊工作，但1959年以前因為身體健康的緣故基本上遠離中共政治漩渦，中共建國以後歷次政治運動都與林彪無緣，葉群更未涉入中共黨內任何事宜。陸定一則長期從事黨務宣傳，是中共宣傳口的總管。林彪與陸定一在工作上也從無交集，乃井水不犯河水。套用一句俗話來說，林彪、葉群與陸定一、嚴慰冰“往日無冤、近日無仇”。

官方欽定的陸定一傳記作者為了粉飾嚴慰冰的行為，羅列了一些嚴慰冰寫匿名信的動機：（一）嚴慰冰在延安時期發現葉群“隱瞞歷史，虛報黨齡”；（二）延安時期葉群因為生孩子搞特殊，經常要吃雞，吃不到雞就在醫院大吵大鬧，嚴慰冰看不慣；（三）解放後葉群向黨伸手要權要官，一次次提拔最後成為了林彪辦公室主任，且在軍內頤指氣使，是個女霸；（四）葉群歧視、虐待林彪前妻的女兒，引起嚴慰冰的憤慨。^{（注6）}

官版的說辭能否站得住腳？眾所周知，延安整風運動的後期，毛澤東、康生搞了一次審幹“搶救失足者運動”，中共自己

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承認這一運動“混淆敵我界限，嚴重逼、供、信的錯誤進一步擴大，造成大批冤、假、錯案，使不少同志無端地受到懷疑、傷害或關押審訊。”延安半個月內居然挖出特嫌分子 1400 多人。^(注 7)葉群實際上也是這場運動的受害者之一，所謂“隱瞞歷史，虛報黨齡”純屬無中生有。葉群的人黨介紹人是師大附中的地下黨員傅英豪，中共建國後曾任空軍雷達兵部部長。^(注 8)

據知情人講述，延安時代的生活非常艱苦，林彪與葉群從未向“組織上”要求特殊照顧。葉群生林豆豆時是早產，缺少奶水，身為抗大校長的林彪連林豆豆必需的奶粉都搞不到，更未給葉群張羅過任何特殊待遇。嚴慰冰說葉群在醫院吃不到雞就大吵大鬧，純屬無中生有。



林彪與前妻的女兒林曉霖。

葉群 1936 年加入中共，在北平參加了“一二九運動”，盧溝橋事變後輾轉去了延安。從資歷上來說，葉群屬於“三八式”幹部。中共建國後，在 50 年代評定軍銜時，葉群被評為大校，這也符合當時的定銜標準，並無不妥。葉群那時的主要工作是照顧身體不好的林彪。為了照顧好林彪，葉群不得不放棄自己在教育部的工作，專職做好林辦主任，這其實也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交給葉群的任務。^(注 9)那時的葉群從未過問過軍內事務（林彪那時尚且不過問軍內事務，何況葉群），嚴慰冰指責葉群向黨伸手要權要官，“在軍內頤指氣使，是個女霸”，實屬子虛烏有。

林彪與前妻有個女兒林曉霖，對這個非親生女兒，葉群一直是很照顧的。50 年代時期，林彪在青島修養時，葉群多次吩咐秘書把林曉霖接到家裡，讓林曉霖和林豆豆、林立果住在一起。林曉霖要去海邊游泳，葉群為了安全還吩咐秘書陪同，並安排好住宿和伙食等。^(注 10)另據知情人士透露，林曉霖生孩子時，葉群特地委託邱會作的夫人胡敏前去看望，帶去葉群精心挑選的嬰兒用品。一個家庭難免會有一些家庭矛盾，尤其是幾次婚姻而形成的家庭矛盾在所難免，外人很難判斷其中的是非對錯，因此世上也就有了“清官難斷家務事”的格言。嚴慰冰毫無道理地介入別人家庭事宜，挑撥別人的家庭感情，製造矛盾，這究竟出於什麼樣的心態？

嚴慰冰的精神病

嚴慰冰何以持續不斷地給林彪一家寫匿名信？陸定一的解釋是“嚴慰冰之所以寫匿名信，是因為她患有精神病，把握不住自己。許多人不相信，因為除了與我吵架和寫匿名信外，處理其他事情還是正常的。我曾請教過北京一家醫院的神經科主任，瞭解到確實有這樣一種病，在許多事情上表現很正常，對某些特殊事件，表現很不正常。嚴慰冰得的正是這種病。”

嚴慰冰為何患有精神病？陸定一的解釋是“1952年開展三反五反運動，領導運動的人企圖把嚴慰冰和徐特立（當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兒媳打成‘大老虎’，整了他們兩人的材料……受過這樣的刺激，嚴慰冰就得了精神病。”^{（注11）}

據“文革”期間衛生部群眾組織印刷的小報披露，從1961年到1966年，陸定一曾為嚴慰冰組織過六次專家會診。^{（注12）}大致情況如下：

第一次會診：1961年3月，衛生部保健局電告上海衛生局，通知華東醫院院長薛邦祺和精神病科專家粟宗華到北京報到。薛、粟到京後，又同衛生部副部長史書翰同機飛廣州（當時陸定一和嚴慰冰住在廣州）。粟宗華根據薛邦祺介紹的嚴慰冰病情和體檢結果，以及自己所觀察到的，做出嚴慰冰患有“更年期精神病”的診斷。

第二次會診：1963年夏，公安部門已經查明給林彪一家寫匿名信的人就是嚴慰冰。這年11月，陸定一帶嚴慰冰赴上



官版《陸定一傳》。

海治病，仍由薛邦祺和粟宗華負責為嚴慰冰會診醫治。薛邦祺、粟宗華診斷嚴慰冰患有“多疑性精神病”，並和一位醫生在陸定一的住所，為嚴慰冰做了50次胰島素休克治療。陸定一還向薛透露了嚴慰冰攻擊林彪一家的行為。

第三次會診：1966年2月18日，衛生部部長錢信忠、衛生部副部長史書翰、衛生部副部長兼北京醫院院長黃樹則等人在衛生部某處為嚴慰冰會診，會診的目的：（一）“病人”這些表現是思想意識問題還是病態？（二）若是病，是什麼病？如何解決治療問題？（三）對病勢的估計如何？（四）治療方法，在什麼地方治療？病人不承認自己有病，如何使她接受治療？醫生根據嚴慰冰的病史進行討論分析，都認為嚴慰冰患有猜疑性

(偏執性)精神病,提出可去香山療養加藥物治療,或用電休克等。

第四次會診:1966年2月21日,錢信忠、史書翰通知衛生部醫療處請上海的栗宗華來京為嚴慰冰會診。2月22日和23日仍在衛生部某處為嚴會診,專家們同意嚴慰冰屬於“歇斯底里性格基礎上產生的偏執狀態”。有的醫生“提出是否可以去四清,加藥物治療”,還有醫生則建議使用胰島素休克加電療等。

第五次會診:1966年3月4日晚,由史書翰出面組織一次大規模會診,這次會診專門討論有關嚴慰冰的“治療”安排的問題。會診後,史書翰亦親自帶領醫生去北醫三院挑選精神病病房。

第六次會診:根據第三、四次會診,醫生建議讓嚴慰冰服用藥物斯特拉金。由於藥物的副作用,1966年4月8日,醫生們再次給嚴慰冰做了會診,詢問了病情,並為嚴慰冰作了體格檢查,未發現異常(據當時病歷記錄),但沒有對前幾次會診的診斷提出異議和疑問,仍按原治療計劃給以藥物斯特拉金服用。

“文革”期間這類“紅色小報”大都是群眾組織內查外調寫出來的,從《衛生戰報》披露出來的資料,尤其是衛生部主要領導人的親筆信函等,均可看出衛生部領導對此事是相當重視的。嚴慰冰有精神上的問題是可信的,嚴慰冰因精神問題在那幾年中請醫學專家會診一事應該也是可靠的。嚴慰冰之

所以寫匿名信是由於精神上的問題，屬於精神不太正常，這應該還是一個說得過去的理由。很難想像一個正常的人會長年累月無休止地給一個與自己毫不相干、毫無利益衝突的人寫匿名信，且主要目的是挑撥人家的家庭關係。由此而觀之，嚴慰冰的行為的確屬於精神問題。

是誰偵破了嚴慰冰案？

嚴慰冰匿名信案是如何偵破的？長期以來流行的說法是“林彪破案說”，這個說法主要來自官版的陸定一傳記，說1966年初的某一天，嚴慰冰與葉群在北京王府井某商店偶遇而發生爭吵，嚴慰冰不忿一狀告到解放軍總政治部，總政的領導人拿著嚴慰冰寫的情況向林彪反映問題，林彪看到這些字跡眼熟，因此想到了匿名信，於是告訴了公安部，公安部由此確定這些匿名信出自嚴慰冰之手。^(注 13)這個說法流傳甚廣，很多不明真相的人大都採信了這個“林彪破案說”。

然而，這個“林彪破案說”卻經不起史實的檢驗。據可靠的知情人士透露，嚴案偵破的關鍵，是公安人員通過信件上的郵戳，分析了匿名信投寄的地點分布、時間密度及到達這些投寄點的路徑，從而縮窄了隱藏甚深的嫌疑人的範圍。^(注 14)另據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曾任公安部副部長的凌雲披露，嚴慰冰匿名信案是由公安機關偵破的。凌雲如是說：“1966年3月的一天晚上，周總理找謝富治、劉復之和我去，談的是關於陸

的夫人嚴慰冰寫匿名信的事。這些匿名信大多是明信片，從1960年起已經延續了一個時期了，是針對葉群並直接寄給葉群和葉的女兒的。只要與嚴熟悉的人，一看就能辨別出寫信人是誰。公安部六局副局長海宇從北京醫院、華東醫院嚴的病歷上瞭解到，從1952年開始嚴就有精神病或偏執性精神病的記載。當時徐子榮、我和海宇都認為是病態，不是了不起的事情，也曾口頭報告彭真，他也同意我們的看法。我們就把此事放下了。”（注15）

從凌雲所談的這段情況可以看出以下幾點：

第一，嚴慰冰給林彪一家寫匿名信一事，公安部門早就掌握了情況，並非是官版陸定一傳和後來某些人杜撰出的那個離奇情節：1966年初嚴慰冰與葉群在王府井某商店偶遇而吵架，最後導致林彪破案。

第二，嚴慰冰寫匿名信大都以明信片的方式，並且直接寄給葉群和林豆豆。凌雲雖然沒說匿名信的具體內容，但是從後來披露出來的信息來看，嚴慰冰寫這些匿名信的目的主要是挑撥葉群與林豆豆母女之間的關係，既非如官史所說的“出於一種義憤而進行的揭露和譴責”，更不是某些人刻意拔高的嚴慰冰“準確地作出了歷史的預言”。

第三，嚴慰冰確實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公安部門在偵破此案時總要瞭解嚴慰冰的作案動機，公安部門根據嚴慰冰就診記錄就已經判斷出嚴慰冰的表現屬精神方面的問題。

第四，在偵破此案後，由於茲事體大，涉及到政治局候補

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部長陸定一的夫人，公安部門不能擅自作主，於是向中央主管政法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彭真作了匯報。然而，彭真對此卻認為“不是了不起的事情”，於是“就把此事放下了”。1966年6月27日，劉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談會上講話中說：“嚴慰冰的反革命案件，兩年前就發現了，當時我們懷疑陸定一是否知道她的反革命活動。這事是交給彭真去處理的，因為這是一個具體案件，我們沒有直接去處理。”^(注16)劉少奇所言非虛，與凌雲的說法可以相互印證。

事實證明，官版陸定一傳記裡的“林彪破案說”，純屬向壁虛構。此案的偵破應歸功於謝富治領導下的公安部。



毛澤東在“文革”中拉攏林彪（左二）、利用江青（右一）。

為何沒有得到及時處理？

既然嚴慰冰匿名案早在 1963 年就由公安機關偵破了，為何從 1963 年到 1966 年初這兩年多的時間裡嚴慰冰的行為沒有得到及時阻止？

但是陸定一確實因為此事曾帶嚴慰冰看過精神科醫生。

從上述嚴慰冰醫療會診的情況來看，從 1961 年 3 月的第一次會診到 1963 年 11 月的第二次會診，這期間隔了兩年半。從 1963 年 11 月到 1966 年 2 月的第三次會診，又隔了兩年多。這說明陸定一雖然給嚴慰冰作了醫學會診，但是並未特別重視。

然而從 1966 年 2 月中到 4 月初這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內，竟然給嚴慰冰密集會診了四次，而此時正是中共高層政治鬥爭最緊張的階段，也是彭真、陸定一等人面臨毛澤東打擊最難過的時期。此時的毛澤東正領導江青、張春橋們向劉少奇等中央一線領導人發起攻擊。毛澤東對彭真、陸定一等人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綱》極為不滿。毛澤東通過江青導演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議紀要》指出：文藝界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專了我們的政”；“堅決進行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此時的毛應該已經下定決心，通過徹底扳倒彭真、陸定一等人，最終順藤摸瓜揪出他們背後的劉少奇。相信此時的彭真和陸定一應

該感受到了毛澤東那股咄咄逼人的殺氣。此時的嚴慰冰匿名信案恰似火上澆油，給這一政治鬥爭帶來更多的不確定因素，公安部門對嚴案的偵破使得陸定一無路可退，唯有通過衛生部門確認嚴慰冰患有精神病也許才能逃過毛澤東的這一波打擊。

據官方欽定的陸定一傳記，1966年2月初，彭真約談陸定一。彭真在談話中向陸定一出示了公安部轉來的嚴慰冰匿名信照片，陸定一大吃一驚，聲稱自己根本不知道嚴慰冰給林彪一家寫了這麼多匿名信。^(注17)接下來的短短一個多月內，衛生部出面為嚴慰冰密集組織了四次會診。如果不是出自“組織上”的刻意安排，嚴慰冰如何能在這麼短的特殊時間內享此待遇？當然，官版的陸定一傳記是不會述及衛生部為嚴慰冰組織的這六次會診的。

陸定一是否真的不知道嚴慰冰的所作所為？陸定一在這一事件上死咬不知情，日後官版的傳記也都統一口徑予以否認。但是劉少奇在1966年6月27日民主人士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兩年以來，嚴慰冰的反革命活動越來越猖獗，她探聽中央負責同志和林彪同志的行蹤，林彪同志什麼時候到什麼地方，住在那裡，這些事我們都不太清楚，但是她都打聽得清清楚楚。嚴慰冰跟著陸定一，參與很多黨內機密，知道很多事。幾個月前，要彭真把嚴慰冰的材料告訴陸定一。而陸定一回去卻把情況全部告訴了嚴慰冰，並用多種方法包庇嚴。最近已把嚴慰冰這個反革命分子逮捕了。根據各種材料判斷，



“文革”中批鬥陸定一。

陸定一是知道嚴的情況的，陸、嚴是合謀的，許多事陸定一如果不告訴嚴慰冰，嚴是無法知道的。”^(注18)陸定一是否知情姑且不論，劉少奇這裡所說陸定一“用多種方法包庇嚴”，應該就是指陸定一請醫學專家為嚴慰冰會診精神病及醫療一事。

拋開“文革”小報裡那些人身攻擊和極左的詞藻，我們應該承認嚴慰冰確實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問題在於，既然公安部門和中央一線工作的衞衞諸公們早就發現了嚴慰冰的這些活動，為何他們卻袖手旁觀，既不出面制止，也不及時採取措施使嚴得到必要的治療，任由嚴慰冰持續不斷地投寄此類

匿名信，直到 1966 年初中央的政治鬥爭馬上就要燒到彭真和陸定一的頭上時，陸定一才臨時抱佛腳給嚴慰冰作醫療會診？正是因為中央掌管政法系統的彭真和公安機關的完全不作為，致使嚴慰冰在寫匿名信一事上“越來越猖獗”（劉少奇語）。筆者認為，彭真等人之所以瀆職、不作為，還是出於官官相護。陸定一既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和中宣部部長，同時又是國務院副總理兼文化部部长，誠所謂牽一髮而動全身，所以彭真對陸的老婆嚴慰冰的行為採取了睜一眼閉一眼的態度，也算是同氣連枝，惺惺相惜吧。

林彪質問陸定一

中共中央在處理嚴慰冰案一事上頗動了一番腦筋。3 月 6 日陸定一被中央要求南下外地。其實這也是為了更方便中央處理嚴案。周恩來為此專門找陸談話，對陸說：你最好到外地去，時間越長越好。陸定一先後去了上海、南昌、井岡山、吉安、景德鎮、蕪湖、合肥。4 月 30 日公安部副部長楊奇清和中宣部副部長張子意到合肥，代表中央與陸談話，告知嚴慰冰已被中央定性為“反革命分子”，於 4 月 28 日被逮捕。與此同時，楊、張還傳達中央的五條指示：不要泄露消息；不與嚴慰冰家人聯繫；繼續留在外地，不要回京等。張子意還與陸個別交談，建議陸定一寫信向中央表示自己的態度。陸定一接受了這個建議，寫信給中央，表示擁護中央的措施並遵守中央的幾條

規定。惟5月6日陸定一接到汪東興的電話，通知他立即回京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陸遂於5月8日乘機飛回北京。^(注19)

從這一過程來看，中央早就籌劃好了如何處理嚴慰冰一案，先是將陸定一調離北京，然後再實施對嚴慰冰的逮捕，隨即召開政治局擴大會清算彭真、陸定一等人。毛澤東當時不在北京，劉少奇主導黨務，而具體負責此事的就是周恩來。據凌雲回憶，1966年3月份，周恩來找謝富治、劉復之和凌雲談話，凌雲說：“這次周總理找談情況不同了。周總理要我連夜把信（指嚴慰冰匿名信）複製多少份，我一個晚上沒睡覺，夜裡周總理給我打了幾個電話，他的秘書也來過一次，最後天亮，周總理電話中讓我把複製件送到一個地方。隨後我才知道這些匿名信複印件是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散發的。在這個會上彭真、陸定一已點名挨鬥，嚴慰冰也被隔離審查了。”^(注20)

在5月份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林彪手書了一紙聲明：

我證明：（一）葉群在我結婚時是純潔的處女，婚後一貫正派；（二）葉群和王實味根本沒有戀愛過；（三）老虎、豆豆是我與葉群的親生子女；（四）嚴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談的一切全係造謠。

林彪1966年5月14日

林彪手書的這封證明信就是因為嚴慰冰匿名信對葉群和林彪一家的惡意中傷，林彪要為自己和自己的夫人找回清白。其實，設身處地地想一下，只要是一個正常的男子漢，都無法容忍他人對自己和自己的配偶作如此無中生有的造謠和誹謗，更

何況身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林彪。

在 1966 年 5 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林彪曾質問陸定一：

“你為什麼害我？我這個人一直喜歡一點知識分子，對你陸定一我還是比較喜歡的，你為什麼幹這麼壞的事，用意何在？”^(注 21)

所有與會的中共高級幹部對嚴慰冰的行為表示了強烈的憤慨，軍隊幹部尤甚，葉劍英、楊成武、蕭華等人都在會上發言表態。楊成武乾脆走到陸定一面前說，解放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並把拳頭伸到陸定一的眼皮下說“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注 22)

周恩來在會上對陸定一作了解嚴厲的斥責。邱會作的回憶裡有這麼一段話：“對此案，周總理的態度是嚴肅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在會上對陸定一，不僅批評、痛罵，還激動得把喝水缸子砸到陸定一坐的那邊去了。總理這樣發怒，以我所知是空前未有的。總理批評嚴慰冰這種行為，不僅在共產黨內不應該有，就是在國民黨內也是少有的；是國民黨少數特務才能幹出來的下流手段。在我們黨內發生這樣的事，並且還持續了幾年的時間，這不僅對林總不應當，對任何人都不應當。把國民黨的下流手段搬到共產黨內部來，是對黨的破壞，完全是反革命行為。對這件事，應當受到黨紀、國法的制裁！”^(注 23)

由此可見，一旦在毛澤東發話後，中共中央就會動真格的了，一切必要的手段都會拿出來。與彭真的不作為形成鮮明的對照，周恩來這位“人民的好總理”親力親為，兢兢業業，一絲

不苟地將全案一抓到底，一舉完成對陸定一和嚴慰冰的“無產階級專政”。

中共中央針對嚴慰冰匿名信一案，在5月24日發出中央文件，將其定性為：“陸定一同志的妻子嚴慰冰，是現行反革命分子，現已查明，嚴慰冰在1960年3月到1966年1月的六年期間，連續寫了幾十封反黨反革命的匿名信，其中90%是集中攻擊和辱罵毛澤東同志最親密的戰友林彪同志和他的一家的。這些信中充滿了刻骨的反動階級仇恨。大量的材料證明，陸定一同嚴慰冰的反革命案件是有密切牽連的。在嚴慰冰的臥室內書桌上放著1965年2月15日寫的一封信的四頁底稿和寄給葉群同志的信封，時間達一年零兩個月之久，陸定一不可能不知道。而且嚴慰冰寫反革命匿名信達六年之



秦城監獄。

久，在寫的時候，陸定一幾乎全都在家。當陸定一被告知嚴慰冰犯了反革命罪行時，陸不僅不表示憤慨，還想誑說嚴患有神經偏執症為嚴開脫。陸定一在這個反革命案件中究竟扮演一個什麼角色，專案審查委員會將加以徹底查究。”^(注 24) 1967 年 2 月嚴慰冰被關進大陸政治犯監獄——秦城監獄。

妻子匿名信與丈夫倒台

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甚至包括一些學者，他們在論及陸定一的倒台問題上，大都歸結為林彪對陸定一和嚴慰冰的仇恨。如已經去世的南京大學教授高華就認為：“林彪最恨的是陸定一夫婦。陸原是毛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提拔的重要領導幹部，建國後毛對陸也基本信任。50 年代後期以來，陸在對知識分子問題的看法上和毛一致，受毛欣賞，但陸定一的夫人嚴慰冰長期給林家寫匿名信，得罪了林彪。陸定一和林彪的重量不能相提並論，毛要拿到林彪的忠心，犧牲陸是小事一樁。”^(注 25) 按照這一邏輯，毛澤東本人並不想打倒陸定一，而是林彪與陸定一、嚴慰冰之間的私仇作祟，最終毛澤東的政治天平倒向了林彪，由此陸定一成為犧牲者。

陸定一在“文革”前緊跟劉少奇、彭真，早就不得毛澤東的歡心了。自 1963 年下半年始，毛澤東就接二連三地嚴厲批評了陸定一所主管的宣傳部門的工作。1963 年 12 月 12 日，毛澤東作了關於文藝領域的批示：“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



左起：葉劍英、毛澤東、鄧發、陸定一、王維舟、聶榮臻、周恩來、陳賡。1945年吳印咸攝於延安。

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但其中的問題也不少。至於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社會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築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這需要從調查研究著手，認真地抓起來。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1964年6月27日，毛澤東再次批示：“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是好的），15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

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事實上，陸定一從那時起就開始走了下坡路。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矛頭直指北京市副市長吳晗，這篇背著北京中央劉少奇、鄧小平等人搞出來的文章，實際上是對他們和中宣部的一個“突然襲擊”。正因為彭真、陸定一等人對該文的背景不摸底，故採取了抵制的態度，北京各報拒絕轉載姚文。毛澤東對此極為不滿，下令發行小冊子，但是北京方面對上海方面的訂購遲遲不作表態。後來在毛澤東的壓力和周恩來的斡旋下，北京各報雖然轉載了姚文，但彭真卻試圖將這一討論限定在學術領域之中，且不同意將吳晗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試圖保護吳晗過關。1966年2月5日彭真將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的“彙報提綱”送給在京的政治局常委，並作了說明。陸定一當時同意該提綱的內容，認為學術爭論不應變成政治批判。隨後，彭真、陸定一到武漢向毛澤東作了彙報。但毛澤東對此顯然是極為不滿的。3月17日到20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專門研究下一步如何展開批判的問題。毛澤東在會上說：我們在解放以後，對知識分子實行包下來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現在學術界和教育界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掌權。社會主義革命越深入，他們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現在許多地方對於這個認識還很差，學術批判還沒有開展起來。各地都要注

意學校、報紙、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麼人的手裡，要對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進行切實的批判。我們要培養自己年青的學術權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押他們的稿件。毛澤東特別提出：中宣部不要成為農村工作部。而農村工作部於1962年被取消。毛澤東雖然沒有點陸定一的名字，但是其含義已經很明顯了，即陸定一可能像當年的鄧子恢那樣當不成部長了。3月28日至30日，毛澤東同康生以及江青、張春橋等人分別或一起談了三次話，批評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壞人。毛說，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做了進行階級鬥爭的決議，為什麼吳晗寫了那麼許多反動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發表姚文元的文章卻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難道中央的決議不算數嗎？毛還說，扣押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識分子的人是“大學閥”。中宣部是閻王店，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如果再包庇壞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組”要解散。

（注26）

毛澤東口中的“閻王殿”就是陸定一領導下的中宣部，毛澤東要打倒的“閻王”正是時任中宣部部長的陸定一。即使沒有嚴慰冰寫給林彪一家的匿名信，陸定一在“文革”初起時也一定會被毛澤東所打倒，嚴慰冰的匿名信案不過是為這場政治鬥爭增添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花絮而已。那種指稱陸定一倒台是因為嚴慰冰匿名信東窗事發的說法，不過是將毛澤東玩弄的政治鬥爭簡單化，抑或是對歷史的無知，前述高華的論點至此也就不攻自破了。

嚴慰冰匿名信案後續

1975 年 11 月 12 日，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討論陸定一問題。會議給陸定一定了三條罪狀：一、階級異己分子；二、反黨分子；三、內奸嫌疑。會議決定將陸永遠開除黨籍，釋放出獄，離京回原籍，每月發 200 元生活費養起來。決議經毛澤東批准，作為中共中央 1975 年第 25 號文件，下發全國。該決議提及嚴慰冰案時說“從 1960 年 3 月至 1966 年 2 月，查獲陸定一之妻嚴慰冰發出攻擊林彪、葉群的匿名信 32 封。在尚未發現林彪、葉群的問題之前，嚴慰冰採取這種手段，陸定一對她加以包庇是錯誤的，對他們進行審查也是必要的。”但



粉碎“四人幫”。

該文件所言“離京回原籍”一事並未兌現。

據邱會作回憶：“後來我才知道，毛主席要把我們放出去‘養起來’。但是上海幫和汪東興等人抵觸，說：‘不能暗著走，要明著走’。不久，‘批林批孔’運動開始了，周恩來自顧不暇，沒落實。據說，那一次安排出去‘養起來’的是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我、李雪峰、陸定一等人。”^(注 27)粉碎“四人幫”後，陸定一多次申訴，在胡耀邦的關懷下，陸、嚴兩人在 1978 年 12 月方被釋放出獄。

1979 年 6 月 8 日，中共中央轉發中共中央組織部《關於陸定一同志問題的復查報告》的通知。^(注 28)該復查《通知》將陸定一的倒台歸結到林彪身上：“1966 年 5 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林彪誣陷陸定一同志陰謀反黨。以後經中央批准進行隔離審查。1968 年 5 月 23 日經陳伯達、謝富治、吳法憲批准逮捕入監。”

關於嚴慰冰匿名信問題，該復查《通知》說：“經查，據病歷記載和醫生證明，嚴慰冰同志在寫匿名信期間患有精神病。當時陸定一同志並不瞭解她寫匿名信的情況，事後也不存在包庇的問題。”

這樣一紙復查《通知》輕輕鬆鬆地將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似乎陸定一、嚴慰冰的倒台與他們毫無關係，都是林彪一手造成的。日後官版的陸定一傳記也悄悄地篡改歷史，編造出一段離奇的故事情節，將匿名信案的偵破時間從 1963 年向後推遲到 1966 年初，將偵破匿名信案的

主角從公安部悄然換成了林彪，瞞天過海地將彭真和公安部門的不作為隱匿過去，陸定一、嚴慰冰被打倒和遭迫害的原因也就順理成章地歸結到林彪身上。但是文革史家余汝信就此問及：“屈指算來，陸、嚴被囚禁幾近 13 年，其中 1971 年‘913’事件後七年。要說‘迫害’，這後七年的‘迫害’帳，無論如何也算不到林彪、葉群頭上的了，那麼，算在誰的頭上？”（注 29）

誰是誰非

1、嚴慰冰匿名信案不是政治性案件，僅僅是單純的人格侮辱、造謠、誹謗和騷擾他人家庭罪。此案如果發生在一個正常的法治國家，警方會很快予以處理，將其制止並繩之以法，不會放任肇事者肆無忌憚、長年累月從事這類犯罪活動。遺憾的是，中國的公安機關在偵破此案後竟然無所事事，放任嚴慰冰的活動達五年之久。這也是中共高層政壇生活中的一個奇景。

2、經過醫學專家們的鑑定，嚴慰冰寫匿名信是出於精神上的問題，這點應該可以確認。中共因為嚴慰冰寫匿名信將其打為“反革命”，且關押 13 年，實為政治迫害，此點應無疑義。問題在於，當初如果公安機關偵破此案後及時採取必要的措施，至少使嚴得到有效的治療，防止嚴再次從事類似的活動，也不至於鬧到後來那麼嚴重的程度。顯然，中共政法機構在此方面確有嚴重失職。

3、粉碎“四人幫”後，嚴慰冰被平反出獄，在鄧小平徹底否定“文革”的大潮下實屬必然。然而嚴慰冰的行為卻因為林彪的被打倒而披上了一層神聖的光環，嚴慰冰寫匿名信本身也變得“高大、正確”起來，甚至被官史美化為“出於一種義憤而進行的揭露和譴責”，而根本無視這件事本身的犯罪性質，即使嚴慰冰的行為可以用精神病發作為由而脫罪，但是這種行為本身必須受到嚴厲的譴責。事實證明，只要政治力量介入，司法也就沒有了公正，而歷史本身也會被當政者隨意扭曲、篡改。這在當下的中國仍然大行其道。

4、中國受幾千年來皇權專制制度的影響，一人得道，雞犬升天，隨著某個政治人物的得勢，其家人親屬也一起跟著沾光，逐漸形成一股政治勢力，呼風喚雨、左右政壇。嚴慰冰夫貴妻榮，乃至彭真在公安部破案後竟採取了姑息、縱容的態度。其實，日後的江青就是絕好的一例，江青在“文革”中在毛澤東的庇佑下縱橫中共政壇十載，給中國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正如余汝信所言：“時至今日，如果我們還僅僅從個人品質的優劣去解讀往昔而不是從制度設置的落後性方面，理性而又深刻地反省夫人干政這一類帶有強烈封建色彩的糟粕對國家民族的嚴重危害，那麼，我們的意識不僅尚與現代法治社會的精神理念還相去甚遠，而且，也實難徹底根除類似‘文革’這樣的悲劇在中國大地上重演的可能。”^(注30) (丁凱文) ■

注釋：

- 1,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 年版，第 593 頁。
- 2,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第 702 頁。
- 3, 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上，新世紀出版社，2011 年版，第 438 頁。
- 4, 張雲生、張叢莖《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2003 年版，第 65 頁。
- 5, 官偉勛《我所知道的葉群》。中國文學出版社，1993 年版，第 170 頁。
- 6, 陳清泉《在中共高層 50 年：陸定一傳奇人生》，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 256—257 頁。
- 7,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1921—1949）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 年版，第 623 頁。
- 8, 羅浮山《走近林彪夫人—葉群》，丁凱文主編《百年林彪》，明鏡出版社，2007 年版，第 614 頁。
- 9, 羅浮山《走近林彪夫人—葉群》，丁凱文主編《百年林彪》，明鏡出版社，2007 年版，第 621—622 頁。
- 10, 宋德金《真實的林彪—林彪秘書最後的回憶》，皇福圖書，2008 年版，第 170 頁。
- 11, 陳清泉《在中共高層 50 年：陸定一傳奇人生》，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 257—258 頁。

12,《反革命“會診”案件內幕》,載《衛生戰報》第三、四期合刊,1967年6月13日。

13,陳清泉《在中共高層 50 年:陸定一傳奇人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 258-259 頁。

14,余汝信《從王光美談嚴慰冰案說起》,《華夏文摘》增刊第 500 期,2006 年 5 月 15 日。

15,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共黨史資料》第 76 輯,2000 年 12 月版,第 77-78 頁。

16,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2010 年版。

17,陳清泉《在中共高層 50 年:陸定一傳奇人生》,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 254-255 頁。

18,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2010 年版。

19,陳清泉《在中共高層 50 年:陸定一傳奇人生》,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 259-264 頁。

20,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共黨史資料》第 76 輯,2000 年 12 月版,第 77-78 頁。

21,王力《王力反思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 年版,第 593 頁

22,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上,新世紀出版社,2011 年 1 月版,第 438-440 頁。

23,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上,新世紀出版社,2011 年 1 月版,第

438-439 頁。

24,《中共中央關於陸定一同志和楊尚昆同志錯誤問題的說明》,1966年5月24日;中發[66]278號,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2010年版。

25,高華《革命政治的變異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載香港中大《二十一世紀》2006年10月號。

26 郝懷明《文革初的中宣部》,《炎黃春秋》,2010年第12期。

27,程光《心靈的對話－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上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722頁。

28,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2010年版。

29,同14。

30,同14。

時任海南區黨委書記馮白駒說：“今天召開的這個會是沉痛的會，但案情已弄清，也是極光榮的一個會。”“烈屬們應該繼承死者的精神，保持烈屬的光榮……”哭泣的人群中忽然有人大聲喊叫：“我們不要什麼光榮，我們要自己的孩子！”

革命無情地 吞噬自己的孩子

——記瓊崖地下學聯冤案

在審訊中，對熱血青年夜以繼日地嚴刑拷打，動用的各種刑罰有：吊打、夾棍、打膝蓋、電刑、用針刺女青年的乳頭、用竹籤子刺手指、灌辣椒水等。總之，凡是能想像出來的人間酷刑都用上了。受刑者被折磨得屎尿並流、死去活來，哀聲慘叫。從審訊室裡常常傳來淒厲的求救聲和以頭撞擊牆壁的聲音。最可憐的是那些女學生，除去刑訊，她們還要遭受獸性的凌辱，審訊者把她們的衣服扒開，狂笑著用點燃著的菸頭去燙她們的乳房……

無論誰讀了上面這一段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慄的文字，都會聯想到這些法西斯行徑是發生在小說《紅岩》中的渣滓洞集中營裡，是“喪盡天良”的美蔣特務折磨我們革命志士



瓊崖地下學聯革命烈士墓。



冤案製造者、瓊崖區黨委書記馮白駒被稱作“不倒的紅旗”。

的場景。不，恰恰相反！這些恐怖場景卻發生在建國之際的海南島解放前夜，是海南黨組織對自己人所濫用的酷刑，是1949年底到1950年間的“瓊崖地下學聯冤案”的真實經歷。在這場冤案中，有31個風華正茂的革命青年，慘死在自己人的槍口與酷刑之下，永遠長眠在他們為之奮鬥的土地上。

特大冤案是怎麼發生的

據親歷者也是倖存者、原法律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藍明良的回憶文章《心香一瓣托哀思》（見《夕陽頌——法律出版

社建社 50 周年文集》) 記述, 成立於 1948 年 5 月的瓊崖地下學聯, 是解放戰爭時期在瓊崖黨組織直接領導下的地下組織, 從 1946 年組織讀書會開始到 1948 年正式宣布成立, 先後發展到 300 多人(包括外圍組織)。他們中有來自南京學運的骨幹人物、進步歸國僑生、進步教師、革命堡壘戶的後代、貧苦青年、從富裕家庭參加革命的學生以及烈士的遺孀等。地下學聯通過讀書活動, 團結進步同學, 搞策反活動、襲擊警察局、演進步戲劇, 諷刺國民黨的統治。即便是在學聯冤案發生後, 學聯成員依舊冒著被打成特務的危險, 配合即將渡海作戰的解放軍, 成功刺探“伯陵防線”, 為海南解放做出了巨大貢獻。在國民黨白色恐怖十分殘酷的海南島上, 這個組織就像一把鋒利的鋼刀, 在非常險惡的環境中與敵人展開鬥爭, 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

可就當全國解放戰爭節節勝利, 海南島也面臨解放的時候, 在瓊崖革命根據地中, 也就是瓊崖區黨委和瓊崖臨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白沙縣毛棧鄉, 卻發生了一場駭人聽聞的學聯大冤案, 由海南的革命領袖、人稱“不倒的紅旗”瓊崖區黨委書記馮白駒親手製造了這樁特大慘案。

冤案的由來其實很簡單, 是由瓊崖縱隊的一個女戰士劉秋菊吃過飯後, 突然肚痛腹瀉後死亡引發的。經過追查, 一個年僅十二、三歲的小公務員, 承認自己是投放毒藥的特務, 還偷竊過子彈。之後便是套用在“搶救運動”中慣用的那種連串逼供信的手法。於是, 在嚴刑拷打之下, 竟然追查出一

連串的特務，而地下學聯也成了具有“反共會”性質的特務組織。不到半個月時間，在白沙、文昌、瓊山等地工作的 320 多名地下學聯成員和外圍有關同志全部“落網”，其中的 21 個被認為是“不肯坦白”和“頑固不化”的成員在受盡酷刑後槍決；其它原因非正常死亡的十人。

這些被當作敵人而遭處決的同志都很年輕，有的剛滿 16 歲，還是孩子。他們每個人都有一個獨特成長的經歷，短暫的生命中，幾乎都蘊藏著一個個撼人魂魄和催人淚下的故事。

陳義俠：留取丹心照汗青

據藍明良回憶，瓊崖地下學聯的創建者之一陳義俠，是一個農村小夥子，他性情憨厚，卻又有一雙聰慧過人的眼睛。陳義俠出生在一個革命家庭，1942 年，12 歲的他就參加了抗日兒童團並任兒童團團長。後來，他是受黨指派，作為播火者來到瓊崖師範學校上學的。時至今日，藍明良仍記得與陳義俠一起在夜間張貼傳單、宣傳革命的危險情景，陳義俠面帶笑容地說，散發張貼傳單對他來說是家常便飯，沒有什麼可怕的，他倒想看看明天國民黨官員亂成一團的狼狽相。第二天情況果然跟陳義俠說的一樣：天明時，大批市民圍觀《告瓊崖人民書》，國民黨駐軍和警察局惶惶不安，亂成一團，驚呼：“昨夜共產黨進入海口市裡了！”



吳慰君遺像。

地下學聯冤案發生後，陳義俠是在瓊山被捕槍決的。

在生命的最後日子裡，這個革命者咬破自己的手指，在日記裡寫下了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詩句，以表示他對黨、對革命的忠貞不二。

陳義俠臨刑前只有一個要求，把他的日記本交給他的母親，在這個日記本裡，記載著他參加革命的理想、情操和經歷。面對槍口，他對行刑者說：“殺我是錯的，你們應該留下寶貴的子彈去殺敵人！”最後還說：“你們繼續革命吧，我先走了！”然後在高呼“共產黨萬歲”口號聲中飲彈而亡。

陳義俠死時，剛滿 20 歲。藍明良感嘆：一個從小就參加

兒童團的革命堅強戰士，一個具有鋼鐵般意志和心地如水晶般透明純潔的革命者，就這樣被自己人的子彈給擊倒了！

林雲：正確建議種下死因

林雲是地下學聯的創建者和領導人之一，也是地下學生運動的傑出代表。他出身豪富，父親是海口當年赫赫有名的白宮酒店老闆，但他卻義無反顧地背叛了自己的家庭，走上了一條為革命奔走和犧牲的道路，並且最後獻出了自己的年輕生命。

藍明良回憶，從表面上看，林雲裝束入時，風流瀟灑，儼然一副富商子弟派頭，並且還利用自己的身分，到越南為黨組織籌款。但他的一切言行都服從地下工作的需要，自覺的遵守黨的紀律。“鐵的紀律”，這是他經常用以教育同志並約束自己的圭臬。他學習勤奮，不僅讀魯迅，還讀《資本論》，既有理論知識也有實踐經驗。正如後來地下學聯冤案平反時，一位中央來的領導對他的評價：“林雲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革命者，既有詩人浪漫的氣質，又有理論家善辯的才華，可惜他犧牲得太早了！”

1949年8月24日，是瓊崖革命史最為蒙羞的日子，瓊府司法廳召開宣判大會，宣布地下學聯為“特務組織”，領導人林雲為“特務頭子”和“司令”，立即執行死刑。林雲之所以成為“特務頭子”，事出有因，因為他進山來到根據地之後，

作為知識分子出身的他愛提意見，曾向瓊崖縱隊領導建議：

“隊伍中不要講粗話、髒話、要組織學習文化、學理論、要搞讀書運動。以提高全體隊伍的文化理論素質。”沒想到這些話為自己種下了禍根，成了“貶低領導、驕傲自大、打擊領導”的罪證。

林雲臨死前，已經被折磨得遍體鱗傷、不能動彈了，他的雙手和雙腳被捆綁著，中間穿過一根棍子，讓村裡人說像殺狗一樣地被殺掉了。

吳慰君：與丈夫見面同赴死

同一天被殺掉的，還有林雲的愛侶、瓊崖師範的學生領袖和地下學聯的骨幹吳慰君。吳慰君來自香港，原是大家閨秀，家裡在香港開有一家飯店和“新華印刷公司”。她是在1948年底，在黨組織的安排下，瞞著自己親愛的雙親，顧不得拿上最簡單的行李，來投奔瓊崖縱隊的，準備將自己的一生獻給海南人民的解放事業。

這位端莊秀麗、才情橫溢的女子在執行死刑前，美麗的雙眸被蒙上一塊黑布，白皙的臉龐被拷打得傷痕斑駁。當她聽人悄悄說她的愛人林雲已經被打得動彈不得時，一向溫文爾雅的她大聲地要求揭去蒙著雙眼的黑布，好讓她最後看愛人一眼。這一對年輕的夫妻，終於在死前見上了最後一面。面對這人生至痛的慘劇，他們禁不住失聲慟哭，雙雙高喊“冤

枉啊！”其聲淒烈，不忍聽聞，卻絲毫不能感動施暴者的良知，槍彈照樣射向自己的同志！

作為早期瓊崖學運的參加者、二萬五千里長征女戰士謝飛（劉少奇前妻）在吳慰君烈士的傳記序言中，這樣寫道：“吳慰君烈士具有光輝的革命理想，堅強的革命意志，勇敢的鬥爭精神。她把寶貴的青春和生命獻給廣大勞苦大眾的解放事業。她死得悲壯，也死得光榮！”

嚴雪：冤魂遺骨何處尋？

60年過去了，留存在藍明良腦海裡，依舊有揮之不去的一個烈士影像，她就是女英雄嚴雪。她的經歷酷似江姐，走的是江姐的路。令人難過的是，江姐是死在國民黨鎚水池中，而嚴雪卻死在自己人的槍口之下。

嚴雪的丈夫陳克，1938年在廣州參加革命和入黨，是中共地下黨湛江情報站的負責人，嚴雪在他的領導下，搞過情報工作，搞過武裝鬥爭，從一個貧苦的農家女，成長為一個意志堅強、能文能武的革命戰士。

1946年，嚴雪的愛人陳克因鬥爭需要，調去搞後勤供應，他帶領湛江地下黨的十幾條帆船運載物質到澳門，在海上與國民黨軍隊遭遇而犧牲。此後，嚴雪擦乾眼淚，繼續在游擊區堅持武裝鬥爭，在極端困難的日子裡，南路特委為了保護嚴雪一家三口的安全，不讓嚴雪一家遭到敵人的追捕和迫



韓惠敏遺像。

害，從海路護送回海南。但是嚴雪一踏上久別的家鄉，就強忍著失去親人和戰友的悲痛，安置好老母，背上年幼的兒子，以教書為掩護，走上了尋找黨組織道路。藍明良至今還記得那一個細雨濛濛的晚上、在約定的地點與嚴雪會晤的情景。嚴雪中斷多時的組織關係得以恢復，她心中的喜悅之情難以言表的，面對這位令人肅然起敬的大姐，除了安慰之外他還能說什麼呢！在地下黨組織的安排下，嚴雪以小學教師的身分，開始新的地下學生工作。

1948年年底，嚴雪來到瓊崖根據地就任演豐鄉婦聯主任，不久就在地下學聯冤案中被槍殺了。

多少年後，藍明良讀完嚴雪當年背上的兒子、小名小黑仔為回憶母親寫下的文字時，淚水一次次地模糊了雙眼。這位失去雙親的兒子這樣寫道：“對於爸爸媽媽的犧牲，我十分悲傷。但是對於媽媽的犧牲尤感淒慘。因為媽媽不是犧牲在敵人手裡，而是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那天，冤死在自己人的槍下！……直到今天，我還不知道媽媽的遺骨葬於何方。我想，爸爸犧牲在大海裡，估計是魂歸大海！媽媽遇難在她戰鬥過的紅鄉，其冤魂是否一直遊蕩在紅鄉？！”

韓惠敏：白皮鞋留給何人？

這天與林雲、吳慰君一起蒙難的，還有其他 14 位“行動可疑”的“特務”，他們都是向往革命、憧憬明天的熱血青年，從被捕到被執行死刑，也就是僅僅七天時間。革命的判決，是從重從快的，真是視生命如草芥。有的進步學生像蒙島南、吳賜等人是被打得不能動彈後，給抬出去槍斃的。但他們在面對自己人冰冷的槍口下，留給人間的最後呼喊，仍是“共產黨萬歲”。

21 歲的韓惠敏生於泰國，是一個熱情奔放、能歌善舞、酷愛體育的漂亮姑娘。1948 年夏，瓊崖縱隊為了爭取東南亞華僑的支持和經濟上的援助，派人到泰國等地發動海外的進步力量資助瓊崖革命，並組織進步青年回國參軍參政。年



陳龍

僅 20 的韓惠敏說服了親愛的家人，踏上歸鄉的路途。這年 9 月，正值瓊崖縱隊政治部文工團要成立，韓惠敏參加了組團的工作，負責歌舞的基本訓練。其間並與副團長鄭放（後任團長），一位英俊瀟灑、為人厚道的歸僑青年，深深地相愛了。幾十年後，曾被牽入地下學聯案的舞蹈家邢浪平仍記得當年這位可愛的姑娘給大家帶來的歌聲：

故鄉在何方？故鄉在何方？

母親啊我在戰場，

風霜雪夜摸索著向前進，

飢餓寒冷樣樣當……

韓惠敏被定性為“特務”的原因很簡單：“她在海外生活得那麼舒服，為什麼要來過艱苦的生活？準是敵人派來的特務！”被槍斃時，韓惠敏已經懷有三個月的身孕。死的那一

天，她穿著一件從泰國帶回來的淺藍色翻小白領上衣，下身是一條嶄新的素色長褲。看起來還是一個稚氣未脫的南洋中學生的模樣。臨刑前，韓惠敏突然脫下自己雪白的皮鞋，把這雙鞋整整齐齊地放在一棵榕樹下，然後光著腳丫子，一步一個小腳印走向生命的終點，死前的最後一聲，她也喊著：“共產黨萬歲！”

她的丈夫鄭放，因為在韓惠敏被槍殺時禁不住失聲痛哭，被組織上認為是階級立場不堅定，所以解放後一直只能擔任副職。痛不欲生的鄭放從此變得沉默，身為文工團團長的他自此不再唱歌。那雙在老榕樹底下靜靜等待著什麼似的白皮鞋，給人們留下了永遠悲傷和永遠無法解答的記憶……

羅平與張光明死裡逃生

在這些讓人驚悸的一幕幕悲劇中，竟然還發生了戲劇性的場面。女戰士羅平是第15個被執行的死刑，當槍聲響過14聲後，居然傳來一聲“槍下留人！”這讓羅平奇蹟般地生還。原來，當辦案人員向馮白駒介紹被槍決者的簡歷時，說：

“羅平，原國民黨萬寧縣縣長的女兒。”此時，有人插話：“國民黨縣長的女兒也參加革命？這個不要殺吧！”於是，羅平保住了一條性命，從血腥的刑場上被押到監牢，送進勞改班。但等到幾十年後的晚年，她再也不願去回憶這不堪回首的一幕。

到了1950年7月，海口市公安局還在繼續逮捕地下學聯的成員。這時，地下學聯顧問張光明為了證明地下學聯不是“反革命組織”，找有關部門反映情況，被認為是“上竄下跳的反動派潛伏人士”而遭逮捕，並同年10月開展大鎮反運動中被列為第一個被槍決的“要犯”，還確定好了行刑的日子。但行刑因颱風耽擱了兩天，在確定行刑的當天，因海南機關是早上9點用餐，執刑人員決定早餐後去監獄提取人犯，遊街示眾後再執行死刑。恰在這天早上8點，海南區黨委接到南京軍管會的電報，證明張光明是在黨領導下積極進行革命活動的全國學運骨幹，是黨派來支援海南學生運動的。這樣張光明才得以從鬼門關逃脫一命，真可謂命懸一線，九死一生！

張光明確是全國學聯骨幹，他曾於1947年8月6日在南京代表全國學聯召開中外記者招待會，宣布《中國學生聯合會成立宣言》，並抗議國民黨當局迫害進步學生的罪行，遭到國民黨中央政府以“匪諜罪”在全國明令通緝。這個被國民黨通緝的“匪諜”，解放後又在自己人的監獄裡當了七個月的“要犯”，而且差點成為地下學聯冤案的最後一名烈士。

推翻冤案的大功臣

冤案發生後，公安部連續接到群眾的申訴信，泣血呼冤，有幾個學聯青年還秘密出逃，到北京告狀。



1953年3月26日瓊崖地下學聯成員在海口合影，前排左一為瓊崖地下學聯主席馮萬本。

1953年，時任公安部副部長的陳龍在一個偶然機會得知這一事件，歷史的經驗與政治上的敏感，使他感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立即責成公安部的政治保衛局進行調查。在遲遲不見華南方面提交“證據”的情況下，根據經驗，陳龍就認定和判斷這就是一场假案。他說，他不相信在解放軍已經渡過長江、國民黨即將逃離大陸的時候，還會有幾百名青年學生會去參加國民黨的什麼“特務組織”，而且全部案情就是從口供到口供，這說明什麼？說明這個案子完全是由逼供信搞出來的。

據《陳龍傳》記載，這位經歷過延安“搶救運動”的黨的保衛戰士，在提到抗戰時期發生在山東的“湖西肅托”事件、冀東地區的“李小初托派案”以及他在延安親歷時說，這些

給黨和人民造成嚴重損失的擴大化案件，無一不是用逼供信的方式搞出來的。說起這海南地下學聯案，陳龍頓時來了火氣，兩眼噴出怒火，大聲說道：“逼著一個人供十個人，逼著十個人供一百個人，幾次‘擴大化’，不都是這樣‘滾雪球’滾出來的嗎？現在全國已經解放了，黨中央規定了各種政策，可是還有人這樣幹，怎麼能夠允許？”

人命關天，急如水火。陳龍指示工作組無論遇到多大壓力和阻力，都要頂得住。後來的結論認定這是一起不折不扣地用逼供信搞出來的假案，是一次嚴重的擴大化錯誤。令工作組成員稱奇的是，這次假案的炮製與發展過程，幾乎與陳龍在北京估計的一模一樣。

“還我們的孩子！”

“瓊崖地下學聯冤案”驚動北京高層。1953年1月，由公安部長羅瑞卿主持，中央監委、公安部、中南局和華南分局組成的聯合工作組來到海南，深入調查取證，徹底否定了海南區黨委的錯誤決定。3月24日，這樁特大冤案獲得平反，

“瓊崖地下學聯”被正式宣布為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下的地下革命組織，追認被冤殺者為烈士。海南區黨委書記馮白駒作了檢討，題為“深刻的教訓”，主辦地下學聯一案的李英敏也宣讀了“我的反省”。

據十多名倖存者的回憶，馮白駒於3月25日在南方大禮

堂與幾百個受害者及其親屬座談並做檢討，當他說：“革命的同志、革命的家屬們，今天召開的這個會是沉痛的會，但案情已弄清，也是極光榮的一個會。過去受歧視，現在宣布了，幹部們也重視了，家屬們也是革命的人民，這是極大的光榮。……烈屬們應該繼承死者的精神，保持烈屬的光榮……”哭泣的人群中忽然有人大聲喊叫：“我們不要什麼光榮，我們要自己的孩子！”“還我們的孩子！”秩序曾一度失控，來自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的一些華僑，拿著自己孩子的遺物，向馮白駒討要自己的孩子。歷經幾十年革命生涯的馮白駒，此時有些憔悴的臉上滿是無奈、誠懇和愧疚交織的神情，任由那些失去至愛的親人們一邊哭訴，一邊對他發泄著憤怒與責罵。

其實，縱觀中共對知識分子迫害史，正如胡適先生於1952年的演講中說過的一句話那樣：“在我們悠久的歷史上，沒有任何時代像今天的知識分子在共產中國之下受到如此道德和精神上的荼毒。即便在長達幾世紀的統一大帝國之下，帝王有無限制的權力，也不及紅色中國每天對知識分子無所遁形而又無所不在的迫害。”

“土八路整洋八路”

瓊崖地下學聯的烈士們，大都是在第二條戰線上為中共效力賣命的人員，也是以青年學生為主體的知識分子，他們向往民主，崇尚自由，思想偏激，天真浪漫，更容易相信中共的

虛假宣傳，輕信“解放區的天是晴朗的天”，但是到了革命即將成功之後，中共對這些來自白區的知識分子並不相信。最先倒霉的，也正是這些在第二條戰線來到根據地為中共賣命的青年學生，接著就開始了老百姓所形容的“土八路整洋八路”的內部整肅。延安整風如此，瓊崖地下學聯一案也如此。最讓人震驚的，就是毛澤東在這個時候，曾對白區地下黨發布16字方針：“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這也是中共大力整肅白區地下黨的緣起，是“瓊崖地下學聯冤案”生成的一個重要的政治背景。

奉中央聯合小組之命留下來協助海南區黨委有關部門處理善後的藍明良，在對烈士家屬進行撫恤和慰問活動時，止不住為這些無辜喪生的同志感到沉痛與惋惜，並喟嘆革命的無情與複雜。但是，與他同行的一個瓊縱老首長對此卻頗不以為然，似乎還在訕笑他的幼稚無知，這位首長說：“學聯死這30多個人算什麼？在1931年瓊崖蘇區肅反擴大化運動中，僅一個瓊崖獨立師就槍斃了200多名幹部，其中不少還是十分優秀的指揮員，到了後來，母瑞山上才剩下了六個戰士，瓊崖革命遭受了最嚴重的損失。對此，馮白駒是有過深刻檢討的。是革命，總是要付出代價的啊！”

但是，現在已經80多的藍明良在文章中質疑：不錯，革命是要付出代價的，革命的殘酷性也可以理解。但是我們不能以“革命要付出代價”為由，一次次地重複錯誤，一次次地濫殺無辜，一次次地對人的人格和權利進行粗暴的踐踏。“瓊

崖地下學聯冤案”的發生，其實就是當年蘇區打“AB團”和延安“搶救運動”的又一翻版。這樣的悲劇，為什麼一再在中共黨內重複？歷史的悲劇怎樣才能不再重演？

2004年4月1日，經過55年的奔走，瓊崖地下學聯31位歸國學子和革命者的烈士墓，終於在海口市金牛嶺烈士陵園落成。據報導，當天上午10點多，當鞭炮響起、祭奠烈士們的香火剛剛裊裊點燃時，天空中忽然烏雲密布，雷電交加，瞬間大雨傾盆而下，久久不能止息。有人說，莫非是先烈的英靈有知，“淚飛頓作傾盆雨”？！（魯直人）■

當今中國最名利雙收的軍方作家金一南的母親，當年無奈屈從組織分配給老紅軍金如柏，後來卻獲得極大幸福感，可說是“斯德哥爾摩綜合征”最好的現身說法。金一南本人則說明，“拼爹”是毛澤東時代開創、延續至今的傳統

人生苦難與政權 輝煌結合的完美怪胎

軍方最耀眼的筆杆子

如果問誰是中國軍方最耀眼、最富有的作家？不是李先念的女婿劉亞洲，也不是軍人出身的閻連科，也不是剛剛摘取諾貝爾文學獎、同樣是軍人出身的莫言，而是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副主任（副軍）、教授、天天在電視上露面的金一南。

這個 1952 年出生，1972 年入伍，曾赴美國國防大學和英國皇家軍事科學院學習，2001 年 3 月又代表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赴美國國防大學講學，現在擁有少將軍銜的軍旅作家，頭上光環不計其數，熠熠閃光：他是《解放軍報》特約撰稿人，中央電視台特約軍事評論員，中國軍事統籌學會戰略研



金一南獎章滿胸，金光熠熠。

究中心特邀研究員。他的學術成果曾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軍隊科技進步獎、國務院新聞辦“中國國際新聞獎”、《解放軍報》“金長城國際觀察優秀獎”，國防大學“優秀科研成果獎”。2003 年被評為國防大學首屆“傑出教授”。2006 年 11 月，國家軍委主席胡錦濤簽署命令、通令，給 2 個單位、7 名個人記功，其中就有金一南，記二等功。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國家安全戰略，國際衝突與危機處理，在釣魚島問題上他也屢屢放話，措辭強硬，屬於軍方的鷹派人士。

除去政治桂冠之外，金一南經濟收入也蔚為大觀，更是令人咋舌，他的代表作、謳歌紅軍長征的 53 萬字作品《苦難輝煌》，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一印再印，版稅豐厚，到底多少，成為隱秘。2011 年 11 月 21 日，“第六屆中國作家富豪榜”重磅發佈，金一南以 400 萬元的年度版稅收入，榮登作家富豪榜第 11 位，後來的諾獎獲得者莫言，那年都不在此列。由此可見，以名利雙收來看，金一南已經在大陸眾多的軍方筆杆子中拔得頭籌。

這無數耀眼的光環下，不少讀者都在問：金一南是誰？這個頗有些像朝鮮族名字的人究竟是什麼來歷？

父親老紅軍老少三將星

說起來，金一南也算“將門虎子”，他的父親金如柏（1909—1984）是聲名顯赫的老紅軍，簡歷如下：

江西省永豐縣人。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紅三軍政治部收發股股長，中共永豐縣委軍事部秘書、政治指導員、科長，江西軍區獨立第三團政治處主任、政委，紅二軍團第6師政治部宣傳科科長，紅二軍團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部長。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120師358旅716團政治處主任、政委，旅政治部主任。解放戰爭時期，任晉綏野戰軍獨立第三旅政委，西北軍政幹部學校政治部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西南軍區空軍預科總隊總隊長、政委，軍政委，雲南軍區副政委，昆明軍區第二政委，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兼解放軍軍事法院院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炮兵顧問，炮兵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是第四、六屆全國政協常委，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

金如柏也經歷過幾乎被“肅反”殺頭的遭遇。1934年第五次“反圍剿”，時為團政委的他為避免傷亡、保存實力，曾下令部隊撤離，在當時“不丟掉一寸土地”的左傾路線下，被戴上“右傾逃跑主義”的帽子，幸而湘贛軍區政委任弼時發話了，說他在政治上是堅定的，這才免於一死，但被一擡到底，分配到紅軍第四分校當戰士，這個分校的校長就是中共建國後第一次授銜時唯一的女將軍李貞。長征開始後，李貞見金如柏體質虛弱，又有點文化，予以很多照顧，還給犯病的他騎牲口。對此，金如柏曾萬分感念地說，當時根本不懂什麼叫“右傾機會主義”，如果不是李貞，我是走不完長征路的。

“文革”期間，作為“賀龍死黨”，金如柏於1967年8月11日停職，12月上旬被關押，1972年10月被釋放出獄，幾近五年。其實，這個“死黨”與賀龍之間也有不少過節。第一次是1946年8月攻打太原時，大同前線指揮部鑒於敵強我弱，決定撤出集寧，金如柏在獨立三旅任政委，由於旅長楊嘉瑞的過錯，部隊遭受損失。後來，120師部召回他們二人匯報，本來楊嘉瑞是準備檢討的，但會議一開始，師長賀龍第一個發言就毫無根據地批評金如柏合作得不好，別的領導也不好講話，楊嘉瑞反而順利過關了。事後，金如柏被調出三旅，去了西北幹部學校。第二次是成都解放後，起義部隊很多，需要大量幹部充實，賀龍讓金如柏帶領軍政幹校全體幹部前往。這金如



賀龍元帥給金如柏授銜。

柏本來就對獨三旅一事有氣，加之 120 師中原紅六軍團的人有時認為賀龍對使用幹部不合理，偏袒原紅二軍團的嫡系，所以提出要求，想隨一野到西北、不想南下。豈料這一下又惹惱了賀鬍子，在一次幹部會上不指名地先罵一通，說：“有的人不願意跟我到西南，認為我沒帶兵，我是軍委委員，到什麼地方都是可以調動部隊的。”金如柏聽了，只好忍氣吞聲，跟著部隊到了成都，後被貶到了一個師級單位任職。時隔不久，西南軍區領導開會，參謀長李達（後任副總參謀長）提出對金如柏的使用不當，時任西南軍區政委的鄧小平才把他調到 24 軍當政委。



金如柏與鄭織文。

1955年軍方首次授銜時，金如柏在昆明軍區擔任副政委，事前軍區已經將金如柏作為中將軍銜申報，中央軍委在最後審定時，賀龍將他改為少將，而把中將名額給了他的嫡系之一，當時的副軍長楊秀山。為此，原紅六軍團的老人們曾打電話質問總政幹部部，但誰也無力改變老帥的決定。後來王恩茂曾說，這是全軍唯一一個副軍級幹部被授予中將軍銜。余秋里也曾說過，賀龍對金如柏這件事的處理，不得人心。其實，也有人分析對當年金如柏授予軍銜並無不妥，現在看來也是合理的，因金如柏是13軍第二任政委，那第一任政委也是少將；還有很多正軍級幹部，甚至是很有名的虎將，人稱“中國的巴頓將軍”如鍾偉，還有賀晉年等，也都是授予少將軍銜。

到了2006年、2007年，隨著二兒子金一南和大兒子金一明先後被授予少將軍銜，這樣，金家老少兩代就有了三個將星。

黨將母親分配給了父親

金一南的母親鄭織文，1913年生，到2013年恰逢九十大壽。2002年，年近八十高齡的鄭織文重返西安八賢莊八路軍辦事處舊址，回來後在留影後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1939年，我16歲，一個歡蹦亂跳的女孩子，為了不當亡國奴，從這個大門走向了革命，如今，這個大門依舊，街道依舊，我卻白髮蒼蒼坐著輪椅來了，看見這個大門，60多年來的酸甜苦辣，喜怒哀樂與生離死別一齊湧向心頭。對著這個莊嚴的黑色大門，我

禁不住淚流滿面。”

鄭織文是河南鄆陵人（即《古文觀止》首篇“鄭伯克段於鄆”的地方，也是吉鴻昌的故里），後移居河南省府開封。她說自己出身於官宦門弟、書香世家，父親不願做官經商，家有土地一千畝，房屋一百間、三個外掌櫃、八個男傭人，大姐二姐和她自己都是讀書識字的大家閨秀。為了國家民族的危亡，她們背叛了自己的家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大姐鄭桂文曾嫁給著名詩人臧克家，生有一子，後來離婚嫁給國民黨的一個外交官去了台灣；二姐鄭京文則嫁給了原總後副部長、上將周純全，此人也是中共黨史上的顯赫人物，曾執掌紅四方面軍的政治保衛工作，還當選張國燾第二中央的政治局委員（相當於今天的常委），與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五人為“中革軍委”常委。建國後，鄭京文任農業部組織部長，在1957年“反右”時，因對高幹夫人們爭名譽爭地位表示不滿被劃為“右派分子”，後來周純全出面找到當時的總政主任譚政大將，才改為“黨內不戴帽的右派”，但受到留黨察看兩年、撤銷職務、下放到基層勞動鍛煉的致命打擊，從此一蹶不振，抱恨終天，鬱鬱而終。

16歲的鄭織文到延安後，被編入抗日軍政大學第五期第一大隊。9月，上面將她與另外幾個女同學一共六人調往120師賀龍部隊，她來到358旅政治部組織科工作，每天就是抄抄寫寫。不久，在強大的攻勢下，同來的一個女同事就與組織科長結婚了，鄭織文還非常瞧不起她，覺得她太沒志氣。沒想到

有一天，鋤奸科也給她送來一封政治部主任金如柏的來信，上面寫著：“你來了已經一個多月了，大家都在議論我倆的婚事，我看還是解決了好……”

鄭織文一看，氣憤之極，當即就把這封信扯得粉碎。自己滿腔熱情到了部隊，是來抗日救國的，從來沒有考慮過婚姻問題。後來她才知道，當時來到這裏，就是領導把她分配給金如柏的，很多人都明白其中緣由，偏偏是她這個當事人不知道。為此，鄭織文苦惱極了，又無人傾訴，於是就在自己的小日記本上發泄著對老幹部的失望和不滿，原來這裏的一切原來並不是自己想象的那麼美好神聖。一天晚上，部隊行軍到一個小村子，她睡在一個條櫃上，寫完日記後半夜出發，把日記丟失了。碰巧後來師政治部進駐這個村子，撿到這個日記本的人看到裏面記述了那麼多不滿的內容，就交給師部關向應政委。

鄭織文回憶，不久，張宗遜旅長就通知她，因為日記本的事，賀龍師長和關向應政委要她到師部談話。鄭織文一聽，害怕極了，說不敢去，怕被關禁閉，張宗遜就讓自己的妻子陪她去。到了師部後，賀、關二人接待她們卻很熱情，關向應還講了紅軍長征史，說不少長征幹部文化不高，不懂得如何談戀愛，但金如柏是小學教員，是長征幹部中的知識分子，人品如何如何地好等等。鄭織文一直低頭聽著，直到離開，也沒敢說一句話，但他們則認為她已經默許了。回到駐地後，鄭織文關上門撕心裂肺地嚎啕大哭得天昏地暗，但是作為一個女孩子，她連一點選擇的餘地都沒有。這年11月，鄭織文入黨，第二年到

晉西黨校學習時轉正。結婚的事已不能再拖，1940年2月，就由旅長張宗遜主持，殺了一隻羊，17歲的鄭織文算是與31歲的金如柏正式結婚了。

鄭織文後來才知道，她的失散的二姐鄭京文，也是以這樣被組織分派嫁給老紅軍周純全的。她二姐的兒子曾問她：“你們之間的家庭出身、年齡、文化和生活習慣都相差很遠，為什麼可以長久生活在一起，而且都無怨無悔？”鄭織文認為，他們的婚姻都是“組織包辦”的，連百分之一的自願都沒有。但是由於組織的干涉和周圍環境的壓力，也相信組織不會害自己，也就認命了。真正的感情是在共同的理想和緊張頻繁的戰鬥生活中、同生死共患難中逐步建立起來的，這種感情很原始，很單純，但牢不可破，有著比愛情更高的情義，只有這樣才會終身相濡以沫。

“斯德哥爾摩綜合征”

1942年3月9日，丁玲有感於兩樁離婚案，在《解放日報》副刊發表雜文《三八節有感》，表達自己的思想感受：中國婦女長期承受的封建壓迫在革命聖地延安也並未徹底消失，一些有著“凌雲的志向”和“刻苦的鬥爭生活”的女性，婚後在大男子主義思想嚴重的丈夫逼迫下卻成了“回到家庭的娜拉”。到了3月13日，這家副刊又刊載了王實味所寫的《野百合花》，批評了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幹部有“小廚房”而青年

學生“一天只得兩餐稀粥”，而且高級幹部卻豐衣足食，跳舞成風，“歌囀玉堂春，舞迴金蓮步”。

丁玲的文章發表一週之後，莫耶的短篇小說《麗萍的煩惱》也在《西北文藝》上發表，文中描寫一個名叫麗萍的知識女性，為了反抗封建婚姻而投身革命，後與一老革命成婚，但這位女幹部與首長結婚以後，只能呆在家裏生孩子，侍候著丈夫而不能出去工作，還因為生活觀念和生活習慣的差異而衝突不斷，而男權思想嚴重的丈夫卻把麗萍的種種“犧牲”當作天職，以封建家庭觀念束縛妻子，這讓女主人公充滿著無盡的煩惱，在某些章節裏，小說還暴露和批評了個別工農幹部對待知識



延安時期的丁玲。

分子妻子的粗野行為。此前，還有《解放日報》副刊所發表的馬加《間隔》，也是說的一個長工出身、沒有文化的老幹部看上了一個女大學生，便動用組織關係來說服女方嫁給自己，女方則對粗直、簡單、魯莽的求愛方式感到反感和害怕。莫耶的小說在鄭織文所在的晉綏邊區產生了強烈的反響和爭議，有人說好，有人叫罵。許多老同志就對《麗萍的煩惱》表示強烈不滿，他們認為，老同志革命有功，也需要婚姻，需要生活，而這篇文章只知道反映知識女性的煩惱，難道老同志就沒有煩惱了？正如當時流傳的一個新婚的八路軍老幹部的名言：“老子打天下，討個老婆你們還有意見？”

王實味的文章發表後，據當時中央研究院的溫濟澤在研究院進行調查，約有95%的人贊成王實味的觀點。鄭織文回憶，王實味還是他開封女中的英文教師，西安事變後，曾在講堂上慷慨激昂地痛斥蔣介石只打內戰，不去抗日，學生們都很佩服他。到延安後，聽說王實味在馬列學院，他的夫人薄淑玉又是自己初中的同班同學，鄭織文還去看望過他。王實味見到鄭織文時說，你能到延安，這條路走對了，好好學習吧。想不到這樣一個人，後來竟被賀龍的晉綏軍區保衛局砍了頭。鄭織文晚年，讀到王實味平反後文章，也從心裏為他感到惋惜，認為這確實是一個富有才華、敢想敢作的人。

沒料到毛澤東卻拍著桌子大發雷霆了：“這是王實味掛帥，不是馬克思掛帥！”4月初，在毛澤東親自主持了一次延安高級幹部整風會，會有八個人發言，七個人都是批判《三八節有

感》和《野百合花》的。第二個發言的就是賀龍，他對著副刊編輯丁玲大聲說道：“丁玲，你是我老鄉啊，怎麼寫出這樣的文章？跳舞有什麼妨礙？值得這樣挖苦？”

延安時期，男女之比為 12 比 1，女性，尤其是從大城市來的女學生，成為高級幹部眼中的搶手貨，從毛澤東、劉少奇、到林彪、賀龍，他們停妻新娶的，哪一個不是貌美如花的女學生？如黃克功那樣，逼婚不成，就將 16 歲的劉茜一槍斃命，稍顯魯莽了些。敢於指摘批評他們這種行徑的，如王實味、丁玲、莫耶等，不是殺頭泄恨，就是囚禁整肅。如賀龍那樣的，能匪氣十足地大罵：“老子在前方賣命，有人在後方罵娘。”有回憶錄寫道，賀龍在高唱《游擊隊之歌》時，把歌詞改為“我們生長在這裏，每一個女人都是我們的。”周圍人聽了，都哈哈大笑，還稱頌賀龍的幽默風趣，不知在這笑聲裏，有沒有人聽到過如 16 歲的鄭織文把自己關在小黑屋裏的嚎啕痛哭聲？中共對待女人的態度，是歷來與對待知識分子一樣的，為我所用，容納你；不為我所用，就毀掉你。據中國著名作家戴晴披露的一段史料，抗戰期間，有國統區的 20 多個男女青年投奔晉綏邊區，竟被懷疑是“國民黨探子”要被活埋，有的女學生抱著戰士的腿苦苦哀告，願意當小老婆，千萬手下留情，但都被賀龍下令無情地活埋了。

延安時期這種男女之間的文化差異，連抗戰期間、國民政府派駐延安縣的縣長高仲謙都看出來了，他在自己的回憶錄《黑牢進出——延安縣長歷險記》一文中回憶：有一位美麗聰



晚年鄭織文把自己及家人與現政權牢牢結合在一起。

敏的女大學生，因為不滿現實，由政府區，投奔延安，從事革命工作。這位小姐抱著犧牲奉獻，一切為革命而努力，下嫁了長征幹部，這位幹部識字不多，頭腦簡單，當然談不到精神生活。在一個鳥語花香的禮拜六的夜裏，這位女大學生提議和她的愛人（夫婿）一同外出散步賞月，這位長征幹部的答覆是：“月亮像燒餅一樣，有什麼好看？”女大學生得到丈夫這兩句令人掃興的答話，不禁感慨萬分，自嘆命苦，好似一朵鮮花擲在牛屎上面，在萬分無奈傷感的情況下，寫了一首七言詩：

嫁得郎君不解情，強把月亮比燒餅：

從今不盼禮拜六，春宵枉自值千金。

這一首詩很快傳遍延安抗大校園，許多女青年讀後都引發共鳴，感到無奈。事情很快就傳到毛澤東那裏，據說這位一輩子都是詩情勃發的領袖依韻寫和了一首七言詩，來批評小布爾喬亞的溫情主義，毛澤東的詩這樣寫的：

春花秋月枉多情，天上人間兩畫餅：

寒來花月不能衣，饑時一餅值千金。

40年以後，丁玲、莫耶所反映的這種文化衝突，在老革命、人民文學出版社前社長韋君宜的小說《露莎的路》中再一次涉及，繼續著同一個話題。八十年代，韋君宜因腦血管病而住了醫院，自這時起，她的手已逐漸麻木而不能握筆，可是就在這艱難的情狀下，她勉力陸續寫完了《露莎的路》，這是她難以忘懷的一位女性的遭遇，寫出來不為別的，只是實實在在讓人看那曾經存在過的事實。書中有這樣一個情節：知識青年女主人公讓通信員給自己老紅軍丈夫帶去一封信，末尾寫道：“給你一個吻！”可那個老幹部不懂這個“吻”，反問通信員：“不是給我一個‘物’嗎，東西在哪裏？”由此可見，無論是丁玲、莫耶還是韋君宜，作為女性知識分子，當年都能感受到與工農幹部之間那種文化上的差異是如何的格格不入。

可是晚年的鄭織文卻不這樣認為，她已經把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與現政權牢牢地結合在一起。鄭織文說，斯大林死後，金如柏曾如喪考妣似地失聲痛哭；前蘇聯垮台後，她本人也有著複雜糾結與失望心痛；陳希同腐敗案傳達後，原裝甲兵司令員頓星雲的夫人曾抱著她痛哭說：“我要退黨，政治局委員都成了這樣子，這個黨不值得我愛了。”但是利益驅使，不僅使她死心塌地地跟著這個黨走，還竭力稱頌這種不對等的畸形婚姻，說“我的婚姻雖然是組織一手包辦的，共同生活了幾十年，我覺得幸福，終生無悔。”如果說世間真有“斯德哥爾摩

綜合征”這一說的話，那麼鄭織文當年的無奈認命和後來所獲得的幸福感，可以說就是這種綜合征最好的現身說法了。

塗脂抹粉的廟堂史學觀

勝利者總是有用不完的資源。儘管到了“文革”時期，讓建國後掌握政權的紅色第一代遭受批判、有不少老革命甚至被囚禁，住進了牛棚，他們的子女也受到牽連，但對於生活在社會底層的老百姓來說，這些苦難又算得了什麼？當時全中國八億農民、包括直到現在的老少邊窮地區人民，住處有的連牛棚都不如。還有他們的子女，說是“下鄉插隊”，大部分都是虛晃一槍，又當兵或是上大學去了，從“二號走資派”鄧小平到“賀龍死黨”金如柏，他們的子女幾乎都是走的這條路。金如柏的六個子女，除去老大、老二“文革”前已參加工作外，其餘四個子女，無一例外地先走後門當兵，再去上大學。在鄭織文的回憶中，津津樂道這些經歷，誰誰利用職權，讓孩子當了兵的，就念念不忘，認為是在最困難時期幫助了他們；誰誰堅持原則。不顧情誼，翻臉不認人的，就耿耿於懷，說他們沒有伸出援手來幫忙云云。1952年出生的金一南就是於1972年當的兵，從此吃上了這碗飯，成為萬人矚目的將軍。他的哥哥與弟弟，後來走的都是這條路。走這條道的大多數紅二代，現如今大都成為掌控中國的強權人物，真正實現了中共元老陳雲所講的“讓自己的後代接班，百年之後沒人刨祖墳”。

讓紅二代接班，其實早已是中共幾代人的共識。1974年1月，中央高層發生“走後門”風波，說是江青以個人名義寫信給葉劍英，打電話給周恩來，決定於1月24日、25日在首都體育場召開部隊駐京單位、中央機關各部委和國務院各部委等單位的萬人批林批孔動員大會，實現江青與遲群、商謝靜宜議好了的“三箭齊發，只瞄一箭”，批評葉劍英等一批老幹部送子女“走後門”去當兵，要限期他們把子女從部隊退回來，謝靜宜在大會上說：“‘走後門’這是與我們社會主義制度格格不入的，這也是堅持不堅持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這一基



本原則的一個重大問題，‘走後門’實際上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背叛。”事後，毛澤東得知江青召開兩次批林批孔大會又批“走後門”，並要向全國發送大會錄音的情況後，很不滿意，指示：“錄音不要發，發了馬上收回。”也就是說，就連毛澤東本人無論如何顛倒乾坤，可也是默許紅二代在動亂中紛紛走後門參軍上學的。金家姐弟四人就是借了這種光，才一個個給自己奠定仕途之路。無怪乎當年大多數平民出身的知青四處上訪抗議，全中國湧動了一股返城潮。當時流傳著一副對聯，最能說明人生而就不平等的中國社會狀況，上聯：你爹有能你進城，下聯：我爹無能我務農；橫批：將爹比爹。“拼爹”一詞是近年出現的，但這種腐敗現象，自中共執政起就有了。

托了紅二代的福，加上自己的天資聰明，金一南如願以償，躋身中共軍方頂尖筆杆子的行列。作為母親的鄭織文，為自己的兒子感到驕傲，這是人之常情。但只說他如何刻苦用功，自強不息，才成就了今天業績，這太片面。可以說，如果沒有這家庭，沒有這父親金如柏的紅色背景，在中國這個“拼爹”的年代中，僅靠自己努力，能達到這樣傲人的地步嗎？這如同國內媒體宣傳新一代總書記習近平一樣，說他如何熱愛學習，喜歡讀書，下鄉時帶了一箱子書到農村去。有人對這樣的馬屁文章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沒有紅色背景，沒有你那個老爹，就是帶十箱書下去，也是白搭，也難以成為新一代領導人。

所以，金一南傾注全部心血所寫下的他的扛鼎之作《苦難輝煌》，就是謳歌他們父輩那一代的光輝業績，去讚揚他們

的苦難與輝煌，去證實他們的父輩所打下的江山以及他們的紅二代、紅三代今天來接班臨朝，好像都是天經地義、理所應當的；唯獨不提他們父輩也曾犯下罪惡，也曾強娶民女，也曾嗜血成性，更不要說殺戮過無數無辜了，連對自己的戰友，“肅反”殺“AB團”、殺“改組派”，無端遭到殘害何止成千上萬？金一南在中共封建專制塗脂抹粉的時候，恰恰忘記了史記中《陳涉世家》的一句話：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忘記了老子所言，天道有常，不以堯存，不以桀亡。看看今天大陸觸目驚心的貪腐現狀與民間百姓積蓄的怒火，難道世間真有永遠不變的一種顏色和一種秩序嗎？難道真能如他們所宣傳那樣，會有一個千秋萬代，永不變色、能讓子子孫孫世襲罔替的無產階級鐵打江山嗎？

粗製濫造的煌煌之作

作為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的重點讀物《苦難輝煌》，裝幀精美，定價不菲，加上宣傳鼓動，作者本人也一夜之間，暴得大名。但細讀之下，卻發現其中錯謬百出，抄襲明顯，如專家所質疑的，“查作者既非專業作家，也無長期從事歷史研究的經歷。作者的文章過去基本上都是談論時政和現實國際關係問題的，幾乎沒有發表過史實研究性的論文，又如何能夠一朝成就一本幾十萬字的煌煌之作呢？”原來，這本書大部分的資料、論點，都是作者抄襲他人的勞動成果而成的，是一個硬傷累累、

不堪卒讀的“豆腐渣工程”、史學垃圾，也是權力鍛造出的中共廟堂黨史學的一個典型文本。

對此，近年來治學嚴謹、頗有聲望的黨史學家楊奎松先生，曾先後在國內報章雜誌發表過數萬字的文章，揭露金一南欺世盜名，偽造歷史，不可理喻地編造史料、剽竊抄襲，金書53萬字中，幾乎沒有自己的東西，其胡抄亂寫、粗製濫造，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就連中學歷史課文的內容，作者都會抄錯，實在讓人匪夷所思。有專家說，讀過《苦難輝煌》的部分篇章即可發現，作者對歷史幾乎沒有什麼研究，不過是借助於近現代史或中共黨史學界同行的研究成果，有些史料是從二手甚至三手的文章或書中輾轉抄來的，如同囫圇吞棗、生吞活剝、不求甚解，所以屢屢出錯。金書其實是作者根據自己的觀點和創作意圖，把學界同人各種研究著述按其需求剪切拼接，加工“串燒”，再結合自己隨性發揮的文學性語言，打造出來的一種速成品。可這樣的速成品，卻依仗中共主流媒體的宣傳和強勢發行，居然風靡一時，洛陽紙貴，上百萬冊的發行人數，幾年間就讓金一南賺得鉢滿盆滿。

楊奎松指出，“作者寫此書的立意或許真是可圈可點，只可惜，如此不講規矩，不顧深淺，拿激情議論來代替客觀紮實的學術研究，把立論建立在種種錯抄誤讀的歷史資料和歷史敘述的基礎上，怕是如同把漂亮的建築建在沙堆上一樣，既經不起推敲、驗證，也難有任何持久的生命力。評這樣的書，實在讓人痛苦；用這種方法寫書，更是誤己誤人誤社會。”他規

勸金一南：“今日中國，社會浮躁，人人都想抄近路、走捷徑，做學問的人也一樣急功近利，這確是事實。但是，在學術界有一些最基本的規範，大家至少都還是在謹慎地遵守著的。金書作者自認‘學者’（金一南在一篇採訪文字中明確給自己定位為“研究國家安全和戰略問題的學者”），就必須要謹守學者的行為規矩和道德良知。”

道德，良知，規範。在中共體制內搞學術的，尤其是搞黨史學的，除去偽造與歌頌之外，還存有這些基本的價值觀嗎？中共每年花費巨資豢養的一大幫子御用文人，就是為給他們所謂“偉、光、正”的偽歷史大唱讚歌的。君不見，中共那“三個自信”理論的發明人、中央編譯局局長衣俊卿，本人就是一個蠅營狗苟、男盜女娼的貨色，不經意間，就在男女淫亂的床上扒下了中共“皇帝的新衣”。而這金一南呢，在專家學者責問下，不僅充聾作啞，不做任何解釋，卻依舊佩戴著他的少將軍銜、以學者的架勢地頻頻出鏡，天南海北地侃侃而談，賺足了觀眾的眼球，撈足了世紀風采。這樣的場景，讓人想起了顧炎武的那句慨嘆：

“士大夫之無恥，是為國恥！”（魯直人）■

無論是作為一個革命者，還是作為一個女人，都在反復離散的婚姻中，成為被強權男人所拋棄的悲劇人物，隨風而逝。有多少自以為被共產主義理念所解放的女人，即便是革命者，也最終擺脫不了千古不變的封建繚紲

中宣部長 鬧離婚鬧出流血事件

陳辛仁(1915—2005)，廣東普寧縣人，北平中國大學學生，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北方部的左翼作家。筆名辛人。1938年夏在新四軍任職，參加敵後抗戰和建立抗日根據地。皖南事變後，歷任新四軍第二師(淮南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長、中共淮南區黨委宣傳部長、新四軍(兼華東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長，中共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省委宣傳部長，福建省教育廳廳長、華東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中共福建省委副書記、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調任中共江蘇省委常委、副書記、書記處書記，9月被委派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駐芬蘭大使。1959年回國後任國際關係學院院長、黨委書記，外交部黨委委員、北京外交學院黨委書記、副院長。

陳辛仁身後，曾出版43萬字的《陳辛仁回憶錄》(世界知



陳辛仁

識出版社 2008 年版)，除去革命歷程外，內中有一段詳細記述了自己的婚姻悲劇。

妻子一去不復返

1935 年，陳辛仁與妻子房紀在東京結婚，一年後生一女嬰。此時陳辛仁 20 歲，房紀 17 歲。這兩個熱血青年為了在革命的路上輕裝前進，把剛滿一個月的女兒送回老家交與母親撫養。此後兩年時間，兩人或在北平、或在香港、或在上海，時聚時散，漂無定所。抗戰爆發後，陳辛仁到新四軍軍部工作，房紀則到西北大後方寶雞擔任地下黨的工作，組織上曾承諾，等房紀的工作一旦脫手，可立即來到新四軍軍部工作。分別幾個月後，陳辛仁曾接到薛暮橋夫婦從大後方帶來的一封信，說房紀很快就可以回到他身邊工作了。讀過信後，陳辛仁感到很奇怪，難道說房紀自己連寫幾個字的時間都沒有嗎？之後，由於戰事倥傯，上面幾次說儘快發電報將房紀調到軍部來工作，但前前後後有三四年時間，都沒有兌現。其間，陳辛仁還收到過房紀的四五封來信，等到皖南事變後，就再也得不到她的消息了。

書中回憶，就在陳辛仁為妻子焦慮不安的時刻，讓他更為喪魂失魄的事情發生了。一天，軍政委饒漱石見到他，談話中突然明確地勸他“另外結婚”，並支支吾吾地說什麼可以批准他“另外結婚”。陳辛仁當時覺得很可笑，自己是已有妻室的

人了，為什麼要“另外結婚”？即使要“另外結婚”，又何勞上級來“批准”呢？他再次向組織上提出，不是已經承諾要發電報調房紀來軍部工作了嗎，為什麼還提什麼“另外結婚”，豈非咄咄怪事？直到這時，饒漱石才用一種嗤之以鼻的口氣說：“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你要知道，現在改名王茜的房紀，早就被人家調到他的辦公室擔任秘書職務了，與此同時，也兼私人秘書。他們已經結合到一起，這是兩廂情願的事情，如今木已成舟了！”聽到這裏，猶如一個晴天霹靂，猛烈地擊中了陳辛仁毫無準備的思想。但他還不清楚，搶走房紀的究竟是什麼人？他想痛哭一番，發泄重壓的感傷，但此時只剩下了憤怒的顫抖；他也想到大後方去說理，把房紀從那卑劣的魔爪中給奪回來，然而他也知道，在生米做成熟飯的情況下去幹這樣的傻事，是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的。思來想去，陳辛仁只能不知所措地強忍著自己的心靈創傷。他呆呆地僵坐在一個小櫈上，悲憤地質問：“我不能理解，在那崇高的革命聖地，竟會發生了令前線指戰員寒心的惡劣行為。”

落入貪戀美色的權力陷阱

其實，如西諺所說：“美女與駿馬永遠是屬於部落酋長的。”縱觀中共高層的換妻潮，有兩次高潮，一次就是抗戰開始後的延安時期，再一次就是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延安時期，大批青年知識分子湧入延安，包括毛澤東在內中共高層



凱豐

紛紛易女而妻之，連忠厚老實如習仲勛，都未能免俗，與老土前妻離婚，換了一個北平來的女學生。就在這次和饒漱石談話之後，陳辛仁收到了一份通信地址是“陝西新華書店轉何凱豐交王茜”的信，信後的署名是“王茜”，信的內容是簡單的幾句話：“別來數年，不知音訊，相見無期，請另覓伴侶，善自珍攝。”這時，陳辛仁才清楚地判斷，這個改名換姓叫王茜的房紀，已經徹底落入了貪戀美色的權力陷阱裏，找到的是比她大12歲的何凱豐！

不久，陳辛仁又得知，在強佔房紀的同時，凱豐還無情地拋棄了與其同甘共苦的髮妻廖似光，而且是命令警衛員把她給趕出家門的，讓這個身經百戰的老紅軍也成為這場家庭崩解

的一個受害者。

再來看看凱豐此人，讀讀毛選，可看到有他好幾處名字。1906 年出生的凱豐原名叫何克全，江西萍鄉市人，是中國共產黨前期領導人之一。在中共歷史上，凱豐不止一次反對過毛澤東，長征途中，作為六大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凱豐，曾譏諷毛澤東是靠著“孫子兵法”打仗；遵義會議上，凱豐還鼓動博古不要交出黨中央的“挑子”。紅軍長征結束後，凱豐不但認了錯，還更加緊跟黨內公認的領袖毛澤東。但在七大期間，由於代表反對，凱豐落選，沒能進入七大中委，以後在黨內的地位也因此逐步下降。建國後，他先後任東北局委員、東北人民政府委員兼瀋陽市委書記，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中央馬列學院院長。1955 年 3 月因病在北京逝世。

為革命獻出兩個孩子

在紅軍長征的漫漫征途上，曾從艱難險阻中衝殺出英勇的 34 名女紅軍幹部，廖似光就是其中之一，她與凱豐也是經歷中央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 26 對革命夫妻（包括長征到達瓦窯堡時結婚的）之一。

廖似光（1911—2004），原名廖嬌。1911 年 4 月出生於惠陽縣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928 年秋，她的家鄉來了共產黨，還是童養媳的廖嬌參加了學習，開始讀書識字，懂得革命道理。1929 年初她加入了共青團，在共青團廣東省委機關工作，此間



廖似光

她認識了擔任共青團省委書記的何凱豐，1930年二人結為革命伴侶。1931年在上海共青團中央機關做地下工作時，透過國民黨統治區的深重黑暗，她看到了中國革命的曙光，所以取“曙光”的諧音，改名為“似光”。1933年秋，在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由上海遷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後，廖似光也調往中央蘇區。從上海到瑞金，需要跋山涉水，通過敵人的重重封鎖線，要走幾個月才能到達。為了輕裝從簡，廖似光忍痛把她懷裏的新生小女兒送到了國際紅十字會醫院，從此杳無蹤跡。1934年4月，她任江西中央蘇區任團委巡視員，同年5月，經胡耀邦介紹，轉為中共正式黨員。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戰略轉移，當時已經懷孕四五個月的廖似光也被編入幹部休養連參加長征，主要負責後勤工作和“打前站”。紅軍長征，每天至少要行軍幾十里，多則100多裏。挺著大肚子行軍的廖似光，由於路途過分顛簸

疲勞，又缺少食物，營養稀缺，懷孕僅7個月便早產生下一個小男孩。漫漫長征路，如何照顧孩子？為不拖累隊伍，廖似光把心一橫，決定把孩子留在途中，她用毛巾將嬰兒包好，並在上面寫明他是紅軍的孩子和孩子的出生時間，送給了當地的老百姓，自己則拖著虛弱的身體，跟著隊伍繼續前進。這是廖似光為了革命失去的第二個孩子！

西安事變後，黨組織派她和鄧穎超一起組成陝甘寧邊區各界婦女聯合會駐武漢代表團，投入婦女抗日救亡運動。武漢失守後，她隨中共代表團和八路軍辦事處一齊遷往重慶。1948年8月，廖似光以“勞協”常務理事的身份，出席了在哈爾濱召開的全國第六次勞動大會，並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隨後她隨大軍一路南下，在1949年4月武漢三鎮解放後，負責籌建武漢市總工會。1949年9月在葉劍英主持的贛州會議上，廖似光被任命為廣州市委副書記兼市總工會籌備處主任。1952年9月廣州市總工會正式成立。此後她歷任廣東省工業廳副廳長，華南分局工業部副部長、中共廣東省委組織部副部長。1978年，她當選為廣東省政協副主席，一直到1988年離休。正如葉劍英對廖似光的高度評價，稱她是一位“難得的南征北戰的工農兵女幹部”。

“把你們倆都殺了！”

作為一個從槍林彈雨闖出來的女人，為了革命，為了丈夫，

曾作出過如此巨大的犧牲與付出，那麼廖似光對於丈夫凱豐移情別戀與薄情寡義，其憤懣與生氣也是可以理解的。當年的一個紅小鬼，延安時期任中宣部行政管理員的李耀宇，曾親眼目睹過廖似光的憤怒與發泄。他在個人回憶錄《一個革命親歷者的私人記錄》的“鬧離婚鬧出流血事件”一節中有過如下的記述：

凱豐是中共歷史上的風雲人物，在楊家嶺時他的職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兼中宣部部長。凱豐的妻子廖似光，也是老革命，長得高大健壯，在黨校一部學習，到星期天就帶著勤務兵和警衛員回楊家嶺一次，楊家嶺的“小鬼”，



黨史專家司馬璐。

私下裏喊她“穆桂英”。而王茜的則身矮體胖，像武則天時代的人，細眉長眼，戴著一副金屬框架眼鏡，文靜高雅。王茜曾留學日本，精通日文、英文，聽大家傳說，她還做過國民黨政府的顧問。李耀宇第一次見她，誤把茜字讀成西字，王茜糾正後，說：“你要叫我‘王西’就隨你吧，授給你專利權，別人可不能這樣叫。”後來毛澤東的秘書葉子龍聽到李耀宇叫王茜為“王西”，很是驚奇，問明緣由後說，“小李有專利權，我們就無可奈何了。”

李耀宇書中說，作為中宣部研究員的王茜，是在凱豐身邊工作，欽佩他的革命經歷和學識，再加上兩人有共同語言和興趣愛好，才日久生情的。為此，凱豐與廖似光之間的爭吵越來越厲害。一天，李耀宇正好看到“穆桂英”拿著一把短刀，怒氣沖沖地走上楊家嶺，她推開凱豐的窯洞木門，王茜和凱豐兩人正在裏面。凱豐問：“你幹啥來了？”廖似光大喊：“來殺你的，把你們倆都殺了！”說著，揮刀刺向王茜。凱豐瘦弱，也沒有搏鬥經驗，他挺身護著王茜，又用手掌抓住刺來的刀刃，“穆桂英”則抽回短刀，凱豐的手掌被割開一道長長的傷口，鮮血立刻流了出來。這時，李耀宇從身後抱住“穆桂英”的雙肩，使她不得動彈，又大聲呼喊。這時，住在隔壁的延安女子大學校長趙毅敏等人跑來，眾人推搡著把“穆桂英”請出窯洞。凱豐此時冷冷地看著流血的手掌，不知所措，李耀宇說：“部長，快把手使勁攥住傷口，別讓血再流了！”

李耀宇回憶，後來凱豐與王茜在楊家嶺結婚時，十分冷

清，無人前去祝賀，王茜就這樣悄悄搬進了凱豐的窯洞。等到1943年李耀宇離開中宣部到棗園時，25歲的王茜已生下了一個男孩。

革命者擺脫不了封建縲紲

不過，與建國後位至廣東省第四屆和第五屆政協副主席的廖似光相比，王茜後來的人生命運，顯得是那麼悲慘與不幸。陳辛仁書中回憶，“文革”期間，他從外交學院造反派專門設置的專案組成員口中得知，凱豐後來又有了新歡，為了再娶新歡而拋棄王茜的時候，他曾散佈過“房紀已經死亡”的謊言。但此時的房紀，已被孤零零地拋棄在關外瀋陽，早成了一個精神病患者。“文革”當專案組成員前去向她詢問前夫陳辛仁的歷史情況時，她兩眼直視前方，旁若無人地說：“是共產黨派來的嗎？我準備去開黨代會去了！”經過幾番訊問，專案組仍一無所獲。房紀後來患了癌症，死於1971年4月，終年剛及52歲。房紀去世時，身邊沒有一個親人，在當地居委會和鄰人的幫助下，她的骨灰撒在了北大荒的黑土地上。

一個生命就這樣消失了。無論她是叫房紀，還是叫王茜；無論是作為一個革命者，還是作為一個女人，都在一場反復離散的婚姻中，成為被強權男人所拋棄的悲劇人物，隨風而逝了。有多少自以為被共產主義理念所解放的女人，即便是革命者，也最終擺脫不了千古不變的封建縲紲。（魯直人）■

他見過很多中共最高領導人

被人稱為“當代中國政治人物的活辭典”的司馬璐，這個名字就濃縮了豐富信息。他自己不無得意地說：“我這一生中，一個特別的經歷是，我可能是見過當代中國政治人物最多的人。”

他見過很多 中共最高領導人

當我走進老人院的房間時，92 歲的司馬璐正坐在輪椅上聚精會神讀報，中文報紙攤了一床。

字很小，又是繁體字，望去密密麻麻黑糊糊一片，但老人卻似乎樂在其中。翻開的這一版上，赫然有大字標題“中國肅清腐敗，難也”。

老人對“你不戴老花眼鏡竟能看報”的驚嘆，浮起一絲微笑，無言地領受，似乎這是小菜一碟，我如此大驚小怪，倒反而是小瞧了他。不過，他還是頗帶愧疚地說：“我九十多了，記憶力不行了。”

在我看來，與其說他記憶力不行，不如說他的口頭表達有點力不從心。當我問到某位他認識的歷史人物時，從他的表情就可以看出，他不僅立即想起了那個人，而且分明在腦海中身臨其境，回到了當時的場景，只是他不能細細對我講述了。

對於一位以歷史為業、以文字為業的人，找不著一個合適的詞兒恰當地表達感受，真是一種折磨！

中共追隨者－同路人－反對派

以中共黨史專家著稱的司馬璐老人，此前我見過多次，但可惜無緣深談，只是聽過他演講，讀過他最後的一本書《中共歷史的見證》。

司馬璐這個名字，就濃縮了豐富信息。

他本不姓司馬。“五四”運動爆發的 1919 年，出生於江

蘇海安，是個私生子，由一位馬姓人家收養，於是便姓了馬。讀過兩年私塾、三年小學，隨後行乞、揀破爛、當學徒、當報館練習生和圖書館管理員。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之後，他取名馬義。1937年，18歲的馬義被中共發展入黨，隨後來到延安，曾任抗大圖書館主任、《新華日報》駐延安辦事處主任，據其自述，還一度擔任幾個機構合併而成的新華通訊社的通訊部主任。

但是，在中共黨內，他只待了四年。期間，組織上對他被捕後是否寫悔過書或自首，以及在延安是否參加過一個叫“新哲學研究會”的小團體進行審查，讓他感到在這個革命隊伍中，很難真正受到信任。1939年他被中央組織部長陳雲派到重慶等地工作後，在思想上漸行漸遠，終於脫黨。

司馬璐加入過中國民主同盟，又在重慶創辦過一個“中國人民黨”。1949年底，他隻身從上海到香港定居。此後，司馬璐憑藉自己對眾多中共重要領導人有過直接觀感的得天獨



司馬璐的最新著作《中共歷史的見證》（明鏡出版社）

厚的優勢和在中共黨內外的人脈，投入對中共黨史的研究，自辦了自聯出版社，從舊書堆中悉心搜購到很多資料，分門別類出版。由於追慕中國歷史泰斗司馬遷，又思念年輕時的戀人璐，他便改名為司馬璐。

從中共的追隨者，到中共的同路人，再到中共的反對派，這就是司馬璐人生和思想軌跡的三部曲。

司馬璐說，“我的半生政治生活，也成為中國這一代不幸的青年的一個縮影”。“整個中國的一大悲劇，也鍛煉了我們這一代青年為中國的前途和出路找到最後一個結論。這結論就是：個人自由、國家獨立、現代科學，三者是中國人民不可分割的基本要求。基於此，我們的觀念和共產黨人之間，根本是無法共存的。”

見過當代中國政治人物最多的人

司馬璐被人稱為“當代中國政治人物的活辭典”。他自



司馬璐將他編纂的《中共黨史暨文獻選粹》12大冊帶到了老人院。

己不無得意地說：“我這一生中，一個特別的經歷是，我可能是見過當代中國政治人物最多的人。”從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共產黨人中，他見過毛澤東、張國燾、王明、博古、劉少奇、張聞天、朱德、彭德懷、周恩來、林彪、陳雲、鄧小平、康生、高崗、潘漢年、王稼祥、柯慶施、董必武等；中國民主黨派中，他見過章伯鈞、羅隆基、張瀾、沈鈞儒、張申府、張君勱、梁漱溟等；國民黨人中，他見過蔣介石、蔣經國、陳誠，還結識過徐復觀、雷震。中共幾個後來成為話題人物的知識份子，像王實味、鄧拓、田家英，都是司馬璐在延安時期的好友。

值得一提的是，他與中共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的養父江上青也相當熟悉，他把江上青和自己的關係，稱作“亦師亦友”。他還記得，江上青讓他讀了《共產主義ABC》（布哈林）和《費爾巴哈論》、《哲學的貧困》（恩格斯），還有蘇聯的一套哲學著作，還將共產黨的一些文件給他讀。

司馬璐在延安時，正是血氣方剛，這就不難理解，他對延安的一些活躍女性也記憶猶新，像王明的妻子孟慶樹，“美麗大方”；陳昌浩的妻子張琴秋，“聰明能幹”。至於江青，司馬璐更說：“我清楚地記得見到她的那一天。為什麼呢？因為1938年1月28日，是日本人進攻上海發動‘一二八’事變的日子，那一天在延安有一個紀念晚會，會上有一個話劇演出。這個話劇的主角是孫維世，江青做配角。”

在歷史舞台的聚光燈下，司馬璐一度跟這些風雲人物同台；後來，他激流勇退，到舞台側幕後的一隅，咀嚼酸甜苦辣，

總結一處處陷阱和死角急彎。最後，他來到這裡，從紐約法拉盛的一家老人院，遠觀中國舞台上新一代明星的表演。

老人院裡他的書最多

老人院兩位老人住一間房，房間不算大，但還實用，衛生間考慮到了老人的特點和需要，相當寬敞，輪椅推進去都可以轉彎，牆上也安裝了結實的扶手。

我沒有見到司馬璐的室友，他告訴我，那是位意大利裔老人，屢屢嫌房間內太悶，於是常常去活動室、閱覽室，或者別的老人房間串門聊天。這也好，與司馬璐可以互不干擾。

司馬璐很少串門。他有自己的樂趣：讀書、讀報。書報



晚年張國燾。

中或許沒有黃金屋、顏如玉，但卻是一片浩渺天宇，任他的思緒遨遊，天馬行空，“精驚八極，思接千載”。

老人院管理相當嚴格周密。在我與司馬璐聊天的這段不長的時間內，護理服務人員三次進門來探望老人。一看他有客人，禮貌地跟我打個招呼，問問他有什麼需要，便退出門外；也巧，正是一黑一白一黃，黃的那位，看上去像華裔，卻不會說中文，司馬璐說她是韓裔。她告訴我，整個好幾層樓高的老人院，沒有哪一位老人，有“Mr.Ma”這間房裡這麼多圖書雜誌。

這些書刊，有的是他正在讀和打算讀的，有的是他撰寫和編輯的，在床榻旁的書架上擺放得滿滿當當。

這在司馬璐畢生撰述編纂的書刊中，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司馬璐離開中共之後，在重慶組織中國人民黨，曾主辦《自由東方》、《人民週報》等雜誌；1949年定居香港，他出版《展望》雜誌；1983年移居美國，他又主持《探索》雜誌。

1952年他在香港出版《鬥爭十八年》，寫出自己從投奔共產黨到告別共產黨的曲折歷程；他主編了一套《中共黨史暨文獻精粹》。

幾十年間，司馬璐保存了不少中共的原始資料，也通過自己的研究、查證糾正了不少原先黨史上的錯誤，業內人士指出，這有很重要的史料價值。司馬璐舉過一例：

“原來大陸一致公認在中國最早介紹社會主義的出版

物是在 1905 年……後來，我找到了在 1902 年（即清朝光緒二十六年）出版的一套木刻版的三本書，這一套書我從舊書店買來才五毛港幣，後來，它的拷貝件一份就賣一百港元。”

司馬璐還對若干中共領導人物，如瞿秋白、張國燾等，作過深入的專門研究。他告訴我，瞿秋白他並沒有見過，但非常景仰他、欽佩他，所以寫了一本《瞿秋白傳》，這是他寫得最早的一本書。

“張國燾我很熟，他長得很高大、很儒雅。”司馬璐直言：與中共創始人之一張國燾不僅有很多交往，並且對他印象很深，中共官方黨史中，按照毛澤東的旨意醜化張國燾，常常並不符合事實真相。

司馬璐在回答周義澄問題時說，他與張國燾是後來在香港真正認識的。在陝北見面是在 1937 年底，梁漱溟訪問延安時由張國燾主持的歡迎會上。此外，司馬璐還聽過張國燾的課。他認為，張國燾吃虧在江西土話太重，別人聽不懂。

“他對政治經濟學很有研究，聽課時聽得出來。他是北大的學生，有書生味道。”

司馬璐也熟悉張國燾的夫人楊子烈，告訴我“她人長得並不漂亮，但是非常能幹”。

用自己的眼看，用自己的心想

司馬璐告訴我，老人院的生活很有規律，他早上八點鐘

就起床了，然後在護理人員協助下在走廊裡散步；天氣晴好時，也到花木蔥蘢的庭院去呼吸新鮮空氣。房間裡一人一台電視，可以各得其所。到進餐時間了，就都到餐廳。老人告訴我，“這裡不供應中國飯，但是還是照顧到了亞裔的飲食習慣。別的族裔的食品，我也吃得慣。”

吃完飯，他回到自己的房間，翻開書刊——頓時，思緒脫離了輪椅、臥榻和床頭櫃上高高低低的藥瓶，回到了海安、陝北、重慶、香港，掠過多姿多彩的生涯，掃視有聲有色的人物……

司馬璐對中共黨史上許多重大事件和人物，都有自己不從流俗的獨立看法。

他說，在中共領導人當中，延安時期的敵區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潘漢年“是我所最喜歡的兩個人之一，另外一個是董必武”；他對周恩來和高崗的評價卻很低。

他不贊成把陳雲說成“左派”，把鄧小平說成是“反左的英雄”，談起史實根據來，有條有理。他說：“陳雲在中共歷史上是老右派，鄧小平是左右反覆過好幾次的。在五十年代赫魯曉夫上臺不久，陳雲在當時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理論性、報導性的雜誌《和平與社會主義》月刊上發表過一篇文章，大大地吹捧赫魯曉夫。蘇共二十一大後，該雜誌編輯部‘請求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一些活動家’就蘇聯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國際意義談一些看法。陳當時以中共副主席的身分在該雜誌的1959年第一期上，著文稱讚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一

大的報告‘向全世界展示了蘇聯走向共產主義的康莊大道’。

‘文革’時中共稱劉少奇是‘中國的赫魯曉夫’，依我看，陳雲才是‘中國的赫魯曉夫’。”

司馬璐很感激陳雲。他在延安受到審查時，擔任中央組織部長的陳雲將他派到重慶去工作，“陳雲還講了幾句訓導和鼓勵的話，給了我八塊大洋，讓我走路。這是1939年。“現在想想，我得感謝陳雲，要不是他讓我離開延安，在後來的‘抓特務’運動、‘搶救’運動、‘整風’運動中我總難逃一死，可能象王實味一樣。”

到後方後，他被派到朝鮮義勇軍的中文編輯委員會裡工作，“周恩來跟我說了很多為什麼要做朝鮮義勇軍工作的原因。那時我的工作主要是把義勇軍的人搞到華北，去配合八路軍抗日。周恩來要我做義勇軍隊長金若山的工作。金若山就是金元鳳，後來是北朝鮮勞動黨的中央委員，內閣勞動相。當時我還擔任了金的秘書，寫了一些關於朝鮮問題的文章在《新華日報》、《群眾》雜誌上發表。周恩來交給我的任務是說服金若山答應把手下的人員轉移到華北。而這支軍隊原來是國民黨支持的，所以我算是立了功，也因此恢復了共產黨的黨籍。”

“共產黨怎樣征服中國大陸？”

黨又要他了，他卻不想再要黨了。

我向他請教黨史方面的問題，司馬璐翻出他的文章剪報，指點我看。在一篇題為“共產黨怎樣征服中國大陸？”的文章中，他寫道：一些淺薄的西方觀察家說：“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是一個農民革命”，中共“還有點民主氣味”，中共“是民族主義者”，中共“政府是一個有行政效率的政府”……

司馬璐寫道：我要指斥，所有這些看法都是極端荒謬的。我願引述事實，支持我的反駁。根據我過去在中共黨內的體會，中共對中國的農民要算是最缺少關心了。第一、中共的領導成分，真正農民出身的要算是最少了。第二、中共的軍隊90%以上是農民，但是，中共一向歧視農民幹部，認為農民自私、短見、不可靠、易於動搖。第三、馬克思主義的經典和中共的領導者都曾一再的說過：“分散的小農經濟是資本主義復活的溫床。”第四、中共的土地改革，常被若干糊塗的人誤認為中共分了土地給農民，這塊地就屬於農民所有了。這是大謬的。關於中共對土地問題的政策，我在延安聽過毛澤東、劉少奇、陳雲（現任中共中央人民政府副總理）、任弼時（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四個人的演講。中共的觀點是：共產黨當然反對土地由私人佔有，主張集體農業制度，但是，當農民現在還不瞭解集體化的“好處”的時候，就暫時給他們土地吧。他引述任弼時的話：“農民掌握土地，我們掌握糧食，土地重要呢，還是糧食重要呢？農民當然是要選擇糧食的，他們就會自動接近我們的集體農場，最後，個體的小農經濟也就會自動的消滅了。”



司馬璐的部分著作。

司馬璐在反駁“中國共產黨還有點民主氣味”時，舉出一個實例：陳雲在延安還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的時候，他對我們說過：“不錯，我們的黨是依靠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的，但是，每一個共產黨員應該無條件的服從黨的紀律，執行黨的命令，否則，我們就不成其為一個布爾什維克的黨了。”

司馬璐還反駁有人說中共與黨外人士“合作”可能要“民主”些，稱“這又是糊塗的看法”：中共的統戰政策，其目的僅在分化與瓦解敵對陣營。當中共與國民黨“合作”的時候，周恩來在重慶一再高呼“蔣委員長萬歲”，我們卻在延安作“推翻政府”的實際準備；當中共與民主同盟“合作”打擊國民黨的時候，中共的機關報《新華日報》正在刊登民盟的文告，而

中共在重慶的負責人徐冰私下對我大罵民主同盟的一批人是“臭官僚、爛政客”；有一位著名的哲學家張申府，過去一直是同情中共的，只有一次和中共的意見相左，竟被斥為“國民黨的幫凶”……“以上這些都是我親眼目睹的事實”。

而對於“中國共產黨是民族主義者”，司馬璐說，在中國對日抗戰期間，我所見到的共產黨中上級領導幹部，他們對於打日本人並不十分熱心，甚至可以說也不十分關心，同志間日常所談的多以對國民黨的鬥爭和蘇聯的勝利為主題。中共當時對抗戰有兩套做法，一面以抗戰的宣傳爭取青年；一面與日本人秘密合作打擊國民黨。

毛澤東打倒劉少奇，使他發了一筆財

我早就聽說司馬璐“文革”期間出版了一本《劉主席語錄》，在香港發行，他為此發了一筆財，但在老人床邊的書架上我卻沒有找著。便問他，他一笑：早就沒有了！

“文革”初期，司馬璐讀過當時在全國發行了上億冊的《毛主席語錄》後，認為毛、劉二人的思想觀點有同有異，毛未必全對，劉未必全錯，靈機一動，編選了《劉少奇選集》和《劉主席語錄》，並於1967年6月在香港先後出版，竟然大為暢銷——《劉主席語錄》比《劉少奇選集》更暢銷，甚至有人排隊搶購，一再重印了約五萬冊，還被譯為英、法、日多種文字出版。英文版印數最多，法文版印得最美，日文版宣傳

廣告最多——據說日文版銷量曾高達 15 萬冊。這當然拜毛澤東要打倒劉少奇之賜，讓海外讀者都要瞭解，劉少奇到底怎麼得罪了毛澤東，讓毛澤東雷霆震怒，非打倒他不可。人們從這毛、劉兩位主席的語錄來對照、思考、判斷中國大陸兩條路線的鬥爭。

據有關資料介紹，《劉主席語錄》與《毛主席語錄》在開本、封面、版式上大體一模一樣，

也是小本紅塑料皮，書名也用燙金字，書前有劉本人正面半身照片、“劉主席與毛主席合影”，以及劉少奇的題詞手跡：

“學習雷鋒同志平凡而偉大的共產主義精神。”

《劉主席語錄》110 頁，定價港幣一元五角，內容分編為 33 個專題——《毛主席語錄》也是分 33 個專題。編者這樣安排，顯然意在表明毛、劉曾是最親密戰友。小書中還刊有劉少奇簡歷、生平事略。扉頁上印的則是“全中國的愛國者，團結起來！”在第一頁上印有“最高指示”，這在“文革”中，就是“毛澤東語錄”的同義詞，但這本小書的“最高指示”，卻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9 條、40 條、41 條、42 條、45 條——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產生、職權、地位和行使職權的期限。司馬璐的意圖很明白：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那麼，中國的“最高指示”理應是憲法，而不是任何領導人的言論。

談到此書在海外熱銷，司馬璐曾坦率地說：“靠這本小書，我賺了一大筆錢：譯為外文按國際慣例都給版權費。這

樣，我在香港才能買到多年渴求的一幢自家的住房，還到世界多國旅遊。當時中國大陸‘破除資產階級法權’，取消了稿費，又沒有加入國際版權公約。不然的話，我還應該送給王光美女士一筆原始版權費。”

不過，好景不長。1968年11月1日，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批准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決定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劉主席語錄》這本小冊子也就運交華蓋了。香港造反派在一個夏日午夜，衝進自聯出版社門市部縱火全部燒毀，當時香港報刊曾以“火燒《劉語錄》”為題予以報道。此書就這樣付之一炬，司馬璐於1983年從香港來到紐約定居時，一本也未帶來。

談到中共黨史研究的回報，還有一件事也值得一提。

司馬璐對中共黨史的研究成果，發行對象也包括中國大陸當局。司馬璐的解釋是：中共宣傳的黨史中“有許多虛假、偽造的東西。‘文革’中，大陸又毀掉了很多黨史資料。‘文革’後期，中共當局設法從國外、黨外引進黨史資料。他們也派人與我聯絡，向我收買黨史資料，其中包括我所編著的《中共黨史暨文獻選粹》12大冊。我當然是明碼實價。中共都是經由中國銀行付款。‘四人幫’垮台後，中國銀行一度不認‘四人幫’時期向我買書的賬，我就在《展望》雜誌上寫文章向華國鋒討債，不久他們也把欠賬給清了。”

朝花夕拾譜出感人黃昏戀

談司馬璐，不能不談到他與戈揚的一段傳奇戀情。

海外著名記者曾慧燕在《司馬璐、戈揚結連理》的特寫中寫道：司馬璐“與70年前青梅竹馬的‘紅衣少女’戈揚（本名樹佩華），譜出一曲感人的黃昏戀……在曼哈頓移民局法庭舉行特別婚禮，一對新人正式結為‘老伴’，喜極而泣，場面感人”。

戈揚大司馬璐三歲，同為江蘇海安同鄉，70年前，兩人在鎮江一起參加共產黨外圍組織“讀書”，司馬璐回憶，年青時的戈揚“非常漂亮”，喜歡穿一襲紅衣，司馬璐對戈揚情有獨鍾，“紅衣少女”的形象多少年來一直烙在他的腦海中。“可是，那時追求戈揚的人太多了，我怎麼排隊都輪不到。”而且，在“紅衣少女”眼中，那時的司馬璐只是“一個黑黑瘦瘦的大孩子”。

後來司馬璐去了“革命聖地”延安，戈揚成為新四軍和《新華日報》著名女記者。巧合的是，兩人分別在周恩來和鄧穎超夫婦手下工作。他們雖曾在重慶偶然相遇，但那時兩人都準備為共產主義理想拋頭顱、灑熱血，置生死於度外，見面時礙於革命紀律，也將兒女私情拋在一邊。命運捉弄他們，由於各自都改了名姓，竟完全失去聯繫達數十年之久。後來，司馬璐“覺今是而昨非”，脫離中共，1983年自香港移民美國；戈揚卻對革命堅定不移，中共建政後曾任新華社上海分社

社長，並出任《新觀察》主編，1957年“反右”和“文革”中遭到厄運，下放勞動改造長達21年，受盡折磨，1989年4月下旬，戈揚應邀赴美國出席學術研討會，因為“六四”爆發被迫滯美。

難能可貴的是，兩人雖然後來的經歷不同，但爭取中國的獨立、民主和人民的自由、幸福而鬥爭的初衷，卻始終未曾改變。令人驚異的是兩人“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杜甫詩），卻似乎在冥冥中遙相呼應：就在戈揚在北京任《新觀察》主編，1957年被劃右派，雜誌停刊時，司馬璐在香港辦起《展望》，刊名都珠聯璧合，好像兩人演出一場“接力賽”。

歷盡劫波，殊途同歸。司馬璐在中文媒體上看到有關戈揚的報導，覺得似曾相識，後來才知她就是當年的“紅衣少



司馬璐與戈揚。

女”樹佩華。半年後，兩人在紐約重逢。

同為“天涯淪落人”，戈揚說：“70年前，我們做過同一個夢，今天我們還做著同一個夢。”1993年，司馬璐大病一場，戈揚在病榻前悉心照顧；其後他們相互關照，終於在2002年9月13日在紐約曼哈頓移民局法院舉行特別婚禮，獲得了所有人的祝福。

2009年1月18日凌晨，戈揚在紐約法拉盛醫院病逝。

永遠生活在對未來的向往中

92歲的司馬璐，不能系統地回答關於黨史的諸多疑問。但他的許多隻言片語，浸透真知灼見：

——我覺得，在早期共產黨人中確實有一批真正的理想主義者，值得尊敬。共產主義作為一種學說，也可以研究。但是，當後來他們把它變成了一種巫教，就造成了全國性的災難。

——共產黨對很多事情有雙重標準，對外講，平型關大戰和百團大戰是共產黨的功勞，但是對內講，毛澤東的看法卻完全相反。毛澤東說，日本人侵略越深，對共產黨發展越有利。

——共產黨認為，為革命講假話，理直氣壯。講假話是從毛澤東、周恩來這些領袖開始的，劉少奇講得很清楚，做共產黨員就是要做黨的工具麼。

.....

我帶來一本《中共歷史的見證》，請作者簽名。司馬璐欣然同意，從床頭櫃裡摸出筆來就寫。

但是寫完後，老人卻磨磨蹭蹭，不肯遞還給我。我不解其意，只好等著。他沉吟再三，才帶著商量的口吻說：光寫高伐林，感覺不好，我就寫上“兄”吧？

我說，我是晚輩，您這樣稱呼我不是折我的壽嗎？

但老人已經在我的名字後面，添了一個“兄”字。

護理人員進來告知：開飯了。於是我推著老人的輪椅出門。

剛才還自謙自己記性不好的司馬璐，卻回過頭來叮囑我說：出門了就不要照相了，老人院有規定，不允許照相。

司馬璐在這裡孑然一身。我問他，在這裡感到寂寞嗎？他搖頭。

他生活在往事中，生活在思索中。而他的往事和思索，都貫串著對更美好未來的向往。那麼，也可以說，老人仍然生活在對美好未來的向往中。（高伐林）■



後記

後記

本書主要內容來源於明鏡網(mirrorbooks.com)、《新史記》、《內幕》、《大事件》和《明鏡》月刊。

感謝本書所引用的相關資料和評論文章的作者和媒體。書中所引用的資料儘可能都註明其出處和來源，但因有些文章在網絡中幾經轉載，實難辨清其初始來源。如有錯漏，特表歉意，並懇請來函說明，若有機會再版時一定補正。

辛紅將

2013年7月

